

● 马善·达格芬·嘉图 著
● 杨建元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走向革命



走向革命

——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
中国共产党 1937—1945

[瑞典] 达格芬·嘉图 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933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1129332

走向革命

——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
中国共产党1937—1945

〔瑞典〕达格芬·嘉图 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25印张 334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200册

ISBN 7-80023-020-1/K·73

书号 11510-69 定价 2.70元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
1983年英文原版（第1版）译出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专著。作者以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为着眼点，阐述了这些政策所导致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的深远变化，探讨了党的经济、政治政策与抗战军事任务的有机联系，并从中寻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内在原因。从总体上看，本书的论述角度较新颖，研究较客观，资料较全面，特别是作者大量使用的日本方面保存的我抗日根据地党的文件资料，是国内难以见到的。以上种种，对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作者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全都核实。个别人物、地点、书刊和文件的名称，在确实查不到出处和标准译法的情况下只好揣译。原书书末文献目录中的英文书目和日文书目，因和注释部分的有关内容重复，都略去未译。文献目录中还有个别书名和资料名，作者本身就未注明版本出处。此外，作者在书中把抗战时期的北平一概称作北京，对此，我们亦未作改动。再者，凡我们在书中添加的注释，均以“译注”字样标明。

在本书的整个翻译校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张天荣、何理老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孙培恕教授，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光辉老师等的大力帮助和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4月

鸣 谢

如果不是幸运地得到了广泛的帮助，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安藤正、弗兰克·鲍德温、古岛一夫教授、琳达·格罗夫、小岛教授、哥拉恩·马尔格韦斯特、中野秀美、铃木豊、内田友行、山岸秀夫和山内一夫教授所给予的广泛而真诚的捐助，使我受惠不浅。非常感谢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东京经济发展学院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它们向我提供了便利和优越的研究环境。感谢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京文库和东京大学东方文化学院，它们使我得以见到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我还要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所给予的慷慨的财政资助。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抗战的深远意义和重要发展	(7)
第一节 战争的双重性质	(7)
第二节 准备出场的人物	(15)
第三节 阶段	(21)
第四节 地区差别	(29)
第五节 边区的形成	(34)
第六节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 A	(40)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 B	(45)
第七节 勾结	(58)
第八节 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65)
第九节 政策的调整	(74)
第二章 战争、社会变革和阶级	(78)
第一节 日军的暴行和人民的抵抗	(78)
第二节 农村的变革和群众的参战	(81)
第三节 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89)
第三章 1937—1940年：溃退、阶级斗争与扩张	(93)
第一节 初期的占领	(93)
第二节 溃散与混乱	(98)
第三节 新政府和群众政治的开始	(101)

第四节	税收制度贯彻中的临时性与不稳定性·····	(115)
第五节	党的发展——数量与质量·····	(121)
第六节	军队的建设·····	(124)
第四章	从内线防御到人民战争·····	(135)
第一节	“强化治安”·····	(135)
第二节	与生产相结合·····	(138)
第三节	军队化整为零·····	(141)
第五章	1941—1945年：调整和群众的权力·····	(147)
第一节	党和群众的活动与斗争·····	(148)
第二节	统一累进税·····	(161)
第三节	减租减息·····	(168)
第四节	土地政策的转变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187)
第五节	生产运动·····	(201)
第六节	合作劳动·····	(209)
第七节	财政·····	(223)
第八节	战争与生产相联系·····	(229)
第九节	人民参政·····	(242)
第十节	社会变革与人民战争·····	(259)
第六章	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变化·····	(263)
第一节	教育·····	(263)
第二节	报纸·····	(275)
第三节	妇女·····	(277)
注释·····		(286)
1941年以来延安《解放日报》有关文章的目录·····		(343)

引 言

共产党人菲茨杰拉德在描述 1937—1945 年的中日战争时写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公开的、其事实在当时很少被大多数中国人和外部世界得知的战争。”^①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了解这场战争，至少是它的社会历史。八年抗战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分水岭，更是出人意外。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一支能够直接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力量。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场革命运动发展得如此神速。”^②

试图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是查尔默斯·A·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1962 年)^③。对中共战时政策的动力缺乏研究，是此书的民族主义论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对其加以评论）引起论战的一个原因^④。有两篇博士论文（李·尼哥克，1968 年^⑤，卡尔·依·多列斯，1975 年^⑥）特别论述了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基础问题。从战略上说，占领这个地区比占领华中华南远为重要。在这个地区，中共坚定地站稳了脚跟，发展了党员，补充了军队。1974 年，片岗哲也的著作也涉及了这个问题^⑦。和约翰逊相比，这后三位作者都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思索中共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分析与战时中共力量的扩张分不开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与农民当中较贫穷的部分（下称贫农和中农）的客观利益相符合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开展和支撑真正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我按照他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使用客观以及主观的因素、条件等术语）。第二，对于进行艰苦斗争的农民来说，（动员他们

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即推翻旧的、顽固的统治势力的阻碍的必要性,必定意味着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第三,阶级斗争的目标,不是把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消灭,而是吸收这些人,使他们居于次要地位,利用他们,因为这种斗争需要广泛地动员群众。这就是农村的联合战线。

尼哥克、多列斯和片岗哲也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不过,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动态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实质性的影响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农村财富重新分配的事实,尽管他们对改组后的政府行政机构中阶级力量的变动很少论述,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变化的一致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的、辩证的关系也没有进行综合的、有条理的分析——例如,没有详细阐述对地主、富农的垄断地位的剥夺是怎样强烈地影响着中农尤其是贫农的。

我更强调这些根本性的变化与中共在以后的内战中以席卷千里之势所迅速获得的胜利的有机联系。我还不同于这三个作家的地方,是注意到了军事任务与努力发展经济的关系。对这种相互关系,我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论述。把这三位作家混为一谈是不公正的。李·尼哥克的论述尽管简短,但或许因为他是唯一广泛利用了最普遍且最有价值的主要资料——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人,到目前为止,他对社会变化的实质的看法仍是最敏锐的;多列斯特别注意枝节问题,经常看不到发展的主流。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农村社会的改变如何成为1937年至1945年中共在华北敌后急剧地、大规模地扩张的条件,以及它如何使各阶级的力量均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并不打算对中共的政策、实践作全面论述。在交代了基本背景后,我集中阐述的是那些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改组带来了影响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本中日战争史。读者将会发现,这里边没有或几乎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或党内的政策争端。当然也有例外,但它们并不妨碍上述本书主题的基本连贯性,至少在对党的基本

政策的推行的介绍上是这样。再说，领导之间的分歧已受到了我特别的注意。

毫无疑问，对政府和官僚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的情况加以阐述，将会提高本文的价值，但由于材料缺乏，这一点只得作罢。任何详细的法令和法律都可以得到，但是这些组织的实际作用却很难描述，因为不仅明显地存在着地区差别，而且实践活动和指示、法令也常常不一致。不过这一类令人遗憾的缺漏，并不影响我的基本结论。

尽管一般的特征很明显，但资料的不完全给确定阶级结构和阶级界限带来了困难。在区别农村的阶层或阶级时，我运用了中共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或者雇农的标准。这种划分标准是1933年10月首次提出的，以后并没有做大的修改：（1）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2）富农。在通常占有一部分土地的同时，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3）中农。经常受剥削，但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不从事剥削。“许多”中农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有一部土地，另租入一部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或主要靠自己劳动。”（4）贫农。区别于中农的主要标志是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有“一部分不完全的工具”，不得不至少租一部分必要的土地来耕种，以维持生计，“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5）工人或者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⑥。

学者们一般认为，华北的租佃并不象南方那样广泛。注意到对地主、富农的宽泛定义很重要，他们的剥削并不必然地表现为

地租形式。进一步说，农村的改组使地主和富农居于次要地位，这是符合上述后三个阶级，特别是大量贫农的客观利益和要求的。所以，这种划分看起来象是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划线（还有一些既不是剥削者又不是被剥削者的人）。根据上述 1933 年的文件，地主阶级事实上不可能主要地或者完全地只参预经济过程：“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故压迫者与剥削者是同一的。

战时党的文件经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最为流行者有如“土豪”、“劣绅”，也有大量其它的称呼），地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规定清楚地主的活动的特殊本质。为了平息自下而来的对农村的根本改革的挑战，地主以及富农被联合成一支成份极不纯的（充满尖锐矛盾的）力量——尽管极不稳固，这是党要达到的重要改革目标。各种其它的名称由于方便的原因也在本文采用，如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集团、绅士、富人等。

改组农村的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强调。然而地区的差别，尤其是各地在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上的相当大的差别，使这种特殊的、辩证的相互联系趋于多样化。在某个局部，一定的政策可能是不相关或者不重要的。例如，在租佃关系并不普遍的地区，减租减息可能并没有普遍实行；而在另一个地区，这个政策可能又是决定性的。所以，就理解战争期间中共的大发展与群众的广泛动员的关系而言，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改革动因或者因素能提供答案，我们必须看到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当然，在使农村社会革命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巩固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和在核心地区贯彻的过程中，党的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有些政策会更重要一些。

尽管局部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及正如我在许多地方所说的实际政策的落实很不平衡，历史性的重要趋势还是清晰地 在社会变化这个主题上集中展现了出来。诚然，党的纲领的真正深刻的影响，仅仅在党控制下的相对小的地区才或多或少地看得清楚，然

而，乡村中发生的变化却是一种质变，并且在广泛地展开和延伸。这种变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1948—1949年统治权的易手，激起了中国革命的群众性大变动。正是由于没有能力掌握社会变化的辩证法，迈克尔·林赛才认为中共力量扩展的原因在于战争后期日军的撤退。按照林赛的观点，假如不撤退的话，“日本人或许就能够把华北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地下组织的水平，华北共军也只能是一些零散的山区游击队”^⑥。

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也称边区，这种社会变化发展得最彻底。本文涉及到四块这样的地区：比较先进和广阔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地区，晋绥和山东地区（参看第一章第五节）。顺便指出，本书考察的重点是边区较稳定的地方，因而对党的政策在整个边区贯彻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难免有照顾不到之处。

关于原始的中共文件，我们已经注意到1941年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的重要性。它刊有大量的，来自敌后边区的有很高资料价值的报告。《解放》周刊（它的出版周期有时拖得更长）也载有涉及各个领域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群众》和《八路军军政杂志》虽相对次要一些，但也有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也是被经常引用的期刊。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各种题目的战时材料集，其中包括石进堂的《生产运动·互助》和《教育杂志》。一些非中共人士办的中国杂志和一些中国作家的采访报道也被采用。他们包括丁玲、陈克寒、李公朴、李菁、周而复、周立波，他们都是中共的同情者，或许陈克寒更甚。他们是想严肃地探讨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宣传家。

关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战后党的原始资料作了特别多的阐述，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但并不侧重于分析。对于很难详尽论述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来说，这是很正常的。然而，也有两点很明显的例外，即齐武关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发展的研究以及李成瑞关于税收引起各阶级沉浮的调查。就齐武来说，他突然意识到了在考察逐步形成的革命性变化的过程时不能与官方关于战时中共地位

的解释相悖的必要性。在战时能够缓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矛盾的重要的统一战线宣传，令人费解地延续到了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东亚》、《满铁调查月报》的文章和狩屋久太郎及草野文男的书以外，战争时期日本方面的材料都是保密的。《情报》、《通讯》、《特殊情报》和《思想月报》上的许多文章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指当时日方翻译的中文资料——译注），而《剿共指南》中的那些文章是日本的研究者写的。经常被引用的一部著作是多卷本的《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农业政策》（1941年），其中有许多翻译过来的中共地方文件，并进行了分析。两卷本的《北支治安战》（日本防卫厅1968—1971年出版），含有军队的调查材料，也有很大的用途。

在谈到由访问过中共地区的西方观察家撰写的书和文章时，人们一定记得，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旅行，并不是有紧密组织的、象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惯例那样的旅行。但尽管有大量的日本和国民党^⑩特务进行文化围剿和搞屠杀活动，西方观察家实际上仍能在这个地区活动，并且从特务的监视中安全地摆脱出来。

有两个人的名字，由于其卓越的报告，特别值得提出来，他们是杰克·贝尔登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前者生动的、脍炙人口的《中国震撼世界》，不仅有描写内战时期的材料，而且有抗战时期的材料，包括他自己收集和采访的材料。史沫特莱的《中国向落后开战》，是一篇非凡的但被忽视了的、描述她在战争初期和八路军在一起时的见闻的著作^⑪。和贝尔登的某种程度的超然处理相对照，史沫特莱坚定地献身于中共的理想事业，然而她审慎地把握着自己独立的判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毫无疑义地让他们的领导者安排。”^⑫ 她为在采访中共各级领导或官员时能够了解到如此多的情况而感动。这对于I·爱泼斯坦的《中国没有完成的革命》和T·A·比斯恩的《1937年6月在延安》来说，也确实如此。

第一章

抗战的深远意义和重要发展

第一节 战争的双重性质

战时中共官方的声明强调民族团结，但团结不是无代价的，而是又团结又斗争，中共仍然强烈坚持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许多文章也都表明了这场战争的两重性质，即反帝和社会的变化。

毛泽东在论述战时党的双重目标时，几乎是惊人的坦率，1937年6月，他对新闻记者T·A·比斯恩说：

“这（指抗日）也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因为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在中国，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革命是会成功的。”^①

确实，在中共控制的地区，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取得了成效。1938年5月，毛泽东大胆地预言，这场战争就是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变旧中国为新中国^②。中共的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更明确地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在1942年首次阐明：这场战争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他还说：“自从‘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内部的阶级平衡和民族力量已经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抗战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的思想观念也将被赋予新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含义。”^③

反对帝国主义

就反帝斗争来说，党的领袖们经常把抗日战争看作是100年

来，即从中国的主权开始受到侵犯以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统治所进行的斗争的高潮的一幕。所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人民决心使自己摆脱一切外国征服的枷锁。这里有两个例子：

宣传部长凯丰写道：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 45000 万人民，具有 1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文如此——译注）和 5000 年文明的历史，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侮剥削和压迫。但是现在中国人民举起抗日的大旗，保卫自己的国土，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确切地说，由于这些战争（1840 年、1856—1860 年的鸦片战争，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从 1931 年开始的日本侵入中国东北的战争和 1932 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暴露了中国的衰落和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视欺侮和他们的贪婪野心恶性膨胀了。现在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反抗就夺走中国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和彻底的解放。”④

毛泽东宣布：

“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在蒙受百年来的欺侮、侵略和压迫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以后，那种中国人民无法忍受的奴役已经完全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已奔赴战场，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进行保卫祖国的战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⑤

这场战争的反帝性质，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文件中也得到了强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100 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然而这场战争就不同了，……（这场战争）扫除了过去的一切失败和倒退。”⑥

社会变化

这是我讨论的中心问题。要通过进行灵活的群众游击战而不是正面对抗，来挫败日本的企图建立对中国的牢固统治的基本目

标，如果没有一个深远的社会变化，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所以，我将简要地叙述使得中国革命能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取得巨大进展的广泛、深刻的农村变化的概貌。

由于日本的进攻，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社会秩序的混乱中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各级行政机构的迅速崩溃和大大恶化的经济条件，暴露了战前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衰弱。在乡村，广大农民彻底地脱离了地主的统治。地主只知道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而对创造任何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代表体制的形式则毫无兴趣。因此，如为了推动强有力的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而试图恢复战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徒劳的。在那种体制下，农民对抗战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让那种体制在战争中毁灭掉而不是修复起来。

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要能够有效地处理突出的农村问题，并且，还必须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相符合，没有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不靠他们在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这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党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个生命攸关的改造问题。例如，毛泽东对新闻记者哈道·汉森说：

“我相信，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得到农民的合作。”^⑦

日本的情报机构经常作出同样的判断^⑧。这些变革，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它们指明了农民保卫自己家园的利害关系。农村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农村权力关系的调整，是进行抗战的先决条件。上面曾提到的压在农民身上的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必须减轻，这个迫切任务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应付战争的破坏和普遍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是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军队的庞大军费开支。实行减租减息和新的税收制度，是减少人民困苦的马上见效的实际措施。那些抗日活动搞得朝气蓬勃，农民大量地踊跃地参加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地区，正是坚决落实了救济贫苦

农民的政策地区。

农民经济负担的减轻和他们积极参战之间的这种关系，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有力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地方，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正是在通过各种运动来增加生产和建立一种新的组织机构方面表现了出来。从军事方面来说，贯彻这一政策的程度和群众参战的积极程度紧密相关。减租减息政策在建立和巩固基层联合战线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哪个地方落后，就在哪个地方开展工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政策在动员群众推翻旧的乡村秩序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如果不使政治上层建筑革命化的话，要使经济发生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前者的本质在于广大群众参与管理乡村事务，或者叫做民主。日本人注意到：“共匪的‘政治民主化’口号已经把政权转到农村的农民手里。”^⑩彻底实行民主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的反抗精神和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乡村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就有坚强的人民大众作后盾，就有能力挡住日本人的反复进攻和实现各种艰巨的任务。一个在战争初期走遍了广阔连绵的晋察冀边区的无党派作家，断言人民群众的真诚支持和渴望参军是：

“与改善生活条件和民主政治的实现紧密相连的，这也意味着除非更加注意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发展民主风气，否则人民将不会理解（军队是他们自己的）和不可能具有这种精神（支持军队和踊跃参军的精神）。”^⑪

日本的情报部门看到，战时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温和的，前者把减租减息、税收政策、政治民主化和广泛的优待军属，描写为一种对穷困的农民有很高吸引力的东西^⑫。农村的富人，包括地主，也包括相当多的富农，不仅失去了对权力的垄断，而且同时也要承担转移到他们身上的主要的经济负担（“供应军用品的担子主要由富人承担”）^⑬，这主要是通过税收来落实。尽管一

个联合和持久的体制的建立相当缓慢，确实需要有一个政策的转变过程，但是这种对穷人有好处的税收，还是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了。免税的程度，税务的分担以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针和手段都是很灵活的。

要粉碎地主的权力，关键在于不仅要彻底废除大约有30种之多的附加税收，而且要禁止地主阶级的其它许多剥削活动，如各种徭役，佃农向地主“送礼”等等。自从法律细则保证了佃农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以后，佃农不会在武断之下被迫与自己耕种的土地分离了。地主再不能随意收回土地，也不能对佃农进行敲诈。地主阶级的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制在它可以得到的一定数量的地租和利息的范围内。

实行税收政策，减租减息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有限度地直接没收土地和占有汉奸（大多数是地主）及流亡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引起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在土地占有问题上，尽管差别没有消除，但原来的所有权至少在许多方面被严重动摇了，这就破坏了地主阶级权力的基础。在中共牢固控制的地区确实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从整体上并没有面临被消灭的威胁——这个阶级的剥削活动被极大地削弱，其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是战后土地革命期间的事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上述经济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阶级结构，使它带有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主要倾向。大量贫农的生活好起来了，中农总的说来保持着原样，富农的地位有某种程度的降低，地主的地位则非常明显地往下掉到低的层次。如果我们看一看新体制中的阶级组成，那末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就更清楚了：在新体制中，各方面的权力都掌握在贫农、中农手里；由于贫农、中农在实际组织力量中处于占绝大多数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来了，富农和地主只扮演象征性代表的角色。

党的群众运动委员会主任邓发在1944年充满信心地宣布：

“没有必要担心我们的政府将会再一次落入旧的统治集团的魔掌之中，因为政府是属于人民自己的。”^③ 战时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对中共的研究也认为：党的经济政策的运用，处处都是非常灵活的：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大多数人民受到债务的重压并被过高的租税所困扰的贫穷国家，作为这样一个经济纲领（税收措施、减租减息，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和汉奸的财产分配给贫农）的倡导者，就能够团结千百万的人民大众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华北的八路军将最终被认为是人民的恩人和救星，不仅在抗日方面，而且在反对地主阶级和前军阀对华北的残酷统治方面。”^④

地主阶级一旦发现自己已在贫农和中农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就本能地用所能采取的种种手段进行反抗。它尽量抵制损害其既得利益的各种政策的贯彻实行，以此来阻挠和破坏这些政策，这就使政策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的坚固程度。这种坚固程度除了军事力量以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群众动员的程度。一般说来，（由党的影响所致）群众动员越薄弱的地方，地主阶级的反抗决心就越大。在边区的中心地带，地主阶级不可能正面对抗这种挑战，只能采用比较隐蔽的不受人注意的手段。

尽管地主企图阻挠农村社会的改革，但是党还是真诚地试图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理由是：从消极方面说，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完全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否则，会无法估量地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和增加军事困难；从积极方面说，这样做，是因为边区的建设极需利用他们的财力和知识。

在统一战线中，对各种改革的宣传是经常不断的。以此来加强阶级的团结、合作，发展互利，使其没有明显的不均之处。然而，由于农村秩序的改造已导致地主在由贫农和中农所控制的本质上不同的权力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建

立在各阶级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根据中共所下的定义，团结和斗争都是必要的，两者并不截然对立。从说服教育直到高压统治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手段的运用，为的是对农村的富人贯彻团结、吸收、容纳和利用的方针，当然那些堕落的汉奸除外。

在华北，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是很惨重的。大批的人或死或伤，或者变成难民，牲畜和耕地急剧减少，生产和收入都大大下降。但同时，在战争中也出现了生产建设的热潮，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卷入其中^⑩。这是一种质的发展，它和1949年的胜利有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发展包括许多方面，并不仅仅是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广泛的地方政府机构也由人民自己建立起来了。

经济的发展，能够较好地说明战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增加农业生产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充满生机的部分。主要从1943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确实是大规模的，它在整体上对各种形式的合作劳动是一个推动。合作劳动，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以支持抗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带有军事和其他色彩的合作劳动并不仅仅是提高农业产量的手段。农民通过创造可行的组织机构来改变自己极端贫穷的状况，把自己从一遇到紧急情况只能依靠地主、只能向地主借款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进步是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开展普遍的小学教育和开办许多训练班，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为加强群众自己的至上权威服务。与此相连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运动，它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的组成部分^⑪。

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在如此极度贫困的社会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广阔的变革和革命建设工作，需要广泛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如果没有高昂的群众积极性，上述的地主阶级的反抗就不可能被打破。那些有效地使地主阶级居于次要地位的政策贯彻执行，几乎处处都伴随着尖锐的斗争。1940年，日本人的一份综合研究报告指出：“这（指地主阶级和商人）是一个最害怕群众

动员和进行全民抗战的阶层，它也是一个直接阻碍群众动员的阶层。”^{①7}

与其由当局恩赐给农民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倒不如发动农民自己起来进行农村的改革。后者比前者要好得多。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晋绥部队的政委林枫对新闻记者I·爱泼斯坦说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从上面用行政的手段开展工作，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命令来代替动员地方所蕴藏的积极性，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完成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①8}

另一部由日本人写的多卷本著作，在论述晋察冀地区党的农民政策时指出：税收政策、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互助组等等，并不仅仅是“法规、方法和行政命令”，而总是伴随着“政治性的群众动员”^{①9}。

使乡村发生了重要变化的群众斗争的开展，事实上是漫长的，充满曲折和反复的。如果能使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巨大的困难，寻求自己生存条件的改善，那就能够使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他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和推翻自己身受的苦难和压迫，发掘出自己的创造潜力。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农民在改变他们的环境，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己。正如列宁所说的：“只靠宣传和鼓动并不够，群众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经验。”^{②0}

一位中国作家当时认为：“人民只有从现实斗争中接受最有效的教育。”^{②1}这不仅适用于农村秩序的革命化，也适用于动员群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负责山西东南地区群众动员工作的李雪峰曾赞扬了群众在灭蝗虫运动中的组织力和创造力。他还指出：

“在组织运动的过程中，群众的智慧发掘出来了，消灭蝗虫的办法创造出来了，产生了许多象曹山禄这样的英雄。此外，在消灭蝗虫的同时，群众破除了迷信、落后和自私的思想，增强了战斗的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精神。”^{②2}

任何根本的和长期的变化，都建立在群众积极性这个基础上。在农民对参加乡村事务管理积极性不高，缺乏生气的地方，组

织的形成就比较缓慢，而且即使形成，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会垮台。要不断地提醒干部，急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做好工作，才有可能对旧的农村秩序进行改造。

第二节 准备出场的人物

在内战时期(1946-1949年)，党的土地政策肯定是激进的。然而在抗战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也是很深远的。由绅士控制农村的局面被打破了(在政策彻底贯彻的地区)，或者正在瓦解。由于地主、富农与贫农、中农的权力关系在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变化，所以，较之战前，主观因素的作用更明显地突出了。当农民群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战争中战斗，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时，他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如果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他们将会顽强地为这个新的社会而奋斗，而不再屈服于地主的统治。正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基本变化，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有机地联系起来。人们可以说，前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为后一时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吉恩·切斯尼克斯说：抗战“为1945—1947年的大发展和土地革命作了直接准备。”^①1944年10月，有敏锐洞察力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及其将会产生的作用发表了敏锐的见解，他指出，中共“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已经改善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地位”，并且预言：

“如果有必要要保卫这些他们正为之而战斗的东西，他们也将会为将来而战斗。正如日本人不能打败这些民众的力量一样，国民党也不可能将这些力量打败。”^②

中共深深地扎根于华北

到1945年，中共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华北的大片国土，立足

于北至满洲，南到华中、华南的广大的战略地带了，而这一地区，正是在中共和国民党的最后较量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地区。1947年，当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再次访问华北时，尽管形势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但主要是在抗战年月创造的党的强大的根据地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根据地在1937年以前是不存在的。他说：

“我没步在解放区的后方，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所到之处并没有发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国民党统治区不同的是，并没有任何警卫战士在县政府大院门口站岗，……其次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区之外完全没有土匪和不满政府的武装农民，而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到处可见。到这些地区旅行是这样绝对的安全，以致感到有些厌烦了。纵然不去说政府本身的大众性，以上情况确实表明它至少是一个稳定的政府。”

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比中共多得多，在装备上比中共军队好得多，而且在运输、供应和驻防方面得到了美国的援助。他们竭力想控制华北，力图把和中共的冲突升级为全面的内战。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控制中国的农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再次向南溃退——这次是由中共力量所致，被限制在一些中共并不急于占据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里。

战时华北之所以会有这样深远的变化，是由于实行了抗战纲领的结果。这个纲领实质上 and 毛泽东1939年9月在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的一样：“这一时期（指抗战时期）我们反封建的纲领包括全国性的民主要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④。这看起来很简单，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甚至对于今天的一些中国学者来说，这似乎只需要进行温和的改革。但他们并没有看到表象背后的东西。他们并不去过问为了实现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也并不去探讨这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会产生什么结果。

国民党的腐败

抗战时期，不仅对中共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增长和进步来说是一个准备时期，而且对国民党统治国家的能力的削弱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时期。尽管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主持着中央政府，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却控制在军阀手里，蒋介石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征服这些地方军阀，或者与之达成一致的协议。国民党在战前没有能力统一中国，它是脆弱、迟钝、矛盾重重的。更重要的是，它和人民群众处于敌对的关系。日本的进攻暴露了这些弱点。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明显地是国民党的本质。对国民党来说，并不是1937年以前的10年时间太短，以致不能巩固它对国家的统治。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只涉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沉闷无趣的表演。

在抗战的第一年，国民党是比较积极的。然而，自1938年底被从沿海地区驱逐到遥远的难以进入的中国西南部以后，国民党就日益腐败了。^⑤ 约翰·谢伟思1944年写的文章，描绘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国民党——中国”的图画。

“中国正在慢性窒息中慢慢死去，中国现在并没有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中国面临着经济崩溃，……士气低落，普遍沮丧，一般地感到没有希望。……政府和军队的机构，自上至下，被空前庞大与公开的贪污所侵蚀败坏，……国民党内部的不安在增长……看起来它已不能以新的血液自行更新，它的不变的领导渐趋硬化，失去了感受现实的能力。”^⑥

1942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时发现：“在抗战方面，看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未被日寇占领的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的三亿同胞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已失去兴趣，而把基点放在了接受美国援助的计划上。”^⑦ 国民党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克服经济困难：

“国民党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资金、原材料、商品和食物，市场开始

被一些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的商人所左右，而在这些商人中，最高层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占绝大多数。”^⑧

这种经济上的混乱也在恶化了的农村问题上反映出来：高税收，高地租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日甚一日。地主不仅是这种状况的积极推动者，而且也是受益者。这和华北中共地区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而中共控制的地区主要是一些资源枯竭的山区，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自然资源却很丰富。另外，整个西南地区除了重庆迭遭轰炸外都是和平的，而中共地区由于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几乎很难坚持下去^⑨。

国民党的军队也正在瓦解。新闻记者T·怀特和A·雅各拜对大多数国民党军队的评价已为许多原始资料所确证。他们的评价是：“在相持阶段（1938—1944年，在日本——国民党对阵的前线上，后者没有取得任何军事上的主动权），中国军队是受到了重创的、疲惫不堪的、士气沮丧的、没有组织性的群体，被敌人所鄙视，与人民不相容，被政府所忽视，被盟国所奚落。”^⑩在整个相持阶段，700万人“就这么简单地突然消失了，……他们死于疾病和饥饿，或者一个个地被家庭抛弃，或者成群地被敌人杀害”。另外，几乎还有100万人在战场上伤亡^⑪。为什么大部分军队化为乌有？野蛮的征兵办法肯定是一个原因^⑫。长官对待士兵就象对待“动物”一般^⑬。此外，在国民党军队中，办事无效率，工作不称职，内部不团结和贪污等现象也非常严重。^⑭这很容易使人明白，为什么自1938年底开始，日本人几乎不担心他们的南方战线。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靠每年征集150万新兵的办法来补偿由于成群士兵开小差而不断造成的部队大量减员，以维持其400万军队的数额^⑮。这支军队从未想到要发动一次重要的攻势作战^⑯。

当1944年日军再次向南推进即执行一号作战计划时，国民党在7个月内就损失了多达70万人的军队，丢掉了146座城市，20万平方公里领土，36个机场以及6000万人民^⑰。事实上美国

的情报资料经常抱怨国民党的消极，而国民党却把打败日本看作是是为美国尽义务。它最好的军队，要么用于封锁中共地区，要么——和贮藏的装备一起——保养起来，以便根据设想在战后和中共算帐时派上用场，驻扎在前线的大都是地方军阀的军队，或者或多或少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杂牌军^⑳。

国民党同日军或者伪军对峙的前线，事实上处于停战状态。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直到日本 1944 年发动攻势止，成百英里长的战线几年来都处于和平的状态。”^㉑同一份原始资料还指出：“由前线双方军事当局所控制的走私贸易很猖獗。”^㉒位于西安、重庆的部队“主要忙于和傀儡势力建立紧密的联系。”^㉓大规模地哗变为伪军的事情发生了。根据中共的资料，国民党有 50 万军队和 58 个高级将领叛变^㉔。虽然这些部队大多数是地方势力，相对来说很少有国民党中央军，但他们原来仍然是为蒋介石服务的。这种重庆的军事力量减少和伪军力量增加的现象，特别明显地在山东表现了出来^㉕。

中共和美国政府官员都看到了这种象一场运动似的哗变给共产党人增加的军事压力^㉖。根据日本的材料，早在 1939 年，当留在华北的部队集中在中共周围的时候，国民党就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兴趣^㉗。早在 1937 年 10 月，深谋远虑的朱德在同新闻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谈话时就告诫说：“随着战争的继续，国民党军队将不得不改革，否则就要失败。”^㉘ 1939 年，《八路军》周刊预言：“一支不能战斗的军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㉙。这句话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中共经常指责国民党的失败，认为这“恰恰是由于他们竭力反对人民战争。”^㉚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没有能力来进行一场需要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战争，这种改革会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那些人的既得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此外，国民党的行动阻碍着它和人民的团结一致。一份从“山西反共封锁地带”来的美国大使的报告谈到：“强征繁重的谷物和燃料的税收，多种多样的

勒索和部分官员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贪污”，创造了一种使农民“很不满意”的关系；这“是在山西、河南、安徽和其它省份的许多地区很有代表性的情况。”^②

改变了的权力关系

那些在 1944—1945 年间访问延安的西方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强烈地感觉到了国民党力量的削弱和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把腐朽黑暗的国统区和他们在华北贫瘠的山区根据地所发现的乐观的、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中共的活动相对照。^③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中共领袖们的信心和勇敢上。1944 年 4 月，毛泽东说：

“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中国的命运。”^④

一年后，毛在延安向谢伟思说：

“日本人都没有能力消灭解放区，何况（蒋介石的）刚征募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不喜欢农民的军队呢？纵然我们只有现在力量的 1%，（蒋介石）在内战中都未能把我们消灭，现在他有何可能呢？”^⑤

抗战期间在力量平衡方面出现的戏剧性转变，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中共在 1949 年的神速胜利。毫无疑问，国民党力量的削弱这一点是重要的——国民党比较的舒适，这种舒适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共力量的极大发展。正如贝尔登所评论的：“从敌后战线上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中，人们能够得到在中国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共产党或者蒋介石”的许多线索。^⑥

另一个西方新闻记者詹姆斯·伯特伦，有些模糊地、但确是有洞察力地感到：早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广大的乡村正在推翻旧中国的统治。当一支抗日部队请他在回到英国后把关于他们和中国的情况告诉英国人时，他陷入了沉思：

“当我看着这一张张热切的棕色的脸，这些山区小镇的农民士兵，以及在雪地上和当地孩子们一起玩耍的‘小鬼’时，我再一次感到惊奇。英格兰对这场战争知道些什么呢？从外表来判断，对于中国来说，任何

事情看起来都进行得如此糟糕，北京、上海、南京、青岛……都已经陷入侵略者的魔掌。

“但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在哪里呢？不在大的沿海城市，也不在各省的省府，它在这里，在这些村庄和小镇上，在这里的农民群众当中。他们在经过多少年的愚昧和内乱后，终于正在团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统一思想和坚强的决心。

“中国的社会单位仍然是村庄。正是这些村庄，将变成将来抗战的真正中心，这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经过了现在危机的压迫和风暴以后，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中国。”^③

第三节 阶 段

中共影响的扩张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变化在抗战时期并不是连续的。除了地区的变更之外(后面还要谈到这一问题)，中共也有急剧的倒退，被迫进行极端折磨人的退却。党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也并未设想靠一次进攻就能打败日本人。抗战末期以及战后的中共文件，也承认党的命运经历了很大的波动。

在日本进攻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文《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就预言这场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①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②。而中间的阶段被认为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关键性的时期”，毛认为它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③。第三阶段将具有开始不平衡的发展的特征——“此起彼伏，这一阶段的完成不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④

毛泽东6年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

还有战时官方的历史文件，都坚持这个三阶段的理论，认为第一阶段到1940年为止，第二阶段到1942年为止^⑥。

根据单个阶段的自身特征，第一阶段可以以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武汉失陷之前，是“日军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日军的主要力量放在同国民党作战的前线上)，而对共产党的打击轻微”。之后，情况正好反过来了。但尽管如此，到1940年，中共还是在华北敌后大大扩张了力量。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由战争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40万，并拥有4000万人口的解放区。从全国来说，党员大体上从4万增加到80万。然而这种成功还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许多新党员缺乏经验，根据地也不巩固。

在整个第二阶段，日军通过大规模的“扫荡”，竭力和华北的中共势力战斗。根据地的人口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减少到30万人。粮食不足引起了饥荒，军队和人民被迫吃树叶和草根，“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党“懂得了或者说开始懂得了”贯彻许多基本政策的方法。这些政策是：减租减息，统一党的领导，纠正不正之风，吸收农村富人参加管理，调整军队和行政机构以适应战争的要求，加强军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又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最后达到了60万人；党员总数增加到120万；被中共或多或少地控制的地区，人口达到了9550万，占全国人口的1/5。1944年6月，叶剑英宣称，华北的1亿人口中的5000万人，生活在中共掌握的地区^⑦。220万民兵，大部分也活跃在华北。但是，在大规模地动员参军和扩大对新区的控制方面，党并不象在1937—1940年时那样草率，而是把这两者放在了思想(整风运动)和物质(大生产运动)的彻底准备的基础上。

这种对战时发展阶段的官方解释，对于了解总的趋势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尽管必要时我们会注意到党的政策在一些地区的贯彻有先有后，也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在寻求确立地区子系统方面

我们并没有多少不同观点，只须说明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特点就够了。例如冀中平原的战斗，战后中国方面的报道也把它分为五个阶段^⑦。抗战期间中共正规军的数量发展情况，是对三阶段说的有力支持^⑧。

不过，这种周期划分还不精确，它仅仅提供了一个华北中共势力涨落的概貌，它还需要精确和详细的阐述。我们在对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行个别考察的时候，还必须对它进行一些重要的修改。

军事阶段

在日军横扫华北之际，中共只能进行一些并不重要的抵抗。正规军很少，对和现代化的日军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的对抗还缺乏思想准备。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武装几乎难以生存。党认识到摆在面前的是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不能牺牲这些将来坚持抗战的核心力量。因此，与反抗日军对中国的占领相比，党开始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准备和建设上。

中共承认它无力阻止日本人的推进。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林彪告诉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说，他不能在山西的那个地区和日军战斗^⑨。一位八路军指挥员也指出了这种军事力量的悬殊：

“我们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他们总是首先使用炸弹、飞机、大炮；然后使用坦克、装甲车。要用劣势的装备来抵抗这样的进攻，必然招致惨重的损失。”^⑩

1937年9月，毛泽东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力量“目前只能起部分作用”^⑪。这并不是毛的过分谦虚，日本人也称赞游击队的作战“灵活地避开了皇军的正面冲击”^⑫。然而，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旁观者。聂荣臻在1937—1938年期间解释说：“凡我们要避开日军主力打击的地方，都意味着若在那个地方打，我们必败。我们应快速机动，以便在敌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打击敌人，使其站不住脚。”^⑬

在第一阶段，由于把组建正规军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结果非常快地形成了一支军事力量。战斗任务几乎只分配给正规军，即八路军。很少注意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因此地方武装在战斗中只充当非常次要的角色。这种战略上的内在弱点和步骤的不协调马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结果，伤亡惨重，地方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动员，不同武装力量之间产生了对立，出现了开小差现象等等。

但华北共产党势力在人数上的扩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1937年10月，日本外务部的报告谈到：“红军……在华北逐渐扩大”，要“极大地警惕”，因为它能够直接影响到日军的军事行动^⑩。一年后，广州和武汉失陷，日方认为抗日运动的领导权开始“完全地”掌握在中共手里^⑪。1939年，笠原行雄将军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估计：

“倔强的敌人的抵抗活动正在地下发展着，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政治势力及人民群众的支持，抵抗组织正在扩大它们的地下活动。华北人民的反日情绪正被煽动起来，……今后，危害华北的和平和秩序的‘癌症’，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收集他们的情报的工作必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⑫

军事力量的增长被认为是“惊人的”^⑬。一份原始资料估计，华北七省的大约三分之一，“有一个时期被赤化了”^⑭。为了对付这种威胁，日本人开始实行包括构筑公路、碉堡、堑沟等手段在内的囚笼政策，以便包围抗战力量。

尽管可以肯定日本人忧惧中共的扩张，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注意到中共势力的规模，因为当时他们集中精力于推翻国民党。1940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有40万人（115个团）和民兵参加的大规模的努力破袭交通线的战斗，使日本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共^⑮。所遭受的有力的奇袭，以及对这些抵抗力量的性质的更准确的掌握使日本越发沉浸于研究排除这种“肿瘤”式扩张的计划。

首先，他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活动，加强收集共产党

情报的工作^②。保密的和不保密的日本文件，对中共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表示了特殊的忧虑。群众工作是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都做到日军驻地旁边来了^③，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④。一个日本作家在强调了中共“可怕的”组织力和人民对它的支持以后深深感到，将来共产党的力量将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⑤。

日军从中共进攻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以后，便竭尽全力向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我们看到中共在1941—1942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好象是担心抗日组织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解放日报》社论一再断言日本人将在一年内被打败，而同时又竭力主张做好进行一场长期困难的战争的准备^⑥。

当1941—1942或1943年的第二阶段开始时，急剧的转向是不可避免的。党彻底检查了自己的军事政策，取消了把重点放在组建正规力量上的政策，在降低正规部队和县以上游击队的力量比重的同时，加强了从事生产和能够自给的基层武装力量。这是“精兵”政策的要旨。“精兵”政策就是要“解决鱼大水少的矛盾，使战争组织适应战时环境”的政策^⑦，使战争加在人民头上的经济负担得到减轻。就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一次非常的经济困难中产生，过渡阶段在军事上或许是有决定意义的改革办法被制定出来了：建立人民武装、游击队、正规军三级结构。

这一阶段军事组织的调整为1943—1945年的重新进攻和扩展铺平了道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加强的地方武装力量推动了分散的群众游击战^⑧。三级结构虽然在1941—1943年就开始形成，但只是到这最后一个阶段，它才巩固地建立起来。各级武装力量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民兵作为征募兵员的基础，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了自己配合游击队和正规军作战的水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据报道，1944年年中，八路军的兵力达到了32.08万人，而到了1945年春，又增加到60万人^⑨。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党重新采取了使武装力量大规模正规化的政策。

为战争而征募这么多人员的负担，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都加到了支持自己的军队并经历着严重考验的人民身上。党是如此深地扎根于华北农村，以至这些问题在提出了各种纲领和开展了各种运动从而加强了军队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后，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使生产斗争和前线战争一体化了。这是从1943、1944年开始有系统、大规模地展开的工作。一方面，民兵的战斗和生产任务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只要条件允许，正规军也要承担生产任务。

中共在1943—1945年的进攻取得了胜利。在1945年春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布：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19个大的解放区。”^②

1945年5月，《解放日报》社论报道了日军已经开始从中小城市撤退的消息^③，几乎同时，董必武宣布，被占领地区的30%即8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已经被收复^④。从1943年起，广大的领土就渐渐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当然，各地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到1944年末中共还认为，总的说来，“我们仍比敌人弱小”^⑤。这更符合山东的情况，那里1944年8月的出击目标仍然是防御性的，例如，在党控制的各地区之间建立联系^⑥。半年多以后，即日本投降的前夕，在晋绥根据地，相对弱小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基本的改变。”^⑦

尽管如此，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共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已经站稳脚跟了。一些地区甚至很巩固，其它地区较为薄弱一些。1945年5月，约翰·谢伟思根据一些非共产党人提供的原始资料，特别是“大量的美国飞行员（有些人现已70多岁）已经安全地在这些地区跳伞”的情况，写道：

“共产党在上海、汉口、广东、南京和太原附近等所有重要的日本人控制区保护美国飞行员的安全，飞行员甚至可以在距日军控制的机场和碉堡一英里的地方安全地跳伞。

“中共有能力使 100 多个美国人安全地横穿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宣称的它对华北和华中的敌后乡村的控制，是真实的。”^④

到了 1944 年春天，华北的日军和伪军仅能控制冀南平原上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京汉铁路沿线车站。根据这一点，日方报道也强调指出：在华北，中共势力大规模地存在。八路军甚至在白天也可以在车站与车站之间的地区自由活动，不傍铁路线的县城都被隔离起来了^⑤。然而，中共若没有武器以及同盟国的支持，是不可能打败日军的。朱德对西方新闻记者的谈话，无疑也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那时我们没有能力把日本人从中国驱逐出去——至少不能单凭军事行动来驱逐，因为我们缺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只能打消耗战，我们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依靠其它的因素。”^⑥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国际环境给了日本在中国的野心以致命的打击。

经济阶段

虽然从军事上看，可以把战争相当简单地分为如官方所描述的三个阶段，但就制定和实际贯彻经济政策的过程而言，把战争区分为 1937—1942 年和 1942、1943—1945 年两个阶段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两类主要的经济纲领必须要提到：一类是在 1942 年之前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的，一类是在 1942 年之前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贯彻执行的。

前者的例子，有减租减息和以互助组的形式来促进合作劳动。实行减租减息的打算，早在 1937 年就宣布了，但只是到 1942 年 2 月才制定出详细的条款。虽说效果很深远，但也只是到战争的最后两三年才体现出来。

后者的例子，有税收政策。随着 1941 年在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它在其它边区的实行被大大推迟了），才最后有了标

准的、有详细规则的、可供所有地区实行的税收系统。在那之前，有许多不同的税收措施付诸实施，引起了相当大的财政混乱，税款被强行征收，在税收过程中经常向富人敲竹杠。

生产运动有点不好分类。这种运动在战争初期就出现了，但只是从1943年底开始，规模才大大地扩展。原先它只是一种具有短期效果的解救办法。从1942、1943年始，合作社大大地发展起来，但它也不属于这两类情况中的任何一类。它首先是相当快地扩展，后来才需要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地主土地的分散情况有所不同，但1942年也是其分界线，在此以前，税收和较轻程度的直接充公对地主土地的分散产生了作用，在此以后，减租减息是导致地主土地分散的主要因素。因此，阶级结构的变化虽然贯穿战争的始终，但在不同的阶段其实现途径却不相同。

一个持久的、系统的、协调的经济改革的发生，是1942年以后的事。耽误的主要原因是：全神贯注于军事问题，缺乏经过训练的干部和行政区域的不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并不限于1942年以前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及战争的破坏。

纵然再把战争的头两年列为一个时期，上述的分期方法也是合理的。在战争的头两年，根据地处于形成时期，紧急情况很多（如保证对军队的供给），政策也不适合具体的情况，几乎没有财政计划和财政平衡，有关经济建设的政策是不清晰并且缺乏长期考虑的。这样，1940—1942年就是更有连贯性而较少暂时性地向财政和经济问题接近的时期^⑧。

政治阶段

由于旨在使农村发生根本变化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政治的发展看来最好是以1941、1942年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开始的阶段，人民群众的动员是不充分的，农村的绅士竭力想维持他们的压迫和统治。对这种情况的突破和经济变化的加强有密切的关系。朝气蓬勃的群众斗争虽然在1941、

1942年以前就开展起来——这种群众斗争接近于彻底的阶级斗争，但也只是从那以后，农民才有效地组织起来。

党虽然在1937—1941年间有神速的发展，但仅仅强调了数量而完全忽视了质量。它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缺点，以致不得不急需在1941年开展整风运动。1941—1943年的著名的整风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它创造性地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而产生了新的工作方法，使一个不团结的党产生了很强的内聚力，使大量的没有经验的各种社会出身的新成员有了共同的目标，并给了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并没有靠施以铁的纪律。1942年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提出来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及军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得到了加强。

建立代议政体的工作虽然在1939年就着手进行，并且在1940年举行了广泛的选举，但也只是到1941—1942年以后，这项工作才认真地开展起来。到1943年，从乡村机构到边区机关，各级组织都发挥了作用。在日本人进攻的时期，对非生产性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随后，对组织机构重新作了调整。

在后一个时期，司法系统统一了，新法律颁布了，执法机构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尽管是1941—1943年建立的，但在此以后才真正发挥作用。

第四节 地区差别

接下来论述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的类型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进行划分，是最恰当的。

抗日根据地主要处于山区，它是中共力量的真正堡垒。按邓小平的定义：它“是支持敌后战斗的基点，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点，发动反‘扫荡’斗争的基点”^①。林彪在1965年为纪念日本投降20周年而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详细阐述了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建设了党，建立了政权组织，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建立了群众组织。我们从事了工业、农业和进行了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其他为各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事业。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政权的雏形。随着我们在根据地工作的稳定的开展，我们的党建立了有力的人民军队，训练了各项事业所需要的干部，在许多领域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为全国性胜利提供有利条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②

武装部队的军事任务不可避免地会和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根据地有必要支持这种多条战线的斗争，只有把抗日斗争和竭尽全力满足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后者是有力地开展抗日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游击部队的行动是纯军事性的，那么就会忽视群众的动员和符合群众客观利益的社会——经济变化，这样，要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主动地孤立日军、使之失去机动性，就将成为不可能。比共产党部队的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的国民党军队之所以会崩溃，正是由于没有把握住军事斗争和其它斗争的相互关系^③。

游击区大多数位于平原地带，或者靠近日军驻扎的地区。毛泽东论述了游击区的特点：“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④ 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得到坚固的立足点。

敌占区包含大城市和城镇，以及重要交通线交汇的地方。

中共的战略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前两个类型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减少第三个类型的地区。总的说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⑤ 抗日根据地惊人地、无可置疑地扩大了，但这并不是顺利地和不经反复地发展起来的。林彪说：“它们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经历了扩大、收缩到再扩大的过程。”^⑥ 在不同的时间交替实行巩固和扩大的政策是必然的，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

“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⑦

根据地的类型

基本区和根据地肯定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中共深深扎根的地区，它通常包括了几个根据地。后者除了在日军统治地区以外，到处都可以见到。尽管中共创造了复杂的根据地等级^⑧，但它们还是能被分为两类：位于山区的主要根据地，位于平原的小的游击队根据地^⑨。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在平原保存大量的部队那将是困难的，所以山区将是主要的根据地。”^⑩正规军和游击队可以在这些地区隐蔽、作战、积蓄力量和进行军事准备^⑪。朱德把主要根据地叫做“地方山区堡垒”，他论述了主要根据地的作用：

“我们的正规军能够回到主要根据地来休整，补充和复训，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也能在这里训练。小型的兵工厂、学校、医院、合作社和地方行政机关都集中在这里，从这些‘堡垒’里出来向日本驻军、要塞、战略要点、弹药库、通信线路和铁路线进攻。”^⑫

主要根据地由正规军驻扎，政府的行政工作还有经济和教育活动在那里公开地进行^⑬。

因为有许多变动，所以游击根据地更不容易分类。这些根据地很容易受日军的蚕食，遭到破坏，其中党的政治影响很不稳定，致使行政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⑭。日本的情报部门把它们描述为流动的，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不重要的地区，因为它们不可能进行强有力的反抗。但它们虽分散于各地，却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宣传和动员群众以后，它们的政治势力也是“相当大的”^⑮。

由于日军缺乏足够的兵力去占领更多的乡村，所以平坦的地形对日军的现代化装备来说是有利的。但尽管如此，一些小的根据地在不便于打仗的平原地区也还是建立起来了。毛泽东深信：“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

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①⑥} 在一些地区，这种临时根据地并不容易建立，如在争夺最为激烈的平原地区之一——冀中平原，根据日军的观察，1940年中共在受逼迫之下只能在这里建立一些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根据地^{①⑦}。

在平原指挥抗日武装的吕正操承认：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部队，要想缔造根据地是行不通的，根据地的中心经常变动，一会儿西，一会儿东^{①⑧}。

游击根据地击退日军进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它们仍在“广大的被敌人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①⑨}。它们在这方面的军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当日军聚集于平原，特别是冀南和冀中平原，几乎使游击队没有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时，游击队就不得不采取快速行动、疏散为小股部队、保持主动权、突然进攻和善于伪装的策略^{②①}。平原作战的一个特点，是利用地道作掩护并进行战斗^{②②}，它是由靠近日军碉堡的地区首创、从藏身小洞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地道起初是在相邻的各家之间打通，再进一步，村与村之间也打通起来，结构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广泛^{②③}。正如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所描述的：

“一个令人惊奇的地道系统，它向周围延伸许多哩，连接数百个村庄……足以容纳全村人以及牲畜、存粮，并且备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以防日军长期围困。……地道修得弯弯曲曲，忽上忽下，它通过紧急出口，和完整独立的辅助地道系统连接起来，这些辅助地道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②④}

山区根据地的利弊

中共也继承了许多农民起义者的惯常的做法，在省与省之间的主要山区建立根据地。吉恩·切斯尼克斯写道：

“农民起义的传统策源地并不在省的中部，即盛产粮食、人口稠密、经济高度发展的平原地区，而是在各省交界的密林山区，这些边远地区，镇压的部队较难进去。因为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较薄弱，所以他们能建立一个‘无人管理’的地带。”^{②4}

切斯尼克斯说：“这条中国农民造反的地缘政治学‘规律’，成为中共在反对国民党和日本的斗争中所继承和运用的一种模式。”^{②5} 这些地区的特点是经济落后，和市场经济的联系不紧密，政府和敌人的影响以及地主的统治比较薄弱，人口稀少，便于防守^{②6}。

自然环境为反对在军事上占优势的日本人提供了保护，山区不发达的通讯条件也对中共有利。正如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所承认的，带着重型装备的日军被携带轻武器的八路军轻易智胜。八路军“总是随意地改变他们的行动”，“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去捕获和追击八路军，结果总是一无所获”^{②7}。怪不得刘少奇说：“最好的地形是交通不便之处和丘陵地带。”^{②8}

战争结束大约两年以后，杰克·贝尔登去晋冀鲁豫旅行，他描述那里的通讯状况“是如此的原始，以致一段 20 英里的旅程，骑着政府的骡马要从日升走到日落，打电话到相同距离远的地方去需要一周时间，电报可能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一封寄到几英里远的地方的信可能要走 40 天。”^{②9} 这种落后的情况对中共来说并不总是有利的条件，因为它给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和党的上下级之间的联络带来了许多障碍。“通讯困难”被中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引证，作为为什么晋察冀边区的选举早在 1940 年就着手进行，而晋察冀边区的第一次大会直到 1943 年 1 月才召开的理由之一（另一理由是“战争环境”）^{③0}。贝尔登注意到通讯条件比他九年前访问这一地区时有了相当的改善。一条电话线贯穿边区两头，政府的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和土质的平原公路上”。但是，使用摩托化交通工具的旅行和运输仍很少见，手推车、双轮马车、动物运载以至于步行等传统方法仍然很普遍。

尽管山区有利于根据地的建立，但是山区根据地的巩固有赖于党把影响扩大到相当广泛的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以便能保证提供重要的和必需的农产品，能保证给急剧发展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补充大量的兵员。平原根据地的削弱将会不可估量地增加物质上的困难，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经济的崩溃。根据1941年日本报纸的报导：在中共控制的冀西地区，不少于60%的谷物来自“外面”，且供应仍不充分^②。因此，党努力把军事上比较强大的山区根据地和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平原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同时也加强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③。

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只要平原游击地区和山区根据地的结合一加强，那么共匪的消灭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④日本人从1941年开始，加紧采取了消灭基本区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分割山区和平原的这种战略联系，特别是在冀中地区。压力确是很严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道：“（在山区和平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听不到炮声。”^⑤根据中国官方史学家齐武的说法，大多数日用必需品日军都不准运往山区^⑥。

第五节 边区的形成

1937年9月初，有3个师——林彪指挥的115师，贺龙指挥的120师和刘伯承指挥的129师——从陕北抗日根据地出发，到华北敌后发展抗日运动。它们分别进到晋西北（120师）、晋东北（115师）和晋东南（129师），后两个师又分别在著名的五台山和太行山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这三个地区的根据地成了抗战的主要支撑点。1938年，部分八路军继续向东挺进，到达河北、山东和河南^①。

这就开始形成了华北敌后的根据地。随着地区的扩大和行政系统的建立，它们被称之为“边区”。边区共有三个：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山东从未得到过这种地位，但也被称为基本

区。尽管在党的文件中，术语并不是完全连贯的，但边区通常比根据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它是由不同程度地处于中共影响下的地区汇集而成的一个行政单位。一个边区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在其中的一个根据地内，设有边区的总部。

在几个边区中，唯有晋察冀边区是国民党正式承认了的。在这个边区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边区从行政上说来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地方政府，除了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之外，它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②。然而，因为中共强烈地坚持其在组织和政策问题上的独立性，坚决维护能够削弱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地主的权力)的社会变革，所以，所谓“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允诺，就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国民党在被驱赶到中国西南部后，就丧失了它在华北的影响。国民党的一些法律，如国民党从未实行过的减租减息，只是由于符合中共的目标，才得以修改保留。

敌后中共地区的情况和陕甘宁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是所有中间党派及政府和军事组织的活动中心。陕甘宁没有遭到日军的军事破坏，只是偶尔被轰炸以及有一些较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最后的一次进攻是在1938年11月。它也很少和国民党军队对抗。因此，在没有紧急复杂的军事情况的环境中，各项政策都能付诸实施^③。

我将描述边区的建立过程和它们的特点^④。

晋察冀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把晋察冀边区视为其它边区应当仿效的模范，这并不是巧合^⑤。它是在敌后最早建立的一个边区，在那里，党的政策纲领得到了最成功的贯彻。当晋察冀的社会变化更加深刻时，党在那里扎根更深，那里的抗日活动也更有力量。

边区由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和辽宁五省的各一部分构成，人口在1938年达到1000万(40个县)^⑥，1939年达到1200

万(70个县,其中53个县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县政府机构)^⑦,到抗战结束时,人口达到了2500万(108座县城)^⑧。

晋察冀边区的地理位置有助于说明它的战略重要性。它在行政上划分为三个部分,这反映了它所辖地区的地理差别^⑨。

首先,北岳地区。主要是山区,位于四周由铁路环绕的长方形地域内:北抵京-绥(北京-大同)线、南接正太(太原-石家庄)线、西连同蒲(大同-太原)线、东达京汉(北京-石家庄)线。在整个战争时期,中共深深扎根在这个晋察冀的核心地带。正是在这里的阜平城建立了边区第一个政府,正是在这里的五台山建立了军事司令部。后者以敌后第一个游击根据地而闻名,是中共最坚强的堡垒之一,许多中外记者曾到这里访问过^⑩。

其次,是人口稠密的冀中平原。它也被铁路线交割成长方形的地域:北抵北京和天津周围的四个拐角地带,南达石家庄和德州。显然,平原地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有利。由于该地的战略位置和比较发达的经济,日军经常对它进行“扫荡”,所造成的破坏也比其它地区更严重。该地的农产品自给有余,所以也成为日军抢劫粮食的“主要中心”^⑪。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不很普遍,也没有象在北岳地区那样的影响^⑫。大约从1935年始,这里就有许多积极抗日的组织存在,特别是那些由从北京和天津来的学生构成的组织,它们在此推动了抗日的发展。

最后,是冀东、热河、辽宁地区。这是日本在1935年就建立了傀儡政府的地区。八路军最初进入这个地区是在1938年6月。一个月后,地方的抗战力量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发动了几万人的武装起义。日军的反攻和内部的分裂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半年后,八路军的援军到达,重建工作才得以开始^⑬。然而,八路军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仍然太弱,以致不能对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相比之下,共产党在北岳和冀中的活动更具有重要意义。

120师(应为115师——译注)副师长聂荣臻带领2000人(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满员的团)活动在五台山区。他和

五台县的地方行政官宋劭文建立了合作关系。宋劭文是颇有影响力的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物，牺盟会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和中共于1936年所达成的协议的产物。中共帮助阎发展抗日运动，而阎给予中共在山西从事一定的政治活动的权力作为回报。牺盟会由中共讲授政治训练课，后来又建立了一支叫做“决死队”的游击队组织，所以它深受中共的影响，也要求进行彻底的改革。援助这支队伍的是许多年轻的学生和迫切要求进行抗日的激进的活动分子。聂在和山西、河北的各种组织取得联系后，和宋宣布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和一致抗日。1938年1月，在阜平召开了有39—40个县的149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选举了地方行政委员会。这就是晋察冀边区的开始。

在这个委员会中，中共和国民党仅有部分代表，而大多数代表来自于各种刚组建的群众组织，当地的或者非当地的，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来自河北。在委员会的九名代表中，两名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聂，两名是国民党员。宋劭文任主席。后来，向冀中的渗透得到了已经在那里作战并加入了八路军的吕正操部队的支援。吕原是从满洲退下来的国民党指挥官，他拒绝向南退却，并且和地方游击队团结起来组成了自卫团。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冀中军事区域的指挥员。从1939年始，得到了贺龙的120师支持的吕正操部队，和企图重新在冀中立足的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到了1941年，国民党在当地的影响几乎消失逸尽^④。

晋冀鲁豫

晋冀鲁豫是最大的一块边区，为了军事行动的方便分成了两个部分：太行和太岳范围的晋冀豫山区（山西东南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黄河以北的河南的一小部分）；冀鲁豫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以及陇海线以北的江苏的一小部分），这是地域广大土地肥沃的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尽管这两个地区在面积上不

和上下，但前者只有 700 万人口，而后者却有 1800 万人口。这种不同之处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山区（指晋冀豫——译者注）是非常贫穷的地方，它不能维持稠密的人口^⑮。

薄一波强调了太行和太岳山区的重要战略意义：“这些山区非常重要，本国的军事家以及野蛮的侵略者总是试图控制它们，因为它们俯视着平原”^⑯。在山区广泛旅行的杰克·贝尔登也赞同地说道：“这个世界，这个山区本身，对一支被紧紧追赶的部队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果军队控制了通道，那末它就可以在此周围到处活动，几乎可以随意地下山到平原去打击没有防备的敌人。”^⑰ 这些山区也是向非常重要的平汉、正太和同蒲铁路发动进攻的理想的根据地^⑱。

从 1937 年底到 1940 年底，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 129 师扩大了它控制的地区。从晋东南的太行总部到包括豫北、冀南及鲁西在内的广大地区，部队发展很快，从开始时的 1 万人达到大约 10 万人^⑲。薄一波对刘的三个团的兵员素质作了精彩的描述：

这“是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士兵，他们都经历过长征，他们技术精、装备好，特别是表现在游击战方面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方面。三个团的人员在内战中都曾在长江以北（河北、安徽、河南）和蒋介石军队打过仗。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一批地下党员和两支步枪起家的。”^⑳

1938 年 8 月，冀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开始了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这个委员会由北京历史学教授杨秀峰挂帅，宋任穷为副手，下辖六个地区。杨起初和中共没有任何联系，他主要是以由学生占优势的抗日力量起家的，后来才增加了农民和游击队员。1940 年 8 月，在进行地方选举以后，建立了冀南和太行地区（太行的东南部）的行政机关，负责协调太行、太岳和河北南部的政策。一年以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杨秀峰任主席，薄一波任副主席^㉑。抗战结束时，中共宣布它在晋冀豫控制了六座县城，在冀鲁豫控制了八座^㉒。

晋 绥

晋绥边区最小，人口只有 320 万，也是最贫穷的地区。它是阻止日军往西向陕甘宁根据地推进的前沿阵地。整个抗战期间，晋绥把陕甘宁——党中央驻地和其它边区，特别是晋察冀边区联系了起来，而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从 1939 年底开始）则进一步在南面集结，对它形成了事实上的封锁^②。

因为晋绥山区的地形阻碍了装备着重武器的日军的完全展开，所以能对边区造成直接破坏的军事压力就相对小一些^③。虽然如此，整个 1941 年，日军仍发动了 17 次地区性的“扫荡”。到 1943 年年中，这个边区共有 1 万名官兵阵亡，2 万名受伤^④。

晋绥边区的形成，是贺龙的 120 师向晋西北渗透的结果。晋西北构成了边区的主要部分。到了 1938 年 3 月，一个抗日根据地已在那里建立起来^⑤。半年后，其势力扩大到绥远。当阎锡山的部分山西地方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发动兵变并加入了 120 师以后，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日见增长^⑥。从 1940 年起，这块根据地更加有计划地进行了建设。1940 年 2 月，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两年后建立边区政府铺平了道路^⑦。

山 东

党在山东的政委朱瑞，概括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从地形上来说，它由山区和平原混和组成。富足的农业、丰富的矿藏使粮食、棉花和我们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都能自给自足。人口高达 3800 万^⑧（能提供大量的潜在兵员）……山东人民还在 1916—1920 年以及 1928 年尝过被日军占领的滋味。许多人迁移到满洲，其中不少人又带着 1931 年以后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回到山东。其次，山东人民有反抗各种压迫者的长期斗争历史。这块土地上稠密的人口形成的压力迫使他们去参军。数以百万计的人迁到满洲或结成各种秘密的社会团体来反对满洲王朝、地主和税吏（山东确实以众多的秘密结社和地方武

装防卫力量而著名)。据估计，在抗战刚开始时，山东农村居民的手里，大约有 30 万支来福枪。所以要组织他们起来抗战并不太困难。”^②

日军推进到山东省，地方军阀韩复榘并没有进行抵抗，甚至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南逃窜，结果在山东引起一片混乱。大多数地区的行政系统崩溃了^③。尽管情况如此不利，地区性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还是很快开展起来了，韩复榘的一个行政专员范筑先，成为这些抗日活动的领导者。范的最早的游击队在山东西部很快扩展到 5 万人，遍布 20 个县。可是到 1938 年秋，部队打了败仗，溃散了，范本人也遭杀害^④。

尽管共产党的地方游击队从 1937 年底就开始在山东省积极活动——129 师从 1938 年夏季以来一直在河北、山东交界地带作战，但直到 1939 年春 115 师的东进纵队到达后，中共才在山东立住脚跟，并得到重又集结起来的范的游击队的支援。中共在这里创建根据地的阶段，一直持续到 1940 年底。它在山东的几个不同的地区建立了几块根据地，地方政府遍布于大约 70 个县，山东的最高政府机构也经选举产生了，八路军的力量在 1938—1940 年成倍地增长^⑤。然而，这里的组织工作或许比其它任何地区都肤浅，它在 1941—1942 年遭到的失败比其它地区更惨重，使得中共在这里的力量比在其它边区更薄弱，恢复起来也更慢，以致到了 1944 年中才能宣布：“现在已经恢复到 1940 年时的局面。”^⑥

第六节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 A

战时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前面已经涉及到了。我现在将考察它是如何缔结的，它的条件和活动方式，它的作用以及长远意义。

早在 1932 年 4 月，即在日本人于 1931 年发起“沈阳事件”——又称“九·一八事件”，并于 1932 年 1—2 月对上海发起

进攻以后不久，中共就宣布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人的侵略。然而，这个宣言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中共当时处在远离日军的南方的江西省。最早的宣言同后来在1937年订立的统一战线协议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的提法，是中共和国民党联合起来抗日；而最初的宣言，是提出建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下层统一战线。也就是在1935—1937年，中共被国民党赶出南方的堡垒，来到西北山区的时候，它和国民党在战时合作的条件成熟了。

本书的有限篇幅不允许我对两党在曲折的谈判过程中的复杂思想转变进行分析。但正是通过这一曲折的谈判，两党终于在“卢沟桥事变”一个半月以后，即1937年9月，达成了正式协议^①。在协议里，中共作了四点特别保证：努力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停止实行武装推翻国民党和苏维埃化的方针以及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取消对立的共产党政府；红军改变名称，并承认自己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②。

中共唯一真正的让步是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尽管对地主土地的重新分配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曲折地完成。至于孙逸仙的模棱两可和自我矛盾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被肢解，并被添加了许多不同的含义^③。在日军横行于华东，国民党退却到西南之际，中共并没有任何“推翻”逃亡政府的兴趣。放弃苏维埃化也并不困难，公开的过分的阶级斗争只能对日本人有好处。中共还放弃了其它一些过去常用来打击那些在农村发挥着突出的经济和政治作用的绅士的暴力手段。最后，由于中共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关于统一国家政权的说法以及改组红军并将其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的说法，必然会名存实亡，中共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独 立

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政策的成功实施，表明中共在

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独立权利，因为广泛的社会变化以及由此推动的抗日运动，不能指望得到国民党的默许。毛泽东 1938 年 11 月的演说，对党所坚持的坚定的独立路线作了明确的概括：

“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译注），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④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也不含糊：“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独立工作的权利，我们必须积极地去我们认为是必须去做和能够做的工作。”⑤因此，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得到了明确的强调⑥。这也完全适用于军队：“在原先的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的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⑦，所以，“我们抵制了国民党要派遣人员到八路军中当干部的要求”⑧。中共认为：“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不是保卫自己地位的一项消极政策，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扩大我们已经取得的阵地”，⑨事实上，党扩大了“三倍、百倍”⑩。

痛苦的经历教育了中共：保卫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不仅可以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可以保卫自己的生存。中共和国民党在 1924—1927 年曾经形成过一次统一战线，共同为把中国从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解救出来而斗争，统一了整个国家。随即，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敌视和血腥镇压，造成了中共灾难性的失败，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了。当第二次统一战线开始形成的时候，中共已经处于比以前更有利的地位，它力图避免 1927 年所发生的悲剧重演。毛泽东概括了情况的这种变化：

“1927 年我们用血换来的教训是，由于缺乏革命力量的坚定的核心

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了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和强大的红军，我们也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在政治上不再是幼稚的了，它能够照顾自己并处理和同盟者的关系。”^①

换句话说，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和地区政权，加上无比丰富的经验，这就是以中共在两次统一战线中的地位相比较，后者不同于前者的地方。

团结和斗争

对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原则表示赞同，可能是相当容易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在强调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必要性时，显然仍常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团结和斗争到底各占多大的比重呢？团结和斗争依层次不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从民族的高度来概括国共统一战线。关于团结——斗争的政策在农村一级应如何贯彻的争论，到后来才展开。

简要地说，不仅在敌后而且在国民党地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的实践，都具有斗争的特征^②。在不完全瓦解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中共力求巩固自己，以便发展强有力的抗日运动，并为将来不可避免的和国民党的摊牌作准备。由于共产党的力量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并渗透到广大的地区，国民党自然越发感到不安。下面是莱门·P·范·斯莱克最好的概括：

“国民党是如此软弱，都不能对日军发动反攻，不可能也不愿意在敌后和中共进行有效的竞争。国民党采取了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政策：尽可能限制中共控制的地区并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压制共产党的活动。”^③

“磨擦”——中共愿意这样称呼，在两党之间虽从未停止过^④，然而它从1939年始却明显地加剧了。考察和确定谁该对随之而来的广泛的军事冲突负责，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仅仅想指出共产党为此损失了数以千计的人。据当事人提供的原始资料，在1940年一年当中，山东的八路军由此遭到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日军“扫

荡”所造成的损失^⑤。最严重的对抗是1941年1月发生在华中的“新四军事件”，估计新四军有9000人死亡。这完全无益于改善两党的关系。中共公开申明了它的观点：

“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一样，自从武汉失陷以后，或大或小的，或在华北或在华中，反共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把它的敌意都集中在共产党身上，对日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敌意。”^⑥

但并不会因斗争而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记住这一点显然很重要。斗争不光是为了发展自己的部队，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维持统一战线。所以，当进攻逐步升级，并有不祥的预兆，意味着国民党的反共甚至可能导致它同日军携手来摧毁共产党时，党感到有必要在各个方面加强斗争。斗争的这种两重性，在1940年5月毛泽东写的一个指示中能看得很清楚：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目前每一具体斗争……（具有）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⑦

在列举了这种斗争的大量例子后，毛泽东接着说：

“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⑧

中共必须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它不能使日本获得一个有力的同盟者。只要战争还在持续，不断地强调维持统一战线就不仅仅是宣传：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认识到，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维护它。”^⑨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党决不改变统一战线的政策。”^⑩

“战争结束之前，国民政府不可能完全地垮台”。^②

虽然有流血冲突及相互间的指责，如中共指责国民党同日伪军没有区别^③，但是周恩来在一篇关于抗战四周年的文章中仍然赞扬了和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

“抗战四年后，我们的国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我们的人民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具有从未有过的民族意识，我们的军队有了从未有过的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集中的意志。国民政府和蒋总司令作为抗战的领袖正变成整个中国人民支持的中心。”^④

历史意义

在“卢沟桥事件”前两个月，毛泽东论述了为什么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的问题。他说：“为的是把我们革命的车轮推进一步……而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⑤这三个口号是紧密相关的：除非能够避免和国民党重开内战，否则，实现实质性的有益于农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变化和发展广泛的全民抗战将会异常地困难。同年底，毛把统一战线视为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到完全新的阶段的历史车轮。”^⑥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B

第二次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在乡村和地主结成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后者或可称作农村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对于阐明战时阶级结构的变动来说，是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将对它进行极详细的考察。由于党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主张并非没有尖锐的矛盾，所以，重要的是要区分宣传性的或者诸如阶级团结之类的易使人误解的阐述与政策性的阐述之间的不同点。在政策性的阐述方面，党在描述其阶级政策时或运用的一些相当含糊和隐讳的名词的实际内涵，也必须弄清楚。有关农村统一战线的显著特征的各种见解都在这里提出，而对具体过程的分析，以及对阶级关

系所经历的变化探讨，将在论述党的政治经济纲领的实施的部分中展开。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战时的整个阶级关系的背景必须提及。对中共来说，在1937年以前阶级联盟的问题——当时是在什么条件下联合农民阶级中的哪个阶层来反对国民党——地主的权力的问题——本来就不容易回答；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占领，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在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党必须相应地调整它的阶级政策。中共通过宣布日军的入侵已经“导致了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所以不仅使联合所有阶级抗日成为必要而且也创造了这样做的可能性”^{②6}，使上述问题得到了解决。更具体地说，就是“把阶级的斗争居于抗日的民族的斗争之下，这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本的原则”^{②7}。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两种矛盾中区分出了主要的矛盾。这一结论意味着：

“在中国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的，而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次要的，民族的敌人已经深深地侵入我们的国家这一事实是具有决定性的。”^{②8}

如果说这个公式至少具有这样的长处——能表明阶级对抗暂时采取了较缓和的形式，那末，它的非辩证的措词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党能依阶级的不同对各种政策作出相当复杂和准确的解释。

阶级团结的主旨

中共宣称，农村统一战线是在农民群众和地主之间寻求基本平等的妥协的产物。有人认为这是十分虚伪的。这种看法不值得一驳。尽管党的这种宣传肯定掩盖了农村统一战线的真正特点，但它对于我们注意党在和地主建立合作关系——当然是在党允许的条件下的合作关系——方面的真诚和努力，或许是有意义的。

利用地主阶级并避免它完全地转向与敌勾结是必要的，这对于边区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944年彭真谈到：地主是“现在我们不能没有或不能丧失的抗战同盟者”^④。他还指出：没有他们的合作，“就无法坚持抗战”^⑤，巩固这个统一战线，促进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团结，建立为社会各方面的人所支持的政府，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阐述的题目^⑥。通过举行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来产生政府机构，表明党关于阶级团结的主张是严肃的。这个政府是由所有阶级参加的政府，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各自还需要调整自己的利益^⑦。减租减息正如其它一些改革措施一样，是作为“照顾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的政策而提出来的^⑧。它意味着互相作出一些牺牲^⑨，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⑩，结果使阶级关系稳定化^⑪。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不和敌人勾结的地主，给予了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自有财产以及参加政治生活的同等合法权利^⑫。同时，要尽最大努力避免阶级之间的磨擦^⑬。总之，每个人都要为争取最大限度的团结而作出让步^⑭。

党关于农村的绅士应该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运动的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敌人的人侵造成的毁灭对任何人都一样，所以农村的统一战线有一个基本的目标。

“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人员——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⑮

日本所宣布的军事经济政策同所有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这就是能够建立广泛的团结关系的基础^⑯。在日本人的第五次“加强和平和秩序运动”期间，一篇《解放日报》社论说：“无论是农民、地主或商人，都痛切地感到‘活不下去了’！”^⑰敌占区人民生活状况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日军在剥削每一个人。日本人所到之处，地主的经济基础动摇了：税收被大大地提高（主要影响到富人，只有他们有能力支付）；由于形势不稳定，土地价格急剧下

降；甚至连那些主动和日军勾结的人，也不能逃脱日军的敲诈和虐待，等等^④。

中共认识到，“封建势力”被日本人所利用，同时“封建势力”也依赖于日本人，但在“广泛的敌人压迫”的过程中，在日本人控制区和游击区，“封建剥削关系”将逐渐趋于消灭^④。另一个使农民和地主两者联合在一起的反面因素是入侵者对农民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毛泽东告诉哈道·汉森说：“你已经看到了，日军的恐怖比国内地主的压迫更厉害”^④。在这种条件下，以“决心和日寇战斗到底”^④作为统一战线的内涵，在理论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统一战线还有其它的内涵，如接受民主和改善民生，但这些要求从来也不是作为先决条件来坚持的。在任何场合下，乡村的变化几乎都没有得到富人的预先同意，但事实上，他们对抗战的默许和社会改革是有关系的，因为地主也已经得知，贯彻社会——经济政策对动员抗战来说是一个必然性的因素。

不能否认，一些地区的地主由于日军的占领政策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战争还毁灭了他们的许多财产，而同时，大量的地主通过与日军勾结，也避免了许多损失。

调整阶级关系和三种成分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强调或者赞扬阶级团结——或曰阶级调和，却毫不掩饰客观存在的阶级冲突：“它们（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派别之间的矛盾）将仍然存在，决不会削弱或者消失。”^④“阶级斗争不能排除。”^④然而，由于日军的入侵，党要求结束内战和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基于阶级矛盾已经居于民族矛盾之下的正式概括——这种概括是不恰当的、易使人误解的，若要推进中国革命，对阶级斗争必须制定一个新的政策。党并不是要掩盖阶级矛盾，而是要让大家明白：党面临的任务是适当地“调整”和“控制”这种矛盾。

调整阶级冲突的新的理论就是1937年9月提出的关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公式。第一，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构成的左翼，也就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左翼”，“因为这是改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最后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前提”。第二，“中间势力……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其中有些倾向于左翼，而另一些摇摆不定。党的目的就是“帮助中间势力前进，改变他们的立场”。第三，右翼，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组成。它们害怕“战争破坏它们的财产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它们是“民族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它们当中，仅有一部分人，是可信赖的抗日力量，其它的，要么已经和敌人勾结起来了，要么很可能要这样做：“一般说来，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它们就会分裂。”^⑨把这种公式应用于农村，那么，贫农和中农形成左翼，可能大多数的富农、开明绅士和抗日的地主属于中间势力，和日本勾结的地主将归入右翼^⑩。党的目标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⑪。首先，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这三种势力，然后再考虑它们的相互关系。

发展贫农、中农等进步势力，并非局限于一个个战区，而是包括了任何地方。它意味着：

“放手壮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规模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的全国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推广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宪政运动。”^⑫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要使扩大的力量得以巩固，并把它引向党的长远目标的轨道，还必须要有一个质变。党必须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抗日组织的形成，以及改造旧的农村秩序的群众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争取中间势力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⑤。要发挥中间势力的作用，关键的是要吸引相当数量的中间派别，得到它们的合作。虽然它们惧怕土地革命，但仍有使它们愿意“和我们一道共同抗日以及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可能^⑥。中间势力对于贫农的要求有对抗的一面，但同时又比顽固分子更“开明”一些，它们本身是不稳定的、动摇的，依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倒向某一边。它们客观上属于统治集团，所以它们依赖于反对被统治阶级的顽固分子，它们在抗战期间对日军的态度有重要的不同，这就足以争取它们成为同盟者或者次要的同盟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以不进攻它们，为使它们参加统一战线而给它们以实质性的物质利益为条件。其它手段也被用于使它们服从进步势力的目的。尽管如此，它们和顽固分子相勾结的危险仍是非常现实的，要把它们吸引到贫农、中农的阵营里来，必须要有三个条件：

“（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它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⑦

最重要的条件是第一个，因为这些势力几乎都竭力抵抗或者暗中破坏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般来说，只有在群众的力量通过运动和农民政权的制度化而组织起来以后，合理地、彻底地贯彻这些改革才有可能。所以，与中间势力实现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使它们居于次要地位。必须使它们认识到：企图继续阻碍改革是无用的，唯有通过支持新的政权组织并和新的政权组织达成协议来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的利益，才是明智之举。

如果第一个条件从性质上说是完全消极的话，那么第二个条件则是积极的，而且在鼓励中间势力参加统一战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辅助性作用。对它们来说，这种鼓励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富有吸引力。然而，党确实做了反对完全没收富农和地主财产的保证。只要它们遵守边区政府的计划，党让它们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这才有可能吸引它们，从而防止整个地主阶级

和日本勾结。在争取它们的过程中，党的要求极其谨慎：“中间势力在中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我们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它们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它们。”^⑧

对待顽固分子的政策有三项原则：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它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⑨。这样就孤立了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⑩。

由于农村统一战线包含着吸收对抗阶级并使其居次要地位的内容，所以，“对于那些仍然坚持抗战的上中阶层采取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⑪，甚至比同国民党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在对党员和“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教育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或者我们常说的贫农和中农）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去团结抗日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同时根据他们妥协、摇摆和反共的程度作相应的斗争。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团结和斗争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谁要是不清楚这一点，谁就不清楚其他的许多问题。”^⑫

中共在军事上被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四面包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的力量和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明显地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斗争的多样化并不至于要离开一般的准则，在和富农、地主结成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斗争的方式将是“和平的”、“无血的”^⑬。尽管这里只提到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斗争，但经济斗争也包括在内，而且经济斗争在使地主富农居于次要地位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决定性的手段。

邓发 1944 年在解释对地主为什么毋须采取激烈的措施时说道：

“由于我军的胜利，政权已经交给了人民。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协商

和谈判的方式而不是通常的阶级斗争的方式重新调整阶级关系。当农民不再处于无权地位时，农民就没有必要去敲地主的头以得到公平，他可以叫地主来进行公平谈判。”^⑧

在中共牢固控制的农村地区，因为地主不可能阻碍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令人震惊的阶级斗争也就没有必要了。战时的目标并不是把他们作为阶级而消灭。对于顽固派来说，它们“反对进步势力的发展”，因此反对它们的斗争必须是“绝对的”和“毫不留情的”，否则，党“将不可能反抗它们的压力和消除中间势力的怀疑”^⑨。如上所述，党对顽固派的态度基本上是防御性的，避免大规模的战斗，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斗争以便孤立它们并使它们居于次要地位，避免内部冲突，以便对日军作最广泛的抵抗，因为甚至顽固派中也仍有抗日的情绪^⑩。这是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在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斗争是达到团结的一种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如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如果以屈服求团结，则团结亡。”^⑪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方面的鬼把戏，中共如果对日军和内部力量同时开战，则将一无所获。

吸收、利用和使之处于次要地位

一对加拿大夫妇于 1943 年 1 月参加了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政府机构臻于完善的那次大会。后来他们记下了自己的感受：“看到这些在中国古老的阶级斗争中的世袭的敌对者（‘地主、土豪、农民和劳动者’）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开诚布公和友好的精神在一起互相讨论，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经历啊！……”^⑫

无论是哪个朝代的风气，都不可能由地主和农民在平等条件下讨论决定乡村事务这样的事情。共产党的任务是保证“在所有的政策中，应该长久确保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优势”^⑬，或者说是贫农和中农的优势。一份日方报告指出，共产党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统一战线口号，本质上是维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⑭。彭德怀在 1940 年 9 月的干部大会上说得更坦率：要建立民主政府，

必须在农村摧毁地主的统治^⑥。共产党认为，贫农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⑦，中农，作为抗日政府的支持者，是“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两者形成了“主要的社会基础”^⑧。在改组权力关系的过程中，不允许地主维持现状，党的一份决议案说得很清楚：

“所有这些，特别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地主阶级（也就是那些拒绝居于服从地位的地主），在群众支持的前提下，必须逐渐地把他们从各级政府行政机关中清除出去，对他们采取孤立的政策。……特别要注意区、乡、村的政府行政机关，因为当地主和坏分子假装抗日的时候，就容易在这些部门隐藏下去。”^⑨

不允许地主积极反抗党的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死硬的不听劝告的地主，（那我们）必须对他们采取暴力的斗争”^⑩。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要破裂统一战线。同一份决议案还说：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肯定不妨碍我们推动所有开明绅士和那些一直帮助抗日的地主和商人结成统一战线。例如，鼓励他们捐献钱、粮和武器，……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联系。”^⑪

现在来总结一下党对地主的态度。推动统一战线到某种程度，并不意味着要达到互相依赖的程度。让地主提供钱、粮（提供武器是相对不重要的）来帮助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能把地主放在次要地位，吸收和利用他们。地主处在符合农民群众的要求和客观利益的边区经济之中，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只好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安排之下。他们得以保留的自由权利也被严重地限制了。

边区严重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所以边区政府急需地主给以帮助。因为地主受到大众的监督，所以他们明显地不可能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狭小的利益。林枫对I·爱泼斯坦解释道：

“我们并不否认许多地主有经验和知识，那是对人民有益的，其中有些人是正直的、诚实的、爱国的。要给他们的资金以投资于工业的机会，要给他们以从事教育、管理、会计和其它专门工作的机会。同共产党人一样，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民是

如何看待他们的。”^⑧

邓发告诉 I·爱泼斯坦，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原居天津和北京的 100 户地主家庭，带着它们的财产回到了晋西北——它们的家乡。他继续说：

“两年以后，你就看到许多地主在政府机关积极从事技术工作。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能够把怀有仇恨的地主赶走，另外，如果他们永远不再指望取得霸权的话，我们仍能给他们以平等的对待。”^⑨

换句话说，如果地主适应了这种情况，并能把自己置于次要地位，那么他们就会被邀请到中共建立的组织中贡献力量。对地主既利用又使其居于次要地位，这在彭德怀向死硬反共的诽谤者回答关于他们和政府组织的关系问题时模糊地反映了出来：一方面，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和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自由更容易”，经常被叫去参加非正式的讨论，并被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要进入政府，就要接受两个含糊的但是具有约束性的条件，即：赞成抗日和民主^⑩。

彭关于地主权力问题的阐述，既表明了对地主的有条件的宽松政策和对他们的平等地位的正式保证，同时又表明要在任何有实权的地方排挤他们。林枫对爱泼斯坦说：“尽管我们已经剥夺了他们对政权的垄断，但我们无论如何不会侵犯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⑪

当爱泼斯坦问到为什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地主作为阶级而消灭时，邓发指出了简单地抛弃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做法带来的消极后果。邓首先特别提到：农民曾经“远比我们‘左’”，党不得不对农民的这种激进主义进行刹车。农民曾提出 23 条要求，其中包括补发从 1911 年以来减少的工钱和归还自那时以来缴纳的租息。农民辩解说：“从 1911 年推翻皇帝的时候起，我们一直被告知是处于革命的时期。”地主和放贷者就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也不能满足农民的这种索取。邓阐明了为什么党不能同意这种做法：

“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商人就提取他们的股票，秘密地转移到敌占区城市。那些现在被吓坏了的地主，也竭力卖掉他们的土地，然后逃跑，甚至没等卖掉土地就逃跑了。那些靠这些地主的资金开办的小工厂也只好倒闭了。在和平时期，你可以来整顿这些事情，在战时，你就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作战。……我们（向农民）解释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将会迫使任何一个地主和商人投向敌人的怀抱，这些敌人在物质方面本来就比我们强大。……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否则，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生产和商品流通反倒会急剧地下降。”

干部力图说服农民：商店关门、资金转向敌占区，只能“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帮助敌人”^②。

使地主和富农处于次要地位而加以利用的原则，看起来可能与党经常宣布的发展富农经济的要求相背离。正如中共的理论所指出，在中国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一支应该发展的进步力量，因为富农带有农村资本主义者的特征，所以他们在生产活动中应受到鼓励^③。因此，在1940年8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经济会议上，宋劭文说：

“逐渐地把小规模农民经济发展成为富农经济是有必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利的条件。”^④

这种富农经济并不是放任自流的，它被严格地限制在必须服务于边区经济的基本目标的范围内，其中的一条就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党认识到富农同贫农的关系的对抗性：他们通过收租收息以及雇佣劳动等手段来剥削贫农。这必须要进行调整，所以富农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受限制的^⑤。

杨尚昆认为无疑应该吸收地主和富农的资金和物资^⑥。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证据表明，尽管有地区的不同，但富农的财富都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作出一个限定。根据彭真的说法，富农和地主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富农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也直接参加生产^⑦。所以要稍微多给富农一点余地，使他们发觉自己处于较优越的环境。他们同贫农的矛盾远不如地主同贫农的矛盾那样尖锐，因而

农民的激进主义对地主造成的损失也比对富农造成的损失严重。彭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根据地的现行土地关系中，主要的问题是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贫农和富农的关系问题是次要的问题。”^⑤

阶级矛盾和“极左主义”

用“和平和无血的方式”有效地使大部分地主甘居次要地位，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冒险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失误和政策遭到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明显的复杂的因素是客观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是如此的尖锐和一触即发，以致于要想在统一战线下层的适当范围内正常地进行斗争都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又必须使地主感到阶级矛盾的压力，否则他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总是采取不合作态度。正如朱德对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表明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容易：

“我们的部队都是工人和农民。……作为农民和工人，他们终身痛恨地主和军人，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是如何生活的，所以现在要号召他们和愿意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的每一个人共同工作是非常困难的。”^⑥

邓发的论述也值得摘录：

“他们（指人民）以及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受着压迫，谁能指责他们粗暴地对待富人呢？他们中间有人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还是非常害怕富人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也狂热地追求这种风潮（如邓所说，这是‘极左分子’的行动），毕竟他们本身也是农民，当让他们在地主和农民之间作出仲裁的时候，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用手枪来接待地主，并说：‘你这得意忘形的寄生虫，你怎么胆敢也站在人民一边！’”^⑦

抗租、没收土地、复仇行动等极左主义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存在。尽管边区各地情况发展不平衡，但我们仍然可以概括说：这种行动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以及1940、1941年以前，要更盛行一些。那时，对地主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边区机构也还没有使贫农、中农的权力制度化^⑧。

不过，彭真毕竟明显针对着党的干部中存在的极左主义而

非群众的自发过火行为，批评了在边区建立及人民翻身以后特别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斗争倾向。他认为：这种倾向非常危险，以致危及统一战线和根据地的巩固。相对而言，在边区的筹创阶段，主要的危险是对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忽视及群众动员中的极右倾向，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创建农民和地主的反日联合战线，所以并未提出农民同地主做斗争的问题^⑧。

极左主义的问题也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与国民党的冲突会使地方党员干部的思想激进，在1939—1940年的某个时候，他们认为统一战线已经最后破裂了，“我们不再需要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是需要如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⑨

小 结

党并非竭力要使阶级关系冻结，也不是要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实现妥协，这些“解决办法”无助于达到阶级调和，也无助于平息阶级对抗。除非改革农村社会，否则很难指望农民群众会为农村、为国家而战斗。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农民世代经历的只是灾难。此外，由于根本的改革受到了地主的抵抗，所以需要使地主居于次要地位。我们看到，关于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矛盾）的阐述，对于理解贯穿战时的阶级冲突是多么的不适当。这样一个定义掩盖了统一和斗争的辩证的相互作用，掩盖了对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控制和山区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实现进行正确解释的唯一途径。

通过一份党的文件——对太行地区经济工作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村统一战线的实质：在和地主对抗的过程中，“务必使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大大地削弱他们的剥削，使他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居次要地位，而不是把他们作为阶级消灭）；争取联合抗战（那就是吸收他们到自己阵营来，防止他们与敌勾结）以及让他们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那就是利用他们的财力）”^⑩。

第七节 勾 结

建立农村统一战线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地主并非全都与敌人勾结，尽管他们对党的政策感到不痛快。从大体上说，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是成功的，足以使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不会叛变，倒向日本人。但确有许多地主为占领军当局做事，还有一些地主很想步其后尘。

地主的态度

根据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在战争进行时，大地主中间发生了分裂。有些依赖于日本人并直接为日本人服务，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其他则“脚踏两只船”，在不放弃抗战的同时，对持久战缺乏热情，并且和伪军及伪政府保持联系^①。中、小地主由其生活条件所决定，相对地不那么倾向于与敌人勾结，不过，他们在阶级利益上同农民仍然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也可能转变立场^②。

1944年，彭真在关于土地政策的一个报告中，批评了不去注意地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倾向的“左”的错误观点。彭的报告，主题是孤立汉奸地主^③，他认为，通敌的只是“为数非常少的大地主”^④。另一方面，战争初期山西的一篇文章说：“没有多少”绅士、地主、资本家是“开明的”，倒有“许多”保守、顽固和自私的地主，“在我们山西（其它地区也逐渐有同样的情况）已经看到许多卖国的劣绅、地主和资本家出卖国家以肥私。”^⑤而山西某地的一位指挥员在回答西方新闻记者关于地主的问题时说，“他们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地主是爱国的，而且和我们一起工作得很好”^⑥。

也有一些地区性的不同。随着边区的巩固，在边区的核心地带，几乎不存在与敌勾结的机会。在不稳定的地区，地主从事“汉奸活动”所冒的风险就少得多，他们通过接近日军来给自己

壮胆。一个农民告诉贝尔登：“当他（地主）眼看日本鬼子要赢了，他就驱赶成千的农民运石头为日军修碉堡。”^⑦当日军的“扫荡”接近豫西的十里铺村时，一个地主曾秘密地和日军谈判，要恢复旧的地方政府^⑧。新闻记者周立波描述了占领定襄的日军是如何使得附近的地主动摇的。一个大的有影响的地主召集其他一些地主到他家开会，他反对和日本人打仗，因为日本人是无论如何打不败的。八路军起先表示了克制，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的联系很复杂”，弄不好有可能会损害统一战线。在这个地主召集上述会议以后不久，定襄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了，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⑨。一份党的原始材料上谈到，1942年日军猖狂的时候，当地的地主和富农公开地支持了日本人，中农摇摆不定，而明确地赞成抗战的只有贫农和雇农^⑩。

地主并不都是公开地欢迎日本人的，有许多地主逃到南方去了，也有一些参加了抗日组织。然而，他们并不象农民那样害怕日军。根据日本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在日军进攻占领了一个村庄以后，回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地主。”^⑪地主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财产，在山西^⑫以及鲁南地区，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些地区，“他们希望日军能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害怕抗日会威胁他们的财产和生命”^⑬，因为“大多数的绅士”都相信：

日本人“希望社会秩序安定和有食物的供应，由此原因，日本人将会帮助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也希望日本人对待他们至少能更客气些。”

一些通敌的地主以日本人作后盾，建立了叫做和平维持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冀南为数众多^⑭。刘少奇宣布这些组织是“劣绅”建立的，这些劣绅“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忙，和平维持会是卖国政权的雏形”^⑮。在战争的头一个月，这些委员会受华北日军的特务组织控制。它们是过渡性的组织，其作用是恢复“有秩序”的状态^⑯。在旧的行政机构仍然完整地保存着的地方，日本人倾向于象晋西北那样，继续让地主在其中负责^⑰。

贝尔登生动地描述了随后在内战期间的反汉奸运动中，农民如何向那些曾经杀了人并且抢夺了农民财物的通敌的地主报仇的情况。关于抢夺，“不仅他们（农民）埋藏的谷物被地主挖开和交给日本人，而且连种子也被交给日本人。壶锅甚至金属工具都被拿去满足日本人的强行勒索，但是强索来的东西有半数进入了地主的腰包。”^⑩ 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占领军当局的利益而实施的暴行，给农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以致经常发生地主在判决之前或者在审讯过程中就被杀死的情况。例如，山西某地，有兄弟三个地主，他们曾杀害 18 个农民，农民“在开诉苦会之前，就把他们拘捕起来，人群中的情绪达到如此的高度以致他们不顾来参加诉苦会的干部在场，便把地主吊在树上”^⑪。

与敌勾结的地主和日本人都认识到，他们在防止对于现存阶级关系的任何挑战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无论是在促进“农业发展”计划方面还是在维持有约束力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方面，日本人通常都利用农村地主的力量。地主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日伪军的保护，在必要时，日本人还帮助地主收租^⑫。然而，这些地主尽管与日本人合作，他们的财产在战斗中仍然会受到损失，有些地主的谷子甚至被日本人武断地没收^⑬。

帮助军事占领

日军不得不雇佣大量的中国人来巩固其对最重要的战略区的控制。中国幅员辽阔，日本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管理人员来征服这个国家。

不管是不是深入地思考过，林彪在抗战初期的有关论述是不准确的，他说：

“敌人是孤立的，它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没有任何能援助它的地方武装力量。尽管敌人在某些地方能争取到一些汉奸，但这种勾结活动不可能发展为群众性的力量。”^⑭

战后宣称“汉奸的数量是很少的”，这肯定是错了^⑮。连清苑

县都被认为是抗战的模范地区，这足以作为勾结活动是多么广泛的象征。但在1941—1942年的“扫荡”中，日本人倒是没有能在8万居民中引诱到任何勾结者^②。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为占领当局服务的中国武装力量。

1944年6月，总参谋长叶剑英在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认为，伪军数量是“庞大的”，这是“最大的民族耻辱”，他们是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很大的敌人”。他计算了这支力量：不包括警察和民兵在内，它达到了78万人，其中38万是正规军，其它是地方军^③。根据其它的原始资料，伪军总数达90万，正规军和地方军大约各占45万^④。这与1937年12月伪军初创阶段的情况比，相差是悬殊的，那时伪军只有5000人的警察部队，外加在冀北征募的第一批新兵，才达到15000人^⑤。

这支部队的数量增长，在日本人的“绥靖”的加剧中得到了反映。1942年年中，中共承认，在敌占区，伪军已经变成弥补日军数量不足的缺陷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因素”。例如，由伪军守卫的据点在上一年已经增加到占华北据点总数一半以上的数目^⑥。1944年7月，《解放日报》从山东报道，在“扫荡”和“蚕食”的战斗中“伪军的数量已经增加了”，并且它在这些地区已成为主要的部队^⑦。从总体上来说，伪军并不是一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一位历史学家相信，“或许大多数”伪军是重庆军队的叛军^⑧。尤其是在华北，大部分伪军的前身是地位比较低下的军阀部队和地方军队。约翰·谢伟思是这样描述这些军队的：

“如果他们是从军阀时代遗留下来的人，那他们是由地痞流氓和社会残渣组成的；如果他们是刚征募来的，那他们也是被迫服役的；如果他们是志愿的，那他们是被签约雇佣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能维持生活；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土匪……他们对艰苦的斗争没有兴趣。”^⑨

由于日本人需要使伪军成为一支能够“维持和平”的力量，所以日本人还是尽力提高它的素质。刘伯承在1941年9月认为，伪

军的战斗力已经“显著地提高了”^⑳。时隔不到半年,《解放日报》对伪军中少数“小流氓、残渣余孽、坏分子”以及“年轻公民”的比例的持续增高表示了关注^㉑。

任何军队中都有一些坚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在豫西,一支强大的保卫日军控制区的伪军,成功地阻止了太岳的八路军向战略地带的渗透。由386旅对上庄发动的三次进攻,都由于伪军“顽强的抵抗”而被迫罢手^㉒。

政 治

日本人须得建立一个顺从的中国政府来管理占领区和开展社会活动,才能促进对日本人的统治的接受。

到1938年春,已先后建立了三个傀儡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9月);位于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随后,尽管1940年在南京又成立了由汪精卫任主席的新的中华民国政府,但地区统一化的问题从未得到有效的解决^㉓。这和侵华日军的三支主要力量对占领区的分割控制是一致的。

战时有一位学生写道:华北“名义上是在本国政府的集中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它被日本人的华北派遣军控制,只具有半自治地区的地位。”^㉔用约翰·H·博伊尔的话来说,各傀儡政权已经“获得了地区的和财政的管辖权,这些政权是精心培植和扩充起来的”,占领军“决心把它们紧紧地控制在几个皇军指挥官手中”^㉕。

北京政府的首脑是王克敏,他曾是满洲官僚,1917—1924年期间几届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该政权的其他人一样,他对国民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官方思想极端仇恨。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新民会”。这并不是一个政党,但组织却很严密,其作用是对日军和王氏政权进行支持。“新民会”的任务很广泛,从政治性的群众大会、农业发展到医疗服务、文化和娱乐,无所不包。乔治·A·泰勒当时写道:

“‘新民会’的活动是如此广泛，以至中国人常常把临时政府看作是日本人的妻子，把‘新民会’看作是日本人的情妇。……‘新民会’的活动范围几乎无所不至；华北各省，占领区的大城市和县城都有它的支部。”^⑳

为了反对孙中山的思想原则，一个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被抛出笼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吹捧孔子学说的美德，即忠臣、孝子和繁杂的等级制度，其宗旨是使人们认为：把自己置于日本人的领导之下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

由于日军的暴行和傲慢的态度，这样一种过时的和荒谬的理论大大失去了兜售的市场，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华北地区驻军中的山崎寿三郎不得不承认：“新民会”“变成了一群思想衰竭的人的团体，完全无助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攻势”^㉑。尽管在1940年这个团体连同王氏政府都失去了正式地位，但其领导层仍然继续在华北推行日本主子的命令，直至战争结束。^㉒

南京政权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国民党，是已被蒋介石抛弃的孙逸仙思想的真正继承者^㉓。汪精卫本人长期在国民党工作，也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并且是国民党领袖职位的一个主要竞争者。然而，正如博伊尔所评论的，在30年代，“他越来越孤立，脱离真正权力的核心……也从未主宰过中国的命运”^㉔。在日本人手下，他也不可能行使实质性的权力。1940年缔结的基本条约确立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事务的控制。条约规定：如果南京方面保证“在两年时间内能巩固地建立和平和秩序的话，日本就在两年内撤军。”^㉕这实际上就是要永久占领中国。条约在1943年作了修改，日本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中国的特权，但从属关系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汪精卫从来也不完全指望以日本人为靠山，因为东京方面非常想让对它更有用的蒋介石来当这个傀儡政府的首领。^㉖

对 策

中共不能忽视傀儡组织，必须要削弱它们为日本人的事业服

务的能力。对于日本人控制区的乡村伪政权，中共采取的主要对策是从内部渗透和颠覆，一旦成功，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白皮红心”，即表面上支持日本人，执行日本人的指令，暗地里却从事抗日活动^④。日本人的调查发现，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渗透到了地方伪政府的最高领导层^⑤，而且他们的权势是如此强大，以致只有经过他们的批准，政府才能执行指示^⑥。这类政权组织为抗战出力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给中共提供情报，用假情报迷惑日本人，耽搁替日本人征粮的工作或缩减征粮的数额，在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中搞援助八路军的地下活动，等等^⑦。

中共也渗透到伪军中去了。1938年3月刘少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宣布：

“我们应该挑选和派遣真诚和坚定地抗日的同志积极地渗透到维持会和自治军中去，以便使他们能帮助我们瓦解他们的组织。……将来，你们毕业以后，你们之中也有一些人要到维持会和伪军中去工作。”^⑧

一些小股的伪军部队在夜战中甚至向日军进攻^⑨。除了取得伪军的合作之外，中共也力求争取伪军的士兵参加八路军，在可能的地方甚至瓦解他们的部队，这通过士兵的家庭、朋友、亲戚的“说服教育”和书信往还的方式来进行^⑩。中共并不指望迅速见效，这是“一个长期和耐心的工作”^⑪。但也有一些伪军宁死也不变他们对日本人的忠心^⑫。尽管如此，日本原始的军事资料还是承认，中共从1943年底开始的引诱伪军背叛日本人的工作是相当成功的^⑬。

反勾结的措施对根据地来说也是必要的。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特务和破坏者经常通过许多伪装渗透到根据地。“锄奸小组”建立起来了，它是一种经过高度训练的、由5-7%的村民构成的组织^⑭。根据日本人的报告，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是贫农出身的党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⑮。然而，锄奸工作发展缓慢。到1940年，它仍然没有发展成为“边区群众的自发运动。……尚未认识到汉奸所造成的危险……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巩固的”。^⑯

第八节 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任何有关边区社会变化的阐述都必须考虑到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震动和影响。由大面积的田地荒芜、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以及经济生活的解体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困难，对党如何去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的问题产生了影响。

在考察日军的进攻和自然灾害给农民经济造成灾难性打击的问题时，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华北地区的一个调查，从总体上看掩盖了地区差别，对这些差别很少注意到。其实，日本人的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中共控制的地区也应当有别于日占区，而且，还应注意广大地区的易手——有些地区甚至不只一次，在1943年——1945年共产党的最后推进中，日军占领区的相当大的部分变成了边区。所以，如果忽视了这一类情况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实际影响，那就绝不可能如实地表述党所面临的困难的规模。此外，不同的地区在经济上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第二，边区的人口死亡，生产下降，可耕地面积缩小和牲畜减少，主要与1941年、1942年以前的形势有关。这些损失，主要是在党关于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得以具体化并得到贯彻之前，也就是在农民群众被有效地动员起来之前蒙受的。大约从1942年起，中共更有能力对付由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了。

破 坏

日军向前推进，紧接其后的几乎是一片毁灭。它毫无例外地拆毁其前进通道上的一切东西，这是“绥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控诉日本人在占领区力求实行“高率剥削”，同时对根据地实行的主要政策是一种“破坏和掠夺的政策，企图以此破坏我们的物质资源，断绝我们的生存资料”^①。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

准确的，但是完全被破坏的地区并不局限于抗日部队积极活动的地区。西方记者对此有众多的报道，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

“日本人一过，他们在这些村庄留下的只是烧得漆黑的，伤痕累累的毁灭的残迹。你有时骑马走上一天，看到的只是这一系列被火烧掉的、简直是一堆堆废墟的村庄。在一些地方，道路被炸断了，以致你无法骑一匹中国的山区小马在这被许多深沟所切断的路上通行。这时，你必须牵马行走。或者你在满目荒山野岭的地方骑上几小时，看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屋顶塌了，梁柱烧焦了。这就是‘无人区’从头至尾一片荒芜的象征。”^②

有一个日军联队长说：

“我们的政策是烧毁我们前进路上敌人的每一间房屋，你一眼就能分辨出我们的先头部队在哪里。”^③

没有被毁灭的财产都被掠夺走了。请看对保定的一场洗劫：“实际上这个7万人的城市，其中大部分人已经逃走了，它的每一个商店和房屋都被有组织地闯入、洗劫和拆毁。”^④这种事情在日军所到之处是很平常的。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打击最严重。美国情报机构的研究报告谈到：“据在游击区的中立国旅行者1942年的报告：在河北、山西的农村，未被全部毁灭的村庄是很少见的，晋西北某些地区的人口完全灭绝了。”^⑤一份党的原始资料宣称，在三年时间内，太行有10万间房屋被毁^⑥。有一个村庄，据目击者回忆，1100间房屋毁于大火^⑦。

强制劳动

幸免被杀的村民很可能被强迫去履行劳动责任。这包括修路、挖壕沟、建碉堡、造房子、替乡政府工作和履行警卫责任^⑧。中共太行地区的一个调查表明，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在一个月内被强迫为日本人劳动25天，尽管在規定上只是10—15天^⑨。根据党的另一份统计材料对同一地区的调查：在四个村庄，每天有八分之一的人被强迫劳动；18—50岁的男子——占其人口总数的30%——都要无偿劳动半个月^⑩。在冀南，“主要劳动力”

平均有五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这种义务劳动上面^⑩。1942年晋察冀地区被日军占领的六个村庄的义务劳动统计数字，也表明了强制劳动的程度：在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内，义务劳动时间所占的比率在这六个村庄分别为：12.84%，22.98%，42.66%，48.44%，51.53%和90.32%^⑪。

年青的和身体条件适宜的男人也被强迫加入伪军。在修武村（太行），参加伪军者不少于合格男子的75—80%，占其人口的10%^⑫。

还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人，大概有4万人，被强行船往日本服劳役，其中的许多人“在过度劳累和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⑬。

大屠杀

日军的大屠杀使无数中国人惨遭杀戮。集体大屠杀的名单长得令人毛骨悚然。只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在战争的前三年，太行有多达6万之数的中国人被杀^⑭。昔污村庄的600人，大部分被杀害。昔阳有1000人被活埋^⑮。另一个村庄，原有221人，而在一次暴行之后，只有70人幸免于死^⑯。太岳地区的某个县，在1940年冬天有5000村民——占全县人口的十六分之一——死于一场疯狂肆意的屠杀^⑰。

在河北省平原地带的战略要地，日本人为摧毁抗日力量，经常进行大屠杀：1937年底到1938年初，北丁的一个村庄被杀871人^⑱，成安县被杀2000人，丘县被杀3000人^⑲。冀东也不例外。有一个村庄，1035人中，有658名妇女和儿童死于枪杀，84人受伤^⑳。

日军在华中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

本书并不考察日军在中国搞恐怖活动的原因，不过这里仍需涉及丸山正雄关于“压迫转移”的说法。丸山正雄把“国民的秩序”

描写成“象链条那样一种结构”，“皇帝是价值实体”，他宣称：“社会是如此地有组织，以致其中的每一个组织群体都永远受最高权力的节制，最高权力要对下面的群体进行控制。”因此，“人们设法往下转移这种来自上面的压迫感，以此来维持整体的平衡”。所以，“在家的人仅仅是‘臣民’，在兵营又是二等兵，但当他们到达海外时，他们发现自己扮演了新的角色：作为皇军的一员，他们和最高的实体相联系，相应地他们就该享有无比优越的地位”^②。

自然灾害

战时横扫华北的自然灾害使人民本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了。1939年晋冀鲁豫受到了百年未遇的洪水的袭击。20个县的地区都被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无数的房屋毁于洪水，300万人无家可归^③。1942—1943年，该边区又逢旱情，太行根据地五分之一的地区受到影响^④。

随干旱而来的是“蝗虫的侵袭。它加剧了灾荒（这种灾荒起因于干旱、粮食减产、日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几乎超出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在灾荒的头两年，铺天盖地的蝗虫云集在构成晋冀鲁豫边区所在的四省，连续几天象乌云般挡住了太阳，所到之处几乎毁灭了所有的植物”^⑤。

晋察冀同样也发生了水旱蝗灾，这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死亡和逃荒

战争和自然灾害在许多地区急剧地增加了人口的死亡率。在完全的敌占区，死亡率高达40%，而在另一些敌占区和游击区，也达到55%。在豫北，根据中共的调查，和战前相比，状况恶化的农户的平均比例数，甚至从1%上升到了49%；有六个村庄的人口死亡率徘徊在30%至65%之间^⑥。1942年12月的一

篇《解放日报》社论宣称：局势如此严重，以致出现了“人口整村整村地逃亡”和“全家自杀”的现象^②。

边区核心地带的情况要好得多，这里较少遭受战争的破坏，经济上也更能抵御自然灾害。然而这些地区也受到了影响，对中共的堡垒五台山区的调查就“表明”了这种情况。用聂荣臻的话来说，由于日本人企图灭绝抗日组织，所以该地区“从1937年到1941年，社会人口平均下降了11%”^③。这个数字和1942年的估计数相接近，中共当时估计：一年内，在1000人中有115人死亡^④。

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随着边区的扩大，当新的地区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时，不要忽视了党面临的新问题。这些地区很可能会遭到凶残的日本人的“清剿”，变成废墟。中共也控制了一些以前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地盘。这些地方的情况非常悲惨，太行地区的陵川县，被国民党统治了四年（1939—1943年），那里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有不少于19%的居民死亡；在14个村庄中，逃亡在外和死亡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88%；在另外的28个村庄，原有人口14446人，其中就有4676人死亡和1680人逃亡外地^⑤。

因日军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破坏而导致人们成群逃亡的地区，实际上已变得无法居住了。在情况突出的地区，逃亡人口占90%——也有估计在30%至50%之间的^⑥。根据日方1938年年中的原始资料，在一些乡镇，逃亡人数大约占人口的50%。在河北省的京汉铁路沿线地带，邯郸县由于洪水和粮食减产，16000人中有6000—7000人逃亡，保定的86000名居民中，半数以上的人因为激烈的战斗而逃往外地^⑦。

这只是战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几个例子。不幸的是，很少以至根本没有关于华北地区的人口迁移的全面的数据资料。要想确切地知道以上情况如何影响了边区是不可能的。看来有许多人在付出了很高的经济代价后迁到了中共控制的地区。战时的一本小册子说，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中，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

制区收容了 20 万难民，太行收容了 40—50 万^⑳。贝尔登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 100 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于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㉑

生产力低下

在 1937 年以前，生产力的低下已经够令人吃惊了，而战争更使生产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足以反映这种情况。从数目字看，不同地区似乎明显不同，但毫无疑问，各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北岳地区和冀西的五个区中，较之战前，劳动力分别减少了 8.8%^㉒和 7.34%^㉓。在晋西北，据有关的报告：在战争的头三年，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㉔；62 个行政村 1941 年的人口较之 1938 年下降了 63%^㉕。对山西八县的调查表明：在这些地区，1942 年只有 25% 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㉖。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也成为农业劳动力渐渐枯竭的一个原因。

牲畜也大批死亡。据战争结束前的判断，晋察冀的农业经济所遭受的令人惊愕的打击，明显地与当地大量的挽畜几乎减少了一半有关^㉗。这一边区的一些零散的例子表明，在中共政权的核心地带，牲畜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1940 年冬天，太岳的一个县有 7000 头牛被杀^㉘。1937—1941 年期间，日本人的突然袭击使五台山区农村的牲畜损失了 40% 以上^㉙。1940 年底，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冀西六县的牲畜总数减少了 39%^㉚。

在晋绥，牲畜的损失同样严重。1937—1940 年，驴和骡减少了 80—90%，猪减少了 80%，羊减少了 60%^㉛。据另一份调查材料所载，截至 1940 年，8 个县的 11 个村庄遭受的相对较轻的损失是：牲畜总数只及战前数量的 42%，其中骡子为 23.2%，驴为 32.2%，牛为 61.8%^㉜。1941 年春，晋绥边区重建经济的努力因日军的进攻而受挫，日军 84 天的“扫荡”造成

了8万头牲畜和3450人的死亡^④。

1938年，日本的调查人员发现，京汉铁路沿线地区的牲畜损失情况明显地相似：涿县没有一只活鸡，猪的损失量达80%，马77%，骡子40%，驴和牛17%^⑤；邯郸县的牲畜也减少了50%^⑥。据日方的另一份原始资料提供的情况：在石家庄附近的许多县，牲畜死亡了80%^⑦。

没有多少人在田地里干活，没有多少挽畜可供使用。同时，战争对土地也直接造成了破坏，可耕地减少了。在晋绥，1940年可耕地减少了16%，存留下来的耕地90%是贫瘠的山地，肥沃的平地和水田分别只占9%和1%^⑧。在晋绥的许多地区，多达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可耕地被废弃了^⑨。

生产下降

陶铸在1942年年中估计，由于日军的进攻，以及日军的军事行动与破坏性的社会——经济措施的结合，边区部分地方的生产已经下降了50%^⑩。因受战争的干扰，农业产量急剧地减少。在晋绥，可耕地的粮食单位产量减少了40%^⑪。1937—1940年，战斗使这一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棉花产量减少了97%^⑫。到1940年，华北产棉区仍然在耕种的土地只有原耕地数的22%^⑬。在冀北，谷子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平均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⑭。五台山区的农村，收获到手的谷子只及原产量的三分之二。聂荣臻告诉爱泼斯坦说：“这个地区是相当贫困的”^⑮。日本人当时的估计，也表明他们对灾荒有一个清楚的了解。1937年，冀东和津浦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较之往年的平均产量，其下降的幅度分别为：高粱，50%和50%；小米，80%和80%；小麦50%和60%；棉花30%和20%；其它40%和30%^⑯。

自然灾害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据美国政府的研究资料，1942至1943年的干旱和蝗灾，使河北、山东和河南

部分地区“大约 150 万英亩的田地无法耕种，小米、高粱、小麦、谷子、棉花的产量不及正常年份的一半，许多人饿死或者背井离乡”^④。一般说来，洪水泛滥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1937 年日本调查人员收集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在洪水淹没过的地区，农作物产量大约只及往年的 20—50%^⑤。一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⑥。在河北沧县，农作物毁于洪水的百分比为：有三个村达到 100%，35 个村达到 90%，295 个村达到 70—80%，379 个村达到 50—60%，38 个村达到 40%^⑦。日本人的一份报告宣称，1939 年的洪水是对中共的“致命的打击”，使晋察冀边区的农业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⑧。

日本的情报机构注意到：1940 年察哈尔南部由于暴雨和日军的进攻，农产量比平均年份下降了 40%，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党禁止在受灾乡村征粮，并努力从日占区获取粮食^⑨。华北从整体上说，生产率的下降也是急剧的：据 1945 年的《华北年鉴》，水田的亩产量在 1940 年至 1942 年期间下降了 60%，只及 1937 年产量的 20%^⑩。据中国的一份原始资料估计，在受战争影响的华北及华南沿海地区，1938 年几种农作物的收获量与 1936 年收获量的比值分别是：大麦，58%；大豆，34%；白薯，76%；花生，42%，小麦，45%；小米，20%；高粱，23%；棉花，29%^⑪。

在抗战的前半期，无论是敌占区，还是中共控制的地区以及无人区，生产都或多或少地下降了。就边区而言，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晋察冀政府 1942 年 2 月的报告，该“边区过去四年来的农业生产是极不平衡的”，尽管如此，报告仍然提出了恢复战前生产水平的计划目标。只有个别地区可能情况不错^⑫。彭德怀关于华北被收复地区由于对农民进行了增产教育，所以 1938 年（或者 1939 年？——作者注）的收成比战前增加了 20—25% 的估计，不能被认为是准确的^⑬。

产量下降，收入减少的现象，在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战争最激

烈的地区特别明显。有个村庄的农民，1941年的收入只及战前收入的44.7%，到1942年，更下跌到了30.6%。在另一个村庄，1941年和1942的农民收入分别比战前下降了33.3%和35.8%^⑧。

动摇或者强化传统

战争的破坏也有其“建设性”的一面：动摇了旧的习惯和信念、宗派主义和地方观念。埃德加·斯诺1940年描述了在战时混乱中潜滋暗长的、由这种混乱急剧促进的某些广泛的社会变化。他对中国情况的直接了解远远早于1937年，并且对这个国家的战时状况也有亲身的体验。斯诺说：

“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可能比以往任何大变动都更深刻。成百万的儿童离开了他们的父母，有些参军去了，有些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确有成千上万的人舍家为国，……在晋北，我看到一群不信神的工人把一个古代的庙宇变成了印刷厂。在中国其它一些地方，佛像也被扔到露天让雨淋，寺院变成了医院或者兵营，几乎无人对此进行指责。我还看到，一些佛像被用来支撑摇晃的机器，工人们自鸣得意地打着他们这些“伙伴”的脸，……工艺合作社向成百的民族手工艺者提供资金，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做焚香用的纸钱——以前这在每个村庄都是兴旺的工业。偏见正在消失。从东部省份来的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西部的小村庄，……外省人和当地人，外地的语言和当地的语言正在发生混和，以致住在落后地区的从未见过中国地图的土著居民总有一天也会创造出新的奇迹。”^⑨

虽然斯诺描述了上述趋势，但是自然灾害的直接作用时有又使情况趋于反面。特别是在那些深受这些灾害之苦的地区，传统迷信活动又复苏了，又出现了一些竭力寻求减轻痛苦的方法的组织^⑩。下面是河南的农民如何对待正在引起大规模饥荒的干旱的一个例子：

“整村的人都一齐来到寺庙，跪在佛像、菩萨以及地方的神面前求雨。许多人穿着牧师的服装，许多人穿着象宗教忏悔者的衣饰，脖子上带着木枷，趴在地上。其他人在这些人颈髓上穿洞，用长线穿通，边

走边拖着他们，以此作为苦修行的象征。”^②

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当这些曾被冻结了的宗教活动不能使条件有任何改善时，村子里的年青人开始对它们的效果提出疑问。在八路军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进入庙宇，推倒偶像，打碎它们的头。贝尔登描述了他们是如何行动的：

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勇气，……把打破了的偶像，驱出寺院，滚落在街头……尽管村子里的老年人对此担忧。然后，他们又用油漆把破片拼成原样，在集合的农民面前当场把它们击得粉碎。”^③

由于神并没有对此进行报复，所以与自己村庄里的统治者的权力相比，村民们对于神的权力并不给予高的评价^④。

干旱也以不同的方式使家庭关系大大地紧张起来。离婚率的增加可能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⑤，它解放了许多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结婚的妇女。买卖妇女儿童以及家庭全家自杀的现象相对减少了^⑥。

第九节 政策的调整

需要经常指出的是，边区各地条件的显著不同使得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进行调整。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各地条件的多样化。在不同的条件下，党要寻求更加具体化的目标。我们谈到的地区之间的不同，是指战斗程度的不同、破坏程度的不同、收复早晚的不同、经济地理情况的不同、过去和现在的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的不同、教育水平的不同等等。

如果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贯彻党的重要政策，那么上述这些条件就制约着集中的程度。要使党的基本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付诸实施，灵活性是必需的：要批评对上面的指示的“盲从”，提倡“独立地贯彻党的政策和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当上面的指示被证明不切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时，下级应该修正上级的指示。刘少奇把这种灵活性叫做“集中领导、分散管理”^⑦。

抽象地阐述政策和无视条件的不同而在许多地区搬用政策的做法受到了批评，比如仅仅根据巩固地区的情况来作指示，而不考虑游击区的情况^②。干部也常因对本地区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发布不切实际的命令而受到谴责^③。指示和命令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口号必须与之一致。适合于抗日根据地的口号是：“好男上前线！”“保卫出身地！保卫边区！”适合于游击区的口号是：“中国人不为日本人当兵！”“反对乱抓壮丁！”^④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组织的活动和形式都要依据和日军接近的程度而有不同，越接近日本人的地方，越应提出充满军事因素的口号^⑤。

尽管经济政策的普遍深入的贯彻将会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但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开支。承担这种开支的能力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据估计，中共控制的核心地区的人民与战争的破坏比较严重的游击区的人民比起来，能够支持多一倍的军队^⑥。1945年鲁中地区的一个报告注意到了有必要根据“基本的”（也就是巩固的）根据地、新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类型来提出不同的要求^⑦。一般说来，游击区和新收复的地区比中共坚强控制的地区的税收负担要轻一些。此外，收税的方法在前两种地区也要简单一些^⑧。减轻群众的经济困难的中心问题，是贯彻减租减息政策。著名的1942年1月的土地法决议案认为：由于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条件，“甚至在中心根据地内也有不同的条件”，减租减息的程度必须要调整。在游击区以及与日本人接近的地区，必须采取不太激进的方法，因为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薄弱，又经常存在着富人与敌人勾结的危险^⑨。正如在山东的一次劳动英雄大会上一位同志所说的：

“在一些地方，（干部）在贯彻政策过程中很不谨慎，或者原原本本地接受基本区的政策。总之，每个地方都必须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开展工作。”^⑩

互相合作劳动——实施计划和分工的劳动——的推行，在条件不同的地区，诸如根据地和游击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组织形

式。对后者来说，建立互相合作的整体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战斗。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互助就特别表现为一种救济的手段^①，这些地方强烈要求在考虑互助组的适当规模时应该注意完全符合当地的具体条件^②。这就必须谨慎地进行工作，而不是急躁地贯彻党的政策，否则结果只能是失败。“如果一个人不考虑现实环境是否允许而企求很快成功，那末也许情况会有暂时的改观但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走进死胡同甚至彻底垮台。”^③和军事形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产运动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几乎难以同样方式来进行。的确，在游击区，为了保卫生产，就必须要建立复杂的报警和保卫系统，因为在这些地区，保卫生产和促进生产本身一样重要。生产运动是否在这些地区行得通呢？对此人们深表怀疑，甚至常常提出批评^④。

在抗战中期，党被迫削减脱离生产的军队和行政人员的数量，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这是随着灾难性的军事挫折而来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所要求的。尽管缩减是急剧的，但也不是所有地区都受到同等的影响。地区的情况越好，缩减得就越少，因为它的负担能力就越大^⑤。军队的急剧发展引起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作出决定，削减专职军人的数量，扩大那些边作战边从事生产的武装。另一个措施是军队自己从事生产，这在各地所能做到的程度当然是不尽相同的，关键的因素在于该地区战斗的频繁程度。据估计，如果以1945年初为截止期，那么，“稳固的基本根据地”能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达到一半自给，而“边沿区”和“游击区”将只能实现15—20%的自给^⑥。

关于如何同日本人作战的问题，毛泽东等人已经写得很多了：关于持久战的阶段问题；关于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的问题；关于消耗战和歼灭战的问题；关于游击战的作战原则问题，等等。在这个模式里，不同的军事组织，如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分别起不同的作用。然而不相同的地区条件会使问题复杂化，以致某一类军事组织可能要去执行不同的任务。让我们看一

看民兵的战斗和它的重点的转变：在边区中心，相当稳定的条件意味着民兵能够集中于“反奸”工作和从事训练，因为战斗行动是相当简单的；靠近日本控制区的民兵主要专心于武装斗争；而在敌占区，民兵斗争的重要作用是使“动摇分子”不敢公开地与敌勾结，使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人不得不更为当心^⑦。

再举一个能够说明地区的不同将导致极不相同的战斗方法的例子。1940—1942年，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中共被迫实施广泛的防御。然而，在粉碎日军的进攻之前就撤退的最初方针在冀南平原变成了更积极地进行抵抗以便展开游击战争的方针。根据中共和日本人的影响程度的不同，该地区被划分成了四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方针和任务。首先，在那些日本人长期占领并牢固统治的地区，基本的原则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重点是建立党的秘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合法斗争，或者说“革命的两面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活动来加强自己。其次，在日本人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非法斗争更重要。这种和合法斗争紧密配合的非法斗争必须隐蔽地进行。再其次，在日本人占了上风的游击地区，就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由于有“革命的两面政策”相配合，许多目标提出来了：摧毁伪政权，挫败日本人的“绥靖”政策，限制日本人并把他们拖垮等等。最后，在游击区，目标是发展武装力量来增强攻势以及改革政府机构^⑧。

不同的地区条件导致政策实施的不同，这在教育方面也表现了出来(见第六章第一节)。

第二章

战争、社会变革和阶级

在这一章里，我将要考察战争与经济、政治变化的一般关联和对于阶级结构的影响。

第一节 日军的暴行和人民的抵抗

查尔默斯·A·约翰逊已经证明，大体上能用以下观点来解释为什么战时中共势力能在中国急剧扩张，这就是：日本人大规模的恐怖动员了农民，使农民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共产党在这种宣传中掩饰了自己，暂缓了自己的阶级斗争政策而代之以更有利的“中间的”或者说是“温和的”政策，以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统一”。约翰逊说：“中国的大众把他们自己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服从民族主义的目的。”^①

日军在许多地方的暴行确实激起了人民的抵抗。毛泽东在1939年会见美国使馆武官伊文思·卡尔逊时说：“他们（日本人）最大的失策是对中国人民诉诸武力，他们的烧、奸、杀的政策已经激怒了老百姓并且加强了老百姓的抵抗决心”^②。许多年以后，即在1965年，毛以同样的措词对埃德加·斯诺说：

“日本人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确实占领过并且烧毁了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加快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可能发展自己的力量和扩大自己的地盘。”^③

战时中共的原始资料证实，日本人的恐怖在说服农民参加和支持抗战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许多地方，据说日本人的残暴对于补充游击队的兵员起了一定作用^④。在某些地方，由于与敌勾结的人所散布的谣言的影响，农民起初倾向于屈服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坚持残暴政策，使得老百姓改变了主意并转而进行武装斗争^⑤。在晋西，游击队组织发展得最快的地方是那些日本人破坏得最严重的地方^⑥。与日本人在冀东的一次可憎的大屠杀——惨杀了1035人、伤了84人——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参加了游击队”^⑦。据任弼时说，在山西，正在武装起来的人民很注意日军的大屠杀，感到有必要保卫他们自己，反对日本人^⑧。征兵的一个办法就是向农民宣传日军的残暴^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⑩。

战时在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山西某地的一个指挥员告诉J·伯特伦说：“在许多情况下，在日本人恐怖特别猛烈的地方，人民都自行成立了小的志愿组织”^⑪。为了给京汉铁路沿线被日本人杀害的90个村民报仇，人民支援自己的游击队。I·爱泼斯坦从部队提供的另一份原始资料中得知，“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与其在家等日本人来杀，倒不如出家去杀日本人”^⑫。H·汉森从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口中得知，日军在进攻冀西的10天时间内，就杀死了200人，并使2万人无家可归，结果有2000人主动参加了游击队^⑬。

在战后对豫北十里铺的调查中，克鲁克斯夫妇发现，由于日军杀死了10个村民，就“唤起许多人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以减轻下一次日军‘扫荡’的危险”^⑭。

然而，日本人的残暴并非全都鼓舞了抗战。例如，1940年冬，在太岳地区的一个县，日军残杀了5000人，占当地人口的十六分之一，毁坏了房屋3000—4000间，结果使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低落^⑮。在靠近保定地区的另一次事件中，有200人由于帮助八路军扒铁轨而遭到惨杀，在日军进一步实行恐怖之后，这个地区的人民明显地具有不想援助抗战的倾向^⑯。

所以，日军的残暴行为可能导致两种完全对立的作用：在一个地区激发自卫的意识，而在另一个地区造就失败主义的情绪。许多地方确实由于日军的屠杀、破坏而或多或少地发展了抗日运动，但这决不是持久的。抗战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是维护农民中最贫穷的部份的利益和广泛处理经济问题，重建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一位非共产党的中国作家李公朴，在晋察冀长期停留期间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首先注意到了靠近日本人的地区所遭受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如何唤起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如何“大大有利于抗日政权的建立”，接着他说：

“如果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仅仅只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而忽视了民主……那他就在犯错误，这个错误将阻碍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在所有工作中积极发展民主。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在靠近敌人的地区利用有利的条件，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利用这些条件来建立抗日政权。”^⑩

除非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对旧的乡村秩序进行剧烈的变动，否则农民将不会起来战斗，至少不会长期坚持战斗。我们的这个论点当然是正确的。日本人的残暴并不会造就包括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运动，而只能导致一些分散的和偶然的抗日活动。

不过，尽管如此，日军的残暴总的说来仍是激起抗战的一个因素。如果在战斗中打败了日本人，就能在适宜于游击战的地区提高人民的自信心。按聂荣臻的观点，这促进了晋察冀地区武装力量的快速发展^⑪。这也是1943年夏山东地区的征兵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⑫。山西的一个地方指挥员说：

“我们向人民显示了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人的，我们总是运用小部队来反对如此庞大的敌军。当他们亲眼看见这是真事的时候，许多村民就自愿地组成部队，开始独立的斗争。”^⑬

按彭德怀的话说：“只有连续地获得胜利，才能鼓舞人民，得到他们的热心支持和使得他们愿意参军。”^⑭

关于军事力量的显示如何有助于赢得人民大众的积极支持，还有许多的报道。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太弱以致不能

阻止日本人的报复的话，农民就可能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尽管他们热心于抗战^②。

第二节 农村的变革和群众的参战

农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

毛泽东在指出“战争不仅是军力和政治力的竞赛……它也是经济力的竞赛”^③时，差点没有夸大了经济的重要性。按照共产党的观点，这种经济力的竞赛主要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问题。当农民努力投身于抗战和生产斗争并成为“基本力量”时，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要不然他们就不可能继续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事业之中^④。中共领导人经常注意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联系。例如，彭真在着重提到农民的贫困和悲惨时说：“如果不改善他们的政治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他们对抗战就没有任何干劲和愿望”^⑤。刘少奇甚至更强调：

“如果（我们）仅仅动员人民群众抗战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生计，那是不行的。这样群众组织（自卫团和游击队）就会崩溃。所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是群众组织的责任。只有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才能动员起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这是一项坚定的原则。”^⑥

彭德怀和凯丰也持有同样的观点^⑦。

在战时初期的混乱的形势中，动员工作通常以直接改善人民生活 and 武装人民两种方式进行，这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克服了村民的失败主义的地方，许多游击队组织建立起来了。在1个月内，就有1万多人被组织和武装起来^⑧。鲁南人民之所以相信八路军第四旅是“人民的军队”，是因为它“不仅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⑨。日方情报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八路军的，‘改善人民生活 and 实行民主’的口号下，地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力量正在受到削弱，而农——工阶级的

反抗加剧了”^⑧。另一方面，在人民的生活条件被忽视的地方，动员群众的工作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⑨。

从多年的游击战中，中共领导人懂得了对农民来说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具体谋生的问题。任何动员农民的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彭德怀在战前就对斯诺指出：“因为人民群众只对他们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感兴趣，所以只有立即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才有可能发展游击战”^⑩。这是抗战动员必须首先处理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成败将最终决定人民群众对党的抗战号召的响应程度。

（1940年3月）晋东南的一篇报道指出：

“群众主要的要求常常与他们自己的利害相关，只有从他们的要求出发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真正地动员群众，逐步把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提高到民族的利益的高度，并为抗战胜利而斗争”^⑪。

一篇关于豫北粮食短缺的文章强调了解决农民的粮食问题是使农民参加抗战的“最有效和适当的方法”^⑫。通过减租减息政策，政府的管理都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增加抗日力量”的原则基础上^⑬。

战时中共的宣传和官方的陈述常常向人们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中国人民为防御外敌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地主乐意为抗战效力作出牺牲。“开明”地主被推举为大家模仿的对象，他们的爱国主义受到赞扬。比起对现实的准确描述来，这更能减轻地主对于农民革命的惧怕心理。

彭真指出了在减轻农民的物质困苦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

“地主阶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正是这个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因此，地主对于农民生活条件的任何改善都抱有敌意，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会更进一步的尖锐化”^⑭。

1942年1月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注意到了地主是如何压迫农民和阻碍农民的要求的^⑮。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地主拒绝为改善农民的条件作出“牺牲”的事情。而地主不作出一定的牺牲，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抗战就不可能发动起来^⑯。

农村改革的必要性

改善生活条件只有通过根本的农村改革才能达到。并且，反复强调这种改革也是使群众参与这场战争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的先决条件^②。1939年11月，党的一个指示也指出了“实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剧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③尽管在强调的重点上有些变化，并且在贯彻方面也具有不平衡性，但改革在使抗战取得群众支持方面产生的重要作用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在“卢沟桥事件”的三个月前，彭德怀告诉新闻记者尼·韦利斯：“税收的重担必须具体地减轻，使人民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否则人民将不热心支持抗日运动”^④。

在彻底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人民更加自愿地参加抗日组织和为建立根据地而工作，而在减租减息政策没有产生明显影响的地区，形势就非常困难，群众的积极性处于低水平——对于组建和巩固强大的根据地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⑤。在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北方局干部大会上，彭德怀的报告注意到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和群众参战之间的紧密联系：

“如果群众的要求不能满足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可能唤起他们高度的积极性。所以，除了政治上建立各阶级平等的民主政府以及在乡村摧毁地主的统治之外，（我们还必须）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⑥。

山东的例子是很能启发人的。在1940—1942年日伪军军事压力加剧以及国民党军队从背后发起进攻期间，中共山东根据地遭受的挫折比其它边区都更严重。实际上，这主要不是因为对手的军事力量强大，而是山东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重建乡村的工作很不充分和群众动员薄弱所带来的结果。各级党组织通过“严肃的自我批评”而作出的结论是：“要改变形势，群众工作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作为进行彻底工作的基础，必须解决群众的困难以便动员和组织他们。”并制定出了加深社会变化和改善农民命运的措施：开展减租减息和提高工资的运动，并为此而派遣

1000名干部去援助农民协会，建立新的民主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农民在经济上依赖地主、并遭受地主剥削的状况的结束。和其它地区一样，农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使得更多的农民参加了抗日运动^④。

在山西对激进的再分配计划的普遍响应，表明经济改革是大大地刺激了抗日运动。由八路军、山西牺盟会召集的一次为期两天的、共有100个村庄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废除所有的税款和增收额，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救济帮助难民和穷人”；“减租、中止偿还债务及利息”；“打倒汉奸！没收他们的财产作为抗日经费”。人民群众马上响应，并要求干部带头工作，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动员，游击队也变得“更强大”^⑤。

在十里铺村，正是这种反对繁重税务的运动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大大地促进了县政府的建立^⑥。在其它地方，情况也相类似。人民群众只有在切实贯彻了减税政策以后，才会逐渐向政府靠近。他们在开始时是持怀疑态度的。^⑦

新秩序的利害关系

农村的改革创造了一种和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及客观利益相一致的秩序。

除了宣传之外，中共对于农民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自发地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的程度并不抱幻想。尽管农民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去竭力阻止日本人自东而西的推进。有篇文章把农民“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极端淡薄的观念”，归因于过去历届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没有减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沉重的负担^⑧。农民对于抵抗日本人的不自觉性，表明了他们对原地方统治人物及其行政机构，以及对于国民党政府是何等的疏远。

基本的问题并不是战争的准备令人遗憾地做得不充分。在1937年夏，山西的农民就表现出对战斗不感兴趣，老军阀阎锡

山不得不承认：“人民并不关心他们的政府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政府从不关心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④另外，重庆军队的粗野和专横的表现及其灾难性的敲诈使农民对于参加抗战感到失望。这在十里铺得到了证明。这是中共组织农民进行抗战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日本人并不使农民的困境再恶化多少，他们“甚至可能(对农民)更好些”^⑤。

农民对于整个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强烈不满及不愿为此而战斗的情绪，在鲁南地区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年的目击者、历史学家王玉川评论道，较穷的农民对于旧政府随着日本人的推进而倒台的最初反应，是感到了“一种解脱”，因为在韩复榘政权的统治下，“饥饿、失败、鞭打、敲诈和监禁是他们一天的议事日程”^⑥。虽然人民也惧怕日军的残暴——

“但是，鲁南人民为他们肩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卸掉了而感到特别宽慰，他们认识到韩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不再要交土地税和其他税收以及不会再强迫更多的劳役。”^⑦

王认为，造成以上情况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直接和快速的入侵对地主的安全造成了威胁，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还有其它一些影响农民的因素，排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农民是相当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由于农民几乎没有土地，除了被杀害以外，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变得再坏了。王坚决认为，这种状况会引起这样一种情绪：“无论谁来，我们都交同样的税”^⑧。

日本人的残暴和破坏使农民深切地感到了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的必要性^⑨，但这同我们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农民并不是为旧的压迫者进行战斗，而是把抗战作为实质上改变自己的状况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战争的破坏和遭受的苦难也使抗战的情绪低落。约翰·谢伟思在1942年底报告：由于“到处迁移和遭受的苦难，河南农民已经对战争没有兴趣了”^⑩。

我们将在后面再谈农民群众在战争开始时缺乏抵抗决心的情况(见第三章第二节)。

农村生活的根本变革具有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否则，农民就不会对日本人进行英勇的抵抗。在保卫农民的居住地区时必须向他们指明利害关系。正如吕正操对H·汉森所说的：

“我们新的任务……将是给村民们某些能为之战斗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有痛恨日本人的个人原因：房屋被烧了，妇女被强奸了，老人被杀了，猪牛被牵走了。他们并不缺乏恶感。但是憎恨并不是好的战斗口号，农民们总是激烈反对本国政府，但是很少起义。要使农民奋起抗日，我们必须给他们某些他们珍视的东西，让他们去保卫它。”^⑧

这暗示着要建立民主的乡村政府和实行改革，如减租减息，税收再分配，帮助那些没有挽畜和马匹可用于耕种的农民。吕宣称：“通过推行这样的政策，我们要使每个农民都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并不是我们的：他们只有支持保卫他们村子的游击队，才能保持他们这种特殊的权利”^⑨。

有力的群众抗战不能仅建立在痛恨日本人的残杀的基础上，这一点，任弼时也指出来了。尽管他起初宣称“日本人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对我们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是最好的题材”，但他还是列出了一些主要的经济因素，作为唤起和组织农民群众的“最重要的方法”：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减轻税收和租金、尽可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对军属给予优待^⑩。部队的征兵必须紧密地和农民的实际生活条件联系起来。男子参军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是解决士兵家庭在粮食、土地和劳动等方面的困难被认为是扩大武装力量的最好措施^⑪。

被紧紧逼迫的共产党只有通过创建与农民群众的利益交融在一起、并使他们准备为之而战斗的社会经济秩序，才能发展成为一支主要的力量。约翰·谢伟思领悟到了华北敌后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并且看到了中国的将来：

“普通人第一次被给予为之而战斗的东西。和日本人战斗不仅仅因为他们 是外族侵略者，而且因为他们阻碍了这场革命。人民将继续和任何限制或者剥夺他们新近得到的东西的政府战斗。正如日军不能征服这些现在富于战斗精神的人民一样，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是失败。共产党有了这样广泛的基础，所以谁也难以对它进行限制。……在相对短的几年时间内，共产党在中国将成为一支突出的力量。”^⑧

为战争创造物质基础

革命性的社会变化必然要有对巩固的物质基础的建设相伴随。例如，没有充分的食物供应，军队就不能扩大，人民对于抗战的积极支持就可能严重地动摇。对于实行抗战来说，适当的经济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教训，中共老早就吸取了。30年代初，在江西苏维埃时期，为对付国民党的围剿，毛泽东就极力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离开经济建设就不可能保卫革命战争的物质前提，人民将在长期战争的过程中变得精疲力竭。……如果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满意……这对我们红军的扩大以及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难道就没有影响。所以，认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必从事经济建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扩大经济战线的工作，建立红色根据地的经济，我们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⑨

建设物质基础主要是进行生产运动。战争，特别是日本人的不加区别的毁灭已经破坏了生产力。党断言：“只有通过认真发展生产事业，解决人民的经济困难，我们才能提高人民的信心，最大限度地支持我们的各种类型的战斗。”^⑩特别是在游击区，生产运动对于战斗力有重要的影响，因为战争在那里是猛烈的，那里的人民面临着最大的经济困难。一篇《解放日报》社论强调了生产运动在这些地区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群众的这个基本的和迫切的要求（就生产运动而言），那就不能团结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和敌人战斗，武装斗争就会变成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而这将难以进行持久战。”^⑪

民主和积极性

除非用中共称之为民主的体制来代替以地主为统治者的政治体制，农民是不会参加抗战的。尽管这个概念从未被赋予准确的定义，但它暗示着——实际上是意味着——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实权，建立一种保证贫农和中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政治秩序，所以，民主和抗战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正如1937年毛泽东对斯诺表示的：

“这个(民主)运动所面临的障碍是陈旧的政治体制，而问题是如何改变这种政治体制(使其不危及抗战)。因为，除非改变了这种体制，除非实行民主，否则就不可能有胜利抗战和民主是一把剑的两个锋面”^④。

1937年6月，朱德以相同的口吻对I·A·比斯恩说：

“只有民众抗战才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反对现代化的日军)，这就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必要的原因，也是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最主要原因”^⑤。

在此前两个月，彭德怀在接受尼·韦利斯的访问时强调说：

“为了取得完全的胜利，民主是唯一的保证，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就不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⑥。

实行民主化的前提就是群众积极地参与乡村的事务。如果没有合理的彻底的民主化，乡村就会是非常软弱的，它将不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执行为正规军、游击队、侦察队补充兵员和供应食物、收集情报等项任务。因为这需要有效地动员群众。

举个例子，晋察冀边区1939年1月的一个指示曾抱怨：在战斗过程中，“乡政府太软弱”。它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乡长有沉重的工作负担；另一个是没有充分实现“民权”——这是最基本的原因。后果当然很清楚：

“群众对政府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必须使他们有意识地并且积极地参预政治、支持政府，……抗战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增强群众的信心，振奋群众抗战的决心，充分运用群众的力量。”^⑦

李公朴注意到：“坚持敌后抗战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不可分割的”^⑧。他还评论道：晋察冀反奸工作的经验表明，除非民主得到有力的发展，让有组织的和有政治觉悟的民众管理他们自己的组织，否则将一事无成^⑨。

第三节 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生活水平

我们已经注意到党的经济政策直接给贫农带来了实际的物质利益。对农民群众大幅度地降低租税，发动生产运动，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并让农民自己来管理和控制，以便发展农业和大大改变剥削和封建的习俗，这些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杰克·贝尔登 1947 年一回到幅员辽阔的华北大地，就评论说：

“被共产党管理只有两年的地方的条件与管理了五六年的地方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给我极其深刻印象的是，相对贫穷的山区的许多小村庄的条件比相对富裕的平原的大村庄的条件要好得多。前一类村庄，共产党已经管理了七年，而后一类村庄，只是从日本人投降后才开始管理的。”^⑩

战时要使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改善，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贝尔登甚至否认有任何全面的改善，尽管他并不总是坚持这一点^⑪。虽然结论性的证据尚缺乏，但是也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那些共产党控制时间最长、并且受战争的直接影响最少的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确实得到了重要的改善^⑫。人们可能会怀疑所给的百分比数字的准确性，但是薄一波对晋冀鲁豫边区在八年抗战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总结，看起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尽管抗战时期到处都很困难，但是 80 % 的人民的水平并没有降低，这是由于财富的再分配和集中精力进行了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最后两年的时间里。”^⑬

各阶级的动态

各阶级动态的总格局是：较富裕的人生活下降了，最贫穷的人以及最接近这个阶层的人生活上上升了。中国的阶级结构有所变化，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中农化”的过程。减租减息对导致这一结果产生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党的经济政策实施得最成功的地方，其变化如下：地主的成分显著地下降；富农的成分稍微下降；大多数中农保持着他们的地位，有些上升到富农的地位；贫农和那些低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准实质性地上升了。在不同的地区，这种变化相当不同，但是在边区的中心地带，实质性的结构变化看来都呈现出以上那样一幅图景。

抗战结束时来自太行地区的一份调查阐述了这种趋势。这份调查涉及了5个县的7个村庄，它表明了下列上升趋势：35%的雇农和手艺人上升为贫农和中农，47%的贫农上升为中农，14%的中农变成富农^④。在对十里铺的调查中，克里克斯夫妇也注意到了重要的中农化过程：在农村，许多从较贫困的阶层上来的农民被认为是“新中农”，在十里铺，这些农民包括：

“劳动英雄王成池：一口炮牙的雇农出身的常赤成，他已经赎回父亲押出的土地；坦率的第一任农民协会主席王克贫；墓地耕种者王少文……那些敢于按新的交换率偿还旧债的人；那些已经参加互助组的人和有能力参加商业运输冒险的人；那些竭力开垦荒地的人；还有那些生产率达到县里最高纪录的纺织妇女。”^⑤

到了1941、1942年以后，经济政策的综合影响仍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尽管如此，早期的重新分配的措施确实导致了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晋察冀边区的两次以1941年为截止期的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根据其中的一份调查，农村的上层阶级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地主有11.02%下降为富农，有4.72%下降为中农，有6.88%下降为贫农及其他。富农有15.15%下降为中农，

1.29 %下降为贫农。中农有 83.37 %维持原状或者变成了“富裕中农”。剩下的占总数 78 %的贫农，由于税收减轻和利息率的降低以及较易得到土地，其中许多人已达到中农的水平。雇农和工人的经济水准也有重大的提高，其中有 44.04 %的人上升为贫农，不少于 16.25 %的人达到了中农的水平，还有 1.02 %的人甚至上升到了富农的地位（还有 0.24 %的老贫农上升为富农）^⑥。

1939—1941年，在中共的北岳地区，阶级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份包括了 12 个村子的情况的调查表明，有 30 %的雇农已经上升到贫农的水平，2.71 %的雇农上升到了中农的程度。中农队伍，既有增长的一面——有 10 %的贫农增加进来，也有轻微减少的一面——有 5.41 %的中农下降为贫农和雇农。在地主和富农中，有 12.44 %的人下降为中农，8.33 %的人下降为贫农^⑦。在这个地区，中农化的过程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党的力量相对薄弱。

在那些 1941 年以前曾由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有关的数字也反映出同样的现象：雇农几乎没有上升为贫农的，倒有 7 %的中农下降为贫农，不过富农却有重要的下降，有 22.73 %的富农下降为中农，还有 9.9 %的富农下降为贫农。至于地主，有 4 %下降为富农，12 %下降为中农，12 %下降为贫农^⑧。

经历了上述地位变化的地主，并非全都继续从事农业经营，他们当中有些人转向了税收较轻的商业和工业^⑨。

地主减少了，但他们作为阶级并没有被消灭，从这种意义上说，党仍然没有超越自己经常申明的界限，即：设法削弱或者减少地主的（或封建的）剥削而不是完全消灭这个阶级。消灭的政策仅仅适用于最“凶恶的”和“顽固不化的汉奸”。任弼时在同新闻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党的税收及减租减息政策时说：“我们尽量不使这方面的要求高到让富人破产的程度。”^⑩地主阶级并不是致命的威胁，截止战争结束，对地主阶级的地产虽然进行了再

分配，但其大多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中。

尽管如此，施加给地主的税收、强迫捐款等经济负担，以及对地主征税的严格限制，特别是对地租和利息的最大限度的调整，终归还是导致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从量到质的改变。

第三章

1937—1940年：溃退、阶级斗争与扩张

在日军迅速占领重要地区、初期抗战的主要力量即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溃败以及大部分旧政府开始崩溃的时候，共产党影响的地区出现了两种趋势。

其一，在执行税收政策与建立新的乡村政府的过程中，爆发了自发的，有时近乎于公开的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主要政策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旧的政权组织已经开始被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取代的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富人身上，还废除了敲诈农民的巨额税款。农村上层阶级意识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趋势，极力反对任何变革。党对它们施加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影响，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逃到了国统区和敌占区。

其二，党和军队的力量迅速增长，并且很快给党和军队的建设带来了大量严重的问题，以致后来需要进行整风运动和对军队的全面整顿。简言之，在党和军队的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巩固、完善的工作和成员的质量。

第一节 初期的占领

1931 — 1937年的侵犯

一些历史学家把日本人侵犯中国的年代定为 1931 年而不是

1937年^①。事实上，1931—1937年是日本人连续不断地侵犯中国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被占领，国民党南京政府也一而再地在群众反对他们对日妥协的骚乱中出丑。1931年下半年日本人进攻了满洲里，1932年建立了满洲傀儡政权。1932年1月中国军队在上海进行了武装抵抗，随后，日军在上海登陆，并对上海进行轰炸。在一个多月的激战中，19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反南京政府之道而行之，进行了顽强抵抗。此后签订的“和平条约”规定：上海周围25公里的地区为非军事区。次年，日本占领了战略要地上海港和热河，因此也控制了通往华北平原的两条陆路。《塘沽停战协定》划定了另一个从长城到北京至天津的非军事地带。在1935年签署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又获得了河北、察哈尔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所有权。同一年日本人在这些省份建立了两个傀儡政权：以殷汝耕将军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前者的建立是中国政府屈服于压力的结果，“（南京政府）接受后者则是一种防止日本人完全控制华北的权宜之计……”^②，宋的军队没有被日本人严密控制，它也是第一支起来反对日军对华北的侵略的军队^③。一位史学家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评论：

“1937年标志着早已进行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31年以来发生的事件（是）……单个的冲突。”^④

侵略的路线

人们通常认为，日军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始于“卢沟桥事件”，即宋哲元的部队与一伙日本驻军的一次小冲突。部分日军自北京沿两大铁路线推进，沿平绥线向西和沿京汉线向西南推进。另一部分日军沿通往南京的津浦线向东南推进。埃德加·斯诺曾目睹：

“日军怎样马不停蹄地沿线而下，进入河北和山西（头5个月以平均每天12公里的速度推进，其中有许多天的平均行程达30公里）……日本人几乎完全是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发动攻势，由摩托化、

机械化部队打头阵”^⑤。

到1937年12月，华北的所有主要城市，包括省会，都落入日本人之手。

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也是从上海发端的。日本人的直接借口是1937年8月9日的“虹桥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两名日本士兵被杀。继国民党1937年11月在上海的顽强抵抗失败后，日本人又粉碎了国民党在华中的抵抗。随后迅速推进，并且伤亡较之上海激战要少。12月，南京陷落。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迁都重庆。重庆地处遥远偏僻之乡，在此可以免遭日军的穷追猛打，但却不能幸免于轰炸造成的重创。

1938年10月，日军还占领了广州和海南岛，其主要目的是切断当时国民党唯一的国际交通线。

中国的辽阔

日军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越是胜利就越是陷入败仗的泥潭。共产党人无可辩驳地描述了占领军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敌人越是向前推进，它的后方越是变得辽阔，战斗力就越弱……对于我们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与发展 and 正规军的战斗有同等战略地位的大规模游击战就越加有利。”^⑥

日军兵力如此分散，以致“当他们在一个地区享有军事优势时，在其它地方就将处于劣势”^⑦。中共经常指出，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它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重要交通线和一些平原^⑧。毛泽东在1936年的讲话，对于日本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一事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恐：

“中国是一个大国，直到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处在侵略者的屠刀下才能说她被征服了。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获得了拥有一亿或二亿人口的地区，我们还远没有失败。我们仍然有强大的力量与日本军阀战斗，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人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⑨。

日军的弱点在战争开始时就暴露得十分明显。它对中国许多地方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占领多，实际上的占领少。王玉川说，1938年秋，国民党的一个有1000人，几百匹马的团，“带了大量弹药和从洛阳兑出的200万元现钞，经过鲁南到鲁北，行军1000多里，没有遇到一个日本士兵”^⑩。当时，班滋夫妇从北京去延安，来到靠近北京的一个地方与党的干部联系。据说这个地方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县长和经选举产生的县政府。在他们到达该地区的两天前，一个大部队曾在这儿驻扎^⑪。日本人建立了点和线来进行控制，他们企图把这些点和线扩展为面，以便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⑫。

从“卢沟桥事件”到百团大战

至于战争头3年日本在华北农村的占领政策，可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适当的分界线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日本人的主要目标是摧毁国民党或军阀的军队，保护铁路干线。为此目的而发动的进攻实质上是防御性的，并不是总体计划的组成部分，通常是以三四千人的部队进行历时四五天的战斗^⑬。依乔治·泰勒的观点，从1938年春天起，保持铁路安全已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从那时起：

“华北某些路段的铁路系统几乎没有一天不遭到游击队的破坏；他们拆除电话线，炸毁桥梁，袭击驻地，破坏铁路。修复工作耗资巨大，更不消说要耽误大量的时间和要有极大的耐心了”^⑭。

“爱护”村大约始于这时。沿铁路线的村民们被组织起来保护铁路，自卫队担负主要责任。一般每个村子有3到5人是自卫队员，分白、晚班警卫。17—35岁和36—45岁的村民则被划分为两个组，从事其它有关的治安工作。前者是骨干防卫力量接受军事训练。不论怎样，责任最终落在了每个村民头上，某一段铁路遭到破坏，全村都得遭殃，最坏的结果是村子被烧毁。

日军企图借助对集体性报复的恐惧感来获得与中国人的合

作。不过它也企图以农业技术援助、医疗服务，教育和重新建设作为诱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日军修筑碉堡、开凿深沟，禁止在铁路沿线 500 米以内种高于 1.2 米的农作物^⑮。

在驱逐了华中的国民党、占领了武汉后，日军可以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平定”华北农村——在那里，共产党组织的抗日运动正迅速发展。日军于 1938 年底采取了军事行动。一方面，发动了兵力达 3 万的扫荡与合围^⑯。正如聂荣臻所解释的那样，日军突击部队的战略是：“不打算得到阵地而是进行迅速而纵深的进攻，以消灭我们的指挥中心，隔离我们的部队”^⑰。从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这段时间内，日军在晋冀鲁豫进行了 10 次扫荡，将太行和太原地区分离成了两个部分^⑱。

另一方面，日军实行了“囚笼”政策，旨在以众多的公路、碉堡、壕沟将一个地区分隔成数块，限制抗日力量的灵活行动。泰勒说：“甚至到 1940 年，铁路正常交通还没有恢复到一半，人力物力的损失仍然巨大”^⑲。战后党的一份原始材料声称：那一年，60% 的进攻是破坏日本人的交通，129 师是唯一因破坏了 1.2 万里铁路和公路而受到赞誉的师^⑳。

日军的兵力

日军投放在华北的兵力，1937 年 7 月是 1 万，1939 年夏季增加到 20 万^㉑。到 1941 年，日军在中国的兵力分布情况是：华北 25 万，华中 29.6 万，华南 16.6 万。加之后来又增兵 1.6 万，日军在华兵力达到了 72.8 万人^㉒。自此以后，日本投入华北的兵力没有明显变化。当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已陷入了持久战时，1940 年制定的削减兵力的三年计划就没有执行^㉓。1944 年，中共对于华北的日军已逐渐减少的说法的否认是正确的。日本虽有撤军行动，但又补充了兵源^㉔，不过补充来的士兵在素质上不如原先的士兵。换防也弱化了日军的影响，减轻了对根据地的压力^㉕。

华北的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的原因，日本人把华北的战略重要性置于华南与华中之上。日本人抓住华北不放，并尽力使之与满洲、日本融为一体。博伊尔说：“部分皇军对自治（华北国）踌躇满志，而对于华中与华南则没有这种奢望；在卢沟桥事变后也没有想到还要再以华中或华南去激起日军作战的热情。”^②

伪政权之间的区别，尤其是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差别导致了黄河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差别。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政策亦不相同。日本在华北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发自然资源，如铁矿、煤田；而华中的自然资源较少，重点是复兴建设。华北开发公司的投资是华中开发公司投资的三倍多。华北开发公司还下属许多国家保险公司，掌管着诸如交通，电气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然而，博伊尔认为：“在日本资金奇缺的时刻，军队很少鼓励投资。对于一分利润就有一份危险的投资，它明显不感兴趣，认为这如同耗尽产品和利润来为实现其规划筹集资金。”^③他们掠夺自然资源甚于为平衡、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④。

第二节 溃散与混乱

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日军穿过华东诸省，长驱直入，其各路进展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在大部分地区，它很少或完全没有遭到抵抗，而在某些地区却遭到了痛击。1938年1月，叶剑英特别提到，当时山西、冀西和冀南的抵抗运动方兴未艾，而山东、河南的群众却“还没有组织起来”，“游击战还处在初级阶段”^①。总之，在开始的交战中，由于中国非共产党的军队迅速南撤或完全战败，日本的兵力

损失不大。在“卢沟桥事件”前两周，朱德精确地估价了华北友军的情况：

“华北的军队及其指挥员很差劲，北方的指挥员与南京的联合行动计划很难实行。北方的军队是由象宋（哲元）将军这类既受制于日军的压力，又受我们抗日运动影响的人领导，下级军官很抗日，而高级将领们对于要做什么则毫无打算。一旦打起仗来，这些军队将挨个被消灭。”^②

西方随军记者描绘了战争初期中国人——主要是军阀部队努力阻击日军时的战斗惨状：

“经过日军一天的毁灭性轰炸，在没有得到指挥所的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中国人终于放弃了南苑。当载着部队的汽车和军团卡车仓皇地从停尸房后面撤退时，它们的去路已被公路两边的机枪火力网所封锁。在一个战场上，躺着 800 具中国人的尸体。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任何老兵都没有遇到过这种屠杀场面。甚至战时双方的指挥员中最低劣的军事战术也难以同（宋）向他的部队布置的战术相比”^③。

国民党在华北没有站住脚，它驻守在那儿的军队也是望风而逃。贝尔登写道：

“在一次可怕的（经过山西的）撤退中，我看到（蒋的）部队几乎溃不成军。士兵们扔掉武器，当官的占了所有的运载工具，扔下部队从该地区仓皇逃窜”^④。

日军入侵后，朱德在对中国记者的简短谈话中，并不打算掩盖惨重的失败：

“（在晋绥）没有任何抵抗运动。那些没有逃走的区长、保甲长们实际上在为敌人卖力。我们知道，在和平时期，绅士们总是掌管着民事大权为己谋利，然而我们没有料到他们同样愿为敌人效劳。在繁峙县陷落后，该县保安署署长当了县长。许多人请求饶命，并出三千大洋作保，连日本人都说这是毫无羞耻”^⑤。

大量的中国方面的史料证实，朱德所描述的情况并不少见。消极抵抗，积极通敌的现象是普遍的^⑥，仅举几例就足以说明。1939年5月，邓小平在冀南报告说：“投降运动尤其猖獗，（伪政权）和平维持会比比皆是”^⑦。刘伯承也承认，在该地区，汉奸“非常活

跃”^⑧。彭德怀说，在豫南有一万多个汉奸组织^⑨。一位中国作家描述了“汉奸组织起初是怎样随着国军的撤退而迅速建立”^⑩及和平维持会在敌占区是怎样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的情况。贝尔登评述过战争初期“城镇中叛徒与汉奸迅速增长”的情况^⑪。据说汉奸的要求“很实在”，他们声称：“在日军到来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象往常那样收获和交税，就可以作为普通人安静地生活。”两支游击队瓦解了^⑫。汉奸反抗日的恐吓还使发动工作“非常”困难^⑬。中共的资料也屡屡提到：“人民还不很懂得什么是战争”——甚至“许多人认为无论谁来我们都得纳税”^⑭，人民还缺乏忧国心，自尊心和自信心^⑮。

中共意识到，要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不能只靠宣传，与农民利害攸关的是必须在农村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一些旅华的外国人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点：

“华北的国民党政府很少或几乎没有表示过支持农民的热情。事实上，日本人和西方观察家一致认为华北的穷困潦倒的农民是不会大规模地反对日伪政权的。”^⑯

有许多组织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些组织不属于任何党派。如要给日本人以更大的打击，它们的行动需要与中共及其改造社会的纲领联系起来。

政府的垮台

在许多地区，当地政府由于其工作人员的逃奔而倒台。战前国民党并没有宣布它要对被地方军阀控制^⑰的辽阔的华北实行统辖，随着日军的进攻，除晋察冀的两个县外，所有其它各县的国民党县长和政府官员纷纷逃离，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更弱小了。由于战败，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惊慌失措地向南逃窜，“在一些地区抓不到一个原政府官员，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⑱。

走遍晋西北，聂荣臻看到，孤寂的城镇、地区中只剩下了老人，残留的部队和土匪在劫掠人民，整个地区既混乱又荒凉，汉

奸们造谣惑众，人们悲观、失望，失败主义盛行^①。

在山东，县长们和其他地方官员的溃逃不亚于韩复榘将军的臭名昭著的撤退。“凡是由日军占领了的地区，军队和政治机构被彻底破坏，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不堪”^②。在冀中，地方政府已不复存在，完全是杂乱无章。由于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有钱人纷纷逃离，失败主义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地区^③。此外还有大量的政府倒台和地方官员逃亡的例子^④。

因此，战前的地方政府的大批倒台是由于日军的大举进攻，而不是由于民众的暴动。哈道·汉森曾经问毛，“在五台山实行的民主试验是不是民主革命的榜样”，毛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道：

“但是，那些人民是从日本人而不是从中国政府那里赢得的自由。日军赶走了所有的前中国官员，随后，游击队夺回了土地并在这些地区开始了政治改革。在大多数的敌后根据地，农民都以这种方法获得自由并取得政治改革的胜利。”^⑤

毛的说法并不怎么准确。首先，在很多地方，前政府还是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了^⑥；其次，在前政府已垮的地区，无论新的抗日政府是否已经建立或者改革取得了什么成效，旧统治者都企图不失时机地东山再起。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问题。在广大地区建立新的政府机构，还要克服由经济崩溃、战斗频繁、党的资金匮乏和受过训练的干部不足等因素造成的障碍。

第三节 新政府和群众政治的开始

过渡性组织

在旧政府崩溃和边区机构有秩序地建立之际，涌现出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非官方的，拥有某些政府职能的组织，

承担着战时动员和维持秩序的任务。有些组织是中共建立的，有些是地方团体组建的，还有一些则是两者联合建立的。这些组织是临时性的，有各种不同经历的人加入其中，最高一级的组织只到县一级。其名称各地不同。冀东称为“自卫队”，冀中称为“救国会”，冀南则叫作“群众团体”。在山西、山东、河北，最著名的组织可能是“动员委员会”^①。

有位日本记者说，动员委员会是“由无政府时期向政府机构建立过渡的桥梁”^②。然而，在村、区、县一级中建立的大量团体，是在动员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组织是被称做“自卫队”的民兵组织^③。

其它的动员委员会是由国民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组建的^④。前者在华北作用不大，而后者则越来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朱德在回答一名中国记者关于晋北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游击队是否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行动的提问时，提出了这些组织激进程度：“太原失陷后，阎司令命令组织普遍性的动员委员会。八路军派了许多干部帮助组织，领导它们战斗。”^⑤

动员委员会有其令山西省当局害怕的动力。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为什么当权者们要尽力限制人民动员委员会在太原的活动：

“太原委员会的努力受到了那些认为战争只是军队之间的冲突的官员们的阻挠。官员们认为，如果训练和武装起普通人民，他们确实能够与日本人作战。但是战争结束时他们可能拒绝放下武器，回复到战前的状况。

“因此，太原人民动员委员会不得不谨慎从事，尽量使当权者们确信动员委员会会使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并会巩固他们的权力。当权者们勉强而小心翼翼地同意了委员会可以举行会议、解释战争的目的，但这类活动只能在居住在战区边沿地带的人民中进行。这些地区甚至还不包括太原，因为他们不相信太原会沦陷。”^⑥

史沫特莱的评述生动地说明了统治机关对群众活动和社会变

化的理解。但只有中共愿意并且能够深入到达区的群众中去。史沫特莱指出了八路军地区的截然不同的情况：

“在只有八路军敢于深入的地区，到处都有群众组织，他们组织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团体，而且正在引导年轻人参加游击队，年纪较大的人加入自卫队。”^⑦

动员委员会的激进倾向也影响到了鲁南：

鲁南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地位。过去，没有人敢迈入靠近家门的(县)政府的大门，但如今不仅跨进了(县)政府大楼，而且要求(县)政府镇压反动势力。”^⑧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八路军控制的冀南地区，所有的阶级都联合起来，组织了动员委员会^⑨。当然，这未必是一种普遍现象。史沫特莱的上述评论没有列举地主和富农参加动员委员会的情况，日本的战时资料也没有提到，只是说委员会是由工人、农民、学生、青年以及军队、政府、党的干部组成的^⑩。实际上，由于恐惧共产分子，许多有钱的人却从广大的中共控制地区逃到了敌占区^⑪。

政治改革和阶级斗争

然而，大量的富人仍留在中共控制的地区。但由于察觉到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威胁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富人们又竭尽全力地阻挠改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地主常常采用的一种手段是在本地的政府干部中寻找代理人^⑫。

历史学家王玉川在随同一个游击队在鲁南工作时评论道，“新政治组织”的组织工作“交给了抗日青年”，这个组织能使人民参与政府事务，它将：

“最终根除绅士掌管(县级)事务时的颓废政治。绅士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尽力破坏改革。起初，他们不敢公开行动，而且企图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在各种委员会中站住脚。只要能控制本地政府，他们并不在乎谁当县长。为达此目的，他们伪装出由衷地欢迎改革的姿态。但一当他们发觉新政府的政策是违背他们利益

的时候，他们就企图进行破坏。当他们不能进入新政府时，就采取最后手段——反对新政府。纵然在那时，他们也尽可能地在暗中活动。”^⑬

绅士们维护现状的程度取决于“最近觉悟了的群众的警惕性”，王补充道^⑭。

在战争头几年的混乱中，农民很少得到动员和组织。农村中的统治者企图以更无耻、更直接的方法来获取乡政府的大权，这些现象发生在旧政府已经垮台而新政府还在建立的地方。富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还有土匪、歹徒，常常当上了村长或副村长，乡政府和区政府被一小撮人把持着^⑮。十里铺的地主和富农“牢牢地控制了新的乡政府”^⑯。这些政权——无论是战前残留下来的还是战时受到绅士渗透的——的弱点，在1938年日本人对晋察冀的进攻中暴露了出来，那里的许多政权因此而被瓦解^⑰。这种地方势力极力破坏作为群众抗日的先决条件的农村改革。

对地方政府机构进行清洗是势所必然的。刘少奇在1938年3月说，在县长没有逃跑的所有地方，“将对他们进行考察，（以确定）他们是抗日的还是汉奸，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处理”^⑱。事实上，是“抗日的”还是“汉奸”，取决于他们对农村改革的态度。对坚持反对党的政策的乡政府机构实行了大清洗。在晋中，八路军和它的同盟者牺盟会召开了一个村干部会议，决定“实行民主政治，清除坏的官僚分子、劣绅和坏人”^⑲。“坏人”，是指那些站在阻碍民主一方的人。中共的史料披露，晋西许多地方清洗了不少“坏干部”^⑳。晋东河顺县的一份党的文件，强调了清除所有欺骗与剥削农民的坏干部、劣绅和流氓的必要性，指责他们给农村带来了“不幸”和“残酷的灾难”^㉑。另一份山西的材料进一步证实了上层阶级不愿遵守民主制度的情况。据说，在劣绅、地主和资本家当中，许多人“反对所有进步的和新的事物，阻挠开明政治的实行和军事改革”^㉒。

在许多地区，从旧势力手中夺取政治决策权的阶级斗争已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印证了抗战初期日本人关于“一场民主革命”、“彻底的民主政治”的提法^②。剧烈而多变的斗争起因于阶级矛盾的尖锐。中国的一位官方史学家指出，在战争期间的农村政治改革中，地主中的“死敌分子”反对彻底的改革，地主和富农利用民主运动和政府的法律来“反击基本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③，总之，在改革的酝酿时期，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上层阶级的统治只是在1942年以后才崩溃。这个史学家承认，在此之前，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④。

1942年2月，一份来自晋西北的报告提到了旧势力阻碍法令贯彻的情况，坚持了要在下级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的主张^⑤，原因是群众的发动“不充分”和群众在新政体中的作用相对不足^⑥。党的资料多次提出，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应归因于群众对减租减息运动认识缓慢。从1942年起，民主运动恢复了元气，并加快了步伐^⑦。然而，把民主运动作为深刻的政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正确的，其它的因素比如经济政策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辩证的。

选 举

虽然建立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的工作直到1942年和1943年才完成，但从战争的头几年起，大量的准备工作已通过选举和组织临时机构而做好了。贯穿整个战争时期的选举，其动员作用和对阶级关系的革命影响是值得仔细考虑的。简略地说，选举是从1938年开始的，两年以后才开始普选。除开罪犯，精神病人和汉奸，凡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参加^⑧。

正如彭德怀所说，选举是由一场运动为先导的。受过专门训练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向人民解释选举的意义与方法。他们进行了各种宣传活动：组织讨论会，组织剧团到村里巡回演出等。报纸和宣传栏公布选举情况，以引起人们的兴趣^⑨。具有选举资格的人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没有这种权利的人被登记造册。村

民们对选举情况进行审查，并公布结果。合格的人选名单用红榜公布，不合格者的名单则用黑榜示出。登记注册的群众活动有效地抑制了汉奸，并迫使地主服从新制度^②。

选举方法有多种。一种普遍的方法是投豆选举，即把豆子投在位于每个候选人身后的篮子(或碗)里^③。目不识丁的人要进行高效率和新颖的选举，需要有易行的方法^④。但方法虽然简便，却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十里铺的选民必须用发给他们每人的七颗豆子选出七位候选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后来有位农民回忆了新政府产生的情况：

“因为是投豆选举，一些没有特别倾向的人就只是依次投放他们的七颗豆子。因此，在一排候选人中，前面七位总是比其余的候选人占优势。另一方面，一些倾向性很强的人则偷偷地朝他们所偏向的候选人的碗里投几颗豆子。”^⑤

这种选举当然不是保密的无记名投票。但是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保证多元化的政治竞争^⑥。选举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和强迫投票的现象^⑦。

选举形成了一个群众运动。大部分普选统计材料都提到了晋察冀，正是在这里，选举工作取得了最大的进展^⑧。到1939年春天，在晋冀鲁豫的冀南地区，选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⑨。1938年，晋察冀的选举起步相当缓慢，参加选举的人数不超过合格选民的40—50%。两年以后，参加选举的人数上升到占合格选民的70%^⑩，个别地区甚至达到90—99%的创记录数字。随后，这个数字又持续上升。1941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选举是在绝大多数的村民中进行的，大约有75—9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⑪。以下是1940年以后报道的晋察冀各地的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数字：冀中，80%^⑫；山西五台地区，60—92%^⑬；北岳，80%^⑭。能时尔获得的地区和县级选举的精确数字与此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1941年7月《解放日报》的报道说，在晋察冀，平均85%的人参加了区级选举，90%以上的人参加了县一级的选举^⑮。一

年以后来自晋察冀7个县的调查数字似乎更精确：参加区级选举的平均人数为81%，参加县级选举的平均人数为70%。^⑤同一份材料还记载了参加村级选举的人数达83%的情况。

下面这份统计表展示了群众参加选举的清晰画面^⑥。这些来自冀西17个县的数字说明广大农民参加了选举，尽管它们似乎高于边区选民参加选举的平均数（表见108页）。

作为农村权力机关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选举必然会受到旧统治者的敌视，他们企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在战争开始时，鲁南地区有两股势力竞选村、县和区委的领导职务^⑦，即——充满着激情，“代表人民的一方，它包括农民、抗日青年、八路军游击队和各种群众组织的成员”，和“前统治阶级一方，它包括旧官僚机构的成员、绅士、地主、和孙将军有联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采取的是非暴力手段，然而他们阻碍选举的有效进行的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统治阶级一方拥有选举机器的优势。他们很富有，足以在选举运动中花大量的钱，在有必要和可能的地方行贿。这些人通常策划一种有效的选举运动，请党内主要人物吃吃喝喝。既然选举机器操纵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就可以有意地使发给共同伙的选举通知单大大地超过他们的对手所能得到的数目。此外，他们的对手得到通知单的时间还经常被延迟……”

和彭德怀的说法相反，不管怎样，在选举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不出现腐败和不正当的事情^⑧。尽管党逐渐加紧了对选举过程和政府成员候选人的控制，但决不可能杜绝地主暗中破坏的现象。

纯洁政府的方法之一，是进行成功的改选。刘少奇在1938年3月说，要使那些被选出来的人明白，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在为抗日工作，为群众工作，否则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就会被撤职：

“在选举政府领导人时，必须清除一切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分子。只有那些正直、勇敢、抗日的，有能力的以及群众信赖的人才能当选，以及使这个政府更纯洁，更坚强。”^⑨

冀西选举情况统计表*

县 名	全体选民数	参加选举人数	百分比 %
平 山	123427	114875	93.00
灵 寿	42700	41427	91.00
井 陉	21679	18747	83.60
行 唐	22933	17020	88.30
阜 平	60021	57573	95.75
完 县	81415	62230	88.40
唐 县	126735	102185	80.70
定 北	69996	63697	90.90
曲阳、望都	114345	96558	86.00
清 苑	59240	50946	89.34
满 城	31210	25787	92.20
涿 (水) 涿 (县)	82279	77592	99.40
涿 源	25478	25333	75.12
定 县	59999	43871	83.00
宣 (化) 涿 (鹿)	6319	3962	96.90
蔚 县	5909	5737	85.80
平均数	21165	18096	87.25

(* 表内部分百分比数字有误, 系英文原版如此。——译注。)

晋察冀 1939 年 1 月的选举口号表明了候选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选出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工作不怕困难的人当先进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人为村长”^⑧。

贪污腐化的影响和渗透是相当广泛的。据报道，1948 年 8 月冀中政府机关“进行了彻底的改选”，即撤换了许多村、区、县一级的干部^⑨；随后，山东废除了所有的旧区委和旧乡政府。一位研究战初日本历史的人说，无记名投票是用来改善区政府机关，选举新的区、乡领导人的方法^⑩。那些被撤职的政府机构的人员，有秘密帮会的成员、土匪、贪污分子和不称职的人，等等。在领导机构中这样的人数量多，不可能一下子都被撵走。这一点，从晋察冀的一次讨论改选县委中有问题的成员的指导性会议中可以明显看出：

“过去两年多来（即 1941—1943 年），委员会的代表变化很大；有些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其他一些被清除。还有一些成了叛徒，投靠了敌人，这造成了代表人数的不足。代表与人民的关系极差”^⑪。

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边区的边缘地区。选出适当的乡政府机关候选人所面临的困难与“人民贫苦的生活条件、乡政府繁重的工作以及对敌斗争的尖锐有关”。“许多人不愿意当村干部，有些人故意选坏人和懒汉”^⑫。

选举的动员工作所面对的另一个障碍是农村的传统观念，如宗族主义。一个村子的宗族头目通常是富人。宗族可以使它们的代表只选它们自己的头目。日本学者写道：“宗族之间的冲突常在村代表会议上反映出来”^⑬。

1945 年春天，周恩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915 个县的人民已经选出“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⑭。然而，选举的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动员村民和使村民政治化，通过参加群众大会，讨论各种计划、纲领，农民对于利害关系的问题有了较好的理解，希望自己管理自己的村子。选举运动是农民检查政府工作、批评错误的一种机会，从而也为他们提供了检查官僚主义弊端的便利。

群众组织：建立

群众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在阶级斗争和农村改革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些临时性的、属于半官方机构的组织，在战前的政府垮台后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虽然如前所述，群众组织和临时团体^⑧的关系极其复杂，但是随着政府机构的建立，这些组织还是被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起来了^⑨。

四个基本的群众组织是农民、工人、妇女和青年各自的委员会。农会是最重要的组织^⑩。其它许多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包括儿童、教师、作家、记者、商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团体及宗教团体，等等^⑪。这些组织在农村的社会改革和抗日动员中的作用不太重要。武装团体，如民兵及它的附属组织，是群众组织的中心。这点将在下章讨论。

据说上述四个基本群众组织的建立是从最基层逐渐向较高层次发展的。换句话说，这些委员会首先在村里产生，随后再产生区一级、县一级和边区一级的委员会^⑫。一位中国记者评论说：“从此，各种群众组织当然不再是一块空招牌，而是有了群众基础……和一定的工作方案。”^⑬农会下面的执行委员会设有总务部、宣传部和教育部，从事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武装、动员、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村一级的组织进一步划分成小组，去发动所有的村民执行各种经济、政治、军事任务^⑭。在组织蓬勃发展时，党要求严格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它认识到违背这个原则将会导致失败。在谈论山西的群众运动发展情况时，刘少奇把“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称之为“群众运动发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解释道：

“为了组织他们，（我们）应该使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使群众感到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没有这点，将什么也不能组织。另外，当群众感觉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非正在组织时，无论多么艰难，无论是（企图）阻止（他们）或是打击（和）诅咒他们，他们还是会组织起来的。”^⑮

这个原则受到普遍重视是有道理的，否则就不能理解发动的规模为什么会日益扩大。来自冀中的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报告承认，在发展农会的过程中不存在强迫，采取的是“说服和具体的教育工作”^⑧。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资料也提出了相反的情况^⑨。

土匪和“机会主义者们”起初把持着一些农会的大权，但在日军进攻时期，他们因露出了真相而被撤了职^⑩。农村中的剥削者企图阻挠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认为这是一种较大的威胁。十里铺的地主和富农了解了农会的作用，“开始以恫吓手段来阻止（农会）会员活动”。有个地主威胁道：如果国民党回来，“（农会）会员将被处死”。“他和其他的地主在庙里煞费苦心地拜神求佛，好让神保佑国民党回来”^⑪。

农会要在村里站稳脚根，成为推动群众运动的基础，就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保护群众的利益。拿十里铺来说，在一场遍及全区的饥荒中，农会表现出了它的这种能力。它之所以能成为“村里最有威信和群众组织”，是因为它成功地防止了地主和富农“囤积居奇，进行粮食的投机买卖和牟取暴利”，地富所囤积的粮食“被按合理价格”出售。结果，全部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农会。农会壮大多了，它能对隐藏粮食的行为采取直接的行动而不只是采取说服的方法。长工们向农会报告藏粮的人和地点，农会发动了“挖地粮”运动。这个运动：

“是没收那些拒绝出售粮食的人的粮仓。这些没收来的粮食免费分给忍饥挨饿的人。农会常常在囤粮者的院子里就地生火煮饭，满满地煮上一锅肉分给饥民”^⑫。

党的地方组织的一份文件强调，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农会，取得群众的信任，必须“开除”和“惩罚”“坏干部”以及劣绅^⑬。

群众组织：职责与成员

群众组织的职责，是为着两个目标而发动群众：一个目标与抗日直接有关，即完成目前的军事任务；另一个目标与抗日有间

接的关系的，即从事社会改革。刘少奇谈到：

“我们说，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所有的群众组织的职责是：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各种工作”^①。

日本人在山西和顺县缴获的一份中共文件，阐明了群众组织的所有职责。农会的行动纲领有六点：武装保卫所在地区；贯彻税收政策；以各种方式努力支援战争；清除“坏干部”、劣绅和流氓；“实行减租减息和协助进行优待军属的工作”^②。

刘把群众组织的军事任务概述为：“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协助军队作战(和)做饭、转移、巡逻、报警、抢救伤员、侦察敌情、破坏公路”，等等^③。

这些任务主要由民兵及其附属组织承担。必须记住的是，这些组织与农会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组织成员的资格的多重性。一般说来，农会和其它群众组织中最有能力的成员同时也是地方武装组织的成员^④。

农会一直忙于支援战争。日本人对安国县 18 个村的农会活动进行了详细调查。河北省农会在以人力、物力支援八路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⑤。相当一部分正规军的士兵和游击队员曾经加入过农会。1939 年年中的一份报告提到：在两万名士兵中，半数的人在被动员参军时已有 17 个月的农会会龄^⑥。所以，农会对抗日的直接贡献是极大的。军事动员工作转为依靠地方来做。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破坏交通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运动^⑦。

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群众组织通过宣传和说服工作来帮助贯彻政府的法律与政策^⑧。然而，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群众组织偶尔也干预政府的工作，但会受到党的严厉批评^⑨。

农会的发动工作有时纵容了农民，使他们在阶级斗争的程度与方法上超越农村统一战线的规定界限，走向激进主义。在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上尤其是这样，战争头一年年初，晋察冀的一些农会被批评“犯了极左错误”。尽管 1938 年春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要求纠正这一错误^⑩，但其趋势并没有得到制止。从 1939 年

到1940年年初，“极左主义”在这些农会的许多工作中都达到了高峰，双减中的“极左主义”成了主要问题。此后，对阶级斗争加强了组织领导，农民拒绝按统一战线的标准行事的情况不常出现了。

群众组织从事的鼓励人民执行政策的工作，也包括实现政治民主化。它们在诸如反贪污斗争、清除政府机关中的“阻碍”势力、参加选举、争取群众支持政府的法律和纲领这样一些问题上表现很积极^⑧。

有相当多的资料表明，在华北，从1942年起，群众组织就开始形成，1943年至1945年，它们得到了很大发展。下述大约1000万成员的数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群众参加组织的情况：

1942年人民参加群众组织的数字(华北地区——译注)

群众组织	晋察冀	晋冀鲁豫	晋绥	山东
农会	875761	1970001	215000	1070000
工会	243682	123625	55000	200000
青年会	280954	273960	70000	400000
妇女会	710535	834673	87000	500000
儿童团	628871	1070000	24264	238367

农会在群众组织发展中充当了主角，这可以由其会员数量大量增加来证明。1938年，晋察冀农会的会员有惊人的发展：3月，当20个县的农会代表汇集一处成立边区一级农会组织时，会员有20万人；而半年以后农会发展到27个县，会员发展到60万人。在支前运动中，冀中17个县的农会就有20万人^⑨。

日本观察家说，群众组织的“骨干”是贫农与中农。这些阶层

形成了中共力量的“基础”^③。实际上，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允许参加农会。这就排除了地主参加的可能性^④。至于群众组织中和负责干部的社会出身，由于数据缺乏，难于判断。日本的研究人员在战争开始时收集了关于河北地区群众组织的负责干部在村里拥有土地的数量详细统计材料，以证明贫农对群众组织的控制（武装组织也包括在内）：

河北地区群众组织负责干部拥有土地的情况^⑤

组织名称	每个干部家庭拥有土地的情况							干部家庭成员平均拥有土地的情况						
	1亩以下	1亩以上	5亩以上	10亩以上	15亩以上	20亩以上	?亩	1亩以下	1亩以上	2亩以上	3亩以上	5亩以上	?亩	
农会			1	2			3	1	1	1			3	
工会	3	1	1				5	5				5		
青年会	2	3	1				6	5	1			6		
妇女会	1	2					3	1	2			3		
文化工作团	2		2		1		5	2	3			5		
军事委员会	1		1		1	1	4	1	1	1	1		4	
自卫队	2		6	3	1		12	2	7	2		1	12	
模范团	2	1	4				7	4	3				7	
青年先锋队		2		1	1		4	1	2	1			4	
青年妇女团	2		4				6	2	3	1			6	
儿童团	1	1	3				5	1	4				5	
总数	16	10	23	6	4	1	60	25	27	6	1	1	60	

十里铺的情况也类似。虽然农会会员是贫农和中农出身，但正是那些最贫苦的农民，佃农、长工们，在1942年发起组织了农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他们成立农会的前两年，在农村的经济改革中，他们“加强了力量，取得了信任。”^⑧

第四节 税收制度贯彻中的 临时性与不稳定性

尽管党的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直到1941年以后才得以发挥，但是在战争初期，仍然可以看到农村的经济改革有了重要的发展。这种发展，就是税收政策在农村财富的再分配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

初期的税收

中共的军队和干部开进华北敌后时，最先的行动之一是废除了35—40项“苛捐杂税”。在减轻农民困难的工作中，废除这些税收被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①。一位来自山东的天主教传教士，谈到了“凡是八路军占领的地方，老百姓都为有了安全措施和免除了税务而欢欣鼓舞”的情况^②。日本的一份史料说，人民对免除这些税收的反应是“欣喜若狂”^③。1939年彭德怀在会见中国记者时，对这些税收进行了评论：“苛捐杂税”“使得人民无法生活”，因此不废除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群众运动”^④。

战争的头两年，在采取合理负担税收制的政策之前，税收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别，党的总路线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条总路线对于税额在各阶级间的分派来说，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在许多地方，这种新的税收办法基本上把税务负担转到了地主和“部分”富农身上，尽管富人不服^⑤。“如果富人不愿意出钱，我们就得强迫他们出”，山西省有个村子这样宣称^⑥。山东党组织的一份材料披露，山东地区的税务由富人单方面承担^⑦。如果要建立稳固的边区，这些专横的税制就不能继续实施下去：

“几乎所有的地方，组织游击队的日用消费品和粮食都由富人负担。然而，无休止地号召‘富人’出钱是有困难的。我们打算用更有计划的方法来进行这项工作。”^⑧

这种缺乏准则而且不规律的税收方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财政的拮据^⑨。

除了几乎任意地对富人征税外，国民党的旧土地税——田赋还在继续实行，虽然变换了形式^⑩。在晋察冀进行考察的一位中国记者指出：过去，农民反对交田赋，甚至不顾地方官吏的强迫和被关押的威胁；在新成立的边区政府领导下，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田赋，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不再拒交地租。人民是否真象他说的那样争相完税呢，似乎靠不住^⑪。

根据彭德怀的有关说法，不管怎样，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土地税的征收没有考虑要区分富人和穷人，而是对他们平均分派。1941年，一个废除田赋的要求说明了田赋还不能迅速废除^⑫。当政治和经济的建设取得了远比过渡时期要大的进步时，田赋就会被当作一种“过渡税”来废除^⑬。1948年，有位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田赋一直征收到统一累进税开始贯彻之时。田赋有许多不足之处：它不是以土地的产量为基础；它没有免税率；它的税率不是累进的；土地税收的帐目也不准确，等等。但比起其它的旧税来说，它仍然不失为一种较合理而可靠的税收^⑭。

合理负担税收

合理负担政策，作为税制向更正规化的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志，是1938年至1939年组建地方政府时开始实行的^⑮（有些更早的税收政策与它同名，系由阎锡山和牺盟会创立）。尽管几年以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不适当的，但它对于社会的平等作了重要的贡献。

彭德怀否认合理负担政策是针对富人的，他说：“把较重的负担放在富人身上是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一致的，对他

们来说，并不是用收税来没收他们的钱财。”^⑩ 彭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这意味着政策要依情况而变。事实上，政策的执行情况极大地取决于群众动员和群众积极性所达到的程度，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这项与 1939 至 1940 年的极左相一致的税收政策，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引起“过激行为”（即威胁到农村统一战线的行为）^⑪ 和阶级关系的激化。日本人关于山西和顺县的一份调查材料的结论是：合理负担政策“近乎于掠夺”较富裕的人家^⑫。另一份日本方面的情报说，这项政策将会消灭大地主。据说向大地主征收“超额”税是“一般的”做法。这份情报评论说，大地主被消灭，宗族系统被瓦解，就为“扫除农村的封建势力铺设了道路。”^⑬ 山西报纸上有篇文章证实了在这项税收政策的规定下，必须交付大量税款的正是富人：

“既然对富农征收超额税，这项政策执行起来通常就不合理，并已引起了争论。根据部队首长的指示，干部进行了调整。那些不理解政策的人谴责这些干部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人’。”^⑭

据一位在晋察冀参观的中国作家所了解到的情况“有钱的出钱”的原则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变成了“富人捐钱”的原则^⑮。一本 1949 年以后出版的中国著作，将这种税收的特点概括为：“有钱的出钱，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钱的不出”^⑯。

然而在向富人收税时不可忘记地区性的差别。有一个事例证明了税务是如何适当分派的。在和顺县的一个村子中，富人占总户数的 11%，而派给他们的粮食饲料税则占全村总额的 80.6%，其中现金占总额的 63.9%^⑰。由于没有更详细的证据，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从有关富人“负担过重”的零散报告来看，富人的最高税额占其个人收入的 35% 的说法似乎很成问题^⑱。

除了交纳正常税外，富人经常被指派“捐款”，提供“贷款”，等等。这些支出与增加税额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用齐武的话来说，“采取这种向‘大户’派钱粮的方法使得地主和富农的负担过重。”此外，按财富比例付税而不是按财富比例得选票，“这明显

对富人不利”^②。

根据对和顺县的调查，各种紧急费用都用“贷款”支付，这样的“贷款”，实际上等于“没收”。没有缴足贷款的人被当作叛徒，他们的粮食被群众组织没收^③。在其它的情况下，富人被“说服”向政府机关捐献经费^④。

富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相当多的财产。强迫可能比立即没收的方法更为普遍。然而，捐款允许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刘少奇已经指出，要“坚决禁止”强迫抽捐的做法，“如把愿意捐物而不愿捐钱的人定为叛徒”^⑤。既然总是要施加重压才能实行捐款，那么就谈不上有什么自愿与强迫之分了。

整个战争年代都实行了这种超过税收率以上的抽捐。过高地规定税款很可能引起了地主与富农的反抗，并使得大多数地主成为积极的通敌分子。征收这种名为“捐款”的超额税，好处在于有极大的灵活性。在战争的头四年，抽这些税常常引起争论，有时情况还很严重。但公开、尖锐的，使用暴力手段的阶级斗争一般都被制止了。促进捐款筹集的一种方法完全说明了党所控制的阶级斗争是“不流血的”：党对于“愿意”出钱支持抗战的富人给予广泛的宣传，以鼓励这方面的竞赛。捐款通常是以支援战争为由，以民族主义的口号相伴随。有个地区以这些目标去“发动”富人，工作“做得很好，不少富户愿意主动捐钱帮助政府、军队甚至穷人”^⑥。1944年同一个省（山西）的其它地方则号召绅士尽全力把粮食和种子“借”给极贫穷的军属，以便耕种^⑦。对于捐款的要求，富人是不可置之不理的^⑧。

农村中平均财富的斗争有时以自发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出现。在日军入侵后，鲁南的贫农立即发动了抢粮运动，以报复他们所憎恨的绅士。农民组织自己收集情报，讨论问题，主持群众大会，为进攻作好准备。一经决定从哪些地富家庭抽粮以及该抽多少，农民就立即开进这些人的家门，要他们把粮食借给需要粮食的人。显然，这种要求“很少被拒绝，尽管这使得地富们不快”。

一些地主在他们的村子则以事前威胁和“救济穷人”的方法来尽量减少农民抽粮的要求，防止问题政治化，并且不无成功^⑳。

通过采用迫使地、富以及家境好的人承担多数税额的方法，农民有可能减轻负担。对较贫穷的农民的免税与战前的税收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事实，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㉑。也许是在比较偏激的情况下，十里铺村子中70%以上的人都免了税，仅仅剩下30%的人向政府提供税源。最富的人，交税必重无疑^㉒。那免了税的70%的农民已经明显地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克鲁克斯夫妇写道：

“许多农民第一次发现他们有足够的种子播种。以前，他们被迫在粮价最高的春耕时节借入种子，而在粮价最低的收割季节归还，这是使得农民的债务越背越重的主要方法之一。农民免了税，生产热情更高，更加努力。结果民心普遍大振。”^㉓

有关大量的人被免税的其它零碎数据表明，十里铺不是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战后中国公布的一则史料指出，冀中有40—60%的人免了税^㉔。按H·汉森的说法，在这个地区，“免税农民占农民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㉕。日本的情报材料说，山西和顺县的一个村子，在183户人家中有66户以上的人家免了税^㉖。

此外，中共的有关报告声称，合理负担政策的执行结果是降低了税收总额。这是通过不断地向富人征收较高的税额实现的。与1937年日本人入侵前夕的地方税征收情况相比，晋东南的地方税利制1939年减少了三分之二^㉗，太岳（长治）的地方税甚至大幅度地削减了80%^㉘。

筹集军费开支不能单单依靠向富裕人家征税。在一些地区，农民群众面对着军费需求不断增加的局面。1941年8月，晋察冀政府报告说，入民的税务比战前更重。政府号召人民忍受“暂时的困难，节衣缩食，作出大的牺牲支援前方”^㉙。

虽然合理负担的政策比较紊乱，但它确定了税收核算的原则。边区政府分派定额到县，由县来确定村的定额。每户人家的标准

税收类别由被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决定，或由村动员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来定。后一种办法似乎更为普遍。对不服从决定者，要强迫实行，如本人不在村里，则没收其土地，并且不留半粒粮食，待其完成粮食交付的定额后，再将土地归还^②。根据这个制度，对每个村子的财产都进行了估价，并按照 11 种等级确定了付税额。村子地位的等级，决定了它向县里交付的税额。在村子内部，则根据财产和收入将住户分成 20 个等级^③。H·汉森说，河北农村中，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公布栏，税收情况被列成一个相当详细的表格，纳入其中。如果向农村征粮过多，农民可以到军队指挥部去诉苦^④。

征税主要是征粮。在许多地方，这被称之为“救国公粮”^⑤。“合理负担”税这一称呼，主要在晋察冀通行。冀南则称其为“公平负担”，以区别于不公平的“田赋”制度^⑥。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开始以实物来交纳农业税，这种方法以后一直在使用。以物折款与直接筹款相比，尽管有许多麻烦，但更适用于战争年代。不管是同日本人还是同国民党作战，食物和其它用品的供给都是军队的直接依靠。因此，以物纳税省去了购粮的麻烦。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农民筹集税款。除了用粮食，还可用其它如木炭、家织布之类的实物来交税，这很容易筹满税额^⑦。

合理负担政策比较简单，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因此，在贯彻这项政策时，似乎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尤其是自农民自己集体决定税额以来。中共希望农民能很好地了解农村财富的分配情况，但效果未必如此。中国不搞财产登记，人们对自己的财产守口如瓶。实践已经证明，要核实财产的数量与价值，尤其对有钱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不可望马上奏效^⑧。

合理负担税的明显缺陷，最终必然会渗透到统一累进税中去（见第二章第二节）。向县和村分配平均税额的方法，有使负担上的不公平扩大化的倾向，并且各级政府中也存在浪费现象。在村子内部，税收累进原则运用得不平衡：在地主势力强的地方，税

收上的平均主义就少于贫苦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另一些严重的缺陷是，税收率的条目不完备，税收缺乏组织、计划，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混乱，等等。^⑨一个税收制度必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单位、核算、税率和税收机构^⑩。

第五节 党的发展——数量与质量

正如党所设想的那样，为了领导农村改革，并使之与游击战结合起来，党需要深入到广大敌后根据地，在农民群众中深深扎根。我们已经看到，到1940年为止，党员的发展是迅速的：1937年为4万，到1940年就发展到8万。但就质量而言，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地主和土匪或多或少地公开破坏党的政策，并且颇为成功。在党的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党员的发展，因贪多求快，工作做得很差劲。

战前党的状况

在短命的高阳——蠡县苏维埃之外，中共对于1932年8—9月在有15万人口聚居的冀中平原数县爆发的一场有1500—2000名农民和军校学生参加的起义，从未施加过影响。它当时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要深入华北农村^①。党在华北的机构于1926年被破坏。在这之前，党的工作只限于领导工人斗争和学生运动。齐武承认，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华北的党员人数“极少”^②。齐武还说，党的敌后领导机关的重建工作仅仅是由“3—4名核心成员”开始做起的^③。由于预料到日本人的入侵，中共在为时过迟的情况下进行了准备——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建立党的机构。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还决定建立几个省委机构^④。在日军侵入华北的时候，无论党在当地的组织建设已取得了什么成绩，终都是从零开始的，从而也是有限的。

党的发展与巩固

从延安整风之前到1942年整风开始这一段，敌后党的建设有两个明显不相同的时期^⑤。第一个时期是党的大发展时期；此后，由于1939年8月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指示，第二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则是巩固党的组织。第一个时期意味着：“共产党员必须发展它的组织，使共产党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党……这里不应该容忍半点关门主义的倾向……我们不能因防止敌特而关闭党的大门，我们的政策是大胆地发展我们的党”^⑥。

由于缺少准备基础，在农村，建党的最初成果大都是依靠诸如八路军地方工作队或学生积极分子的“外力推动”而取得的。因此，党的发展是自上而下，从村外向村内进行的。这对党群关系来说，含有消极的意义。随着1938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快党的组织发展的指示的发出，忽视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变得格外明显了。党员发展运动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在一些地区，党员人数从几百一下子跳到了几千甚至几万。但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犯了错误”。党员标准被降低，以致常常忽略了阶级成份。由于“盲目追求数量”，揣着各种动机的人，如企图维持旧制度的农村中的富人，被吸收到了党内。在冀西和冀中的部分地区，党员人数的发展已经“惊人”，而质量则相当差，其中“有许多质量低劣的党员”^⑦。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的速度赶不上新党员发展的速度，造成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这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组织：强迫现象普遍；干部擅离职守，贪污犯罪；在下级党组织中，富农和“流氓地痞”进入了领导岗位，进行欺骗、压迫活动。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争初期在农村中强调团结有产者而忽略发动群众的情况。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忽略了群众工作，不努力对下级进行指导^⑧。

由于这些原因，党进入了巩固阶段。正如中央委员会1938年8月的指示所指出的：“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在今

天已成为当务之急，成为了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于是，1939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了第一次边区党代会，决定以紧缩现有党组织的政策取代发展党员的政策。虽然态度更加慎重，但在党的发展工作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的地方，仍要继续执行发展政策。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发动了整党运动，清洗了“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也许还有地主分子。对各级干部进行了调查，以确证他们的可靠性。面对日本人的进攻，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党的组织以及地下工作。对党员质量的强调反映在对党员数量的规定上。在“大村子”（规模在100—300户人家之间）中，党员人数规定不得超过总人口数的5%；在“中等村子”（规模在25—100户人家之间），党员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数的3%；在“小村子”，党员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数的1%。在进行了各种整顿教育活动后，党支部又恢复了战斗力，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应付战争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然而，晋冀鲁豫第一次整党运动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思想工作被忽略，只是机械地削减了大量党员。群众斗争没有发动起来，这意味着党的觉悟和能动性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在运动中，党组织没有确实“得到整顿”，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坏”的和“好”的党员同样被清洗；“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在党内仍然可见。作为党在农村的“主要阶级成份”的雇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在党内还没有取得广泛的支配地位。党内的政治教育仍然“很不足”，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常被歪曲，或者完全不为党员所理解。由于撵走了大量党员，党的力量分布显得不均匀。

对于党支部在与人民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没有涉及具体的支部。有大量的支部不接近群众，不接受群众的批评。许多支部忽视了如何与人民一起工作和生活，因此，它们不能领导农民。它们不是使自己成为群众的核心力量，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威信，而是以统治者的态度自居，把党凌驾于“群众之上”^⑥。

第六节 军队的建设

随着党的力量的增长，军队到1940年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对军队建设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对战争初期中国五花八门的抗日力量给予重视。

抗战初期的各种抗日力量

1937年秋，刘少奇列举了下列几种抗日力量：直接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军阀与国民党的部分军队，它们构成了华北最早的抵抗力量；民团，它们一般被军阀控制；人民自发建立的武装组织；土匪和秘密帮会；内蒙古傀儡军队中的起义军；蒙古族人 and 回民；起义到中国方面来的日本士兵^①。几个月后，刘又指出，在山西，有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游击队；国民党的游击队，阎锡山的游击队以及其它游击队；抗日的土匪和秘密帮会等^②。日本方面的一份史料说，抗战初期冀中抗日力量的成份“极其复杂”：有旧军队，保安团，中共领导的工人、农民组织，民团，土匪和宗教组织^③。山东的抗日组织的种类和这差不多^④。据估计，华北有16种抗日部队、游击队^⑤。

如果不是大多数，那么也有相当多数的地方抗日力量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它们既不忠实于中共，也不信仰国民党。这大大引起了混乱。刘少奇对此做了概述：

“曾有各种部队和集团，它们思想不同，行动各异，指挥不统一。它们有的抗日（大部分抗日），但有的也动摇、妥协”^⑥。

农民自发起来组织抵抗的直接目的，是保卫他们的家园、土地和祖坟。他们获得了枪，有钱也有人^⑦。然而这些成果有时受到土匪、留守的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如在晋西北，人民严重地受害于土匪与逃兵。最初的武装组织，几乎都是在“组织自卫队，维持地方秩序，准备迎击进犯之敌”的口号下成立的^⑧。在

冀西，散兵游勇放火抢劫，弄得人心惶惶^⑧。聂荣臻经常收到关于士兵和土匪掠夺、勒索村民的报告，农民们“痛哭着要求肃清当地的邪恶势力”^⑨。当地人民经常要求八路军保护他们免遭中国溃兵的骚扰^⑩。

抗日力量的全然不同，是实现协调与合作抗日的可怕障碍。确实，各种军队在抗日方面从来没有合作过。聂荣臻在描述这种情况时说：

“在与同一个敌人交战时，抗日力量不能共同努力，协同作战。力量分散……单枪匹马的部队在战斗中通常不能互相取得联系。一个部队与敌人交战，而另一个部队只是坐守旁观。事实上，每一个部队仅仅关心自己的防区，用自己的方式作战”^⑪。

总之，“这些力量尽管都是‘抗日’的，但它们都各行其是”^⑫。除了没有全盘的领导外，这些部队也缺乏作战经验。薄一波说：

“这种由几乎不懂得打枪的学生、不懂战术的教授、和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的农民组成的部队，有因指挥员的缺乏而分裂，因技术的缺乏而被消灭的危险。”^⑬

军队之间的“磨擦”是常见的。林彪把这种势不两立归咎于世界观的不同和复杂的历史原因^⑭。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战略战术和训练质量的问题，而是包括了从政治立场、群众工作作风到文化水平等一系列内容的问题^⑮。在同日本人的战斗中，各种抗日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克服以上分歧^⑯。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自称抗日的部队决非真正的抗日。在鲁南，那些组织武装团体的地方官僚并不“认真地努力抗日”，而是“仅仅对为他们自己建立有影响的地位感兴趣”。地主控制的大多数组织“投靠了日本人……它们还总是为自己辩解。当然，它们声称自己是在拖延时间，等待中央军的到来”^⑰。

收编与改革

大量抗日团体的形成并不影响我们的观点：抗日开始时，农

民群众对抗日仍然是漠不关心的。聂荣臻写道：

“我们(直接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的地区还不巩固，我们还不能杜绝汉奸组织的活动。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仍不普遍。武装动员工作也很不足。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广泛地调动起来”^⑩。

此外，115、120、129师在转移到敌后之初，由于干部缺乏，还不可能大规模直接招收新兵。军队最初的发展是通过收编其所在地区的零散战斗部队，以及其它武装团体来进行的。

在对边区建设的研究中，我们略为提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非共产部队：(冀中)由吕正操率领的部队；(冀南)由杨秀峰领导的部队；(山东)起初由范筑先领导的部队，以及山西的牺盟会和部分军队。这些部队基本上提倡进步，并且有组织。对它们的合并进行得比较顺利。

显然，在山东，合并地方游击队的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据政治部长朱瑞说，八路军两个团一到那里时：

“发现一个重要的，有自己的传统、经验和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得到了发展。那儿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这支部队不需要象其它地方那样再输入抗日力量，它只需要在(山东)人民已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加 强自身建设”^⑪。

另一份材料说，这个地区的抗日精神是如此的饱满，以致连宣传工作都没有必要进行^⑫。这是一个特例。

其它地方都存在着进行政治再教育、灌输在战斗中遵守纪律的意识以及与人民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聂荣臻对于保持军队的战斗纪律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描述：“党的干部不得不常常花大量的时间解决分队的纪律问题。例如，一天中，一个连队和一个地方动员委员会必须处理12起事件。”^⑬

改造土匪和秘密帮会的态度与方式，是一个特殊问题^⑭。党企图解散这些组织，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成员吸收过来^⑮。

在中共的核心地区，对土匪的处理比在那些不稳定的地区更严厉。中共屡次言及土匪队伍阻碍抗日，并不断提出有必要消灭它们。这表明，对于中共来说，土匪问题是一个顽症^⑯。

尽管秘密帮会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并有通敌的倾向，但党对它们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对于与它们合作有浓厚的兴趣。毛在1936年7月向哥老会发出的热情洋溢的呼吁是众所周知的。他赞美秘密帮会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强调了与他们共同的客观利益：“剥削阶级使（哥老会）遭受的痛苦和我们是一样的！……你们支持打击剥削阶级，帮助穷人，我们支持打土豪分田地；你们鄙视富人，维护正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社会阶层。”毛号召哥老会“发扬”“过去的革命精神”^②。鲁南的八路军第四旅与秘密帮会建立了友好关系，“尽可能在各方面帮助它们”^③。党对秘密帮会的宽宏大量，可能是以重视它们与农民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在帮助和保卫农民时所表现出来的朴素的阶级觉悟为基础的。

正规化

专心致志于建立正规化部队的紧张工作，是1937年至1940年军队建设的突出特征。为要建立一个军事基础，部队在战争的头几年迅速正规化是必要的，但是做得太过火，也没有注意方式。

1938年初，军队的正规化过程已经开始，党甚至宣称：“大多数部队已经着手正规化工作了”^④。党支部制度、军事和行政机构已经建立。一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改编军队的运动开始展开。1940年，政治整风和组织整顿的运动接踵而至。

在正规化的过程中，不愿意接受来自上级的管训与指教的“游击主义”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把游击队编为正规军的做法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⑤。1939年12月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已经在每一个（游击队）分队采取了使它们成为正规军的第一个步骤”，并为加强正规化进行了辩论。基本理论必然会促进政治的巩固和军队中党的领导加强^⑥。

然而，过分地强调正规化，导致了对游击战争认识不足。因此，以群众为基础的地方武装团体通常被忽略^⑦。地方游击队和自卫

队通常被随意地改编和收编到正规军中去。强行募兵的现象也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党支部制度的薄弱^②。尽管屡屡强调收编和招收新兵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否则编成的部队不能打仗，但强迫现象仍然不断^③。刘少奇在批评急于正规化的倾向时指出，它妨碍了各种武装团体的巩固，使它们擅离职守，造成了正规军与游击队之间的敌对情绪：

“现在，一些地方游击队居然不与正规军相见，当军队开来，他们就跑到敌占区去。因为他们害怕被军队吞并。这个现象必须纠正”^④。

许多游击队宁愿逃跑而不愿被合并为正规军的情况，在其它材料中也得到了反映^⑤。逃跑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⑥。有两个武装团体的逃跑的人数，分别占其总数的16.4%和20.8%^⑦。除了强迫正规化和强行招兵外，逃跑的原因还在于：军队质量的降低和急速的发展^⑧、政治教育的缺乏^⑨、部队生活艰苦并且纪律严格^⑩以及不满分子的煽动^⑪。在动员收编自卫队时，人们开始趋向于认为参加自卫队就是当兵，即在军队服役，因此他们不愿意参加自卫队，结果使得自卫队与正规军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刘强调，必须首先发展和训练自卫队，只有走完这一步才能慢慢动员一些自卫队员到正规军中来^⑫。

在收编游击队时，为了减少逃跑，提出了许多措施：第一，先把游击队转移到靠近家乡的地区，在那里它们能与正规军共同行动，在军事上得到更多的经验；第二，不要直接把游击队派往作战地域或战区的某一处，而要较有步骤地进行这项工作；第三，尽可能地把有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的人组织在一起^⑬。

在上述几年中，正规军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战斗，而游击队和民兵却只是跑跑龙套。大部队战事繁重，伤亡率很高^⑭，这通常给动员地方武装团体尤其是民兵的工作造成了障碍。至于同日军的交战如何暴露了正规化政策的根本弱点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机构的改编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讨论。

对于具有广泛基础的武装组织的发展所面对的客观障碍，切

不可低估。在 1942 年以前，群众的积极性仍处于低水平状态。经过训练并且有能力的领导干部奇缺。简言之，在这个时期，地方武装组织所能完成的任务是有限的^④。

巩固和整顿军队的努力显得不够。冀中乡村防卫组织因有强迫、打人、贪污等行为，认为“与人民的利益不够一致”。面对敌人的“扫荡”，它们土崩瓦解了。这要归咎于自上而下派遣干部和以军事经验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的做法。其结果是使一些有旧作风的军人和政治工作人员进入了领导岗位^⑤。

老八路的素质

“军阀主义”的含义很广，例如：不尊重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法律，虐待人民，违反纪律，干部对士兵的态度专横等。直到 1943 年底它才有所“克服”^⑥。但在一年之后，这个问题仍然是“严重的”^⑦，对急速招募的大量士兵与江西苏维埃和长征时期的有经验的、身经百战的坚强的老战士以及训练有素的新战士，必须加以区别。有位传教士说：“老的（八路军）纪律严明，我们还以为是上帝天国已来临。但后来的这新兵有的还不如土匪”^⑧。

与这些新的成分相比，八路军的中坚分子的素质大不相同。通过长期而艰苦的游击战的考验，这些战士不仅训练有素^⑨，而且朝气蓬勃，坚韧不拔。在战争的头几年，一位西方人在敌后目睹了这些战士，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部队中有许多战士光着脚在泥泞中、雪地里行军、作战。他们根本就没有袜子。我看到这些光着脚的人踏破了河上的冰层，涉水过河。他们背着行李和武器，有的人还背着铲子和镐。然而，他们仍然顶着风雪前进”^⑩。

“他们以一小时 3·5 英里的统一速度上下山，一天行军 35 英里，一星期走 250 英里。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不知疲倦的步伐……我看到他们一晚又一晚地在山边露宿，而他们却习以为常……军队中的孩子们的身体更吃不消。布朗博士告诉我，他曾见过一队八路军战士，在 1 月中旬的夜间行军时过一条几乎冻结了的河。这些人裸着上身，用

他们的衣服系着步枪，一只手握着用以应付紧急情况的手榴弹，象一群印第安人一样叫着走进冰水中。这呼号声，附近几英里处的日军岗哨能清晰地听到”^⑧。

“也许世界上没有其它军队能步行这么长的距离，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⑨。

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很强，作风很好。正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写的那样，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很融洽：

“在这个镇子里，我们目击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大量逃走的人和附近的村民都络绎不绝地回来了。八路军来了的消息如蔓延的烈火在人们中传了开来。人们收拾好包袱，驮好毛驴回到自己的家。当晚，镇人民代表来到军队指挥部，感谢他们的到来，并请求他们留下，保护人民”^⑩。

“农民们站在一边给我们送水，伸出他们的双手握着我们。这是一幅动人的场面。常常我们拐了一个弯，走了一截路，又看见一群人，他们正在等我们。在一些地方，人们煮了大缸的小米。他们不要我们的钱，他们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我们。”^⑪

八路军能够进行顽强的抵抗。1940年5月，日本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八路军“充满着战斗精神”。报告还说：“八路军的大多数(士兵)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不管对一个地区清洗多少遍，共产分子仍然存在”^⑫。

平等精神使八路军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处得很好。史沫特莱写道：

“从地里回来，我见到了一幅我想只能在八路军中见到的情景。一位首长正在街上走着，一位战士……迎面朝他走来，(战士)停下敬礼，首长还了礼，然后两人往回走，一个人的手搂着另一个的肩。他们沿街而行，低着头谈话，显得颇为激动和愉快。”^⑬

由于严酷的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人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的意识。日军的指令说，在人群中找出共产党员的方法，就是在吃饭时去观察：“如果有人愿意把食物让给别人，以及悄悄地拿最差的，一般来说，这人就是共产党员”^⑭。

征兵的原则不是强迫，而是自愿。虽然在征兵时施加了压力，进行了劝说，但强调的是参军光荣。有关某个村子的一份材料谈

到，村里为应征入伍的一个年轻人安排了欢送仪式，“他披挂着一面旗子，坐在装有华丽的鞍辔的骡子上或坐在用鲜花装饰的轿子里。全村的青年小伙和姑娘们敲锣打鼓，吹着笛子把他送出村子”^⑧。在仪式上，许多人都对他的父母讲话，男人们要求为他家耕地，妇女则答应帮他家纺线，民兵保证用地雷保护他的安全^⑨。

老八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的纪律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军队的装备很差。一份日本方面的报告认为：他们的武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的武器都简陋”^⑩。一位中国作者认为这些武器“极其落后”^⑪。同时，以下情景给哈里森·佛尔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背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红樱枪、大刀、短枪、旧式大口径短枪、火药枪、地雷、旧的老式步枪和中国造的冲锋枪……”^⑫没有较新式的武器，是共产党的不利条件。他们不能把日本人从较大的城镇赶走，敌人通常是先用重武器防守，然后击退进攻^⑬。这甚至给切断铁路、攻击敌人的据点等战斗带来了困难^⑭。整个战争期间，武器弹药的供应短缺^⑮。1937年底，史沫特莱访问了八路军115师，发现“几个人有步枪，大多数人没有武器”^⑯。在新的部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据朱德说，100个人中可能只有15—20人有步枪，其他人则用手榴弹来武装^⑰，据说这是部队的主要武器^⑱。

由于几乎不能从苏联得到武器援助^⑲，加之1939—1940年之后国民党又停止了武器供应^⑳，共产党的军队不得不依靠其它武器来源。他们缴获日军和伪军的枪枝（这是主要来源）^㉑，收集由原先驻防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扔下的武器^㉒，征收私人的武器（地主和富农都有较好的装备）^㉓，并且自己制造枪枝弹药。“我们自己制造枪枝弹药，几乎在敌占区的每一地方，手榴弹和地雷都是我们主要的武器”，朱德解释道^㉔。日方的一份材料称游击队的武器“出人意料的好”^㉕。

对中共来说，日军不仅是武器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其它物

品的重要来源。史沫特莱曾目睹八路军俘虏了一整营“身着大衣的日本士兵”^⑧和“300匹马”^⑨。佛尔曼惊讶地看到八路军战士“把形形色色的战利品装上车，其中有自动步枪、大刀、钢盔、电话、战旗、毛毯、大衣、盐、大米、烟和火柴，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几个人挑着若干瓶苏打水和日本米酒。一个人还戴上了一副日本眼镜”^⑩。

对日军的认识

战争初期的一个重要情况，是中共面临着一个生疏的敌人。与国民党相比，日本人有铁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力，进一步说，日军所使用的战术也不同^⑪。在谈到战争初期的扫荡时，薄一波坦率地承认：“我们不了解日军的作战规律”和“建制”^⑫。重庆指挥的部队在日军面前屡遭失败，士气低落。正象一个当事者后来回忆的那样：

“虽然我们从未与日军交过战，但国民党士兵的惊慌失措的逃跑仍能使我们感到恐惧。我说，‘撤退的国民党部队给我们的影响太坏了’”^⑬。

日军的装备也比国民党部队更精良。聂荣臻告诉哈里森·佛尔曼说：“开始，我们同用坦克，大炮，飞机这样强大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作战没有经验”^⑭。另一本共产党的回忆录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攻击的目标是飞机，我们将首次与日军遭遇时，我们感到不安。这一仗我们怎么打？”^⑮

尽管叶剑英1944年6月在对中外记者谈话时，说到中共对于日军的行动、装备以及组织方面的谍报工作“不全都有效”^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谍报工作确实取得了进展。根据日本方面的分析材料，中共的谍报网是有成效的，“相当完整”^⑰。据说八路军对日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军对八路军的行动却“一点也不清楚”^⑱。日方有一份报告对此更是一片赞扬之辞：

“敌人在获取我们的军事、政策情报方面，已经是够细心和热心的

了。对于他们已经得到的精确的情报，有人感到吃惊。情报不仅包括了军队的方位、兵力……而且包括了军队和政府中每一个机构的全体职员以及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复杂情况……”^⑧

日本人的战斗精神

中共逐渐熟悉了日军的作战方法，同时也逐渐掌握了如何与他们作战的方法。但对日军的作战精神，中共却无能为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共产党向日本士兵发出呼吁，要他们停止为长官卖命而代之以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斗争。除了进行宣传，中共丝毫也没有幻想煽动日军哗变。1938年5月，在谈到整个日军时，毛断言：

日军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武器上，而且表现在训练……组织水平……自信……迷信般的信仰……傲慢……看不起中国人民上。……要消除敌人的这些特性，将要一个很长的过程。”^⑨

据说，由于所受教育的原因，日本士兵“盲目地蔑视与憎恨中国人^⑩，他们头脑中被灌输了一种“占领中国、屠杀和剥削中国人”的思想^⑪。众所周知，自从19世纪以来，日本的思想家就轻蔑地看待中国人，认为他们懦弱、腐败，是劣等人种，没有任何尊严^⑫。这种思想也反映在学校的历史教学中^⑬。军队领导层的态度也是如此。1937年，驻华北的日军参谋长酒井龙把中国概括为“一个土匪的世界”，声称中国是“侵扰世界文明的细菌”。一个历史学家曾注意到，这种语言“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中是常见的”^⑭。据中国的史料记载，日本士兵非常“坚强”与“顽固”^⑮，每一仗八路军都“损失颇重”^⑯。

一位中国作家描写了在著名的1938年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怎样包围了日军，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投降，答应不杀死他们，而日军却拒绝投降的情景：

“正相反，他们抓住机会更顽强地向我们反击。他们不逃跑，而是顽固抵抗，战斗至死也不投降”^⑰。

中国人承认：“虽然我们打死打伤了许多敌人，但我们很少抓到俘虏”^④。“日本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当俘虏”^⑤。据朱德说，他们只在受伤以后才投降^⑥。而周恩来告诉J·伯特伦：“他们愿意战斗到最后，哪怕受了伤。”^⑦据报道，日本人甚至在受治疗时也进行反抗，把医务人员杀死^⑧。日本人总是装死，然后跳起来杀害担架兵。朱德和彭德怀告诉史沫特莱说^⑨，共产党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日本士兵具有害怕当俘虏被杀的动机。要劝说一个被俘的日本士兵投降很难。在平型关战役中，已被缴械的日本兵给八路军造成的伤亡，要大于八路军在战斗中的伤亡^⑩。

第四章

从内线防御到人民战争

我们已看到，尽管中共的军队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参加抗日。其基本原因，是没有进行农村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就抗击装备精良的敌人而言，也还没有形成能实实在在地引导人民群众去进行精悍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结构。在这一章，我们将研究从主要依靠正规军作战到进行分散的、地方性的和以群众为基础的游击战的变化。

第一节 “强化治安”

1940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使得日军所致力农村“平定”已无法恢复元气。从1941年起，日军采取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诸方面内容在内的“强化治安”措施。“军事百分之三十、政治百分之七十”和“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日本人的统治已不能单靠军事扩张来实现了^①。

日军为了切断中共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它们无法生存，巩固自己所控制的地区，从1941年5月到1942年底发动了五次大的“强化治安运动”。第一次和第二次运动（1941年3—4月，7—9月），实际上主要是进行准备工作：从事反共宣传和建立形形色色的“自卫团体”。第三次运动（同年11—12月）是直接向中共根据地发动更大的攻势，实行经济封锁，禁止从日占区

向根据地运送某些物品。而中共根据地则实行抢种抢收。最后两次(1942年3--6月, 10--12月)是继续实行经济封锁,对游击区和基本区进一步加强攻势,以夺得粮食。在敌占区,经济建设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为增加粮食和棉花的生产而建立了合作社^②。

1941年7月,日本人为摧毁抗日根据地拟订了一个三年计划。象中共一样,日本人也根据中日双方的控制程度把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对每一种地区都实行隔离政策。三种地区分别称作“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这些称呼,与中共使用的“敌占区”“游击区”“革命根据地”等称呼的实际意义是一致的^③。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治安区”从10%(1941年7月),逐渐发展到70%(到1943年底),使“准治安区”由60%下降20%,使“非治安区”从30%缩减10%^④。

在中共看来,这些战略变化能够说明: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很快地征服华北,而只能一点一点地进行蚕食^⑤。当初,日军首领认为可以迅速地控制中国,例如作战部长杉山曾对天皇说:“中国事件将在一个月内结束。”^⑥在另一场合他还说:“我们将派遣大部队,很快地击溃他们,迅速结束整个事件。”^⑦日军参谋本部也曾表示出令人惊讶的得意神态:“我们认为中国会很快地举起它的双手认输。”^⑧

“治安区”

日军在这种地区的主要做法,是实行“清乡”和加强集体负责的旧保甲制度。10户为1甲,10甲为1保。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行动负有责任。保甲制度的其它方面包括:发放良民证(在进行了人口检查之后),在房子门前贴上住户要注意的详细条款,督办通行证,建立检查点以及组织民团。实行这些措施,目的在于控制村民的行动,防止抗日力量的渗透。

在日本人牢固控制的地区,这种严密的监视确实严重地抑制了中共向乡村渗透的能力。《解放日报》的文章承认,农民害怕日

本人，怀疑党的能力。据日本报道，河北安国县的占领村，从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恢复了旧政权时期的保甲组织作为村政府。30年代早期，国民党在华南也曾使用保甲制度来反对共产党的影响，以图维持乡村的现状，但是不大成功。在“治安区”，伪组织被置于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对有不忠之嫌或者太不称职的人也不时进行清洗。

“准治安区”

在这种地区，日本人是步步推进，建立傀儡组织。这一过程被称作“蚕食”。在日军正式进攻之前，由特务收集中共的情报，秘密组织反对派。然后日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种行动，参加人数要比扫荡少得多。日本人在这种区域里修筑堡垒，通过一系列镇压和恐怖活动——包括制造无人区，建立傀儡政权和伪军，最后这种地区就“被平定”。

日本人最为努力的目标是根绝已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根据1944年统计的数字，为了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日军把“准治安区”划分为若干小块，用1000个据点，30000个碉堡，600公里的石墙，10000公里的壕沟将这些小块围住。日本人还修复了铁路与公路，以便部队使用。这些活动大多在河北进行。冀中平原被分割为2700个部分；在冀南，日军修筑了1103个碉堡和据点，平均每15平方公里一个，碉堡之间距离最近者一般为10里，在一些地方只有二三里。在这些被分割的地区，较大的抗日组织发现他们的机动性受到了限制，彼此不能协调一致地抗日活动^⑩。

“非治安区”

对这些地区，日军所实行的政策是彻底摧毁，造成一种使共产党的根据地再不能恢复的破坏，泯灭人民的抵抗希望。其主要手段是实行“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扫荡”的形式也由短促进攻转变为时间较长的，由大部队参

加的“清乡”；由小股部队作战转变为大量集中优势兵力；从直接进攻转变为步步推进。日军采取了游击战术，潜入到根据地中心地带，实行突然袭击和长期掠劫。为了使自己的优势火力发挥作用，日军不得不在长距离急行军之后立即作战。这些强攻有根多弱点，容易被击退。此外，日军也有补给线被切断、部队受困的危险。1941—1942年，日军的扫荡（176次）和投入的兵力（833900人）比1939—1942年多出两倍^①。

日军对上述三种地区的军事压力是紧密配合的，它犹如一股人造的浪潮，从日军控制地区涌出，在力量被逐步削弱的情况下，一直涌到中共根据地的核心地区。

第二节 与生产相结合

日本人的“强化治安”运动没有达到粉碎中共抗日力量的目的，但对中共在华北扩大其影响是一个严重的阻碍。中国的历史著作承认，“战役取得了相当的成功”^①。1941年12月，《解放日报》编辑部声称，游击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扩大根据地的政策必须放弃，“目前的任务是巩固这些根据地”^②。到1941年中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缩小了六分之一^③，压力加剧了，根据地“经常处于危急状态”^④。到1942年春天，华北解放区已经减少了六分之一，人口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⑤。这年秋天，“许多”根据地已变成游击区。另外，《解放日报》还认为，在平原，“不可能从事正常的基本建设”^⑥。

冀南地区，在1942年的一次大扫荡后，根据地缩小了60%，正规军，党员和党支部只剩下一半^⑦。1940年至1942年5月期间，太行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减少了20%。太岳的局面更严重，没有一个完整的县掌握在中共手中^⑧。至于山东，由于国民党的进攻，挫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上述地区：“基本区缩小了，敌人占领了广大的乡村，战略区被分割成许多块，军队的干部遭受了惨重

的损失。更严重的是，群众组织全部被摧毁。”^⑨

与根据地相反，游击区与敌占区扩大了。据日本人 1942 年 1 月的报道，他们可以在点、线周围 5—10 里的范围内征收土地税、附加税和招募劳工^⑩。

“精兵简政”

如此重大的损失逼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紧缩政策。这个政策意味着减少工作人员与行政机构，削减财政开支。在 1940—1942 年的艰难岁月中，实施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财政节减。在政策执行得好的地方，农民减轻了负担。据测算：1941 年—1942 年，冀南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三分之二，太行、太岳征收公粮的数量在 1941—1943 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⑪。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太行地区在 1942—1943 年期间，粮食税收减少了 16—17%^⑫。在北岳，1941 年，税收占收入的 14.8%，但在 1943 年降到了 10.7%，下一年又降到了 8.9%^⑬。

大量脱产的行政人员和士兵被裁减。在晋察冀，由于脱产人员的百分比从 5.9% 下降到 1.5%，所以，税收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也从 1941 年的 14.9% 下降到 1943 年的 10.07%，又下降到 1944 年的 8.9%^⑭。另一个类似的趋势也值得注意：晋冀鲁豫 1941 年有 4—5% 的脱产人员，到 1945 年下降到了 2%^⑮。薄一波在 1943 年年中作报告时说，在太岳，专职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只占人口的 2.8%^⑯。这恰好符合“精兵简政”的政策——脱产人员不超过 3%。在 3% 这个数目中，按要求，三分之二是军队工作人员，三分之一是政府、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人员^⑰。对于精兵简政的作用，我将分别讨论，这里只说说上级机构——指挥阶层的主要精简情况。有些数字可以表明精简的规模：在太行、北岳和冀中，分别裁减了六万和四万工作人员；在冀南，50% 的军政人员被重新分配工作^⑱。改组下来的人员，大部分被编入了农业劳动大军，一些则被送去培训^⑲。

这个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减少人员，裁减经费。尽管在执行中总是有不正确的理解。但它的另一个目的，是适应战争与社会变化所一致提出的政策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②。

紧缩政策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同样执行。在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和落后地区——通常是指平原和山区，执行的情况就不同。在平原，人民对于战争费用与其它政府费用的负担能力较大，能赡养较多的工作人员^③。

政府机构的精简

政府机构的精简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分阶段进行的。我们从已经获得的详细情况中得知，太行地区的机构精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初起，主要限于采取一般措施，使政策付诸实践。第二阶段：1942年5月日军的进攻，使组织机构的弱点得到暴露，于是大大地强调精简县级以上的机构，加强下级机关的力量。第三阶段：从1943年1月起，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区与村一级的领导工作，使行政机构适应分散的游击战的需要；其结果是，对上级机关实行合并，较大的机关则被裁减^④。与太行山区第一阶段的情况相似，晋察冀的干部在本地区机构精简的头两个阶段中一直埋头于裁减人员的工作。直到第三个阶段，他们的注意力才转到了行政机关的改组与领导的精简上来^⑤。据说，山东为了结束机构重叠的状态，实行了“最大范围的合并”^⑥。

参阅上述情况，在太行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精简总数不少于51%。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在所有机关中进行，在第二、三阶段，边区政府和行政办事机构的数量66%以上，机关工作人员也很快缩减了57%以上。在后两个阶段，下级机关得到了充实，区级机关的人员增加了42%，县级机关的人员增加了3%，而大量的村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变动。正是那些“打杂”的人员被精简掉了，当第三阶段结束时，这些人与干部相比，在行政机关占总人数的50%，在县级机关占40%，在区机关占39%^⑦。

总的说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的政府工作人员被裁减了50%，山东略为少一点。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由548人精简为100人一事，可见政策严格执行之一斑^②。

行政机构的改组带来了大量的重要收获，包括经济上的收获。在晋冀鲁豫，行政开支总额削减了46%^③。另一个好处，是工作效率更高。据报道，一个人能完成原来由三至五^④个人做的工作。最后，它消除了大量的官样文章和日常琐事。边区政府委员会宣布，自1942年3月起的一年之内，边区政府委员会发出的文告减少了68%^⑤。

第三节 军队化整为零

军队的结构

在考察“精兵”的详细内涵之前先描述整个军队最后形成的结构，将使我们容易理解从高度正规化的抵抗向更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游击战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一个由正规军，地区或地方部队、游击队，以及包括民兵与自卫队在内的人民武装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组织^①。人民武装的大发展和三个层次的军事组织的建立是1940年以后的事。尽管据说人民武装组织独立作战或与军队协同作战的起始期是在1941年^②，但实际上它们的巩固是在两年以后^③。

战斗职责的划分如下：

“由于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这个军队很强大，前者用来在任何需要的地区作战，后者则集中防守它们自己所在的地区，配合地方民兵、自卫队打击敌人。”^④

用更确切和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民兵保卫村子，游击队对县和区进行防守，正规部队则在地区间机动作战”^⑤。

一位作者对这个组织结构的重要性进行了解释：

“这种组织结构能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年龄、能力和社会与家庭的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地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种组织很开放，然而这种开放正是为了尽快地发动群众和顺利地建立军队。”^⑥

总的来说，正规军的训练与装备比游击队强，但差别通常不大。如果就武装力量的机制而言，那么，民兵是基础；地方部队是桥梁；地方部队来源于民兵，而经受过锻炼的地方部队又是正规军的源泉^⑦。正象有关材料所证实的那样，民兵“是主力部队的最可靠的后备军”。1944年初一份来自山东滨海地区的报告说，50%以上的志愿兵来自民兵^⑧。人们通常把三位一体比做一个人：正规军是骨头，游击队是肌肉，人民的武装团体构成了肌体^⑨。

八路军的正规军总是处于机动状态，数量也相当少，不能在边区大部分地区防御敌人的破坏、袭击和扫荡。这个责任落到了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团体的肩上^⑩。

战争机器与战争形势的矛盾

抗日战争中的精兵运动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为了发展人民战争^⑪，有关的工作重点从正规军的发展移到了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团体的发展上。正规军只剩下了核心的武装力量，在分散和局部的战争中，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防卫和反击日军的进攻，并尽可能地避免损失^⑫。

党指出，日军的进攻与根据地的创建之间的矛盾是战争机器与战争形势的矛盾，中共面对的问题是，人虽然多，但武装起来的人太少。一方面，根据地的缩小已造成了“鱼大水小”的局面。新兵没有给养，部队的灵活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参加反日军蚕食斗争的人不足^⑬。

解决的办法是削减正规军和脱产的县级以上的地方游击队，以加强县以下的不脱产的地方游击队与民兵的力量。在战争中，地方武装力量应该肩负起较大的任务。向这些组织发放了一些整编剩下的枪枝弹药，它们的士气也因此大增，尤其是在那些经常

进行战斗的乡村。简言之，全神贯注的正规化作战已经让位于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⑭。

发展并较多地依靠民兵和县级以下的游击队，具有一定的好处。其一，除开一些弹药武器外，它们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公积金，从而减轻了农村的经济负担；其二，人民手中有了更多的武器，就能更有力地抗击日本人；其三，强大的群众武装团体能限制日军的行动和破坏，减轻对正规军和县以上游击队的压力^⑮。

军队化整为零的政策并非为大家一致接受。据《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有些同志”认为，应该限制民兵的数量，民兵只应该成为向游击队最终向正规军输送士兵的来源。这篇文章指出，有4%以上的人不从事生产——“战争机器与战争形势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严重的程度”，并责备这些同志：“不赞成发展民兵和减少部队脱离生产的现象”，不赞成化整为零的政策，认为这个政策在1937—1938甚至1940年在某些根据地都是正确的，但在1941—1942年就不再适合了^⑯。要求扩大正规军的类似问题确实存在。有关批评意见指出：工作队员与连队应当增加，但是正规军的兵力不应当增加^⑰。毛写道：“天气变化就必须更换衣服”，由于根据地的收缩，应当“脱下冬装，穿上夏装，以便灵活机动地与敌人战斗”，这是当务之急；“但我们仍旧被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很不适应于战斗”^⑱。

废除重复机构也是精兵的内容之一。在山东，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好”：指挥部从31个减到18个，营部和连部从42个减到22个。问题并不在于单纯地削减部队，而是更好地组织。通过“向下派遣”干部，连队得到了支援，平均每个连队有150人，战斗力增加了两倍多。连队更集中地使用武器，又使火力得到了增强。由于干部不足而导致的各级领导与指挥人员力量薄弱的问题，通过对许多机构的精简，得到了较好的解决^⑲。

分散的群众游击战争

用陶铸的话说，战争应该转变为有广泛基础的战争，应该是“有地方和群众特点的游击战”。因此，“现在一切必须分散”，要放弃过去的“集中一切”和“按部就班”的政策。这意味着减少对上级的依赖，大大地增强地方的主动性，象重新提出的“灵活性”、“地方化”、“群众化”那样。陶要求放弃以前那种“集中一切”和“实现高度正规化”的政策。总体性的游击战需要极大地依靠群众。在军队迅速发展与部队正规化时，显然严重缺乏以前在斗争中建立的那种军民鱼水关系^②。

在几年来深入和广泛的抗日斗争中，人们看到了武工队的出现。武工队的口号是：“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这是一种由30—50岁的具有政治、军事经验的男人组成的有严密组织纪律的突击队，从事军事袭击、宣传与组织等工作^③。尽管作战不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据说，有个队在半年中参加了37次战斗，挫败了敌人15次进攻^④。很明显，在反击日军蚕食的斗争中，武工队是很重要的组织，因为一个地区就有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和一半的游击队员加入这种新型的队伍^⑤。

大量地发展民兵是推动这场群众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著成绩之一是，在1940年民兵几乎翻了一番^⑥。但这并没有达到党所预期的数字。1945年1月，《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批评了某些地区的民兵发展工作，认为其数量与质量都不合格。文章要求：民兵的数量要从200万增加到450万；正规军要调些武器来帮助，而不能象以前那样仅仅是给多余的枪枝，因为事实上正规军仍然不集中，也“不经常”作战，（编制）太大。甚至在战争后期，作战仍是以分散为特征的。据说正规军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地方部队的训练上”^⑦。结果，在1941—1942年日军向根据地施加压力期间，某些地方的武装团体的发展速度减慢。就游击队而言，其自身状况“使他们无法平衡发展”^⑧。总之，

在华北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民兵训练，否则军队在随后几年的迅速补充是不可能实现的。进一步说，民兵自1943年支持游击战以来，已在乡下深深扎下了根。

民兵：组织、作用与成分

在保卫乡村的斗争中，民兵由于能比自卫队容纳更多的成员，接受更多的政治训练^①，所以是人民武装中“最能干”的部分^②。它与正规军和游击队相联系，是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自卫武装^③。它与游击队相联系，使游击战具有群众性。在保卫乡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等战斗中，民兵通常与自卫队联合行动^④。中共的政策，要求民兵占根据地各村人口的4—5%^⑤。可是在1944年，各地民兵的数量平均只占人口总数的3%或略高一点^⑥。

民兵又进一步分成青年先锋队，（队员年龄16—23岁）和模范支队（队员年龄24—35岁）。民兵与自卫队（队员年龄16—55岁）、妇女自卫队（队员年龄16—55岁）一起编入村支队。自卫队与妇女队是民兵的附属组织。然而民兵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参加自卫队则是带有强制性的^⑦。

青年先锋队值得特别注意。战争初期，日本的研究者在河北安国县收集了详细的数据，从中发现这些队员几乎没有土地，来自最贫苦的农民。正是这个群众组织为党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是军队志愿兵的源泉^⑧。1942年《解放日报》曾报道：在巩固的根据地，90%的青年参加了先锋队。另一方面，在一些稳定的地区，先锋队成员发展受到了限制^⑨。在一些地区，起核心作用的民兵秘密组织也已形成。这是一些由3—5人组成的小组，极其类似于专门执行战斗计划的游击队^⑩。

民兵被称之为“不脱产的常备军”^⑪，它的任务是将生产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情况以及民兵的具体生产职责将在其它章节中讨论，这里只就民兵的军事职责进行研究。由于目标是使“民兵成为战斗堡垒”^⑫，所以党要求民兵执行大量的任务：与

正规军协作、独立作战，骚扰日军，搜捕和清除汉奸、特务，收集情报，站岗放哨，迷惑敌人，组织群众进行战争，传递消息，运送伤员，侦察，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人民疏散，收藏粮食、财产，埋地雷，等等。

在统一的指挥下分散作战，是民兵作战的指导原则。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摧毁公路，保护秋收时，它才集中行动^④。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配合并不总是顺利的。民兵常因不能随时得到战斗通知而受损失。由于怀疑民兵的战斗力，正规军有时认为训练民兵不值得^⑤。

为了进一步使民兵充满战斗力，一场当英雄的运动发动起来了。英雄通常由群众选出，被授予象神枪手、爆破能手、侦察英雄一类的光荣称号^⑥。据说，在有英雄的地方，民兵的积极性更高，战斗决心更大^⑦。作为群众的带头人，这些英雄对村民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人民非常尊重他们，而他们的重要作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民兵组织方面似乎已得到了证实^⑧。

战时日本的研究人员收集的有关河北民兵的统计材料表明，大量的民兵以及干部是贫农^⑨。在民兵的党支部中，他们也明显地占有优势。重要的是，正是党员和“突出”人物才能领到较好的武器。据说已证实，民兵确实一直在与日军作战，保卫人民的利益^⑩。要锻造出一个强大的民兵组织，党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党员在民兵中占有一定比例^⑪。日本的一份报告说，由贫农担任领导是支援民兵建设的“重要因素”^⑫。

由民兵的成份所决定，解决基本的衣食问题成为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地方武装防御部队的关键。于是开展了一场“爱护民兵”的运动。在晋西北，当民兵战士在农忙季节作战时，他们的土地由其他农民代为耕种。在有婚丧等大量传统性的花费时，村民给予他们资助。为了帮助贫穷的民兵家属，还要求地主“借”出粮和种子并协助耕种。如果民兵战士必须到其它地区作战，整个村子的人都对他们的家庭和财产承担责任^⑬。

第五章

1941—1945年：调整和群众的权力

抗战中期的危机的克服，以及尔后武装组织与区域的恢复和扩大，是非常细心地制定和坚决实行更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主要的经济负担，正如过去已出现过的情况那样，不仅转移到一部分富人头上，而且全部由他们承担。这就增强了在头几年已明显出现的中农化倾向。在此期间，地主被迫服从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在边区建设过程中，他们被迫让步和被利用。如果没有群众和广大农民的坚决参与，这些根本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变阶级间的权力关系，需由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己起来进行社会变革。只有经历这一过程，他们才能获得为防止旧秩序的恢复所必要的坚定的阶级觉悟。邓发解释说：

“我们有些人总抱怨人民群众‘落后’，总想通过行政命令走捷径。我们赶紧把这种人调开，因为持久的变化不是来自上面，而是要靠人民的行动。一个领导可以发布大量漂亮的、重要的规定，心想他能走在任何人前头，但是，所有他要做的只是自己向前走，过后，事情又恢复老样子。如果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组织独自前进的话，那么，他们前进一步就是一步。即使敌人能用残暴的武力消除人民得到的成果，也不能摧掉人们的记忆，一有机会，他们又会重新开始。”^①

除了更有组织的税收办法和恢复元气的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和贯彻之外，大生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劳动合作，也说明了农村的社会变革从前半期临时的、部分性质的变化，向后来几年中有计划的变革的过渡。他们扩大了生产，而没有生产，经济就无法

维持，军事力量的扩充就不能着手进行，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这些运动调整了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增加产量，使农民不再依赖地主，把他们从地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宏大的群众活动与军事战术的紧密结合是成功的。这是战争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战斗和生产必须密不可分地有组织地结合起来，这样后者才能得到保护和发展，战争的努力才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1943年代议政体的形成，贫农和中农至上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一节 党和群众的活动与斗争

党的领导

在边区根据地中，党在指导各项政策的实行方面的决定作用，我们已经提到。没有党的全面的领导，战争后半期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党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在自己影响下的地区建立自己的领导。博古在汉口告诉斯诺：

“我们必须时时处处为领导权而斗争……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一个不能领导的政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①

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和人民大众参加政权，“是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原则。”^②杨尚昆断言，党的领导是决定性的：

“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必要的，这将保证我们永往直前。”^③

杨还确切无疑地补充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④根据地的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分不开的^⑤。作为必然的结果，党理清了自己的事务，实行了对军队、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领导。这涉及到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各个领

域^⑥。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指示才能在每个组织的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⑦。

强调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当战争进入1941年时，日本人的大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打击。保持上下级之间的联系变得“极端困难”。在一定的地区内统一和集中党的领导，促进了各种组织在活动中的配合，改进了合作。

《解放日报》指出，另外的因素也决定了党对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要给予特别的注意。由于三三制的实现（见第五章第九节），政府机构中党员的人数减少了，“然而，党的领导责任变得更重要了”。（正如1940年5月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写的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的指示所强调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人在政权机关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占三分之一席位的党员必须才能出众。在没有更多代表的情况下，这将足以保障党的领导。”）^⑧另外，如果要在符合边区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解决阶级冲突，彻底贯彻党的政策是绝对必须的^⑨。

1942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抗日根据地统一党的领导》的决定（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译注），最有力、最清楚地阐明了党要在边区行使最高权力的主张。它肯定了各级党委（在农村最基层是支部）是“最高领导机关”，指出要由各级党委来统一党、政、军、群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要与党配合，先前建立的机构都必须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否则取消^⑩。毫无疑问，由于抗战初期军事活动的迅速扩展，许多机构严重受到军队的影响^⑪。此后军事工作的从属关系得到了强调：“将来，正规部队必须执行各级政府党委的决定和决议”^⑫。罗瑞卿在文章中认为，在1942年，党对军队的领导仍然是不够巩固的^⑬。杨尚昆坚决认为，党对政府、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必须坚持，这包括“原则、政策和总的方针的领导”，而并不是去“到处干涉或者垄断一切事务”^⑭。党、政

区别应当保留^⑬。在这种职能分工被破坏的地方，“一些党的领导机关在大多数时间里做着政府工作”，例如安排选举计划等等。《解放日报》指出，党的机关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以致没有时间调查政治问题^⑭。坚持党的领导而又不包办一切事务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党对群众组织的关系^⑮。一份早期的文件表明了党是如何在群众组织中发挥作用的：“这些组织必须由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党员领导，由他们发动群众运动，向群众宣传，使群众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斗”。^⑯

在各级党委监督各级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同时，大多数非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职务也是由党员担任。一位作家把这称之为“双层挤压”^⑰。在地方性的政府和群众组织中，也不难找到由党员占居领导职位的例子。例如，在河北安国县1个村政府的8名成员中，有4人是党员，其中既有村长，也有副村长^⑱。显而易见，党、政、军、群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述1942年9月的决定，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

“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⑲

为建立党委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试图克服分散和协同配合相对不够的状态，以便在日本人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面前加强急需的团结。除此之外，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发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运动，来加强人民群众与党、政、群组织和军队的紧密联系。结果，每一方都保证自己要支持其它各方，并就以往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举行了节日庆祝会，互致问候并交换了礼物。由于根据地的重新恢复和猛烈发展，物资严重紧张，这一期间的上述工作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一系列运动确实增强了以团结为目的的重要观念^⑳。

1941—1942年，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显得格外必要。同时，党也意识到地方的创造精神也不应抑制。必须有“一种独立的创

造精神和一种灵活的总体上的统一领导”^②。确实，战争形势特殊，而且交通困难、地区不同，如果硬性强求统一，既行不通，也不合乎需要。

有限度地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是必要的。为保证党处于统帅地位和指导地方一级的事务，党的领导就不只是一个认真检查非党组织的全体人员及其工作的问题^③。有效的领导要依靠党员结合群众的能力来实现。林枫说，党没有操纵“地方政府或者任何形式的群众组织，武装的或生产的”。他解释说：

“党的影响，要通过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得到人民信任，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通过给予实际指导来实现。地方党组织的成员，必须参加民兵和换工队。他们不是要向上级党的机关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广大的战士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他们有能力这样做，那么，他们对党对人民都是无用的……”^④

组 织

自延安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的组织有7个层次。它们是：中央分局，地区分局，省委和特区党委，地区党委，县委，区委，支部与小组。党章规定，在区和区以上，各委员会所直接选举的更高一级的机构，都有待于相应的上级批准。六大中央分局的领导职务都是委任的。这六大分局遍及中国北部、中部和东南部。负责华北敌后的是1938年以后在西安设立的北方局，由刘少奇、彭真、杨尚昆和薄一波负责领导。华北各地区分局的成立是稍后的事：晋察冀分局成立于1939年，由聂荣臻领导；山东分局成立于1940年，由朱瑞、罗荣桓领导；晋绥分局成立于1941年，由关向应、林枫领导；晋冀鲁豫分局成立于1945年，由邓小平等人领导^⑤。

党支部

在等级上，处于“最基层、最低层的党支部，直接促进和领导

了农村的结构变革^⑳。通过支部，党的组织就与群众直接联系起来^㉑。在农村的斗争中，党支部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罗瑞卿把这种作用比作推动马车前进的两个轮子^㉒。党的一份关于怎样“深入群众”的文件阐述道：

“党支部必须把做群众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活动，每个支部必须成为每个村镇群众的核心，也要成为宣传者、组织者，一切群众运动和斗争的领导者。”^㉓

党支部工作的重要性不能任意夸大。只是在那些有效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决定和指示，使社会变革和权力关系方面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的乡村，才建立起了广大群众的最高权威，驱逐了旧的统治势力。

日本方面的一份情报列举了成为一名党员需要具备的四项条件：是勇敢的抵抗战士和革命者，贫农和中农出身，年轻，有能力^㉔。除上述最后一条外，其余条件都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了。根据日本人截获的一份共产党文件，搜寻那些可能是支部成员的人的最好办法，是观察人们在变革农村的斗争中的举动，例如，在反对腐败的村领导或处理难办的租佃关系争端中的行动，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包括除奸活动^㉕。在冀南，60%的党员是贫农；30%的党员是中农。大约一半以上的人能看书，平均年龄约30岁^㉖。日本人对河北安国县的两个支部的详细调查，证实了这些标准^㉗。五人桥镇党支部，在1942年5月日本人向该村进攻时被摧毁。在被摧毁之前，这个支部有13名党员，其中：9人是贫农，4人是中农；8人在30岁或30岁以下，没有1人超过39岁；6人没上过学，其余的人上过初小，多为3—4年。1943年7月，来自西北马村的数字略有不同。这个村党支部的16名成员中：9人是贫农，7人是中农；6人在30岁以下，6人在30—40岁之间，有4人超过40岁；受教育的程度明显高于五人桥镇党支部的成员，1人上过高小，2人上过初小，11人上过识字班，只有2人登记没受过教育。如果中农成分相当巩固，那

么党支部的贫农特征有时就会被压下去。冀西有个村子，党支部成员中不少于 18 人是贫农，另外 7 人是长工，2 人是手工业劳动者，只有 1 人是中农^⑧。

在通常情况下，贫农和中农控制着党支部。但也有例外，如在战争初期或党的影响弱的地方，为了阻止变革政策的执行和挖墙脚^⑨，地主和富农有时占据了支部书记的职位。十里铺党支部的成员就是这种“混合性质”的，甚至还有亲日分子混入。这严重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到 1941 年——该支部建立后第 3 周年，减租减息仍然未能有组织地进行，这与相距不过 3—4.5 公里的其它各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是到新支部建立起来，清除“旧”成分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不久之后，政府行政机关也建立起来，并部署了选举工作^⑩。

这个例子说明了党支部在农村秩序变革中的核心作用。支部成员的条件，必须是相当严格的，要与松散的群众组织相区别。但由于每个村的人口构成的情况变化很大^⑪，无法确定其中哪部分人是党员，这很可能使估计的数字与事实出入较大。根据日本人的 1 份报告，冀南曲周县的 1 个村，其人口的 5% 是支部成员，其它村则在 3—4% 左右^⑫。不管比例占多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必须懂得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全民族的一小部分……”^⑬这无异于在提出警告。毛认为，党员不能切断与那些不在组织内的人的联系：

“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⑭。

共产党如果不广泛发动广大群众，要进行一场广泛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革了。“只团结全党同志，我们不能打败敌人，只有团结全国人民，我们才能打败敌人。”^⑮党支部首先要负责动员农村的一切人力物力。在斗争中

领导群众的先决条件，是党必须深入群众。否则，党的政策、宣言就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③。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为党内的“一种历史传统”，已深深扎根于党组织之中^④。在此后的5年中，党明显成长起来了，但是毛仍然说，“一些党员”没有积极与那些将要和能够响应党的号召的人发展合作关系，而是“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关在门外”。他还说：

“宗派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阻碍党的路线的实行……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合作，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标就一定不能达到”^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克服其它危害党的严重缺点，1942年发动了重要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开始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也涉及了军队和政府的整风运动，是在日本人发动多次攻势后的抗战中期，共产党进行的重建工作的组成部分，但是整风运动最伟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对党自身的影响。

整风运动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41年中期，但是，它真正大规模的展开，则是在当年冬天和下年春天，特别是在毛泽东作了报告之后。在这同时，运动扩展了范围，不仅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而且也包括那些担任较低领导职务的干部^⑥。整风的最初目标，据战后中国公布的材料，是解决高中级领导机关中的有关问题^⑦。然而，在晋冀鲁豫，运动深入到支部，与减租减息斗争结合起来，导致了党的阶级成分的调整^⑧。

运动中公布了学习文件。这些学习文件反映出了毛泽东的强有力的影响。22篇文章，有7篇出自毛泽东之手，另外，六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决定，虽然没有毛的署名，但大概也是他写的。

那些从苏联归来的奉行莫斯科路线的学生——这些人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更加熟悉——让了位，显然从名单上被排除了。毛的文章明显地强调了中国的具体问题。事实上，在最初的18篇文件中，只有两篇是俄国人写的，后来才又增加了4篇苏联人写的东西^⑤。

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们每天学两小时文件^⑥。但是在敌后，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很少，因为经常打仗，局势不稳——社会的、军事的。党的影响相对薄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整风不那么彻底，并且是临时的。对于那些分散在各地致力于游击战争的大多数军队干部来说，情况更是如此^⑦。

资产阶级的影响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诫人们：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⑧

党在战争的头几年迅猛发展，结果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猛增到1940年的80万，各种非社会主义的影响、意识也积聚起来。事实证明，1939—1940年的整风，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五节中所看到的，作为清洁剂已不敷应用。大量农民涌入党内，他们缺乏党的基本知识；还有大量学生，非无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进入党内；甚至农村富农也进入党内。他们没有受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训练，接受的是从中国传统观念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这样，党就不能不进行擦拭和清扫工作。否则，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将被瓦解。毛在1939年10月——即精简刚刚开始，第一次整风开始的前夕写的东西，直到1941年仍有针对性：

“在组织上，党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虽然党发展了许多新党员，然而，许多新的组织还没有巩固。

新党员同老党员和新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特别是新党员）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方的暗害分子”^④。

新成员的入党动机和目的五花八门，刘少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或是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为了抗日；或是为了逃避捐税，寻找食物、口粮供应；或是受朋友和亲戚影响；或是为了分配土地；或是出于其它原因^⑤。1940年，罗瑞卿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还谈到了过去三年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和机会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加入党内的问题^⑥。想成为党员的还有一些想从内部颠覆党的人。这是农村富人保护自己地位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党员持有与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性质相悖的观点，主要包括“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态度”，“独立性”，“无中心主义”等^⑦。就党的多数新成员而论，具体哪一个人持有哪一种观点，取决于他是农民小生产者还是城市知识分子。党声称，特别有害的倾向是“自由主义”，即拒绝思想斗争和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它损害了党的战斗性、力量和效率；

“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⑧

虽然1940年以后党员人数的增长趋势引人注目地下降了，但纯洁党的问题依然存在。1945年春，党员的登记人数达到121万。这时，毛泽东写道：“1937年以前入党的人员中，只有几万人留了下来”，其他人都是后来入党的，毛认为：

“他们入党的动机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或者是不一致的，一部分1937年以前入党的人也是这样。这就形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和

巨大的困难”^⑧。

统一战线的环境有助于这种同党的指导思想和有关规定相背离的倾向发展。党的宣传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因强调民族团结而放松了对“自由主义”和其它不良倾向的警惕。

干部类别和分歧

在谈到党和军队干部中的不团结现象时，刘少奇引证了许多事例。工农出身的干部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的社会出身，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则自恃于受过更多的教育。老干部自恃革命经历长和经验丰富，在年轻干部面前自以为是，而年轻干部则认为自己聪明能干，看不起老干部^⑨。军队干部认为，他们的军事技术比地方干部的业务更为重要，而地方干部则认为自己更有经验。打了胜仗的部队中干部看不起其它单位的干部。不同部门的干部取得不同成绩时，成绩大些的干部常常有优越感^⑩。

刘少奇在引证时说，这种不团结主要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是革命过程中工作的特点、历史和地区不同引起的”^⑪。我们的干部，在革命工作的某些方面受过训练，但对其它方面就很不熟悉。有些干部容易夸大自己的能力，却看不到别的干部在工作中的长处。

统一的目标

到1941年，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支不和谐的队伍。一方面，党员数量的猛烈增长，意味着成分不纯和令人担忧的思想不纯的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党内宗派主义的各种现象，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效率。1941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如果允许这些（与党的精神相反的）倾向发展，那就会毁掉党的统一的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的纪律，就会导致派别活动、宗派斗争和

公开的反党，也就会给党和革命带来极大损失”^②。

发动整风运动，就是为了克服这些危机。整风运动预定要形成一种统一的思想状态，这将保证分布于华北各地的当地干部领会党的指示和纲领的内容与意义，并能够认真贯彻。由于交通不便和被强敌所包围，为数众多的大大小的根据地和堡垒相互之间联系很困难，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山头主义。有一种“组织小团体的倾向”和优先照顾当地利益、不顾全局利益的倾向^③。注意遵循一种共同思想，是达到协调一致的最好、最实用的手段。思想改造的目的在于加强党的内聚力：“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④。党的最高层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大大加强了地位。然而，整风运动并不是一次清洗运动^⑤。毛这样描述整风运动的方针：“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⑥

具体应用

整风期间，薄一波告诉杰克·贝尔登：

“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成长为成年。（整风）教育党员要客观，反对阴暗面和无知，整风教育了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敢于赢得胜利吗？”^⑦

通过学习文件和小组讨论，干部们在应付农村变革的复杂环境和抗战等方面，明显地成熟起来。他们更加了解社会现实，树立了勇敢面对巨大困难的信念。

确实，学习文件的目的是，在于造成党的进一步统一，观点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并不是要把党搞成一个高度僵化的党，也不是要单纯的理论训练。它和干部工作的现实条件直接地联系起来，使他们理解这些条件并找到改变这些条件的途径。这是事关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要素之一。毛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来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⑧，“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寻找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方法”^⑨。这是合乎逻辑的。毛老早就十分强调，要使马列著作适用于中国的条件，“需要一种确定的民族形式”^⑩。整风运动把这一过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薄一波也指出：

“（整风）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方针，没有必要重走苏联的老路”^⑪。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运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抛弃教条主义和具有创造性。毛在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用以下方式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象登上茅山的道士所学到的征服魔鬼的鬼魂的教义那样有什么神秘之处。马列主义并没有漂亮的外衣，也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只是完全有用。”^⑫

整风使干部们认识到，由于华北敌后各地区之间条件不同，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时，必须考虑到自己地区的特点。正象在贯彻党的政策的过程中，机动灵活性十分重要一样，在流动、分散的游击区，独立判断问题的能力也特别重要。虽然整风运动确实对解决这些问题很有帮助，但是僵化的工作方法，“简单地阅读文件”的情况，“理论化的”知识分子与那些“从事实践的”工农活动分子之间的裂痕，还是存在的^⑬。

群众路线

大概整风运动获得的最持久的成功是群众路线的制定：人民和领导之间的牢固联系和动员农民中的巨大潜力，以推动农村的社会变革和抗日运动的方法。虽然群众路线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并不是抗日战争这几年的实验结果。它可以更早地追溯到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实验，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动员群众的方法上取得质的突破，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群众路线的精华，在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起草的重要决定中，得到了最简炼的说明^⑭。

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被归纳为一个公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意思是：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工作，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⑮

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在群众的自发性与党的领导之间造就一种辩证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使二者在紧张和各自独立的状态中保持经常的联系。实行群众路线是为了克服干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官僚主义的态度，避免群众的自发性——这种纯粹的自发性，使群众对有关问题不能正确理解，也找不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经验证明，成功地贯彻党的政策，有待于“在运动过程中，在每一个具体单位”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这一小组由那一单位的少数积极分子和行政领导组成，作为该单位的核心”……“这一领导小组，要与群众紧密打成一片，参加群众运动”。群众可以划分为三类，“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中间状态者为数最多。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领导骨干是在斗争中形成的，随着斗争的发展，骨干也会变动。这样，可以使更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去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加强领导骨干与群众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些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始终健全的领导骨干。”

第二节 统一累进税

就调整阶级关系而言，在从最初的临时性措施向更系统的方法的过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税收政策。与原先确定的合理负担税收的简单办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1年开始实行的统一累进税要复杂的多。在税率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地区性差别，但在统一税收制度方面，差别程度则不太大。

计 算

根据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发布的税收规定，可耕土地的计算单位叫做“标准亩”。每亩的年平均产量是10石。财产收入的计算单位叫做“富力”。如果地租低于产量的20%，一个富力相当于8石谷子（就佃耕者而言——译注）；或者就来自地租和农业的收入来说，相当于10石谷子（就土地出租者和自耕农而言——译注）；或者相当于7.5石谷子的其它收入（就非农业人口而言——译注）。耕种者可以从总产量中扣除25%用于自己消费，余下部分用来计算富力。富力与税款的折合挂钩，它在当时被划分为16个等级。第1级不超过二分之一富力，第16级是81个以至更多的富力。议定的计算方法是把富力换算成分，这是决定应付税款的单位。根据这一计算单位，第1级在比率上计算为0.8分，第2级为0.85分，以此类推，第16级计算为2.1分^①。

由于时间、地点的变动，要对每一分的精确价值得出1个一般性结论是困难的。在那些农业收成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每一分所支付的税款就少。据中国的有关材料说，每分的税额呈下降趋势：1941年为1.5石谷子，1942年为1.25石，1943年为0.9石，1944年为0.83石^②。迈克尔·林赛提供的每分的税额的情况略有不同：1941年为1.2—1.3石谷子，1.5元或等值的牲畜饲料（原文如此——译者）；1942年为1.326—1.8石。

1943年为0.93石，1944年和1945年为0.85石^③。

尽管晋察冀在贯彻税收政策方面远远先进于其它地区，但是，正象所宣传的那样，这一政策的贯彻并不限于晋察冀边区^④。例如1942年10月，晋绥分局就发表了1份关于税收的准备工作的工作报告^⑤。尽管有拖延和变动，但是看来，这项税收政策在其它边区的实行，与在晋察冀边区的实行基本上是同时的^⑥。

税收负荷的相对承担

在总的税收水平线上，存在着明显的变化形式，与此相对应，税收也经历了3个阶段：削减、巩固和扩大。在战争初期和最后几年，有些偏高，在歉收的1941年——1942年期间，税收负担增长了。下列数字可以说明这种变动。

1938-1945年晋察冀北岳区粮食税收表^⑦

巩 固 地 区			巩固的游击地区	
年份	个人税 (谷子:斤)	税收占登记年产量 的百分比(%)	个人税 (谷子:斤)	指数 %
1938	21.1	6.27	10.8	41.75
1939	23.9	7.12	12.0	46.71
1940	32.6	9.71	17.0	65.82
1941	50.3	14.98	25.8	100.00
1942	45.8	13.62	25.2	97.89
1943	33.8	10.07	21.8	84.55
1944	29.9	8.90	20.2	78.29
1945			32.0	124.00

1941-1945 年晋绥边区粮食税收表^⑧

年 份	粮食税总量(担)	税收占收入的百分比(%)
1941	204 403	24.60
1942	163 200	17.40
1943	219 500	19.61
1944	205 600	19.35
1945	324 500	21.00

在晋冀鲁豫边区,税收上下波动的程度也大体相同:曾由1942年占每人平均总收入的16.9%,降到随后的10.5%。而在1944年又上升到12.5%^⑨。与合理负担政策相比,这种税收政策以更具计划性、合法性的方式,把公共开支从农民群众头上转移到了地主、富农头上。然而,由战争的特定条件决定,政府在财政上有巨大的需要,所以农民交税的数量不可能显著减少。不过,在新税制下,农民的收入确实比战前要多。邓发解释说:

“当人民为了免遭奴役而需要每一分钱的劳动成果时,农业和工业的劳动时间是不能减少的。但是,劳动成果的重新分配,却是以穷人得到的越来越多,富人得到的越来越少的方式来进行的。”^⑩

除最贫困的人外,虽然没人能逃脱或多或少的税收负担,但是,在“钱多多出,钱少少出”^⑪的累进税原则下,税收的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富人承担了。事实上,虽然规定了所得税的最高限额是30—35%,^⑫但是下列统计数字充分说明,地主纳税是经常超过这个限额的。

1940—1945年晋绥边区五个村庄所得税税率统计表(%)^⑭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地主	22	30	26.9	48.6	39.9	40.6
富农	12	30	24.9	33.9	32.7	33.2
中农	8	27	18.8	20.2	20.3	18.2
贫农	1	13	10.9	8.02	7.97	10.66

所得税税率表(%)^⑮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 1943年	山东根据地 1943—1945年	晋冀鲁豫边区 1943年
地主	33.5	35—50	25—40
富农	16.75	28—30	15—25
中农	8.04	15—18	8—15
贫农	5.41	6—8	3—8

1944年太行区的一次调查表明，地主缴纳所得税的税率是30—50%，富农是20—30%，中农是10—20%，贫农是3—8%^⑯。该区的另一份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

1944年，北岳区的最高税收率是：地主52%，富农18%，中农10%，贫农4—5%^⑰。按照这一税率，1945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更清楚地体现了统一累进的税收政策的阶级性。

这些数字与战前地主只缴纳大约10%的土地税的情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⑱。

1942—1944年太行区所得税税率统计表(%)^⑧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地主	47.4	45	39.4
富农	27.7	20.2	19.24
中农	13.58	11.47	11.11
贫农	5.5	3.93	4.63

免税率

与合理负担税相衔接的统一累进税，通过其免税率的实行，向人们展现出所有最贫困的人是如何决定性的改变了自己的境况的画面，影响了35—50%的村民。1941—1942年，党强烈主张把纳税的百分比降到20%^⑨。后来在1949年，中国的有关文件宣称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⑩。

宋劭文在1941年4月指出，为了建设晋察冀边区，把税收扩大到边区人口的80%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到军队需要大规模充实和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宋声称，这是合理负担税、减租减息等政策实施的结果）^⑪，这样做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可行的。

然而，免税率的实行，在这一地区与那一地区必然会不平衡，特别是在贯彻统一累进税的初期阶段。1941年2月，《晋察冀日报》发表的关于冀西几县情况的详细调查报告，表明了这一点。阜平县的部分地区，只有16%的人纳税，而平山县的一些地方，纳税者却占人口的94%。在冀西其它地区，完税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7%，28%，35%，44%，48%，50%，52%，69%，70%，75%，81%，和90%^⑫。由于经济的发展和

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多的人交了税。1945年,十里铺纳税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是90%^②。据有关记载,这个比率大约与1944年太行区7个县的比率相等(80%, 80.19%, 88.5%, 90.95%, 91.33%, 91.7%和94.95%)^③。由此看来,免税率是建立在农民能否交得起税的基础上的^④。尽管经济发展了,但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与土地的占有和集中程度不同(如土地占有的分散,地主数量的减少和村民中交税人口的增多等),因此,免税率的明显的地区差别仍然存在^⑤。

实 行

把这一复杂的税制付诸实践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小规模,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占有程度的不同,以及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使计算和调查工作变得非常艰巨。况且战争也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大量货币被人藏匿了起来,使收集基本数据的工作更加困难。不仅如此,还有与敌勾结的人和“其他反共分子”的破坏活动,例如散布在调查期间将重新分配上地的谣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许多富人不进行合作^⑥。当年的一位观察家特别提到:“新税制的采用,是一个很大的政绩,因为它包含了对各地区所有农业用地的估价和在填写财产登记表方面给予人们的许多帮助。”^⑦

由于政府机构在相当广阔的敌后地区已建立起来,人民群众也更好地组织了起来,因此,征税是统一的,它建立在比合理负担税更牢固的基础之上。这使人们更容易揭露地主隐藏自己真实财产的企图,更容易对地主的财产重新进行调查分类。地主再也不能象战前实行田赋制时那样自由地控制税收机构了^⑧。

但是,地主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一累进税的负担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逃税或偷税。因此,富人偷税漏税的现象并未消除,尽管征税范围肯定缩小了,富人完全交得起税。地主企图逃避交税的手段之一,是让别人借耕一块土地,条件是收取一

笔现金借款。借地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时期内对借来的土地拥有支配权；在协议因期满而中止时，土地所有者归还借款，收回土地。克鲁克斯夫妇写道，这种行动是普遍的 and 合法的：

“那些极需要准备点现钱以救家庭燃眉之急的穷人，是不会采取这种行动的。社会上最富的成员才会这么干，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把土地占有量降低到能够应付统一累进税的程度以下。”

这种策略也用于出租土地。此外，地主分散土地占有权的另一种办法，是把土地划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地主还运用各种证据确凿的非法手段，企图逃避沉重的税收负担，如伪造土地证件，以“显示某些土地已经抵押、出租、出卖或已交出去了”。有些时候，由于担心土地被夺回，在威胁之下，佃户被迫与地主签订这类契约。克鲁克斯夫妇讲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叫李峰的富农，在统一累进税即将实施的情况下，向佃户施加压力，要求签订土地抵押契约。由于这类契约意味着提出抵押的一方在抵押期内已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因此，李峰逃脱了全部税收，但他继续象往常一样收租。佃户们亦屈服于地主的压力，不得不签订这类契约，他们担心将来什么时候国民党会回来，他们的担心一再受到富人的挑动。其它偷税漏税的办法是，富人让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因为军人家庭在税收和其它待遇方面得到特别的优待^⑧。

地主和富农设法减轻对自己不利的过重的税收负担。由过高的赋税和各种杂税的取消以及合理负担税收和统一累进税政策的实行所引起的基本变革，虽然过程曲折，但不会停止。1941年日本人的一份情报报告指出，与合理负担税收政策相比，统一累进税政策更加一致，它增加了阶级性和促进了税制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增强了有生气的抗日力量，使贫农和中农的力量大大地得到了加强^⑨。

第三节 减租减息

迟来的发展

虽然共产党的战时土地政策的原則早在 1937 年夏天就已公布，但是，直到 1942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的著名决定才规定了具体细则。推迟公布一项更全面的政纲，使减租减息相对放慢了前进步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以其明确的措词清楚地说明：

“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地认真地彻底地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点，或者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或者虽已由政府发布了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上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必须认识到，公布宣传口号和法令，与实际实行之间是常有差距的。”^①

大约同时，《解放日报》一篇关于减租减息的内容详细的文章断定：“并不是每一个抗日根据地都广泛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未开始。”^② 文章充分列举的事实，打消了人们的怀疑，使他们不致认为这是过分悲观的估计。据 1941 年 8 月杨秀峰的报告，当时冀南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地方不到三分之一。1940 年 10 月来自冀中西部地区唐县、宛县、阜平、曲阳、望都和定县的统计数字，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在总共 1982 个村庄中，只有 601 个村庄实行了减租，911 个村减了息。鲁西的情况更为严重，据调查，到 1941 年 5 月，在某地区的总共 8000 个村庄中，只有 626 个村庄实行了减租，228 个村庄实行了减息。然而在鲁南地区，这项工作要先进一些。沂蒙地区的减租，在 1940 年已扩展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县。一般而言，山东的减租减息运动在 1940 年就开始了。正象 1942 年党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所抱怨的那样，减租减息在形式上的开始，并不必然决定它在实践中的落实。例如在鲁东南，减租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但是（1940 年 5

月)有一篇文章提到:“然而,许多人仍旧没有听说过此事。”^③

虽然减租减息运动在1942年大大恢复了元气,但是,这并不能立即见效。晋察冀边区1943年的有关指示说:“这项政策仍旧不可能广泛地实行”,它仅在北岳和冀中的部分地区取得了成效。一般说来,减租减息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整个来说,在边区,由于事实上地主“公开归还给佃农的那部分地租又由佃农偷偷送还地主”,因此高地租还是普遍存在的^④。

由于集中致力于军事任务,减租减息就容易局限在“宣传口号上”^⑤。正如1942年1月的决定所指出的:由于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⑥,“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了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⑦,这延缓和阻碍了1942年之前运动的发展。在以后几年中,地主威胁佃农说:如果要求减租减息,就将收回土地。这也特别延缓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一直到战争结束,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是明显的,虽然程度减弱了。1945年2月,《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许多地方仍然必须重新搞减租减息^⑧。在落后于其它地区的山东,情况尤其如此。黎玉1945年1月在一次劳动英雄群众大会上发言时,认为已经取得的成果“不够伟大”,并批评了那些“仍然没有认识到贯彻这项政策是一项根本任务”的干部^⑨。

尽管困难阻碍了减租减息任务的完成,但从1943年到1944年,减租减息仍然日益发展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1944年春,运动波及太行的绝大多数地区,并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⑩。在晋冀鲁豫的中心区,1943—194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检查减租减息的实施情况^⑪。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都受到了这项政策的影响。据战后中国公布的材料,实际上,在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三分之二的解放区或者至少在解放区的一半人口——5000万人中,实施了这项政策^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动员和组织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进行范围如此广泛的变革——减租减息,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成就^⑬。

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减租减息意味着什么。

减租的范围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质，是在承认土地所有权和租佃权的前提下，减轻而不是完全废除“封建剥削”。这项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地租减少25%，并且在实施中不得超过总产量的37.5%；利息的最高限额则固定在10—15%之间^⑭。

党的政策在总体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在减租的具体程度的问题上，这一点也是明显的。37.5%的数字是“地租的最高标准”，25%的数字是“减租的一般方法”^⑮。可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根据情况来调整减租工作。作为实行的准则，如果在减租25%之后，地租仍然超过总收成的37.5%，那就要进一步减租，直到符合上述数字为止。如果减过的地租已低于总收成的37.5%，那就不再变动^⑯。

决定地租水准时，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损失的产量将不计算在内。根据损失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地租水准时，如果收成低于常年标准的50%，就要规定一个较低的比率（如果超过常年标准的60%，规定仍然适用）^⑰。在庄稼全部被毁的地方，地租一概免交^⑱。还考虑到了土地的肥力状况。^⑲在一分区，“薄地”的地租是“30%甚至更低”，与此相比，“好地”的地租是“37.5%”^⑳。地主是否为佃户提供耕畜、农具、肥料、种子等，也是影响地租确切数量的一个因素^㉑。即使佃农改良了土地质量，较高的地租也不允许^㉒。毛指出，佃户可以保留收成的60—70%，“但不能再多”^㉓。可是，地主总是企图暗中破坏党的政策，只要佃户在要求减租方面稍有犹豫，双方的私人协议就得不到承认，只好被迫实行法令^㉔。

由于减租政策的贯彻普遍不平衡，更由于减租的比率是根据土地质量、产量和上面提到的其它因素来决定的，所以，减租的程度带有明显的波动性。据报道，至战争结束，晋察冀边区的地租

总体上比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一^②。在北岳区，减租工作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到1944年减少到只占总产量的20—25%^③。在晋西北，正如1942年4月《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所宣称的，运动发展健康，在经过调查过的所有地方，地租从原来占总产量的40—52%减少到30%以下^④。晋冀鲁豫根据地提供了更全面的数字。对黎城（太行区）30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平均地租从35.7%减到了16.52%；对平顺县40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平均地租从57.69%降到了25.24%^⑤。在太行区的涉县，减租的比率是根据每亩的具体产量规定的，详情见下表^⑥。

(%)

	每亩不到2斗	超过3斗	5斗以上	9斗以上	1担2斗以上	1担6斗以上	2担以上
1942年	25		30		35	37.5	
1943年	25	27.5	30	32.5	35	37.5	40
1944年	10	14	16	20	23	25	27

1945年7月，《解放日报》提供了黎城的一个更低的地租比率数：地租占总产量的13.3%^⑦。就十里铺来说，第一次减租的最大限度是减到占总产量的30%，尔后，边区政府发出指示时，又减到了22.5%^⑧。

在头几年里，地租在收成中占的份额，对众多农民来说是很小的。尽管一般来说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是到1942年初，运动在一些地区还是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头。在晋冀豫地区，减租之后，地租的最高比率是37.5%（战前为72%），平均地租为33%（战前为54%），最低为30%（战前为40%）^⑨。

降低利息率

战前时期，农民在借钱时几乎完全受有钱人和地主控制。年

初青黄不接，农民急需用钱度过难关，以待下季来临时，地主和有钱人便利用自己对债款的独占，趁机抬高利息。这是害人的利息。农民常因在规定的短时期内还不起债款，而把土地作为担保物抵押给债权人。这种现象，有效地加强了中国土地占有的集中程度。由于战争和许多富人逃往南方，资金缺乏的现象比以前更加严重，使利息进一步提高到月息为20—30%的水平^⑳。

为了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有必要严格地规定一种农民能够承受得起的合理的利息率和提供各种贷款，以实质性的减轻以至于取消地主——债权人对农民的束缚。此后，年息率在晋察冀降到了10%，晋冀鲁豫降到了15%^㉑。这些利息率，主要应用于对战前契约所规定的债款的利息计算，虽然一般来说在抗战期间也有效，但对1937年以后的借款采取了一种更灵活的办法，特别是把地方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在内了^㉒。人们发现，规定一个太低的利息率，实际上会使那些有钱借出的人感到沮丧。党注意到，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对农民来说事情变得难办了^㉓。当然重新作了调整，但是，直到1944年彭真的报告还说，得到借款“仍然困难”^㉔。关于战前的债务，农民得到了保证：如果利息累积超过了借款，就只归还借款数额^㉕。借款不足的问题，也通过由合作社和银行延长无息或低息借款的办法来解决。

禁止附加税

农民过去在经济上深受其苦的各种附加税和勒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提供猪肉、酒和其它东西(杂租)；付给地主家管理人员小租；佃户通过签订契约借稻米，到秋后按增加50%—100%的数量归还；一年中佃户要在地主家无偿劳动一些时候，这一般包括春季往田间运肥料，秋季打谷收粮（在平顺县，甚至佃户全家为地主挑水），碰上红白喜事，佃户还要无偿帮忙(送工或零工)。所有这些捐税徭役，后来都被禁止并被作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经纪人各种形式的剥削也被禁止^㉖。而且从此以后

地主就没有在收获之前收租的合法权力了，也没有在订契约时向佃户索要保证金的合法权力了，甚至穷人借钱时利息也不能再由地主说了算^⑩。

虽然各地对这些活动的禁止并不完全带有强迫性，但是这些活动的实际被禁止，在经济上对地主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打击，加强了农民的自信心。简言之，在超出了名称本身含义的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减租减息约束或剥夺了农村富人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发财致富的权力和力量。

保证租佃权

在减租的实施过程中，保证租佃权是至关重要的。对地主的重新收回土地的威胁，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以保护佃户的减租要求，或者使他们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把土地转让给其他佃户。北岳区由于没有恰当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招致了严重后果。在那里，许多农民为抗议未能实现这些权力而退出了农会。据报道，他们“刺激了”其他农民，使他们进行生产的努力受到严重破坏^⑪。

只要佃户按约交租，又不造成土地损耗，那么，在契约期满之前收回土地就是非法的^⑫。契约中止后，虽然地主有权重新出租或出卖土地（或者按规定另行处理），但这种权利也被严格限制了。战争期间，对佃户的生活条件必须加以考虑。一旦收回土地会危害他们的生计，那就只有一部分土地可由地主收回或者重新签订契约^⑬。另一方面，如果土地占有者需要这些土地来维持生计，并且确实能亲自耕种，他们也可以收回这些土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有时被地主用来作为报复佃户的减租要求的借口。这些，地主是否有权收回土地，要视对双方生活水平的影响而定。当佃户和地主都坚持他们对土地的权力时，就由农会作出裁决^⑭。事情很明白，佃户一定是得益的一方。因为他们的可怜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几乎不能与未必急需一块土地耕种的地主

相比。而且，也不能指望主要由更穷的农民组成和控制的农会，能以对佃户不利的方式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那些没有详细规定租期的地方，保障租佃权是最急需的，因为佃户会随时被剥夺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生产遇到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来年将被迫脱离土地的佃农，是不会用心管理土地，对它投入多少本钱的^④。不过这与那些有租期的地方的情况并不非完全不同，因为租期通常都规定得太短。不规定一个较长的租期，符合地主的利益，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佃户施加更大的压力。为了给佃户提供一些保障和鼓励他们增进土地的肥力，一般来说，必须规定至少三到五年的租期^⑤。有些土地是在永久性的基础上出租的，这进一步增强了契约关系^⑥。

佃户可以得到附加好处。在契约期满时，佃户可以优先（在与别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租种或购买土地，以防止被地主控制^⑦。

为了保证不失去耕种土地的权力，大大增强了佃户对地主的权力，排斥或严格制约了后者的专横活动。地主不得不承认，他们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统治农民了；地主无力把佃户从他们租佃的土地上赶走，这是改变农村权力关系的一个征兆。

地区变化

在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的过程中，执行的规定是很灵活的，并且不断强调要十分注意特殊的条件^⑧。1942年1月党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由于各根据地之间、甚至一个根据地内部条件不同，任何人不可能始终一贯地执行一套单一的具体方法，解决土地问题。”^⑨

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心地区，实行一贯的、强有力的政策是可能的，而游击区因受军事因素的影响，情况就明显不同。在那里，局势的不稳定使运动更具临时性并且计划不周，但即使取得

的成果较小，其意义也不容低估。游击区的减租是小规模的，然而却是相当有价值的。一般来说，减租25%的规定适用于中心（或巩固）地区，而游击区大约减了10—20%。干部们经常提醒人们，减租比率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意味着可以大于或小于原定的比例范围^⑤。实际上，37.5%的地租最大限额，不一定非要坚持^⑥。

对游击区采取特别谨慎的方法，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共产党还没有牢固地确立统治地位，无法促进运动发展。第二，有必要尽可能广泛地保持统一战线。由于地主、富农大量通敌的危险逐步增大，这些地方的减租不能象边区的中心地带那样以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第三，全神贯注于军事任务和军事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就难得有时间和物力来进行减租减息这类重要工作^⑦。在此背景下，党的指示相对降低了游击区减租工作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

“在游击区，必须更加强调团结对敌。当务之急是动员人民与敌人的抢粮活动和与对人民的剥削行为作斗争，而减租则降到了次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强调与敌人战斗就不进行减租工作，也是不对的。”^⑧

在游击区，不仅对减租的要求降低了，而且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来对待那些剥削佃农的人。不得不劝告富人间接地降低地租。因此，党的指示认为群众大会不用召开，而应由干部“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讨论和进行劝说”^⑨。总之，齐武注意到，当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参与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后，党就开始探索减轻封建剥削的合适的良机^⑩。

在新收复的地区，通常必须优先考虑清算汉奸的问题；如果此项工作认真落实了，随后就是二五减租^⑪。

被自然灾害严重毁坏地区，要全力以赴地进行恢复工作，减租减息的落实只好暂停^⑫。

阶 段

减租减息运动“不仅”包括减轻剥削，它在程度和范围上要复杂和广泛得多；要有效地实施这项政策，必须同时进行其它斗争（如反对“内奸”、“恶霸”和“腐败”）^⑨。同样，正象当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项工作是有长期的和艰苦的^⑩。1944年，彭真把它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⑪。

第一阶段，政府和群众组织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一般来说，地主拒绝按规定去做，只是有时候，在被强迫的情况下，才同意减租减息。佃户自然喜欢这项政策，但是，在地主扬言进行报复的严重威胁面前，他们不敢积极坚持他们新得到的权利。

形成群众集体力量的优势，这是第二阶段中克服地主的阻碍和确立党的坚强领导的努力得以基本成功的先决条件。企图主要依赖上面来贯彻党的政策的问题不再存在；运动在群众积极行动的基础上，从下面开始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农民成功地起而向地主的反抗进行挑战。这是一种根本的变化，因为佃户不再暗自缴纳已经减掉的地租，并要求废除日益累积起来的庞大的债务。地主直接对抗这一政策已毫无意义，甚至会自我毁灭，因为党和群众现在指挥着一切。地主转而雇用凶手和搞秘密勾结，同时又试图以主动提供帮助、让他们的女儿主动与穷人结婚和口头答应支持村民的利益等手法安抚穷人。

在地主被剥夺了统治者的权势后，第三阶段，巩固的阶段就开始了。由于现在阶级斗争受到了控制——因地主已处于从属地位，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党把强调的重点转到了利用地主方面（我们对此已有明确说明，见第一章第六节：B）。

彭真描述的三个阶段，广义地说，是与战争期间发生的社会结构变革相一致的。起初，地主直接反对改组工作，之后，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巩固了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取代了农村富人原有的权力。在十里铺，农民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实现党

的政策。因而，在这一进程中，克鲁克斯夫妇写道：“人民一步一步取得了主动权，因为正是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支柱”^②。即使在比其它边区遇到了更多困难的山东，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也导致了基本的经济、政治变化，“推翻了”农村旧的权力关系^③。

农民为政策的真正实施而进行的积极而又坚决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地主破坏政策的活动

地主坚持反对减租减息政策的行动清楚表明，前进历程中充满激烈的阶级斗争。

尽管说是“互利”，地主看到的却是减租减息偏重于对佃户有利。几乎不能指望地主会默认对他们的经济权力基础的损害。在共产党牢牢扎根的地区，地主凭借种种偷偷摸摸的手段，试图使党的政策无效。显而易见，地主首先通过“明减暗不减”（后来叫做“形减实不减”）的广泛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1944—1945年冬，太行区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检查地租问题，结果发现形式上减租的现象广泛存在。根据对108个村庄的调查，在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各种形式的非法活动中（包括所有没有得逞的活动），属于形减实不减问题的大约占25%（在4807例中占1080例）。而在另外72个村庄的（2042个）例子中，这类问题不少于40%^④。对太行根据地在减租减息方面取得了进展的15个县的152个村庄的另一次调查表明，在1944年间，60%的租佃问题属于形减实不减的问题。这份文件以更具体的数字更清楚地反映了形减实不减对政策实行的影响及其与地主反抗的程度的联系。事实上，到1944年发动群众运动，检查政策落实情况时，高地租并未取消。平顺县的部分地区，只有13%的佃耕地的地租低于37.5%，有80%的出租土地的地租在40—80%之间波动，还有6.8%的出租土地的地租甚至超过80%。在相当多的县，“人们可以发现，比率达60%的地租为数不少”^⑤。形式上减少地租

的问题，在北岳和冀中也明显普遍存在^⑳。

农民在形式上减租的问题上，以这样的规模屈服于地主的压力，不是没有道理的。地主巩固与农民的这种“合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向佃户进行威胁：如果坚持要搞真正的减租，就收回土地。甚至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这种威胁还继续妨碍着所有解放区的减租工作^㉑。在反对地主重新占有土地的问题上，如果缺乏公道而坚决的保证——即合法和强大的组织支持，那么，佃户在要求减租之前自然会瞻前顾后。由于担心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佃户不得不被迫玩弄形减实不减的把戏^㉒。由于地主非常可能收回土地，干部们对要求减租也很犹豫。有两位村长承认，由于对重新收回土地的问题心神不安，他们在促进减租方面落后了^㉓。

这些担心，明显地与各种各样的消息有关。这些消息说，地主要收回已出租的土地，特别是好地^㉔。在上面提到的太行根据地的 4807 例违法土地案件中，有 1562 例与地主重新收回土地有关；这种违法活动，大约与上述经过检查的 72 个村的情况略有不同，后者重新收回土地的案件占违法土地案件总数的 26%^㉕。已提到的对太行区的第二次调查表明，这类案件占全部土地案件数的 30%^㉖。许多地主甚至在租期结束之前就收回了土地，这中间，虽然有些地主是为了维持生计才这么做，但大多数地主通常是为了报复^㉗。

向佃户施加压力使之屈服于形式上的减租，并不是地主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办法。为了维持现状，他们企图控制农村的行政机构，并为此采用了一系列手段：雇用自己圈子中的人（在阳城是副村长和治安人员）监视村长；对积极分子进行威胁和收买；揭露村长的受贿，使之丧失名誉，并设法使自己圈子中的人被选上这个职位^㉘。

地主改变契约形式的目的，在于反对减租减息运动。地主通常改变永久租佃权——按永佃权的规定，只要佃农按约交租，佃户就可以有权继续耕种土地；另外，地主还把固定的契约改为临

时协议，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收回土地。特别是1943年以后，许多地主（主要是晋察冀的）利用了1940年签订的契约已经到期的事实。他们看到了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租佃关系来加强自身地位的机会^②。根据前面曾引证的太行区的调查情况来判断，这类问题略微不同于形减实不减和重新收回土地的问题：后两类问题在2042例案件中分别占40%和26%，而改变租佃形式的只占8%，不签契约的只占12%^③。上面曾提到的对同一地区（15个县）的另一次调查仍然证实，租佃契约的修改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加之地主要佃户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交税，使得这类案件占到全部非法租佃案件总数的20.42%。所以，修改租佃契约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事，它使农民丧失永佃权，使他们为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而不得不支付劳役地租或为地主干打水、劈柴之类的杂役。这类事情相当普遍，在上述调查中，它们占比例数的24%^④。

在共产党的巩固地区，地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间接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办法来搞破坏。但如果其中某个地方象游击区那样出现了共产党的控制不稳固的情况，许多地主就会毫不犹豫地公开破坏租佃契约^⑤。就是在同意遵守法令时，地主也时常希望国民党回来，或者希望事情“越来越糟”，由日本人来接管，恢复旧的地租与利息率^⑥。

实施和群众的斗争

地主反抗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农民运动的动员相比较来说显得不够。这就使许多地主能够从事各种阴谋和敲诈勒索活动。一旦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坚强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以保卫他们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力，保卫根据地，那就能铲除和减少地主所抱有的日本人、国民党将要恢复旧统治的希望，使他们不得不与乡村政权当局采取更合作的态度。

尽管党的公开出版物经常提到地主对保证其财产权表示感激，他们后来心甘情愿地按规定减了租息，但这似乎并不是他们内心的意愿。对遵守法令作出许诺，是各阶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⑧的一个结果。简言之，后来退还了地租的地主确实承认：“我们收回土地是错误的”。但这与其说是真正接受了党的政策的一种表现，不如说是用以劝导其他地主照办的一种孤立现象^⑨。日本的研究人员在战争初期宣称，在山西和顺县，干部告诉贫农减租减息政策的经济好处和它与抗战的关系。当党得到了贫农的支持时，富农就“没话可说，完全被群众的力量吓服了”^⑩。但这在那时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可能是对富农的屈服的夸大。然而，后来几年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富人活动的余地被不断限制，对他们非法活动的检查也越来越严了。

由于地主出自习惯本能地反对减租减息，以及由于要树立起农民的集体权威，才能使地主屈从于变化了的情况，所以，只有经过长期斗争，党的政策才能取得成效。展开减租斗争和落实政策的过程具有高度紧张的特征。在十里铺，“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已达到极限，但一般说来，情况还没有严重到使统一战线破裂的程度^⑪。对减租减息工作不断的监督和检查，也包含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因为这需要一定程度的群众动员来制止地主持续不断的逃避法律制裁的企图^⑫。用一句话描述，这无疑过分夸大，但绝不是没有真实性，齐武把减租减息描写为“一场千百万农民站立起来要求解放的伟大运动，一场震撼世界的革命”^⑬。

《解放日报》的社论强调指出，农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必要性并且坚持照法律行事，才有希望保住减租减息的成果、粉碎任何暗中破坏的阴谋^⑭。晋察冀分局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说明：

“干部必须使群众理解，减租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然而，只有依靠群众自己的斗争，政策才能付诸实现……只有通过斗争，群众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实现他们的(目标)利益”^⑮。

换言之，认为减租是党和政府的恩赐（或是群众组织与个人的恩赐）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正好是一些干部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⑧。事实上，他们不懂得发动群众起来行动的基本目的，而是“包办代替”。这样做的结果，大大阻碍了减租工作的进程：党的各项政策和政府的各项指示，没有得到广泛宣传，群众不能运用法律，因而容易受地主的欺骗；由于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联合起来解决问题的巨大力量；如果干部在场，似乎按政策办了，但一旦干部离开，减了的地租又送了回去，一切仍然照旧^⑨。

《解放日报》通过描述冀南涉县的两种具体情况，试图说明在减租工作中，由干部包办一切和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的不同做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⑩。作为前者（指干部包办代替——译注）的一个例证，报纸列举了一个老村干部张金晶指导减租工作的情况。张没有认真摸清农民的意图，对他那老爷式的询问，农民起初没有反应。只是到他大声训斥时，人们才勉强作了回答。更糟糕的是，张对农民的愿望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他领导减租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去反对不让步的地主。在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张草率地找来一些农民，“漫不经心”地搞了一下。之后不久，工作就结束了。在此情况下，即使那些受到高地租剥削的农民，几乎也对党的政策缺乏热情，或者认为这只是干部们关心的事。另外，张还不是唯一采用专横手段的人。别的干部也有“我为你们减租，我为群众提供帮助”一类的看法。

县干部会议考查和批评了张金晶的工作，并在工作中采取了灵活的可以选择的方法。干部们认识到，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农民必须大量介入。开头，把那些不敢大胆说话的“诚实农民”作为工作对象。那些遭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最多的人，是最先组织起来的对象。一个叫姜肖杰的人，生活地位特别低下，他讲述了地主统治的残酷。在姜的建议下，组织起了一个小组来保持联系和讨论穷人的苦难：“我们要想一想，怎样摆脱压迫和剥削。”之后，儿

户佃户组织起来，带头成立了佃农农会。单有农会的存在，还不足以向地主挑战。在张的负责下，农会耐心宣传政策，认真进行了动员工作。在看到佃农协会真正在为佃农做好事，农民加强了对农会的支持，并积极投入了减租运动。

单靠行政命令，既不能使农民朝气蓬勃地行动起来，也不能实现减租^⑧。“包办一切”也同样被指责为损害了农民协会^⑨。不充分发挥无数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减租减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被动消极的农民充其量只能取得一种形式上的减租。此外，因为党的机构的扩展不太普遍，党甚至难以只是粗略地规定一个法定的减租量。

群众的积极性必须由坚强的组织形式来保障。干部对农民指示说：“只有组织起来，你们才真正有力量。”^⑩涉县的干部向农民指出，在运动于1942年发起之后的一年，地主仍然违法收回土地。没有联合起来，佃户就缺少挫败地主阴谋的力量^⑪。1945年2月，《解放日报》的社论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能组织起群众（不只是形式上），鼓励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⑫

指导运动的是党支部，动员农民和领导他们进行减租减息斗争的基层工作，则由农会遵照党和政府的指示与法律来负责^⑬。

农民的态度

组织农民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是一个有进有退的长期过程。地主以进行报复来要挟，不许农民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威胁农民，要他们屈从于旧的地主权力当局^⑭。克鲁克斯夫妇对这种传统性的对地主的敬重，提供了极其生动的例证：

“甚至到战争后期（1944年？），一些农民在地主在场的情况下，仍然有些不安。在第一次会议上，一些佃农蹲在人群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恭敬地给正被人们议论的地主让座。开头，地主的能言善辩和专注的神态经常占上风，一次座谈会后，农民有时会抱怨，他们从会议中没

有得到什么值得为它花费时间的东西。”^⑧

邓发在与爱泼斯坦谈话时，进一步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

“开始(促进减租和提高待遇时)，他们(即群众)时常害怕去做我们建议他们做的事。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各种军队来了又走，标语贴了又被雨水冲掉，但地主却始终存在。农民时常是在会上通过了减租规定，事后又去大户人家私下保证他们将仍象过去那样交租。有时，与地主签订了新型契约，却并不要求履行，封建的恐惧传统不可能一天就消除。”^⑨

农民由于受到地主的剥削和苛刻对待，怀有强烈的反对地主的情绪。但是，要想把这种情绪发展成为强烈的和有效用的争取减租减息的斗争热情，必须改变他们的意识。问题是要变农民的“奴隶思想”为“我们是主人”的态度^⑩。为了改变农民的屈从态度，必须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强化他们反抗地主的思想。这通常包括让农民讲述自己遭受的残酷剥削和蒙受的耻辱。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认识到，他们低下的地位并非不可改变，他们并非必然要受苦，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对此提出挑战^⑪。在党支部管理的冬季夜校里，十里铺的贫雇农相互交流过去受地主剥削的经历，这被称之为“挖苦根”。1位贫农认为，“地主赖以生活的每一点东西，都是榨取我们农民的血汗”^⑫。还通过把农民与富人的生活条件进行比较，来提高阶级觉悟。太行区的1个地方，向人们展示了3户地主怎样通过收取高地租、高利息使农民死亡和受苦的情况^⑬。

农民为实践党的政策而进行斗争，并不都是思想改造的结果，这也是农民的阶级本能的体现。最明显的例子是1939年末和1940年初的所谓极左错误。那时几乎还没有为执行党的规定进行什么工作。事实上，1939年11月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批评了先前“只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做法。决定还补充道：

“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在经济

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④。

地主已及时利用了先前对他们有利的形势^⑤。

国民党在向共产党地区进犯（按共产党的说法叫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表现出的残酷行为，使农民变得进一步激进起来^⑥。彭真 1944 年在一个报告中声称，这期间，一些地方的农民拒绝交租交息。他警告说，这是对统一战线的一种损害。他承认坚持让佃户按党的政策交租，已使得“一些”农民和党员“不满意”。农民说：“为什么党变得越来越右了？”用彭真的话说，一些党员也认为“这一规定（减租后必须交纳地租）是不正确的”。同样，农民也“肯定不再”偿还债务^⑦。在一些地区，农民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还包括超出减租减息范围的其它问题，这就导致了某些“混乱”。过于紧张的阶级关系，使农村的统一战线面临着破裂的危险^⑧。

农村中如此根深蒂固的敬畏富人的思想方式，不是容易改变的。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短短 8 年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着实令人吃惊。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孤立的和偶然出现的。大多数人起来要求减租，并为此而顽强战斗。除了已引证的例子外，北岳区在从 1942 年秋开始的 1 年时间内，至少有 1 万起租佃争端。而“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由地主增加地租或收回已出租的土地引起的^⑨。

促进生产

1942 年 1 月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已提到——，强调减租减息是为了促进农民建设边区和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见第二章第二节），前者具有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随着战争进入最后几年，人们看到运动加剧了：发动了群众性的生产活动，加强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展活动。有效的经济变革与成功的群众动员的关系一再得到证实^⑩。这种在各条战线上的全面出击，需要抗战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即农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在实质上减轻了剥削的减租减息，为此作出了伟大贡献^⑪。

虽然直到战争的相当后期，运动也没有全面进入高潮，但是，运动对提高生产的影响却很早就显示出来了。1941年春耕运动的规划中，人们注意到，尽管农业生产不平衡，但是“在减租减息工作彻底落实的地区内，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民群众普遍参加了生产，劳力非常充足……”^④随着运动现出猛烈的势头，它对生产的影响也显而易见。1945年1月，毛说：“我已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得到一些证据，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减租之后，农民在生产中获得了更大利益，愿意组织互助组。”^⑤

1944年末至1945年期间，在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恢复了元气的减租减息运动怎样对生产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在晋绥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巨大”提高^⑥；在太行，生产积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⑦。人们注意到，在山东滨海区，影响稍微小一些^⑧。反之，在减租减息政策没有成功落实的地区，据说要发起大生产运动是十分困难或不可能的^⑨。运动也促进了互助组的建立。在晋冀鲁豫，1944年在减租减息运动之后，路家口村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互助组，另外一个在此之前一直没有互助组的兴台化子屯，有91.55%的劳力参加了互助组^⑩。

针对这种情况，上述1942年1月的决定断言：虽说其它办法也能促进生产，但是实行减租减息“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⑪。看来，对于那些地租偏高而执行政策又过分简单的地区来说，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例如在晋绥区，废除旧的债务和发起土地恢复运动，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⑫。齐武精确地把这一政策描述为提高农业产量的“预备前提条件”^⑬。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使地主的兴趣部分地或全部地转移到了生产上来^⑭。

总之，通过实行党的经济政策，贯彻减租减息，提高了贫穷阶级的地位。太行区1943年的调查表明，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35%的雇农和手工业工人上升到了中农水平，47%的贫

农也上升到中农水平，14%的中农达到了富农水平^②。但由于各种经济政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很难说这种变化只是减租减息的结果。

恢复抗战元气

减租减息使农民更愿意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和为共产党组织的抗战服务。地租负担在实质上的减轻，给了农民愿为之而战斗的利益，这是不足为奇的。1944年林枫告诉一位西方记者：“为使农民在战争中得到好处，我们削减了地主收租的数额”^③。

一方面，这项政策激励了人们的士气，增强了人们的抗日决心^④。另一方面，它鼓舞着人们直接参加战争。用杨秀峰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减租，我们促使农民参加了战斗……”^⑤减租减息有助于参军运动^⑥。退还地租具有相同的效力。人们更愿意当兵，在一些村庄，人们向民兵送枪枝弹药，为民兵做新衣服^⑦。

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与他们为保卫祖国而效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经常被用来迫使富人让步。任弼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斯特朗说：“军队的宣传人员向人们解释，除非减轻人民的负担，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抗战，而如果日本人取胜，每个人都将遭罪”^⑧。

动员、组织和觉悟

在那些土地租佃关系广泛存在的地区，对于减租减息运动在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变革农村权力结构方面的作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⑨。

但减租减息仍具有多种含意。党的一份文件宣布：“减租减息工作的成功，动员了农民，使他们热情地参加选举和政治活动，并支持农村政权。”^⑩运动为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作出了巨大贡献^⑪。1942年以前，在落实党的政策方面，进展相对不够，群众活动消极，影响了他们参加建立新的政治结构和推翻富

人在农村的统治的斗争。1942年之后，恢复了元气的运动，是建设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⑧。一部关于战后至1949年的中国问题的著作甚至断言：“如果这种情况（即政策落实得不够的情况）没有改变，那么，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保持就是不可想象的。”^⑨

总之，减租减息绝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⑩。

第四节 土地政策的转变和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暴力没收土地政策的停止

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这在战时和战后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官方材料中都被描述成一种“让步”——甚至是一种“主要的”让步^①。这样一种政策的转变，被证明是建立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遭受日本全面侵略的新时期的基础上的。正如毛在1941年初所阐明的：“党的现行政策不是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策”^②。党现在面临的任任务，毛继续说，“是团结所有那些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③。民族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停止向地主开战是不可避免的。凯丰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值得详细引用：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这是因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体中国人民都面临着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问题是，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更重要。这样，为了团结全体人民抗日救国，公布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④。

党教育农民说，随着统一战线时期的到来，农民不应再“把自己局限于直接的、狭隘的利益上”，而应同“民族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党的土地政策已发生了根本变化^⑤。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而实行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的政策转变，其目的在于争取地主加入抗战阵营，使他们为抗战做出贡献^⑥。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叫作争取和利用地主。因为继续实行直接剥夺政策，必将使地主整个地与敌人勾结起来。再说，这种政策的转变，也使日本人在“绥靖”中国农村时失去了地主的帮助。1944年年中，毛在向新闻记者根瑟·斯坦因解释党的土地政策改变的原因时说：“没收土地的政策将把地主赶入另一个阵营。农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减租使地主能够存在下去，又有助于孤立日本人。”^⑦

杨秀峰在与贝尔登谈话时，也证实了这一目的：“通过拒绝满足农民直接分配土地的要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防止了同地主和富农的疏远。”^⑧

关于放弃没收的政策，党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现时，土地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⑨，所能完成的任务只是“限制”地主剥削^⑩或者“调整”佃户与地主的关系^⑪。正如刘澜涛在北岳区党委会议上的报告所指出的，“现在还不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在当前，应该采取过渡和革命改良主义的办法”^⑫。这是对共产党的战时政策非常恰当的描述，因为已经导致的农村结构的变化，为共产党人铺平了将来通向土地革命的道路。

虽然时常宣传土地革命的结束，但是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党降低了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热情^⑬。党不得不“放弃暴力没收办法转向恰当的新办法”^⑭。这些新办法实行的效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生活痛苦，也动摇了旧的统治秩序。在这种意义上说，选用这种灵活政策——较之于暴力没收政策来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

处理土地问题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关于保证财产权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承诺是有限度的。尤其是那些被认为“罪大恶极的汉奸”，将失去占有土地

的权力。由于许多地主属于这一类别以及划分的条件模棱两可，所以对这种限制条件的重要性不能低估。另一方面，对“反共分子、顽固分子和伪军士兵”来说，只要他们重新回来，土地还将归还他们。在他们归来之前，土地临时由政府管理。党推论说，由于许多中国人被迫为日本人做事，所以我们应当以示宽大（但仍称他们为“汉奸”），鼓励他们悔悟和争取他们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所有在“反对日本人”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的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保证不被没收^⑮。这包括逃出共产党地区的地主，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土地仍归还他们^⑯。然而，据邓发的说法，这只适用于那些经证明没有与日寇积极勾结——如担任某种汉奸职务——的逃亡地主。邓发说：“如果地主确实为敌人工作，按照没收汉奸财产法，我们将通过法律程序没收他们的财产。”^⑰确实，党呼吁逃亡地主回来，但不是指那些与敌勾结的地主，而是呼吁那些只是由于害怕共产党而逃亡的地主回来^⑱。

解决土地问题时，如何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另外，还有几种类型的土地要处理。一种是所谓黑地。列为黑地，是因为没有按规定向上面报告和逃避交税。这种情况已有很长历史，战争期间黑地又有增加。党主要依靠群众和村干部调查黑地的存在，如果实际占有黑地者交纳了所有拖欠的税款，黑地将不没收。由于黑地大量存在，只要发现了其中一部分，就足以为政府带来一笔实际上是额外的收益^⑲。

其它各种类型的土地或者由政府直接支配，或者由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包括庙宇土地、氏族土地、社会用地、墓地和学校用地。这些类型的土地，总起来说用于社会，特别是由那些急需土地的贫农利用。然而，由于有些类型的土地与旧的传统习惯有直接关系，太突然的变化不可能不遇到公众的对抗，党不得不“非常谨慎地、非常小心地对待农民的习惯。过去的错误告诉我们，强制和鲁莽是不行的”^⑳。由于敌人一直企图在共产党地区挑拨离间，因此，特别尊重群众的习惯无

疑是必要的。

分散地主(富农)的土地

在肯定耕作土地的租佃权的同时，党指出：将“不改变旧的土地关系”^②，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外，土地占有制不作改变^②。确实，《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宣称：“这种改变只会引起社会动乱”^③。如果把这类声明看作是共产党放弃一般的土地革命——对地主土地的总体上的再分配——那它们是在准确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如果把这理解为是以几乎没有变动或以很少变动土地所有制的办法来冻结战前土地关系，则是不妥当的。因为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虽然无法衡量全部效果，但从能够得到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确实导致了相当大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实质性的土地占有权的再分配。这种相对平均地占有土地的倾向，一方面起因于直接地、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这明显破坏了统一战线的规定，另一方面起因于以更间接的、与党的规定抵触较少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土地的做法。

在处理这些地主以及一小部分富农的土地的过程中，土地逐步集中到了穷苦农民手中。这些农民或者成为土地的占有者，或者从负责管理土地的政府手中以很少的地租租种到土地。而后者常常也类似于实际占有。这就是由缩小农村等级差别和使土地转到耕种土地的农民手中这两项激进措施所导致的中农化倾向。简言之，最穷的农民的地位上升了，而地主和富农的地位下降了。除佃农外，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还有士兵家庭和难民。后者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破坏而弃家逃亡出来的，他们非常渴望得到耕地。H·汉森在河北发现，难民得到了“免税的土地和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到第一个收获季节到来”。据报道，到1938年5月，4万多农民得到了这种援助^④。

没收办法对土地所有制形式产生的影响远远小于间接的方式，因为没收的做法被大量地限制在战争头几年。1944年，毛接

见G·斯坦因时，谈到了“战争初期一些地方没收土地的某些经历”^⑤。1938年8月，“五台山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人”告诉乔治·泰勒：“政府控制的大约10—20%的土地已被拿来重新分配了”^⑥。邓发在对I·爱泼斯坦的谈话中，强烈暗示了对地主土地的没收^⑦。这些情况得到了日本情报部门的证实。尽管夸大了事实，1938年11月日方的一份报告还是值得注意的，根据这个报告，从（1938年？）6月开始，共产党就“迅速”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倾向”。这不仅意味着没收土地和进行土地再分配，而且意味着在从冀北平原到冀东地区的范围内平均分配粮食^⑧。1944年，日本政府的一份分析共产党政策的冗长报告声称，共产党在宣布实现新的民主（1940）以前，就“经常地”在根据地，甚至在游击区内没收土地和富人的其它财产^⑨。

夺取土地的现象，在战争后期也没有完全消失。1944年，在关于晋察冀土地政策的报告中，彭真抱怨那些破坏党的不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的做法，告诫当地负责党的宣传和计划工作的机关要成为当前运动的具体指导者，因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开始变为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⑩。正如彭从另一面对问题加以评论时所指出的：党没有以赞成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做法，这些做法具有事实上的土地革命的特征。党已经宣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适宜的。除了地方党的机关的责任以外，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也是佃户向恶霸地主报仇的结果。这种方式的土地再分配，基本上是自发的，不是中央指导经济变革的努力的一部分。

与党先前宣布的主张相反，1940年8月，宋劭文在晋察冀边区经济会议上的报告清楚表明，土地占有形式在抗战期间不是保持不动的。宋在提倡“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时，可能已经想到了战后时期，他把这解释为“改变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状况和使少数人占有的土地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有”。然而，更可能的意图，是在战争仍在进行时就计划实施上述政策。抛开报告的全部内容不说，关于“在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党正在逐步实行的这项政策”，

宋劭文的评价是与众不同的。当然，宋不是提倡剥夺，但他说，“促使地主出卖土地是必要的”^②。

无论如何，要调合宋劭文与彭真在“耕者有其田”政策上的观点是困难的。重要的是，他的声明告诉人们，战争期间，土地占有程度相对来说确实变得更分散了。这主要是由于出卖土地和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进行抵押造成的。抵押的土地叫佃地。通常是破产的地主或农民，在规定期限内把一定量的土地抵押给贫农或中农。这种做法实际上常常是一种土地出卖^③。主要适用于分散地主和富农土地的政策是税收、减租减息和向他们收取各种“捐助”。最后，由于不得不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农村上层阶级被迫永久地(就绝大部分而言)或临时地放弃自己相当一部分的土地。

1941年北岳区的一份党的文件说明，地主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的结果，是被迫出卖土地^④。1943年对该区24(或25?)个村庄的调查证实，从1937—1942年期间，地主出卖和抵押土地的情况已达到相当大的比例。战前，地主和富农是土地的购买者和抵进者，现在这种顺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颠倒过来了。

北岳区 24 个村的土地买卖情况

	工人	雇农	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小工业者商人
卖出亩数	4	(3) 7.9	(45) 492.16	765.00	1061.30	1320.61	4.50
占%	0.11	0.2	13.47	20.93	29.06	36.13	0.12
买进亩数	(5) 29.80	102.15	669.89	1192.18	(77) 113.7	32.25	60.70
占%	1.35	4.63	30.39	54.1	5.16	1.59	2.71

从上表看来，农村各阶级抵押土地的数量是不同的。然而很清楚，抵押出去的土地有半数以上原来是属于地主富农的^④。

上述情况，在1942年的晋西北地区也是很常见^⑤。对该地区14个行政村和17个自然村的两次调查表明，出卖的土地，分别有77.9%和51%是地主、富农的（两次调查是混合进行的），28.3%和14.3%是中农的，16.6%和7.5%属于贫农。土地买进的情况也同样明显，即地主、富农买进的少，贫农、中农买进的多。据一次调查的情况来看，地主和富农买进的土地只占买进土地的总数的10%，而中农和贫农买进的土地，却占买进土地的总数的86.3%。另一次调查的情况稍有不同：地主买进的土地，占买进土地总数的0.7%，富农占13.9%，中农占52.8%，贫农为32.5%。在一般情况下，地主、富农出卖劣等丘陵地，保留好地。关于抵押土地的情况，另外一次对晋西北的调查表明，某个村庄在1937—1941年期间，虽然每年结果不同，但总的情况是地主、富农抵押出土地者多，抵押进土地者少。中农、贫农则正与之相反。地主抵押出土地者占20.5%，抵押进土地者占8.28%；富农抵押出土地者占47.5%，抵押进土地者占22.7%；中农抵押出土地者占25%，抵押进土地者占42.7%；贫农中无抵押出土地者，而抵押进土地者占24.3%；工人中也无押出土地者，而抵押进土地者占1.7%；商人无抵押进土地者，而抵押出土地者占7%。在地主当中，抵押进土地者的比例不高，说明地主在村中所占土地的数量已相对减少。

由于减租减息运动直到战争的后几年才认真开展，因此，可以设想税收是引起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确实，统一累进税（在1941年采用）使富人承担了主要经济负担，并促使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然而，如果在这之前实行高免税率，那么，这些地方的征税可能比后来几年对土地所有权的分散产生的影响更大。日本的调查者发现的，由于重税，许多富人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一些土地。为了逃避灾难性的税款，冀中定县的地主、富农在1940年

初采取了不要任何报酬，把自己的部分土地转送给农民的做法。据说在那个地区，这种现象很普遍。例如一个叫苏第先的人，拥有土地 120 亩，为了少交税，无偿转送了 18 亩给一户农民，12 亩给了另外一户。宋正阁是一个经济境况稍好些的地主，他转送给别人的土地达 60 亩，几乎占其土地总数的三分之一。那些在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缺乏明智的地主，结局就更加悲惨：一个叫李书段的地主被抓到后，其 700 亩土地被征税 2 万元，300 亩地被没收，后来连人也被杀掉了。^⑧与合理负担税收政策相结合的减租减息政策的影响，在战争的前半期是有重大意义的。这在 1941 年 6 月《晋察冀日报》报道冀中平山县北庄村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村里的大地主在 1937 年以前，占有土地 897.3 亩，到 1940 年，他们占有的土地减少到 659.66 亩，而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却增加了^⑨。

下面的表格明确显示出 1942 年开始的旨在恢复元气的减租减息运动对土地转移的深远影响。早先谈到的中农化倾向也是明显的。

太行区 15 个村的减租和土地占有情况^⑩

成分	时 间	户 数 (%)	占有土地 (%)	平均每户 占有土地 (亩)
地 主	1942年5月以前	2.75	23.04	98.64
	1942年5月运动开始后	2.02	8.79	42.28
	1944年运动以后	1.65	3.64	
的经 营地 企 主 业	1942年5月以前	0.50	1.59	37.32
	1942年5月以后	0.41	0.19	21.82
	1944年以后	0.33	0.58	

(续)

成分	时间	户数 (%)	占有土地 (%)	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亩)
富农	1942年5月以前	7.25	18.68	30.37
	1942年5月以后	6.90	14.53	20.74
	1944年以后	5.29	17.18	
中农	1942年5月以前	30.80	37.02	11.56
	1942年5月以后	46.79	54.87	11.54
	1944年以后	55.20	60.85	
贫农	1942年5月以前	48.95	18.98	4.57
	1942年5月以后	42.12	20.05	4.69
	1944年以后	33.33	17.01	
雇农	1942年5月以前	1.88	0.25	1.57
	1942年5月以后	0.95	0.39	4.26
	1944年以后	0.49	0.18	

上面的材料进一步证实了对太行区的另一次调查得到的情况。根据那次调查，减租减息和税收导致了地主占有的土地的逐步减少^②。

其它边区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

晋绥区 5 个村的减租与土地占有情况^④

成分	户数 (%)		占有土地 (%)		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亩)	
	1940年 ^{a)}	1945年 ^{a)}	1940年	1945年	1940年	1945年
地主	3.8	2.4	30.3	9.0	595	350
富农	10.8	8.3	24.8	17.5	218	185
中农	25.8	44.2	27.5	49.0	102	125
贫农	53.4	43.1	16.3	23.5	29	50
雇农	5.2	2.0	0.85	0.4	16	23.5
其他人	1.0	1.3	0.25	0.6		

a) 指“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前后。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
39 个村的减租和土地占有情况 (%)^④

成分	户数		占有土地 %	
	1937年 减租以前	1942年 减租以后	1937年	1942年
地主	2.42	1.91	16.43	10.17
富农	8.45	7.88	21.93	19.56
中农	35.42	44.31	41.69	49.14
贫农	47.53	40.95	19.10	20.12
雇农等	7.06	5.36	0.83	1.01

在鲁中，减租减息与稳定债务关系同样也对地主土地的再分配产生了影响。^②

土地占有权的变化是重要的，但其发展并不平衡。战后党的有关材料说：“尽管对减租减息的实行情况屡次进行了检查，但在总体上，封建势力仍比农民多占有土地，基本群众仍感土地不足。”^③

在共产党地区，逃亡地主的土地仍被转移到穷苦农民手中。根据规定，这种土地是不应没收的，但是要由政府接管和“临时”管理，直到原主人回来要求收回为止^④。正如刘少奇指出的，这些土地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或者让给士兵家庭耕种，不收地租^⑤。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查到逃亡并永不回归的地主的数字。在那种情况下，农民至少在事实上、甚至在法律上也获得了占有土地的权力。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大量的土地就是以这种办法易手的。其中有部分土地就是直接没收的，从而破坏了统一战线协定^⑥。有些地主就是受到威胁而逃走的，这样他们的土地就可以在贫农中分配^⑦。这种情况是常有的，绝大多数发生在1939年到1940年的所谓“左”倾时期。在当时，即使这些倾向受到了党的批评，并要求纠正，但是地主想重新得到失去的土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为按原则规定，土地一旦分归农民所有，就不能变动^⑧。

以上关于分散地主和富农土地的讨论，主要涉及边区的中心地区。远离中心的地区，由于战争破坏的影响，加上党的力量相对薄弱，情况就更加复杂。虽然必须谨慎仔细地对待这些材料，但是，北岳区的一次对党的影响薄弱的3种地区的42个村庄的调查，也表明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的减少。这次调查，涉及1939年以来3年的情况，被调查地区包括游击区、老的“保护村”和“无人区”。关于第一类地区，1941年日本人大扫荡之后，就变成了游击区。在老“保护村”，日本人早在战争初期就建立了统治，破坏的情况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那里的抗战工作开始得

晚，基础相当薄弱。

北岳区42个村的土地占有情况(%)^⑨

		游 击 区	老“保护村”	“无人区”
地 主	1939	10.47	8.35	21.99
	1941	8.41	6.36	16.52
	1942	7.61	6.26	13.38
富 农	1939	26.95	17.41	28.85
	1941	22.02	10.98	16.61
	1942	21.25	11.23	10.52
中 农	1939			33.11
	1941			44.79
	1942			33.65
贫 农	1939			15.46
	1941			16.81
	1942			31.31

在这些地区，由经济政策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变动比较小，所进行的各项变革也不那么激烈，政策的落实也不够彻底；另外的因素是战争的破坏引起了地价的大幅度下降和一些富人的逃亡。

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虽有重要的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地主阶级仍不同程度地占有大量土地。彭真在一次党内报告中

引证了北岳区 1941 年年中汇编的数字，说明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仍没有根本改变。地主富农与那些在经济上低于他们的阶级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当大。

北岳区 25 个村 1941 年的土地占有情况^④

成 分	人 口 (%)	劳 力 (%)	占有土地 (%)	平均每人占 有土地(亩)
地 主	3.11	1.55	9.0	7.62
富 农	7.42	6.35	17.47	6.22
中 农	50.12	49.27	50.94	2.68
贫 农	25.32	36.80	20.58	1.54
雇 农	1.63	2.93	0.88	1.4

1942 年初对晋西北的一次更广泛的调查，也显示出了相同的结果——一种中农化倾向。

1942 年晋西北 100 个行政村、
100 个自然村的土地占有情况(%)^⑤

成 分	人 口	占 有 土 地
地 主	2.85	14.6
富 农	5.5	12.5
中 农	31.6	45.0
贫 农	51.0	25.5

相对地平均土地占有权，其难易程度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过去和现在的租佃关系的性质、主观条件、土地质量、军事形势等等。冀中的例子说明，这一过程是如何的持久。1944年一个村子被解放以后，建立了抗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手段来削弱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实力，例如减租减息、稳定债务、反腐化斗争、土地赎买、增加工钱等。到1945年9月，这个村子总共210户人家中，18户地主还占有全村35.52%的土地，21户富农则占有全村16.98%的土地^②。

经历了战时经济变革以后，土地的占有不仅在数量上还存在着不平等，而且质量上的差别依然明显存在。肥沃的土地、平原土地和水浇地，大量地被地主、富农占有，中农和贫农继续耕种劣等的丘陵地和干旱地。1943年底对一个村的调查告诉我们，即使在1942年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后，贫农也没有得到水浇地，而只是占有大量最贫脊的土地。

1943年太行区1个村的土地占有情况^③

	人 口	占有土地 (亩)	水 浇 地 (亩)	旱 地 (亩)	丘陵地 (亩)
地 主	46	330	15	215	
富 农	225	1257	12	1345	
中 农	678	1913	7	1845	52
贫 农	427	850		713	137

从1941年末开始的对晋西北的一次更早的调查也证明，农村的富人占有大部分最好的土地。在100个行政村中，占人口7.59%的地主、富农，占有水浇地的56.6%。占人口41.2%的贫农，只占有16.8%的水浇地^④。对同一地区兴县一个村的调查

表明，肥沃土地的分配更不公平。

1941年晋西北1个村的土地占有情况(%)^⑤

	人 口	水 浇 地	平 原 地
地主和富农	27.7	94	78.5
中农和贫农	70.6	6	21.95

由于这些材料没有说明共产党对晋西北这些村庄控制了多长时间，因此，这些数据只能概略地说明问题。

需要土地的农民容易得到其它类型的土地，最主要的是公共土地。至少在那些没人注意的地方，这种土地就变成了耕种者的财产，耕种者在一定的时期内全部免税或部分免税^⑥。过去寄生的食客“单独占有的”庙宇土地，也租给缺地的农民管理和耕种，而交给政府的粮食税则被用作救济^⑦。

第五节 生产运动

增加农业生产的意义

为使农民认识到他们与新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利害关系，为建立起能生存下去的根据地和继续进行战争，扩大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战斗——，进行反对日本人的经济战，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保卫根据地的财政、物质资源；同时，在边区根据地建立起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①。齐武对此的看法是：“如果要与敌人战斗，就存在着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如果没有根据地的建设，任何人就没有能用来与敌人进行战斗的依托”^②。

高度的自力更生是极端必要的。边区的中心地区处在日本人的进攻和军事、经济封锁之下，一般来说是贫穷的。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可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援助。陕甘宁边区实际上缺少大量物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性地恶化之后，共产党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来自重庆的援助。农村经济及其和城市方面的关系不得不做调整。党认为，实现从依赖外援到内部自给自足的转变有极大的优越性：“这是一个独立和自由发展的好机会。”^③

增加农业生产是关键的一环^④。在太行区的一次生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了农业生产对于建设根据地的作用：

“如果要你建立一块根据地，你必须记住，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彻底解决群众和军队的农业生产问题。这是一个革命的建设问题。过去，我们没有足够地注意农业生产。我们现在应该弥补这一点。”^⑤

关于这个问题，邓发说：

“新的法令本身不能解决包括为我军提供给养在内的全部经济问题……阶级利益的调整也不能仅按照规定和依靠规劝来实现并保持稳定。要真正取得成功，我们必须依靠增加生产本身。”^⑥

从逻辑上讲，扩大农业生产，在各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为不断扩大的军队、游击队和党的领导机构提供给养和供养边区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大宗作物，粮食对于稳定物价和保证政府税收不断增加，都是主要的因素^⑦。粮食的征收占边区总收入的75%^⑧，边区总收入的80%来自农业^⑨。因此邓小平1943年7月在《解放日报》上写道，“谁有粮食，谁就有一切”^⑩。齐武谈到，“粮食斗争”对根据地来说事关生死存亡，是巩固根据地，同时削弱日本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⑪。1940年晋察冀边区关于收购粮食的报告，也坚持这种观点：“没有粮食……就不可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⑫

大生产运动开始于1943年——互助组的创立是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党扩大农业生产运动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党的经济政策在各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减租减息、合作社、垦荒（在一定

时期内准予免税)^⑬、改进农具、计划提高耕地产量(如多施肥,改选良种和深耕),而且各方面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武装组织通过阻止日本人抢收和保卫根据地,为实现党的这一目标(指大生产——译注)作出了贡献,而且它们还直接参加生产。

同时,努力增加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密不可分。大生产的根本目标是让直接生产者——农民群众掌握整个生产过程。这是通过互助组与合作社发挥作用的。这种直接符合农民需要的合作劳动,是使他们积极从事生产的前提,也是增加生产的因素。正如农民如果与农村秩序没有真正利害关系,他们就不会与日本人战斗一样,除非实际上对农民有好处,人们才能指望他们对生产更多的东西感兴趣。

1941年的春耕运动

高度组织起来的,于1943—1945年大规模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共总攻势的组成部分。以前对群众进行的农业生产动员,主要是在每年春耕时临时性地突击搞一下。尽管春耕动员对支持抗战有作用,但没有大生产运动那么大的效果。

1941年的春耕运动是很重要的。当时,边区形势非常紧张,自然灾害和日本鬼子的反复扫荡造成了大片土地的荒芜;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正在恶化;此外,军事动员导致了劳力不足^⑭。在此情况下,春耕生产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重要^⑮。春耕支撑住了日益衰弱的根据地经济,有助于反击失败主义和组织农民群众反对伪军和国民党的颠覆。

根据1941年初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运动的基本目的,是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只要求某些特殊地区超过战前水平。自1937年以来,农业生产“极不平衡”^⑯。党的指示指出,由于特定生产的手段的落后,决定性的因素是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指高效率的组织劳动力,包括大量的妇女,参加大规模的生产。

1940年规定的春耕运动的具体任务，是数量很大而又雄心勃勃的：通过整修沙滩增加农业生产，恢复从前的可耕地的生产和防洪，建立合作劳动形式和帮助解决种子与农具缺乏的问题（农具的短缺是由于日本人的破坏和严重的洪水灾害，补充农具是运动的“主要的准备工作”）^⑧；进行救济工作，主要的是组织难民开垦荒地，由政府和春耕委员会解决农具、种子、房子和粮食问题；为贫困的人和没有足够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士兵家属“代耕”土地；武装保护春耕。

春耕委员会渊源于1939年日本人高度破坏性的大扫荡之后立即成立的救援委员会。1940年，各级行政机构都建立了春耕委员会，以负责计划、领导、调查和监督春耕运动。在行政区一级，发行了报纸，宣传队和文艺小组向人民进行宣传，群众组织也进行了政治动员。为进一步激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个人、劳动小组、合作社和整个村庄的范围还开展了劳动竞赛。选拔模范的标准包括政治影响和生产情况^⑨。根据地区的不同，对于生产贡献的评定也不相同。评定标准包括帮助士兵家庭，整修沙滩，栽树，喂养牲口等等。在远离中心区的游击区，还包括军事任务的完成。

大生产运动

到1943年底，大生产运动从陕甘宁边区扩展到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共力量在战争后期的恢复和扩展的开始。这是一场与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相一致的经济攻势。在其进行过程中，党做了比1938、1939年更为充分的准备。这时边区已经稳定，共产党领导抗日运动的思想基础已经巩固，减租减息和税收政策已大大减轻了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更由于经受住了1941—1942年日本人凶残的军事进攻，党有了生存下来的能力，因此共产党的信心提高了。虽然大生产运动在1939年被描述为最“紧急的当前目标”^⑩，但是，只有到了1943年底，由于有了牢固的

群众基础，大生产运动才能够真正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这次运动的不同特色在于，它是对先前一些做法的补充、改进和更有组织地推行，特别是建立合作劳动体制和通过树立劳动英雄和标兵的办法来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进行活动的范围上和群众动员的规模上，大生产运动都超过了以前的努力。1944年，毛泽东在号召各根据地准备一场大生产运动时宣布，这场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一场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的运动。”^④除幼儿以外每人都要参加。

这一政策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不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⑤。

实际上，“仅仅”组织起10%的18岁至50岁的男女劳力加入互助组的计划，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在毛泽东的声明中，没有规定年龄限制。运动的参加者从8岁到80多岁的都有^⑥。政府工作或者军事任务都不能作为可以脱离生产的充足理由，脱离生产就是失职。在晋西北，据说一个姓王的行政干部不得不到田里去撒肥^⑦。大量的参加生产的行政干部与军队干部都是新干部。宋劭文在1945年3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在歉收的1942年至1943年期间，政府强调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由于人们几乎不懂得如何发展经济和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大家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行政机关和军队对生产的贡献^⑧。1943年秋，有人抱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多数干部没有学会怎样组织党员，组织政府、部队和人民群众……大规模地进行大生产”^⑨。

一般来说，1944年期间，华北敌后地区大约20%的劳动力

组织起来参加了大生产运动^②。比这一劳动力动员率高的有晋绥根据地(37%)^③和晋察冀的阜平县(36%)、隆化县(45%)、灵寿县(58%的男劳力和23%的妇女)^④。在山东根据地，参加大生产的人数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15%^⑤。

符合农民利益的、广泛的农村社会变革，被证明是得到群众完全支持的，它是扩大生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简言之，哪里经济上消除差别的工作取得了真正效果，哪里运动就发展迅速，反之就会遇到严重困难或者没有进展。同时，集中精力致力于军事任务，反过来也影响了生产运动^⑥。在必须采取更谨慎的办法的游击区尤其如此。由于战斗任务繁重，许多干部强烈地怀疑在这样的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能否行得通。党认为，要使游击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就必须把大生产运动推向前进^⑦。忽视在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人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难，将对军事上的努力带来严重后果。《解放日报》的社论争辩说：

“如果不抓住群众的这一基本的和紧迫的要求(发展生产运动)，就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他们与敌人战斗，武装斗争就将变成没有群众支持的单纯的军事行动，持久战就难以坚持。”^⑧

尽管人们抱怨大生产运动中有浪费和工作粗心的现象^⑨，但是，运动在边区的中心地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晋察冀边区42个村的调查说明，1944年的产量比1943年增加了43%^⑩。据报道，晋绥根据地在1944年底实现了农产品自给，粮食还有一定剩余^⑪。在生产运动开展之前农产量就在增加的地区，在运动开展之后又继续增产。在太行区的部分地区，平均每人的收入从1942年的2.21担增长到1943年的2.9担，1944年又增长到3.36担^⑫。

劳动英雄

树立劳动英雄的做法有效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努力争做劳动英雄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了。

据说劳动英雄不是“提拔”或“委任”的，而是“从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中成长和涌现出来的”。大生产运动“产生出英雄，英雄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前进。”^⑳人们期望中的英雄，必须显示出自己在劳动方面、计划和组织生产方面的特殊能力^㉑。十里铺的劳动英雄王成池，在为本村及别的村建立增产互助组的工作中作出了贡献^㉒。王和其他人赢得劳动英雄的荣誉，正是由于他们为发展全村的公共事业和合作生产作出了贡献，而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

1945年10月，在延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毛泽东列举了英雄必须具备和发挥的三个作用。第一，通过他们“特殊的努力”和“许多创造”，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他们是“带头人”，是鼓舞别人和别人仿效的榜样。第二，他们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的核心”，有了他们，“工作就好推动”。最后，劳动英雄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桥梁，通过他们，群众的意见能传上来，上面的意见能传下去^㉓。

在中国，按传统习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完全从属于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正如孟子所说：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㉔

根据儒家学说，农民虽然仅次于贵族（即“士”阶层——译注），其地位在手工艺人和商人之上，但他们是“用自己的力气”劳动的，并不受到尊重。当毛泽东少年时代读到《旧的传奇故事和中国作家的传说》时，他对小说中不提种田的农民感到吃惊：“所有人物都是武将、文官或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主人公。”深入地读下去之后，毛发现“它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种田的……”^㉕

为了改变人们对体力劳动所持的观念和提高工农的地位，边

区举办了产品展览会和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边区领导人高岗在延安举行的展览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开幕词中自豪地宣布，“这在中国和东方都是史无前例的”。高岗把陕甘宁边区建立党的领导前后“劳动人民”的地位变化作了比较。作为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的对证，高岗提到了10年前在西安看到的一出戏，他说：那出戏反映出农民处于被轻视的地位——

“但是，现在我们这里，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受人尊敬。你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以往出色地通过殿试的人所获得的学衔）。”

劳动英雄受到尊重，明显地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高岗问道，“谁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供应”？他接着回答说：“是那些手拿锄头、斧头、鞭子和剪刀的劳动英雄”。他还补充道：“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他们。”^④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召开了同样的展览会和大会。晋西北边区乐观地宣称，他们已使劳动变成“在边区人民眼中受尊重的事情”^⑤。由于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指示规定：劳动英雄“应该受到表彰，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提高，他们的生产经验应该介绍，他们的模范行为应当宣传”^⑥。不过，有的地方却存在着劳动英雄高人一等的现象，这可能有使劳动英雄脱离群众和不能发挥带头人、骨干以及桥梁的作用。毛认为，有必要使劳动英雄发扬谦虚精神。他说：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而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⑦

第六节 合作劳动

必要性与作用

人力、畜力的实际不足，战争对农业的广泛破坏(见第一章第八节)和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都要通过改组生产提高效率来解决。这意味着要变个体劳动为合作劳动和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而且，由于频繁的战斗，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时间被迫缩短。这只能通过密切合作、劳动互助来解决。

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劳动互助运动的地方，人力节省了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①。按照计划组成小组劳动，必定比分散的个体劳动效率更高。在晋察冀边区，共产党的许多材料透露，劳动效率大约平均提高了30%，有的地方甚至提高了一倍^②。这个边区的另外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劳动效率提高了30%至50%^③，有的甚至高达60%^④。阜平县一个模范互助组在完成劳动任务方面打破了记录，达到了这样的劳动效率：割麦子的效率提高了25%；开山坡地提高了30%；锄苗提高了30%；种麦子提高了66%；往田间运肥提高效率66%^⑤。在太行区，我们听说工作效率提高了15—30%^⑥。这样的生产效率消除了农民对互助组的怀疑，因为他们是用产量来判断其好坏的。简言之，生产的增长是互助组扩大的前提^⑦。

同时，劳动互助这种组织形式还显示了其它优越性。这包括可以吸收大量只能勉强劳动的妇女和小孩。这批人被称做“半劳动力”^⑧。晋察冀政府的一份报告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⑨劳动互助大大推动了农具的改进，解决了肥料和种子不足的问题，建设了一些水利工程和增加了可耕地的数量，一些主要的建设项目也得以进行。在互助组内，农民通过交流生产经验和互相学习，激励了劳动积极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并锻炼出了强

烈的团结观念^⑧。一位参加者这样描述互助组的影响：

“在一天劳动快要结束时，人们总是说，‘来，再加把劲，到天黑前我们就能干完这块地的活了’。大家这样做了。如果在过去，我们就只好留待明天去干。”^⑨

军事形势要求人们干活要快，不允许拖拉。1944年春，人们告诉去山西访问的爱泼斯坦：通过互助合作劳动，收割庄稼的时间已从6个星期减少到10至14天。时间一下缩短这么多，令人惊奇，这无疑是罕见的。这是组织所有男女老少一起做收割、打谷和贮藏等农活的结果^⑩。

劳动互助有助于使农民追求自我翻身和解放^⑪。互助组是改变农村秩序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把它称作“团结人民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是恰当的^⑫。

劳动互助的建立

劳动互助最早并不是中共的发明，它渊源于农村旧的合作习惯。生产的急剧下降和可耕土地的减少使这些习惯长期泯灭。直到1942—1943年之后，通过改造传统的农村合作形式，劳动互助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⑬。赫勃斯·鲍恩的概括是恰当的：

“历史地说，确立新的组织机构，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和策略，起初都不是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社会工程而开始的。人们生活在历史成就的积淀之中，很自然，人们就会吸取那些最适用的东西为自己所用。当然，历史学家追溯这些过程时，不应忘记新的组织机构可能产生的特殊作用。职能分析学家也不能忘记，特殊的历史环境也会对新的组织机构的形成产生特定的影响（促进、延缓或使其转向）。”^⑭

过去，劳动互助仅限于亲戚、朋友之间，并没有一定的组织和领导。自然，在这种合作形式中，劳动纪律松弛，也没法准确计算劳动贡献。这些旧的方式影响了最初组织互助劳动的努力。例如1943年之前的北岳区，由于缺乏领导，农业又严重减产，结果互助组的发展受到了妨碍。一般来说，在晋察冀，这种情况在

194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有了组织、有了领导和有了必要的纪律，总之，互助组建立起来了^{①7}。从季节性和临时性的互助组，逐步发展为长久性的巩固的合作组织。互助组“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短期到长期”^{①8}逐渐发展起来。最初的互助组只由几个人或几户人家组成，最后变成了相当大的综合团体。最高的合作形式，是全村农户参加的互助合作社^{①9}。这里是十里铺如何进行互助劳动的情况：

“在收获季节，每个组分成若干个由几户家庭组成的换工组（即互助小组），先到一家的地里去干活，然后再去其它人家干活。牲口借出去帮助其它人家从地里往家里运庄稼，往地里运肥，耕地等等。工具在全组成员之间可以互借。家中没有壮劳力只有妇女的农户，为家中缺少妇女的农户纺线、织布、做衣服。劳动报酬按出人力畜力的多少和得到别人多少人力畜力的帮助来计算，对大家提供的额外帮助，用现钱或以其它方式支付报酬。”^{②0}

人们常提到这一点：互助组是为了满足贫农的要求，要不他们就会躲着互助组。在一些地方，没有足够注意互助组的长期性，劳动互助被当作一种“救济帮助”。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不能根本改变贫农的生活条件^{②1}。

活动范围

互助组由于不断扩大，乃可以更广泛地承担各种任务。互助组的任务范围从农业扩展到了副业、手工业、运输业、贸易、供销、文化、政治、教育、卫生，甚至一些家庭事务也包括在其中。当然，这通常是从初期的互助小组向互助合作社发展时逐步演进的^{②2}。在农闲季节，互助组停止生产活动，但小组仍然存在。由于互助合作社的建立，使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组织劳力和进行其它形式的生产活动成为可能。季节性互助组发展成为全年性的合作社^{②3}，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互助合作社为发展畜牧业和准备肥料，喂养了大量的羊和

猪……合作社直接组织纺织、榨油和其它生产，组织运输和销售，给组员的产品寻找销路和确定价格。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²⁴

变工和拨工

互助劳动的主要形式叫变工和拨工。前者主要有3种基本交换形式。第一，交换人力，以便及时完成收割和进行其它农业生产劳动。第二，人力和牛的劳作交换，互相弥补对方的不足。一般是1头牛的劳作等于3个劳动力。最后，是农具方面的互相帮助²⁵。

在晋绥，至少有两种形式的变工是特别重要的²⁶。

第一种形式，仅仅有3至5户或7至8户参与，轮流进行耕作。耕作量的计算单位或者是劳动日(我为你干1天活，你也为我干1天活)，或者是一定数量的土地(每方为对方耕作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于劳动任务的交换很好计算，也就没有必要记账。为适合农民的习惯，组织形式不是强制的。春耕期间也有同样类型的变工。这种变工使人口多的大村子易于解决牛和农具不足的问题，这对于停滞的农村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土地、农具、人力和牲畜的缺乏，束缚了个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今天，由于我们实行了变工互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互相合作和帮助……使每个人都能克服困难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随着这些互助组的扩展，较少几个人就能完成在分散劳动的情况下较多人才能完成的同样数量的工作。4个人结合起来就可以干5人的活，7人可干9人的活，10人可干13人的活。劳动效率是提高了。但变工仍有缺点。如果领导不得力，劳动任务变成了硬性的规定，按计划完成劳动任务者就会受损失。由于小组成员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所以产生效率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与此相比，如果其规模和人员的进出不受限制，那么，在第2种形式的变工中，一个组就可以吸收更多的人。随着互助组逐渐发展成为“大组”，以一家一户的劳动为基础的轮作制被强制性地

打破了。由于用统一的标准计算提供了多少劳动和得到了多少帮助，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说变成了成员与小组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按照劳动任务确定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了。

根据地区习惯的不同，拨工的形式也有多种。可分为小拨工和大拨工两种。

在晋察冀，小拨工是很普遍的。这是最简单的拨工，常常成为其它劳动交换联合体的基础。除农业之外，它的活动还涉及手工业、副业、家庭事务等。劳动交换不再局限于人力和畜力，而且包括马车一类的财产。就1个村而言，如果1个小拨工队能包括相当多的劳力的话，1个大拨工队就能包括全部劳力。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在有些地方发生。拨工队的扩大是通过参加户数的增加体现出来的^②。可以看出，大拨工队与互助合作社之间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

互助合作社

互助合作社是在变工和拨工基础上的扩展。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力和解决日益增多的繁重任务，这样的合作社的建立就必须特别小心，否则人民将不会接受。组织合作社是互助组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晋察冀边区的拨工发展到1944年春季，人力和畜力的劳动交换已非常广泛，然而范围受到了限制，许多组织的扩大受到了阻碍。互助组的成员大部分限定于男性劳动力，妇女和小孩很少能加入。没有牲口的农民常感到入组困难。孤儿、寡母和士兵家属由于缺少劳力，实际上被排除在组外。除了牲口和人力交换之外，别的交换都受到限制。建立合作社的另一理由是充分利用效率提高之后出现的剩余劳力、资金和货物，这要在永久性的互助合作社内才能做到。但是一般来说剩余的劳力、资金和货物并不多，因此，对这一点不应夸大^③。

合作社构成了一种更高级的劳动联合体。它有正式的成员，长期活动，并无农忙农闲之分。作为互助组的扩大，合作社的全

部劳力可以进行各种方式的生产活动，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通过把互助劳动与供给和信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进一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由于政府资金非常紧张，无法指望得到更多的贷款数额和其它援助，群众只有自己调节农具和种子的供给，在这方面，合作社比互助组更具优越性。最后，孤儿、寡母和病人的生活，由于战争的缘故，长期以来每况愈下，现在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组织，他们的生活就更有保障了。总之，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促进了生产活动。合作社是“组织人民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的核心”，也是调节政治与军事任务的核心^⑳。但是，规模扩大后，灵活性有所减少^㉑。

在合作社的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毫无疑问，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管理农村经济的能力：

“这些合作社与群众有直接联系，其每一个成员，都是合作社的一位股东，都是合作社事业的直接参加者……不拘礼节的成员大会很容易召开。合作社的主要计划和方法，须经成员讨论同意，然后由全体成员去落实。”^㉒

作为最先进的劳动互助形式的合作社，与互助组比较起来，其数量并不多。晋察冀边区1944年春就建立起了合作社^㉓，但1年以后，周立波提到，合作社“仍不够普遍”^㉔。看起来，晋绥边区的合作社多一些，然而，也是直到1945年初才“大量”建立的^㉕。那时，在晋绥边区的1个县中，一半以上的自然村组织了合作社^㉖。

交换条件

在组织互助组的过程中，一个紧迫和麻烦的问题是“等价劳动相交换”，这是指精确地记录和交换劳动量。若不能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损害互助组的基础，这种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曾经发生过^㉗。

由于农村的劳动既多又杂，事实证明，要准确地计算劳动量

和划分完美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交换条件的不同——土地的远近、土地质量的好坏、参差不齐的技术熟练程度和训练程度，又进一步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解决这些问题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⑳。贯彻平等交换原则，在每一地区还要适应当地农民的习惯，要有很大的灵活性。当干部们脱离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其它地区的经验时，农民就难以认清劳动交换的必要性^㉑。

平等交换的主要受益者是贫农。“平等交换搞得越好，贫农得到的越多。”^㉒公平的交换也具有某种综合性的双方受益的作用，所以，它的好处不可能全部为贫苦农民所独占——这种现象虽然偶尔也出现过^㉓。

阶级、阶层和劳动交换

在不同的阶层——贫农、中农和富农——之间实行的劳动交换是多样化的。《解放日报》关于山东滨海区的一篇文章分析了这个问题^㉔。

由于在土地占有的规模上大致相同，贫农之间实行劳动交换是比较容易的。为弥补双方缺少耕牛的问题，他们用人力合伙耕地，也可以用政府的贷款买一头牛。随着互助组剩余劳力的增加，为满足贫农对土地的渴求，组织开垦了大片大片的荒地。

更有效的和构成了最广阔的社会基础的是贫农和中农组成的互助组：这种互助组不仅解决了与耕牛、农具和人力有关的问题，而且剩余劳力问题也通过搞辅助生产得到了解决。

中农之间的劳动交换也同样容易进行，因为他们在土地占有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之处。《解放日报》的文章强调，中农的合作并不影响贫农得到牲口。互助组吸收中农参加，是要他们在互助组的劳动交换中发挥“支柱”作用。

贫农与富农进行互助合作，必须解决前者缺少农具和牲口的问题，也必须解决后者劳力不足的问题。由于“富农总是担心自己的牲口受到伤害”，所以贫农与富农进行互助合作的问题不太

好办。

富农之间或富农与中农之间也有劳动交换。上述《解放日报》的文章对富农联合起来搞互助合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不理解变工的意义并害怕与贫农变工”。

尽管强调等价的劳动交换，然而根据其明确规定的目标，互助组更适合于成为吸收(对地主、富农，以说服教育和给予实际利益相结合)、利用(将地主、富农的资金和物资用于发展生产)^④和使地主、富农屈服于农村的社会变革(由于贫农是互助组的主要得益者，地主、富农的某些利益不得不牺牲)的形式。

尽管如此，不同的阶层与阶级之间的劳动交换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1945年上半年，晋察冀的中农单独联合起来劳动，而不愿与贫农或富农结合在一起。另外，中农和富农也经常联合起来，互相弥补各自人力、畜力的不足^⑤。在北岳区，富农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互助组，直到全部贫农和中农都组织起来了，富农才改变态度，因为不改变态度富农将雇不到临时劳动力^⑥。有时生产资料多的人试图控制互助组。滨海区在春耕季节就发生过此类事情，那时劳力与耕牛的换工很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互助组肯定办不好。

建 立

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人们常常指出，草率行事和急躁冒进都会导致互助组垮台^⑦。同样，互助组的调整一开始就需要认真过细的工作。首先要树立一个榜样，从某些个人到农户，再到全组，最后普及到全村。人们多次听到反对鲁莽行动的警告^⑧。一个互助组在完全建成之前，总要经历不少于三次的失败和调整^⑨。

组建能够坚持下去的互助组的先决条件，是群众的真正支持。经验证明，除非人民群众确信互助劳动交换能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愿参加互助组的^⑩。在十里铺，有两次改进至关重

要：

“一次是王成池领导全组挖地窖，这证实了组织起来集体劳动的可能性。另一次是他在组内安排使用病户的毛驴，这次证实了组里的成员可以从互助合作劳动交换中得到好处。”^④

在山东，经过一次证明互助组已取得了成绩的生动教育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了互助组的必要性。在互助组成立前，还进行了一次尊重劳动的教育，这次教育运动以充满阶级性的语言向人们表明，互助组将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光荣”，“世界属于劳动人民”，“想想过去为谁劳动，现在为谁劳动”^⑤。

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合作劳动，需要具体了解群众的态度和区别不同的地区条件。《解放日报》宣布：“必须始终贯彻民主精神，进行广泛和彻底的调查，听取变工组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⑥在互助组成立后，随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也同样重要。如在一个村，起初看起来互助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可靠支持，因为参加者中无人表示出不同意见，但是当干部下去和群众商谈之后，才知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⑦。

各地组织互助组的具体步骤不尽相同。方法之一是，从先找出需要劳力的人开始^⑧。另一方法是，先由那些经济条件和人力差不多的农户开始联合，然后逐步扩大^⑨。一般说来，应以与村民保持密切联系的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互助组。太行区的报告说：“各地的经验证明，哪里的互助组有核心组织，哪里的互助组就会发展起来，巩固下去。”^⑩山东党组织的一份文件宣称：“只有当群众在依靠和相信核心成员的基础上组成互助组，而核心成员又能与群众结合并能倾听群众的意见，变工队和互助组才能巩固。”^⑪核心积极分子被视为农村社会中最受尊敬、最可靠、最勇敢和最有威信的人^⑫。在农村实行的革命性变革中，那些从事变革的领导者——而不是那些维持现状的人，更能获得这些赞誉。用阶级的术语来说，那些中农阶层以下的人是最可靠的。他们象他们当中的互助组积极分子那样参加生产斗争并理解战争的本

质^⑧。党要求干部们通过树立榜样和亲自带头参加来促进互助组运动。某些干部声称自己忙于别的工作，对互助组的工作和生产运动顾不过来。这种意见完全受到了驳回：

“今天，主要工作是生产运动。除了打仗之外，别的什么工作能使自己忙得不能参加生产运动呢？……事实上，只有参加群众的生产运动，才能真正深刻理解群众，明确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才能做好其它工作。”^⑨

对于其它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共也经常使用通过树立榜样来开展竞赛活动的方法。总之，每村先建立一两个小组，如果经营管理得不错，就可以将其作为有说服力的榜样^⑩。

在组织互助组的过程中，中共一再强调自愿加入的原则^⑪。不存在大规模和大量地强迫建立互助组的情况。当然，也不是说这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1944年5月，《新华日报》报道说，太行根据地在“组织互助组的过程中，有的地方行政命令的现象仍是一个严重问题”^⑫。这种高压手段来源于干部的急躁冒进情绪，不懂得群众对自己经济利益的关心和在新生事物面前一时的犹豫不决^⑬。一成立互助组就要求群众大量参加，急于求成必定欲速不达^⑭。类似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共产党的力量较弱，变革的影响不大的地方^⑮。在这些地方，由于干部的忽视，不能实施正确有力的领导，互助组的作用也就发挥得不好^⑯。

参加人员的比例

在战时特定的条件下，根据地内群众参加互助组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据对晋察冀6个县的统计，到1944年，占总人口8%或总劳动力28%的人已经组织起了互助组^⑰。冀西的情况基本与这个数字一致^⑱。而冀东，搞得好的地方，30%的劳力组织了互助组；发展得慢的地方，参加互助组的劳力才占总劳力的10%^⑲。共产党在北岳区的牢固统治，也在互助组的发展上体现了出来。从对27个县的一次调查来看，运动发展得健康的地方，

40%的劳力已加入了互助组，而其它地方参加互助组的劳力是20%^②。来自同一地区的一个不全面的、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数字，甚至表明有60%左右的劳力加入了互助组^③。

来自晋冀鲁豫的数据不够完全。尽管如此，太行、太岳这些共产党影响很大的地区，有20%（在调查过的24个县）到50%（在两个县）的劳力分别加入了互助组^④。对太行地区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平顺县35%的村庄中，有50%到80%的劳力（包括半劳力）参加了互助组；而在该县20%的村庄中，登记参加互助组的劳力所占的比例是35%到50%^⑤。

关于晋绥根据地，据报道，37%的劳力加入了互助组^⑥。战后中国方面的材料声称，陕甘宁边区参加变工队的劳力是24%到74%，其它解放区是30%^⑦。关于华北和华中的敌后解放区，据《解放日报》1945年初的报道，有20%的劳力组成了变工队^⑧，其具体数字如下^⑨：

	山东	太岳	北岳	晋绥
成员人数		70000	200000	146550
占劳力的比例(%)	20	10	20	37.4

这些地区的情况也有明显变化：来自山东的一份冗长的报告说，平均9.2%的农村人口是变工队的人员，而在中心区域，参加变工队的人则占农村人口的17%。^⑩在晋绥的一个县中，有80%的自然村建立了变工队^⑪。

从得到的数字来看，劳动互助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变工队的群众基础更不广泛^⑫。直到1944年中，才完成和超过了组织10%的劳力加入变工队的计划。1945年的发展目标是^⑬：

单位：（拨工队）个

	巩固地区	游击根据地	游击区
河北—山西	35	20	5
冀中		15	5
河北—察哈尔	30	15	5

此表说明，经济调整取决于地区的稳定。然而就是在中心地区，情况有时也不尽如此。当然，在冀西的少数几个地区，参加拨工队的人数比例也比较高：灵寿县56%的劳力，榆平三分之二的男劳力，唐县19%的人口参加了拨工队^④。据说在有的村中，全部男劳力都参加了拨工队^④。

这个比例数字应当有保留地引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互助组都笃定能真正发挥作用，有些可能只偶尔发挥积极作用^④。在某些情况下，互助组缺少内聚力和权力，如十里铺，以前村里的统治者就企图通过建立互助组，采取欺骗、许诺和威胁的手段来恢复他们的权力。如前所述，强制和急躁是自拆台脚。太行区的一份报告提到，以上两种情况都明显存在。报告说：“如果许多互助组只是名义上存在，事实上它们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相反，还会引起群众反感……群众会普遍地厌恶加入互助组。”^④

矛盾和问题

劳动交换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人力、畜力、土地规模、生活标准的不同和人际关系的不融洽有关^④。个人眼前的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也有矛盾^④。

另一困难是土地分散：每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很小，又常被分割成相距很远的小碎块。这导致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④。实际上，这种小规模农业也意味着农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情，因而有时他们对劳动互助就采取了冷淡态度。一份关于组织初级阶段的拨工队的报告劝告人们，拨工单位不要超过 5 至 6 人^④。

旧的习惯也成为重新组织生产活动的障碍^⑤。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诸如播种、锄苗等季节性任务的完成上。这些任务，需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按计划完成^⑥。干部被告诫要密切注意地方习惯，否则农民就发动不起来^⑦。

尽管互助组能够节省劳动力，但是人力短缺的问题也不是自始至终都能解决的。事实上，战争后期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导致了强壮男劳力的外流，以致有的互助组逐渐解体。根据对 3 个县的统计，它们分别有包括绝大多数干部在内的 12%、12% 和 15% 的劳力参了军。尽管这样，据报道，上述 3 县的秋耕任务还是完成了 70% 到 97%^⑧。

合作社

合作社虽然没有互助组那样的影响，但是对于重新组织和发
展农村经济来说也是重要的。1940 年 8 月，在晋察冀边区经济会议上，宋劭文解释说：“合作社是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⑨《解放日报》的报道反映了这种总的倾向：1940 至 1941 年间，合作社在晋察冀相当迅速地发展起来；在 1940 年，总数达到 3790 个，参加的人有 48 万^⑩。1941 年日本方面的一份文件也谈到合作社在一些地区已广泛建立起来^⑪。然而，与互助组相比，合作社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忽视如何进行管理训练的问题^⑫。北岳区的报告注意到，合作社“在数量上是喜人的，但质量不好。”^⑬为了适应组织合作社的迫切需要，1941 年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这次会议为 1942 年 1 月召开的晋察冀第一次合作社代表会议作了准备^⑭。尚不能断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至少让 30% 的村民参加合作社的既定目标^⑮，然而，在象冀中地区那样开展了群众运动的地方这一目标都超额实现了^⑯。

在其它边区，合作社的普遍建立是较晚的事。在晋冀鲁豫，真正为合作社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实质性的进展出现在1943--1944年之后。在太行，合作社从1943年6月的180个增加到1944年12月的1177个，同时其成员由91929人增加到250007人^④。在山东，1940年的建社计划落空以后，1943年后期工作又重新铺开^④。

合作社的类型基本上有5种。1940年中期晋察冀边区的6个特别区即30个县的统计数字表明：31%的合作社是生产合作社，27%是消费合作社，24%是综合合作社，17%是运输合作社，1%是信用合作社^④。

合作社向“所有抗日的人民”敞开大门。合作社社员的条件——主要是购买股份入股，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具备。最初的资金由政府以粮食和现钱的形式提供，在规定的时期内偿还。晋察冀边区的指示说：在合作社内，农民可以用“现金、储蓄公债，或粮食、农产品和牲畜一类的东西”来认购不超过总数20%的股份^④。

合作社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增加生产，争取实现食物、燃料、衣服等必需品的自给^④。这些必需品的供应和计划由消费合作社负责^④。合作社的生产活动包括开垦荒地、造林、兴修水利和兴办手工业^④——尤其是纺织业^④。

运输和销费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使基本商品更公平地销售，同时也对价格进行必要的控制，以保护农民不受商人控制。例如在1941年征收统一累进税时期，由于钞票短缺而粮价下跌，商人企图利用这一机会，但是合作社抢在前头，尽可能地买进了大批粮食和发行了钞票。通过向合作社的股票持有者提供棉花（用来纺线、织布）和以相对低的价格销售各种日用生活必需品，就排除了中间人的剥削^④。

相比较而言，发展信用合作社更困难一些。这种合作社负责农村的资金流通和向穷苦农民提供可用于某些支出——如买肥料

增加生产等——的贷款。在合作社内部，每年的贷款可以集中使用；而在以前，这些贷款则被农民分散用于日常需要和救济^⑥。由于农村的贫困，要积累大量资金是不可能的，然而合作社却可以使这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⑦。

第七节 财 政

货 币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叫做“统一领导，分散管理”，这意味着在华北的每个边区建立一个银行和发行自己的货币。银行雇员被武装起来，当面临日本人的威胁时，就转移档案资料和纸币^①。

晋察冀最先建立了一家银行——1938年1月建立于山西五台山地区，后来其分行遍及全边区。自1938年3月起，边区货币开始流通^②。

在晋冀鲁豫的太行区，除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国民党法币外，还有伪币，甚至几种地方货币也都在流通^③。这个边区的共产党货币，最初是1939年10月由冀南银行发行的，当时这家银行已与先前建立的山西的一家银行合并。1941年，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冀南银行变成晋冀鲁豫银行，之后，边区货币更广泛的流通开来^④。1942年，晋绥的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自己的流通货币，紧跟着发行货币的是山东的北海银行（1942年）和冀热辽的长城银行^⑤。

整个说来，在共产党控制地区，党批准流通的货币至少有20种^⑥。发行多种货币，是因边区分散和交通困难而采取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实行这种货币政策，当一个边区被封锁时，其它边区不致受到影响。如果只发行一种货币，一旦日本人成功地占领了边区的某一重要部分，得到了大量的边币，就可以用它们来瓦解边区经济或在其它边区购买货物。一般说来，发行多种货币

的政策，有利于保护货币和有利于反对日本人破坏边区货币的各种企图^⑦。

伪币在根据地是禁止流通的。然而，取消伪币需要时间，直到1940年共产党的货币政策彻底实行时，才做到了这一点^⑧。因此刘少奇在1938年3月时宣布：“在必要的地方，可以流通法币，使用伪币。”^⑨1941—1942年，法币在边区也被禁止使用了。起初，一元法币兑换一元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货币，但与山东根据地货币的比价不同；当法币停止使用而被收回时，也是按照这个比价计付。禁止使用法币是对日本人的一系列旨在损害法币价值和动摇根据地经济的手段的反击^⑩。

关于保持边区货币币值的相对成功，一位作家这样写道：（1）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农村，相比较来说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直接生产；（2）边区货币只与法币、伪币有联系，与外国货币的贬值没有必然联系；（3）在许多地区，货币都是独立发行的；（4）重点发展高度自给的公共生产部门的经济计划与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的步骤是一致的^⑪。

通货膨胀确实对边区产生了影响，但是影响比敌占区要小，更不能与通货膨胀猖獗的国统区相比^⑫。边区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山区的贫穷，日本人的破坏、封锁和随自然灾害而来的货物供应不足造成的。克服通货膨胀的方法之一，是建立能随价格的波动放出或者收进粮食的粮食储备社，使价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为了保护贫困农民免受变化莫测的市场之害，免受地主、商人操纵以及免受粮食欠收之苦，共产党试图加强人民的抵御能力^⑬。军队和行政人员可以得到固定数量的口粮、衣服、蔬菜和盐（他们可怜的津贴只是一点零用钱），不受边区最严重的货币贬值的影响^⑭。

为了发展一种有生存活力的经济，建立独立的和稳定的金融货币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人和共产党彼此都想侵扰对方的货币，如日本人企图让旧省钞流入共产党地区，以搜刮根据地资

源。

货币战与跨地区的贸易相联系。由于共产党扎根于农村，日本人占据着城市，双方都需要某些贸易。当日本人不能通过暴力和其它手段得到诸如棉花、粮食等基本工业原料时，他们就企图通过向边区输入不太重要的货物来换取这些东西。同样，共产党也试图以价值不大的货物来换取工业机器零件。由于绝大多数贸易是以现金成交，而不是物物交换，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价格斗争。双方都想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而以最贵的价格卖出。货币比价不得不紧密协调：确定一种适当的对等价值，收进和放出敌方货币，稳定财政与价格。与伪币相比，如果边区货币的比价定的很高，将有助于共产党禁绝同日本人的贸易，反对日本人从边区进口货物；如果边区货币比价定的太低，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边区的战略物资禁止出口）^⑤。

边区银行也可以通过向农民扩大发放低息和无息贷款而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民可以用贷款来购买种子和农用设备^⑥。在1942—1943年恢复期间，此类贷款增长很快。在晋冀鲁豫，这种增长是很明显的：1940年1216万元，1941年2596万元，1942年7028万元，1943年19518万元，1944年34490万元，1945年69978万元^⑦。贷款帮助了农民，把他们从对地主和债权人依附中解救了出来。据估计，20—30%的农户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位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当时写道：这种贷款方式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⑧。银行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政府经营的商业的支持上，因为银行扩大了商品流通，为军队和人民提供了财政支持^⑨。

贸易

日本人和共产党都不想停止与对方地区之间的贸易。然而，每一方又都企图利用贸易来削弱对方，加强自己。结果，他们的贸易政策是完全矛盾的。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它希望进口对经济建

设、对战争都有重要作用的物品，如盐、油墨、煤油、弹药、武器及其它军用物资和药品。不需要的物品如奢侈品不准进入解放区。另一方面，又禁止粮食、布匹，棉花和原材料——如铜、钢、铁、木炭和牲畜出口^②。基本的物品是免税的，但其它物品要交税，以限制物资外流和增加税收。原则上说来，对日本人越有用而对根据地价值越小的货物，进出口税就越高。税率一般从10%到50%，而在有些情况下接近50%到100%^③。只有北岳区是个例外，那里直到1943—1945年期间才实施这种高税率^④。

每一方都阻止禁品外流，这形成了一种经济封锁。日本人为此在农村和公路、铁路沿线设立了检查站。被禁的物品一旦查出概被没收，从事此项贸易者将被枪毙^⑤。为了打破封锁，共产党主要依靠“那些众多而勇敢的小货车和贩运者”^⑥。由于熟悉敌占区情况，他们能够建立一些小型的、经常转移的秘密市场。为了把货物用牲口运到根据地，还在日本人的检查站之间建立了藏货站。由于这些商人被允许作为股东加入边区政府管理的商店和合作社，并能得到无息贷款，所以他们受到了鼓舞。运货路线经常改变，一些“小型交换站”沿运货路线建立了起来。由于利用货物交换站，就避免了卖方与买方的直接接触，日本人即使发现了一个交换站，也无法知道别的交换站^⑦。穿上日本军服是穿过封锁线的又一方法^⑧。共产党的一份文件声称，以智取胜，打破封锁取得了伟大成功：

“从曲阳县两个分区的核算数字来看，1个月之内，从敌占区进口，或确切地说走私了下列物品：粮食700多担，盐5800斤，棉花1500斤，土布7800多匹，硝石200多斤。”^⑨

日本人的一份报告承认，在与晋察冀交界的占领区内，物货外流一直相当严重。另一份报告说，商人在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和实施共产党的反封锁策略方面非常有用^⑩。

共产党投入很大力量来建立手工业和小型工业，尽管后来几年进口减少了，但是与敌占区的贸易往来并未完全中断。在边区

内和各边区之间，可能的自给程度和实际达到的自给程度是大不一样的。1943年中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太行边区经济建设的文章说，煤油、肥皂等不再需要进口，毛巾可供出口，但仍缺盐和木料^②。1944年访问晋绥边区的爱泼斯坦得知，由于火柴生产增长，政府可以不再进口火柴^③。

在对日本人实行的经济封锁中，河北的棉花是一个特殊问题。从战前开始，特别是在冀中，日本人就建立了棉纺工业，产品绝大部分销往日本。结果在边区的一些地方，棉花的种植超过了粮食种植，人民群众依靠棉花的出口来维持生计。然而，战争期间，棉花的买卖是禁止的，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继续出口棉花而对日本人有利，要么不许出口而引起饥荒。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棉花由政府购买一部分，而其它部分在征过税后可以自由出售^④。彭德怀写到，在冀南，棉花种植降低到原来规模的20%^⑤。由于群众响应边区“多种粮食少种棉花”的号召，边区棉花的种植平均下降了30%^⑥。这一口号也影响了其它地区^⑦。据报道，在同一年（1940年）河北的粮食产量（原文如此——译注）低于战前60%，1941年整个华北的棉花产量下降到1937年产量的60%^⑧。1942年，共产党夸口说，对日本人掠夺棉花的行动的破坏，已削弱了日本在山东青岛的棉纺工业，在天津，开工率也只及生产能力的50%到70%^⑨。限制棉花种植这件事，给1938年春访问河北的一位西方记者以深刻印象：“我在那里旅行期间，曾穿过著名的产棉区，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亩土地种得有棉花”^⑩。

共产党的反封锁线只能在主力部队扎根的山区牢固建立。平原地区的抗战，主要意图在于阻止日本人控制重要的经济资源，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满足日本人的经济要求，因为共产党急需这些物资。否则，将对日本人有利^⑪。

商人(地主)和市场

共产党对待商人的政策基本上与对待地主的政策相似（许多地主同时也是商人）。商人被迫顺从于农村的社会变革，也被这种变革所利用。共产党允许他们参与建立农村统一战线，这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范围。为了与商人建立关系，在吸收商人的过程中，共产党运用同样的理论与地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换言之，保证商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即虽然政策有很大改变，但仍然保证商人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不得不“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②。

党作出坚决的努力来争取商人（和那些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相同作用的地主）参加抗战，其原因是他们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人和相当大部分的地主在发展边区经济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人建议，商人的活动必须严加限制。1942年11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决定，只能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为商人开路”，并且强调了“控制商人和规定市场”^③的必要性。由于建立了由县贸易局领导的商人协会，这种限制实现了^④。由于贸易局负责稳定价格、组织商品流通和防止市场投机，商人也就只能在有利于边区经济的范围内合法地活动。虽然也加强了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检查，但更重要的是粮食储备社和合作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商人还必须持有执照^⑤。日本方面的报告声称，正是贸易局才能“命令周围的商人”^⑥。事实上，那些企图通过操纵市场或在贸易活动中通过其它非法手段来增加利润的行为是被禁止的，违禁者将被划为叛徒^⑦。河北定县贸易局的决定说明了对商人课税的利润检查制度：

“1. 不许私人走私，以免税收受到损失。2. 不准个人趁机获取暴利。3. 不许买卖敌货。4. 禁止使用敌人的货币。5. 不许破坏政府规定及其贸易政策。6. 保证不为敌人纵恿群众牟取非

法利润。7. 不许出卖奢侈性的消费品。8. 对内贸易的利润率不许超过10%；在对外贸易中争取尽可能高的利润。”^④

过窄的买卖范围或过低的利润，会使商人放弃经商活动。这种情况在所谓极左的1939—1940年时期发生过。那时自由市场被完全禁止，建立了低价格制度，物价由村行政管理干部、群众组织领导人和合作社领导讨论决定。这样做肯定能保护穷人免受涨价之害，但在商业上，产品不易找到销路。商人和地主就以停止销售剩余粮食来对抗，这加剧那些在遭受洪水灾害后急需粮食的农民的困境。同时商人也趁机搞粮食投机^④。

把根据地市场转变为自由市场很有必要。杨尚昆说：“通过行政手段，由军队、合作社垄断市场，从而取消自由市场是一个错误。”^④正如人们注意到的，商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自由发挥作用。1940年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当前行政纲领》规定：“在根据地内，正常的商品交易自由受到保护……投机商人将被管制起来……”^④“正常的”和“非法的”贸易的确切含意，是看其是否服务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通过扩大有限度自由的办法，商人（地主）的才能才可以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被更有效地加以利用。

第八节 战争与生产相联系

努力扩大生产和进行游击战争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林枫向一位西方记者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敌后的全部组织形式，可以包含在‘劳动交换’一词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劳动交换不仅可以在人民中进行，而且可在人民与军队，群众与民兵之间进行。生产和战争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和相辅相成的。确实，除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出足以支持战争的物资，他们才能参加战斗。反过来说，如果不与敌人战斗，他们也不能改善生活条件。……单纯的爱国主义可以鼓舞人心，但是生产成就可以提高人们的信心和热情。……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组织人民进

行生产。民兵随着生产组织的合理变革而组织起来。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随着生产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生产组织的新形式越广泛，人民参加抗战就越普遍。今天，我们正在达到实现全民武装组织的阶段。开始，我们的军队作战，人民群众只管生产供养他们自己。现在，他们认识到了生产对于战斗的重要性。这里的换工组和民兵组织已经变得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从自愿组织农业和商业合作社开始，我们已经发展到组建能制造各种类型简单武器的自愿的战时工业合作社，这些武器大量地由人民群众使用。”^①

民兵与生产的结合及其军事任务

1940—1942年形成的三级组织结构，已经显示出民兵在从事生产、达到自给方面的作用（见第四章第三节），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在承担战争任务方面的作用（保卫村庄）。当然，正规部队也在田里劳动，但他们参加生产的规模是有限的，并要依靠人民群众和政府供应食物。起初坚持两面作战的民兵，正在实现所谓的劳武结合。

这种生产劳动与军事任务的结合，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起初，不得不用替耕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的破坏性进攻，粉碎他们抢夺粮食的企图。当民兵执行军事任务时，村民们组织起替耕队代民兵耕种。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适宜的。1941年春天，13000个日本鬼子、伪军，对晋西北发动了持续84天的扫荡，仅在几个县中就杀死了3450人和80000头牲口。从此，人们得到了教训，生产活动必须和战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否则战斗将无法进行，重大损失将不可避免^②。1945年，共产党军队的一本书宣称，民兵“既是战斗单位又是最好的劳力。劳武结合对保卫解放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③。民兵使庄稼得到了耕种，而且阻止了日本鬼子抢夺粮食的行动^④。

劳武结合是1943年由张初元创立的，他是经常遭受日军进攻的晋西北游击区的一位民兵英雄。作为民兵支队的队长和农会秘书，张成为华北边区的一位竞赛模范。但劳武结合运动并没有

在任何地方都取得成效。1945年3月的一份报告说：“在一些地方，劳武结合运动还停留在号召阶段。”^⑤

劳武结合的形式

在大量的劳武结合组织中，最成功的是变工队与军事爆破小组的结合^⑥。变工队和民兵首先结合起来，这样民兵就可以保护变工队和群众从事生产活动。虽然为实现劳武结合采取了一些办法，甚至在“整个边区”开展了劳武结合竞赛，但是仅仅有劳武结合和只靠民兵打仗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实上，需要更多的群众拿起武器投入到战斗与生产的结合中去。张初元在战斗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敌人来时，民兵和他们打，让群众有机会转移，这只能叫做掩护，不能认为是劳武结合。只有民兵单独保卫群众是不行的，男女老少都必须学会怎样与敌人作战……”

为使每个人对保卫国家作出贡献，正如“全民皆兵”^⑦的口号所展示的那样，变工队的全体成员、甚至妇女和儿童都学会了埋地雷。成年妇女把地雷埋在村内，打仗时呆在家中的小孩把地雷埋在门口。民兵进行侦察，在前面打仗，在路边与其它重要地点埋雷。一位到过晋绥根据地的西方记者说：

“那个村子是我见到的最好战的一个村子。每一条小路都埋上了地雷，不但路上埋了地雷，而且田里也埋了地雷……警告路标很容易移动，敌人一旦来到，就会走进布满地雷的场地。骑着马小心地在地雷阵中拐来拐去地穿行，会使你心惊肉跳……”^⑧

劳武结合不仅把群众武装斗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由于人民自卫能力的加强，民兵还能自由地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敌人。这对骚扰位于边区边缘地带的据点内的日本鬼子特别重要。

在军事任务与生产任务之间求得某种形式的组织上的配合的努力，最初不太成功：对于指挥反扫荡、抢收庄稼等工作，一会儿强调这一项，一会儿又强调那一项，缺乏统一的领导。结果，

当敌人不在附近时，生产指挥者很忙，而负责打仗的人却没事可做；反之亦然，当有战斗任务时，事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克服这种分散行动的倾向，使生产与战斗得到统一指挥，于是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劳武结合形式。村干部担任主席，他和来自政府、群众组织以及军队的人员组成委员会，负责民兵作战、收集情报、变工生产、转移群众及物资，获得补给等^⑧。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评论的：在这种领导体制下，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力量集中了起来；进行生产时，人们可以准备战争，进行战斗时，仍可顾及生产^⑨。

劳武结合的另一形式是“联防”，即把几个村的民兵集中起来使用。人们发现，一个村子不可能集中起足够的、能有效地与日本人作战和保护生产的力量。联防形式有四种：联防战斗；联防警戒；联防围困；联防破击^⑩。

以上是创造出来的劳武结合的主要形式，此外，还创造出了制造地雷和农具以及毁坏日本人设备的各种办法^⑪。

基本原则是民兵不脱离生产，保持自给，但是这一原则具体运用起来，情况却是复杂的。特别是在战斗频繁的地区，民兵被集中用来防御敌人，就不得不依靠人民群众供应食物。村民不大情愿提供粮食，除非民兵能有效地与日本人作战和保护本地利益。这样，依赖就是相互性的。

在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的冀中平原，民兵可以享受某些特权。这使安国县的群众增长了不满情绪，因为那里的民兵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不积极设法对付日本人，而变得对人民傲慢起来。为改变这种情况，停止了免费供给的政策。然而，这在民兵忙于战斗的地方又具有消极作用——面对食物供应的中断，民兵们坚持不住，有个村的民兵藏起武器后跑了。在另一地区，人民自愿向民兵提供食物，民兵就继续坚持战斗^⑫。

军队投入生产

正规军尽管由于职能关系而以战斗为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参加了生产。毛注意到这种做法的落后性及其同分工原则的背离。他补充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国家的军队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生产自给这种陌生的事情。”不过，他认为由于贫穷和要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所以中国的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又是正当的和进步的^⑭。

虽然军队搞生产早在1939—1940年^⑮就开始了，但只是到了1943年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它才认真开展起来^⑯。1944年齐武宣称，全军“从总指挥部到每个连队，从彭德怀同志到每个战士，无一例外地投入了这一运动”^⑰。军队在这一运动中的主要活动是耕种土地和开荒，而且也搞点手工业生产。为实现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每个部队单位组织了一个生产队，各级都有一个生产委员会。然而，每个部队单位都存在着只想扩大自己利益的倾向^⑱。

一般说来，一个士兵耕种一至两亩土地^⑲。然而，军队生产的可行性和对军队参加生产的认识远非一致。1945年2月，《解放日报》报道晋察冀情况的一篇文章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一些军队干部和“相当数量”的战士仍然没有“从思想上”领会军队参加生产的意义。在战争条件下，总有些干部不相信大生产运动或者军队能参加生产。士兵普遍认为从事生产是行不通的：“作为士兵意味着吃粮打仗，不是在田里劳动。”据说毛的《组织起来》的文章起了作用，加上分局的屡次指示和榜样的带头促进，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变化是“缓慢的”^⑳。

针对这种情况，毛在同月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㉑，他声称：在“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已经消除了对军队参加生产运动的怀疑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毛承认，在共产党的军事影响薄弱的游击区和最前线地区，这种怀疑依然存在。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他还广

泛引用该报几天前关于冀中和山西游击队的生产活动情况的报道(一篇署名张平凯的文章),试图驳倒悲观主义^②。张关于那些地区的情况的描绘,也适用于大部分游击区:

“那里布满敌人和伪军的据点与碉堡,沟渠、高墙和道路交叉纵横,凭借其军事优势和通讯设备,敌人经常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包围和扫荡。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不得不经常地、一天几次地转移阵地。”

尽管处在逆境之下,游击队仍在战斗间隙进行生产,这使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每个人现在都吃得好——每人每天半两油和盐,1斤菜,每月1斤半猪肉。另外多年弄不到的牙刷牙膏,识字课本,现在也弄到了。”

张声称,虽然有些人口稠密地区的土地紧张,但游击队通过增加可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改进了生产方法。他们在发展手工业方面也是成功的:

“第4区小队已建立了毡帽商店,1个榨油厂和1个磨粉厂,7个月中赚的纯利,以当地货币计算达50万元。这不仅解决了部队自己的困难,而且满足了游击区人民的需要。现在战士能自我提供羊毛衬衣和袜子。”

张声称,游击队武装保卫田间劳动的农民及其直接对生产作出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坚强支持。毛相信人民给予游击区大生产运动的支持,但他补充道,这些地区的“地租可能还没有削减或者减租工作还不彻底”。情况确实如此。

在冀中这样的地区,进行生产是“很困难的”。然而1944年《解放日报》认为,“每人耕种一亩地”的口号已普遍实现了^③。该报此前的一篇文章还曾经概括说:“生产必须在战斗的基础上进行”^④。

在农忙季节,军队参加生产的规模最大:以大约一半的“工作时间”^⑤或“人力”^⑥投入生产。

据晋西北的报告,军队的手工业生产,包括榨油、制盐等,

虽然技术不高，但在扩大收入、节约开支方面作用很大。由于能生产 70 多种药品和许多特种药材，军队能够解决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②。同一边区的一个部队单位还办起了织布厂，造纸厂和磨粉厂^③。

军队的自给及其生活条件

军队的生产活动带来了许多好处：实现了部分自给和改善了士兵的生活条件。

军队专注于生产任务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因素。朱德指出，只是在受战争影响很小的陕甘宁边区，才能指望军队在经济上的独立^④。毛更具体地把军队的自给能力分为三等。陕甘宁边区是最高的一等，那里的“许多”军队单位完全实现了自给。第二和第三等是直接卷入战争的敌后边区。在第二等自给的地区，军队必须自己提供除粮食而外的许多东西，布匹和被褥由边区政府提供。最低的一等，包括那些“边缘地区和……游击区，要在那里实现（占总费用）50%的自给是不可能的，但实现 15%到 25%的自给是可能的”^⑤。（早在 1943 年 10 月，毛已注意到：陕甘宁边区“军队的开支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政府，绝大部分靠自己的生产”。）^⑥

战后，共产党的一份材料宣称：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 15%到 25%的自给，而在“特别好”的情况下，自给率达到了 50%^⑦。战时统计的数字证实了这样的估计：在山东的一个地区，军队的自给率达到了 52%^⑧，而山东分局（在 1945 年初）要求实现 30%到 40%的自给率^⑨；据报道，晋绥区的军队能够自己解决 47%的开支^⑩。在条件相当好的地区，蔬菜和粮食的自给日期分别达到了全年和 3 个月，在其它地区，这两项的自给日期分别是 6—12 个月和 1—2 个月不等^⑪。

考虑到军队繁重的军事任务、敌人的侵入造成的毁坏和混乱以及农业的落后状况，上述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贺龙

列举了军队的统计数字后说：“这与那些吃国家粮的军队是完全不同的，坐吃山空不能抗击敌人。”^⑦

生产运动的意义在于缓解了军队供应方面的巨大困难。在山西访问过八路军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写道：

“我担心冬天人民靠什么生活。我们购买能买到的一切，但是我们吃的许多大米，都是用驴骡运来的。到太原，要走许多难走的道路，在这一地区的冬季，一个军队的衣食问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在这些村子里要想找到一个能兑换一元钱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兑换到一元钱去买一只鸡，但是我们必须在当天下午买到一只鸡，一个南瓜和一些喂骡马的玉米。”^⑧

1944年，美国政府关于共产党情况的一份研究报告是这样描述八路军的：

“军队的给养好，战斗意志高昂。军队和民主政府之间的团结很好。……美国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给养好的，穿着好的，战斗意志强的，具有很高情报水平和很高士气的自愿抗战的军队。”^⑨

军队从事生产有助于减轻士兵物质生活的艰苦程度，但是这一估计也许有点过于乐观。在军队大规模参加生产之前的几年中的一些事例，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1940—1943年，伴随着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进攻，“情况一步步变得严重起来，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缺少粮食、油盐、被褥和衣服，缺少资金”^⑩。1940年，日军进攻晋西北时，根据地很多部队经历了苦难。在几个月中，战士只能吃黑豆，得不到一点其它给养^⑪。而且，给养供应在此期间如此紧张，甚至“许多时候连黑豆也吃不上，人们只好吃瓜秧、树叶、草根和野菜”^⑫。齐武承认，1939年在晋冀鲁豫的一些地方，军队“非常普遍”地吃谷壳和野草而没有盐^⑬。

大生产运动有很大的补益，八路军总的状况与重庆政府军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重庆政府还控制着国统区的巨大资源^⑭。用毛的话说，就是：

“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④

军队的供给和人民的经济负担

在军事费用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军队的自给，其重要性不能小看。为了不脱离农民群众和解决经济问题，在合理的限度内维持进行战争的费用是必要的。共产党的材料中引用的许多数字表明，军队进行生产和实行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虽然在政府的财政开支中，军费开支仍占了70—80%^⑤，但是，它的真正意义也正体现在这有限的影响之中^⑥。据估计，在中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相当好”的地区，100个人供养4个八路军战士。相同的人数在游击区只能供养两个士兵。而在敌占区及其周围，人民的负担的能力被认为是“低下的”^⑦。

指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即八路军不象绝大多数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和军阀的部队——那样抢占和掠夺人民的东西。八路军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和勤俭节约。用高压手段占有人民的食物，只能恶化供应问题。有两篇报道证实了八路军谨慎地处理与村民的关系的情况。

王玉川是这样描述1937—1938年期间鲁南的地方部队的（指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译注）：

“他们向人民索要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不仅要馒头，而且要油、盐、蔬菜、猪肉、饮具、盘碟等，能抓到什么就要什么。在人民群众应该供养多少军队的问题上，从来不给一个确切的数字。结果人民负担的给养常常超过军队的需要，超额提供的东西，士兵不是浪费掉，就是送回家，卖掉或送人。村干部迫不得已，到指挥部控告士兵的坏习惯并要求他们离开村子。”

这与八路军第四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第四旅行为极好。这支部队制定了向人民征收军队给养的三条纪

律。第一，不挑剔食物的种类。第二，不拿贫农的东西。作为一条原则，在派士兵到村里寻找给养之前，政治工作干部要先去摸清情况。税收将根据群众的负担能力来决定。第三，第四旅决不征集超过其需要量的给养。如果在转移时还有剩余的东西，就分给穷人。”^{④9}

一位来自保定(日本人统治区)的传教士，向新闻记者斯特朗证实了八路军获得粮食的公正做法：

“过去的一年，在我们地区是丰收的一年，所以我们开始为我们的医院购买粮食。但是三天之内，我们的供给全中断了。在离公路3英里或更远一点的所有城镇的小麦，都被运往山区的八路军指挥部。大保定面粉厂不得不从外省买进粮食。八路军并不是抢夺粮食，他们以略高于保定市场的价格付钱。”^{⑤0}

为供养军队，建立了粮票制度。军队转移时，可以用粮票从生产委员会或村行政委员会领取给养。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可以不受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粮票制度在1941年严格实行，由于粮票与小麦等价，人民对粮票“比对普通货币更重视”^{⑤1}。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段时间，粮票被当作货币使用^{⑤2}。据一位到过边区的西方旅行者回忆，边区的粮票制度“非常有效”，“在敌人进攻期间，给养部门的供应能力是很强的”^{⑤3}。粮票的使用也保护了根据地的粮食资源，防止了它向敌占区的流入^{⑤4}。

军民团结

军队参加生产的另一结果是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林枫1944年断言：

“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善。组织生产的新形式越广泛，人民参加抗战就越广泛。”^{⑤5}

1938年，日本人关于山西情况的一份报告，注意到了中共对于农民收割庄稼的支持，认为：“这一简单方法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⑤6} 共产党强调，军队保护群众和参加生产同

建立与群众的亲密联系密切相关^⑤。

当然，在军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北岳一个耕地不足的地方，部队大量集中，群众与军队之间有争地的现象，村民甚至被迫放弃原已占有的土地^⑥。

八路军参加生产，对促进农村青年志愿参军产生了作用^⑦。毫无疑问，这对促进相互理解和共同克服战争与生产的结合方面的困难来说是重要的。据报道，军队的纪律和团结也得到了加强^⑧。

安全收割

在战斗与生产相结合方面，一项主要的任务是保护麦收。这一不让敌人割走小麦的群众性活动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按照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人、一匹马、一头牛闲着”的口号，党的干部、士兵、政府工作人员、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行政人员参加抢收的程度，依其工作情况而定。学校的孩子放一个星期的假，帮助抢收^⑨。

在收割小麦时，男劳力通常要换工。妇女把麦子堆在一起，并准备饭菜。还要组织小麦收割委员会，目的在于动员村民把收割时间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一。为保证行动效果，要先进行一次初步调查，确定重点和最合理地安排军队的劳力。在调查中，特别注意的是保证士兵家庭的利益和缺少劳力的贫、雇农的利益^⑩。调查也包括登记土地占有情况和预计产量等项目^⑪。

当主要的收获工作在 10 月中旬完成时，动员群众的目标就转向夺回被日军抢去的粮食。民兵常常在夜间袭击敌人据点，这叫做“从敌人口中夺粮”，民兵还不断对敌人进行骚扰，弄得敌人疲惫不堪^⑫。

为部队贮藏小麦是个困难的任务，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在山东，小麦或者集中在巩固地区，或者分散到群众家中，每户最多可保存 5000 斤^⑬。在其它地区，小麦先藏在中心村^⑭。尽管

日本人使农民为保护小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①，然而粮食还是藏在便于供应军队的农户手中。为了能把粮食尽快安全转移到靠近山区的贮藏地点，至少晋南地区规定，农户手中不得保持超过一个月的军粮^②。

在平原游击区，日本人主要依靠军事袭击手段来抢夺收藏起来的粮食；这对于中共有更大影响的山区来说，难以奏效。日军也运用了其它手段，有时也获得了成功。例如在丰收后的太行区的一个地方，敌人雇用汉奸混入村内，要群众劝说民兵不要进攻日军。并告诉群众，如果枪声一响，就会把日军招来并造成损失。村民只好如此，并且自己也不加入民兵，而且把枪支也埋了起来。结果日军进入毫无抵抗能力的村庄，抢走了粮食并杀害了拒绝撤离的100多名群众。通过这次经历，党的地方干部把基本问题总结为：“疏散群众，武装民兵和购买、储备粮食等物资，是发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三大环节。”^③

日本人一来，全村的群众和物资就疏散到附近山区，这叫“坚壁清野”政策^④，根据日本人的情报来判断，共产党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一份报告说，这项政策在1939年7月对晋南发起扫荡时，得到了完全的贯彻^⑤。而另一份报告对疏散的成效做了如下描绘：

“各村的确搞了‘坚壁清野’，以致绝大多数村民都逃走了，看不到一个人。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的行动。”^⑥

到抗战结束，共产党的力量已得到全面发展，由于劳武结合及埋藏和疏散物资等方法的完善，不断挫败了日本人剥夺抗战部队急需的粮食的企图和努力。对麦收的保护越来越成功，这在晋察冀游击区保存公粮的百分比数字上可以体现出来：1941年是73%；1942年是94%；1943年至1945年是95%^⑦。这种趋向也明显地反映在《解放日报》几年来发表的社论中。1944年9月，该报的社论自豪地宣布：“今年敌人在华北抢夺小麦的行动，已遭到了惨败。”社论透露，日本人没有能够实现其在太岳区抢夺5%

的小麦的计划^④。

对军人家庭的优待

战争和生产的相互关联，也体现在对军人家庭的优待政策上。当儿子或丈夫参军后，其家庭的物质生活能够得到保证，不会遭遇经济困难。免除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在这方面的担忧，对于军队建设来说是必要的。晋察冀政府 1940 年的一个决定很清楚地谈到：“三年的抗战经历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做好优待工作，军队才能不断发展和巩固。”^⑤事实上，贯彻不好这项政策，会“影响武装动员的工作”^⑥。北岳区的一项指示指出，一些士兵的家庭无法生活，“不得不因饥荒而外逃和要饭”，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⑦。

在战争期间八路军迅猛发展的同时，必须解决由不断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招兵带来的劳力丧失问题。当然，参军人数在晋冀鲁豫各县是不平衡的，大约分别占劳力的 12% 至 50%^⑧。而在山东某些地区，参军的人令人吃惊地占了强壮劳力的 59%^⑨。脱离生产而单纯地扩充武装部队，会对农村经济造成威胁，即使扩充的数量很小。

优待军属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代耕”，即帮军属耕种土地、收割庄稼，此外还帮他们打水、砍柴^⑩。在代耕的情况下，军属如果要求租种被地主收回的土地，得保证租种后土地不会荒芜^⑪。那些为部队战士的家庭代耕的人组成了代耕队，而在某些地方，农会则要求富户履行这一义务^⑫。山东滨海地区一户被优待的军人家庭，其生活上升到了中农水平^⑬。另一种优待形式是向军属提供诸如种子、粮食、农具、钱和衣服之类的直接而有形的帮助^⑭。也有为更穷一些的士兵家庭增加土地的情况。

此外，军属也得到其它优待，如帮助支付债务、帮助解决医疗问题等等^⑮。

第九节 人民参政

代表制政府

战争后期，从边区到村一级的代表制政府机构的建立取得了实际进展。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为最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四个级别。

代表制政府的基础是村政府。较高级的政府机构的产生，其必要的条件是成功的选举。为了配备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采用了许多选举制度。在比较复杂的选举中，村民进行登记后按自愿组成小组。依照村庄的大小不同，小组成员有9—45人不等，通常由15人组成一个小组。这些小组各选举一名代表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小组提出了要求，就可以撤销代表资格。然后在代表大会上选出村长、副村长、政权机构和村委员会及其成员（通常是6人）。其它的选举方式，包括在群众大会上根据村选举委员会、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派别、团体或村民自己提出的候选人选出村长、副村长及村委会委员等。应该强调的是，既然各村大小及居住的集中程度有显著不同，那么各村政府的组织结构包括其委员会的数目也应相应变动^①。

在村以上的区、县两个较高级别，选举制度与前述情况均不相同。战争后期曾在晋察冀考察的一位中国记者说，区级选举是根据人口的比例，选出一定数目的村代表参加区代表会，然后在会上选出区长并成立区委会。由此类推，县代会由区代会选出的成员组成，选出县长、成立县政府^②。一位中国记者还注意到，区与县的代表机构是由群众组织选举产生的^③。迈克尔·林赛考察了晋察冀的广大地区，他看到了选举制度中的另一种情况，即区政府已成为县政府的分支机构，并不另行选举产生。而县代会——

“是在晋察冀地区每 2500 名居民选出一名代表参与选举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对各村庄进行选区划分，在选举会议之后，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群众(组织)或其它团体可以召集会议，提出撤销本地代表的资格的建议。”④

根据一些材料记载，最高一级的边区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以县为单位选举出来的。在晋察冀，每 3 万人中才选出 1 名代表。与晋察冀相比人口要少得多、面积也小得多的晋绥，则没有按这个比例选举代表，光是一个村子，上级就给了 6 个代表名额。从理论上说，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代表竞选，但候选人通常是由群众组织提出来。很明显，供选择的人不必很多，就一个县来说，8 名候选人中可以产生 6 名代表⑤。边区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主席、副主席也是通过县代会选举产生的（原文如此——译注）⑥；另外，行政办公室直接由边区政府领导，其成员由边区政府委任，具有监督、管理功能⑦。

1942 年 7 月，《解放日报》报道，在所有的边区，村与县一级的代表大会已产生⑧。晋察冀与山东从 1940 年起加快了这一选举的步伐。当时这些边区正在进行广泛的选举⑨。至于晋冀鲁豫，党的史料宣称：在 1939 年夏季以前，冀南各级代表大会都已产生，边区的行政委员会成为最高机构⑩。来自 51 个县、代表 200 万人民的 250 名代表参加了 1940 年 9 月召开的冀南代表大会⑪。1941—1943 年期间也建立了边区或基本区（如山东）一级的代表大会或类似的临时性组织。晋冀鲁豫在 1941 年 7 月首先宣布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边区一级的代表大会。然后选举了 15 名边区委员会委员，组成了边区政府，其中有 6 名中共党员⑫。此后紧接着的是晋绥。1942 年 10 月，晋西北⑬和山东也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⑭。虽然晋察冀早在 1940 年已为召开边区代表大会进行了代表选举，但直到 1943 年这个大会才召开。参加大会的人形形色色，当时在场的班滋夫妇评论道：

“这儿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穿着各色衣服，说着不同的方言，给人

留下很深的印象。人们能够从这些人群中找到富有的地主，自耕农，苦工，僧侣和穿着制服的军队妇女代表。从冀东来的4位代表，走了两个月，路上充满危险，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两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一直沿着北京北部行走。冀中平原来的40个人是从京汉铁路偷渡来的。甚至还有许多代表来自被占领的城市……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被秘密带进来的……”^⑮

《解放日报》报道，出席会议的还有少数外国代表，包括朝鲜革命者、投诚的前日本士兵及欧、美朋友^⑯。大会选出了由9人组成的边区政府机构，其中两人是国民党员，至少有两人是共产党员。参加大会的新闻记者周而复注意到，边区自年前建立以来，取得了巨大进展。晋察冀现在包括13个专区，98个县，650个区以及15366个行政村^⑰。

显然，由于战争和经济困难，各团体的选举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且不说缺乏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及选举程序表的不合格等等，选举仅仅在边区的中心才能正常进行，这一点是很确实的。在游击区与敌占区，选举无非是代表们被“邀请”参加县和边区政府。据估计，他们的比例不超过20%^⑱，或者如别的报道，“可能只有10%”^⑲。党认为，如果说选举也适用于游击区的话，那末它主要是一种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⑳。不管怎样，被邀代表与其所在地区和根据地的密切联系并不重要^㉑。

选举大会并不仅仅是一个使党得到尊敬与信任的民主的门面。建立代表制度的尝试不能够与边区村庄的重要变化相脱离。选举作为制度虽然是有缺陷的，但它在为使农民群众的权力制度化而做出的全部努力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直到前统治阶级的权力丧失为止。客观地说，代表大会突出体现了贫农中农的利益，因此难免要与富农、地主的特权与要求相抵触。在政治方面，代表大会加强与巩固了战争年代在边区大部分地区根本改变了农村社会面貌的阶级力量。坚持从纯法律的角度来论证选举是骗局或代表机构没有达到基本的要求，是很幼稚的；同样，刻板地强调选举只能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则是忽略了选举的质的方

面——在两个阶级的对抗中为推翻农村旧制度而播撒种子的作用。

总之，把考察的焦点放在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所导致的客观的社会进程上，我们就能够得到关于代表大会的正确观点。

组成：阶级

贫农与中农在村、县的政府机关成员中占绝大多数。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组可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来自于对村一级政府的较大规模的调查。

当选的村政府成员的阶级成分(%)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工人	商人
	大会代表	0.3	7.8	37.9	41.7	7.5	4.8
冀中 ^②	村长	0.2	7.4	45.8	39.2	5.9	1.5
(1940年)	委员会主席	0.1	6.7	40.2	40.1	7.6	5.3
阜平 ^③	大会代表	1	2	17	71.4	6.6	2
(1940年)							
山西 ^④	大会代表	13		87			
(1940年)	委员会主席	16		44	38(加长工)		
晋西北 ^⑤	村长	14		32	53		
(1941年)							
太行 ^⑥	村干部	6.5	15.4	43	28.1		
(1942年)							
太行 ^⑦	大会代表和委员会	2.3	18.8	34.1	44.8		
(1942年)	委员						
鲁中 ^⑧	村干部	0.8, 1.2	6.2, 1.5 11.3	36, 35 37	56.4, 51.5 46.3	2.2	5.2

来自冀中的另一组数字，表明村政府成员中各阶级人士所占的比例是：贫农与长工，50.75%；中农，37.76%；开明地主和富农，6.23%；商人，5.26%^②。1941年后期，日本人在河北安国县的一个村子进行了选举情况调查，其结果仍是贫农、中农占压倒优势：1940年11月和1941年10月的两次由党严格控制的选举所选出的村长（保留原职）与两个副村长都是贫农，委员会主席团由5个贫农、4个中农和两个富农组成^③。其它的零散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情况。晋西北兴县的18个村长，有10个贫农、4个中农、两个佃农及1个富农^④。山东一个村子的7个委员，有3个贫农、2个中农、1个富农、1个地主^⑤。

上表中的前三项调查，也包括了县级政府的情况。

当选的县政府成员的阶级成分(%)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工人	商人
	大会代表	3.1	14.6	51.6	26.4	4.1	0.2
冀中 ^② (1940)	大会主席 书记	0	23.8	61.9	14.3	0	0
	县长	0	42.8	42.8	14.4	0	0
阜平 ^④ (1940)	大会代表	2	1	25	65	4	1
山西 ^⑤ (1940)	大会代表	19			81		

以上先后列举的统计资料表明，村代表机构大约80—90%由贫农、中农组成。担任村长者，贫农比中农稍许多些。至于县一级，所有的情况都与贫农、中农占优势的一般趋势相吻合。在接受调查的冀中的7个县，情况已有“根本的好转”，因为那里的政府过去“完全是掌握在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手中”^⑥。当然，贫

农、中农在数字上的绝对优势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行使权力来逐渐破坏旧制度。但作为已发动的广泛的经济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政治变革，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与农村的基本变革是一个整体，而且与发动群众、使群众参政有本质的联系。另外，如果在政府机构中全是些与农村上层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人的话，那末这个政府就体现不出差别了。因此，党让地主和富农在行政机构中占有一定的、适当的、少量的和无权的席位。

组成：年龄

新行政机构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的年轻化。

冀中地区村、县级政府全体工作人员的年龄构成(%)^②

村 政 府

	总 数	大会代表	村 书 长 记	委员会主席
青年	49.6	28.5	30.6	27.6
中年	25.1	55.2	51.5	55.2
老年	25.3	16.3	17.9	17.2

县 政 府

	大会代表	村 书 长 记	县 长
青 年	37.8	38.1	42.8
中 年	50.6	57.1	57.2
老 年	11.6	4.8	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县长的年轻化。年轻人接手这个职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彭真在1942年的报告中说，晋察冀有43%的县长年龄在30岁以下^⑤。乔治·泰勒访问过20位县长，几乎没有一位达到或超过30岁^⑥。《解放日报》在1941年7月甚至说晋察冀的县长的“大多数”“已逐渐年轻化”^⑦。日本人在阜平县缴获的一份文件表明：在县代会中，年轻人的比重同样引人注目。在该文件列举的县代会代表33人中，19人在31岁以下，7人在31—40岁之间，剩下的7人在40—60岁之间^⑧。此外，在1940年山西的一次选举中，进入了县政府的候选人有38%是“青年”（占候选人总数的25%）^⑨。冀西临寿的区级统计数字表明，339名代表中，有20%的人年龄在18—23岁之间，24%的人在45岁以上^⑩。

村长的年龄也多在31岁以下。在晋西北兴县的18个村长中，有12人在31岁以下，其中5人在20—25岁之间^⑪。安国县一个村子的村长是27岁，在该县12个副村长和委员会主席中，5人年龄为30岁或更年轻一些^⑫。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山西代县村政府的年轻化。据说那儿的领导机关80%的工作人员的年龄在20岁左右^⑬。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带有普遍性。1940年在山西，被选进村政府机关的年轻人占村政府机关总人数的28%，这个数字也许接近于平均数^⑭。1944年在该省西北部旅行的三位西方记者对于“大量的大、中学校的年轻人正积极地参军或在当地政府中工作感到很惊讶”^⑮。

“三三制”

贫农与中农在政府机构中占了绝对优势，而地主、富农进入政府机构的人数极少。但政府中有了后两种人，对于认识农村统一战线则是有意義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吸收富农是重要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个第一步直到战争后半期才认真地迈出。1940年5月（应该是3月——译注），毛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重要

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声称，“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并第一次对确立稳定的多阶级合作的体制——“三三制”作了详细说明^④。“三三制”，顾名思义，包括了代表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实际上只包括根据地的各种力量——译注）的三部分人。除了共产党员外，一方面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另一方面是由“开明绅士”与“中产阶级”组成的“中间派”^⑤。

在从村到边区一级的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并不仅仅是为了农村统一战线的巩固，而且也是为了争取或保证在各种党（包括国民党）、团之间及在各种职业内同非党人士合作。这些人有一技之长，有政治影响，能帮助管理边区政府。这与国民党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适成鲜明的对照。“三三制”是有吸引力的。在村以上的各级政府中，它的作用也颇为重要。

除了政府机构，党在别的领域也大力宣传与地主、富农的合作——但最强调的还是“三三制”。党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及租金，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但这基本上还是消极的，而“三三制”则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既合法又主要的攻势，对党员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仅占三分之一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样减轻了富农们对农村的突然变化产生的恐惧感。党成功地加强了阶级联合的说法，有时被过分地夸大，如“三三制”“受到各阶层的热情支持”等^⑥。但不管怎样，这些说法中可能有不少的东西是事实，即许多先前逃离解放区的地主随着“三三制”的出现而返回并积极参加了“三三制”政权^⑦。有一份材料在首先叙述了如何“逐渐改变他们（即地主）的态度”之后，举了一个地主支持新的政治组织的具体例子：在1940年的冀中选举中，他们的参加率很高，参加县、村两级投票选举的地主、富农分别达到其总数的72%和87%^⑧。彭真证实该制度影响了许多地主：

“千百年来遭受压迫的广大农民群众在突然获得解放后，不可能避免复仇中的过左行动。他们竟然侵犯地主阶级个人的政治、财产及土

地权利，这使得部分地主憎恨与恐惧。他们不能确定我们和基本群众最终将如何对待他们。但当我们提出贯彻‘三三制’政权，确实保护了所有抗日的人民的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利时，地主们终于支持并加入了抗日政权。”^④

简言之，由于在审议机构中向地主们提供了一定的有保障的席位——不论是次要的还是形式上的，使他们能在那里对自己的意见自由辩解，甚至能对解决某些问题起一定作用，这样，他们基本上就能克服因自己及自己的财产受政府支配而产生的疑虑。中共限定它自己仅占三分之一席位的条例是无关紧要的。在最高的政权领导阶层中，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席位分配给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农民。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村和县级机构中，贫农、中农必须占大多数。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对旧制度的变革中得到了好处，并积极支持和参与这种变革。

在三种成分的分配比例上，党强调恰当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村名额的具体分配，只要求“各地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必须有一个大致的比例”。这一点对于村一级来说尤为重要：“在村级政府中可以稍稍更改比例，以防地主与劣绅混入政权机关”^⑤。就实行“三三制”的整个情况而言，当党员人数未达到三分之一时，可进一步采取办法弥补，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则应严格地重新选举^⑥。选举中党员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的例子很多。关于撤销超过三分之一限数的党员名额的情况，曾经有过报道^⑦。有大量的事例表明党员的数量常超过三分之一，例如，在鲁中，在8个县的456个县代会代表中，33%是进步人士，24%是中间派，38%是党员；在10个县的县政府委员中，30%是进步人士，26%是中间派，44%是党员^⑧。

也有党员比例没有达到三分之一的情况。如在晋西北^⑨的大部分村民委员会或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中，党员人数仅占10%^⑩。同时，也有党员刚好占三分之一的情况。例如，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临时代表大会中，党员占34.6%，即在134名代表

中有46名是党员^①；在该边区政府委员会的15名委员中，党员据说也占三分之一^②。同样，晋西北政府临时代表大会常委会及政府委员会也声称，它们成功地使党员名额保持在三分之一以内^③。在该区的下属机构中也有类似情况，如：党员在行政管理机关中占33.8%，仅低于边区政府机关；在县级占34.5%^④。虽然使农村统一战线和上层统一战线制度化是“三三制”所起的主要作用，但在检查党员的工作质量时它的作用也很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给自己规定的代表限额是恰当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设想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县代会和县政府以及每种类型可能有的结果^⑤。

第一种类型：所有的代表均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得不单纯地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因为服从党的决定是他们的义务。他们未必会去考虑党外人士是怎样观察某些问题的。他们的认识也不会加深。由于党与政府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党就失去了其特殊性，那么在群众眼里，政府的威信肯定要降低。党的周围都是“它自己的人”，党的领导人的作风会逐渐向维护个人利益、强迫命令而不是解释与劝说的方向发展。总之，人民将会把政府机关看作“官府”（公家），宁愿将那些管理群众的人看作“官府工作人员”（公家人），而不愿将他们当作“自家人”。

第二种类型：非党代表占二分之一弱。在这种情况下，非党代表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敷衍其份内的工作，并不努力尽职，因此也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合作与真正的讨论。这样的县级政权机构只是一个“强作欢颜之容”的“空架子”。

最后一种类型：“真正的三三制”政权。在这里，其中每人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党员们感到有三分之二外来者的压力，必须仔细检查党的政策并了解其他人的观点，也就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在扩大相互了解及支持党的政策方面，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党员能更加专心致志于群众工作。

将党员置于少数地位，能使他们克服宗派思想并同党外人士

形成辩证的工作关系；党外人士在参加“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对农村社会的变革将了解得更详细，他们的思想将与党的农村社会变革纲领更加接近——由于这个原因，“三三制”值得认真注意。1940年6月（应为3月——译注），下面这篇引文，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写的，它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⑥

由于“三三制”不单纯是一种宣传手段，那么就不应该对其中占三分之二比例的非常人士过多地贴上带有特殊含义的标签。党曾经发布过一项关于保持“三三制”原则的灵活性的声明，其中指出：不论在哪一级，但主要是在下级，“三三制”与农村统一战线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为了用各种方法不同程度地吸收或控制、利用那些能对边区提供有益帮助的人。

领导和行政管理中的问题

战时中国方面的资料说，新产生的县、区、村长不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是亲自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倾听意见，做动员工作，调解纠纷，等等；同时，人民群众能够直接向他们反映自己的情况^⑦。无疑，这些报道是比较真实的。杰克·贝尔登以他在华北的丰富阅历和对于华北情况的了解，很好地证实了政府主席与村民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我在解放区时，杨主席（秀峰）在6个月内三下农村。其中有一次他骑着骡子在（太岳）山区的赤贫地区走了两个月。杨在走访时，主

要是鼓励部队，访贫问苦，研究土改，总之，是尽力去了解边区政府的法令是行之有效还是应该更改。”^⑧

政府代表并不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杨秀峰说：“当我们外出时，带上粮食，自己做饭。有时我们的干部比最穷的农民吃得还差。”^⑨记者周而复在晋察冀考察时，曾了解到一位名叫陈文渝的县长的情况，并对陈的一些新鲜事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陈不象“以前的县长，整天坐在衙门里要钱要粮，吃得好，穿得好，有几房老婆，外出不是骑马而是坐豪华的车子”。相比之下，陈每月15元的薪水是很低的。他与村民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据说他不要新衣服，因为这样会增加人民的负担^⑩。

边区地方政府与战前的政府截然不同，这是肯定的。在新的组织机构中，农民群众居压倒优势，而他们过去是毫无权力的。工作人员年轻化的特点将它与以前的政府进一步明显区别开来。然而，边区政府尽管是全新的，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克鲁克斯夫妇注意到，在为实行中共领导的变革而进行斗争期间，在十里铺当权的新中农们“并没有摆脱掉他们的前任存在的毛病”。在被提拔当权后，他们变得更有兴趣于使用手中的权力来保卫自己及老中农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全体村民工作。他们尤其“喜欢死守自己的财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地主富农相似。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暴力，也是沿袭了过去的村长的行事方法。

至于传统的统治习俗的继续存在，那是由于新干部承袭了人民送多少礼就为他们办多少事的旧的一套。因此地主抓住时机向新干部行贿，使自己在累进税和债务问题上得到优惠^⑪。1938年彭真对一位西方人士说：

“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在村、县干部中杜绝‘受贿’现象。进行道德方面的教育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受贿’之风在过去如此盛行，甚至那些由人民选出来的干部也在这个问题上堕落了。”^⑫

很明显，要为彭真所说的这个原则而奋斗，必须采取严厉的措

施。那些被区人民法院判定是有罪的人，如果受贿总数超过 500 元就被枪毙，少于此数者则被关进监狱^⑮。有的村干部堕落到了与旧统治者毫无区别的程度^⑯。

除了过去的影响外，其它因素也在促使政府机构出现严重问题方面产生了作用。

1939 年 6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一份报告谈到：在“少数县、许多地区、大部分的村，会议制度不健全”，政府中存在着如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偏见、闲聊、骄傲及敷衍塞责等倾向和问题；这种不良风气以各种形式在工作中反映了出来：与人民的关系不好，单独行动多于集体行动，对上级指示不热心执行等。据传，“将今天的工作推到明天去做”的现象“十分普遍”^⑰。

8 年后，《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详细地记述了晋西北政府工作的缺点^⑱，如：对决议的贯彻普遍不坚决；干部们忽视政令的执行，当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决具体问题时总是出现错误；过多的讨论使得工作进展缓慢；村民居住分散的实际困难也使工作速度减慢。文章仍强调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有个村长由于对情况缺乏了解，一事无成，但过了几个月才向上级交待。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连报告也没有。实际上，村一级机构向上级报告的情况并不准确，这类情况还有待于花时间进一步调查。

齐武写道：“甚至到了 1943 年以后，各地村政府的变革也没有一点成效”，许多会议仍旧流于形式。在区县一级，也存在着不经常讨论工作报告及村的有关问题的现象^⑲。1943 年 3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发布了一道指示说：

“许多干部对县(代表大会)会议的性质，任务及权限有错误的理解……代表大会经常被绅士控制，干部会议变成了闲谈会或无休止的争吵(会议准备不充分)。同时，讨论及通过的决议经常不落实。”^⑳

一年以后，县代会抱怨没有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尤其在游击区，村政府的工作正在“成为少数人的活动”^㉑。由于党在游击区的影响较弱，在那儿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政府。同一个指示

说：在这些地区，“仍然有许多(村政府)控制在上匪、封建势力的手中，有些甚至被汉奸所控制……贪污浪费现象很严重。”^⑧

法律：发展、群众的作用及对罪犯的处理

1. 任何阶级关系的变更和群众的最高权力的确立，都必将伴随着同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相一致的复杂的、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新的司法制度直到1941年以后才建立，在那以前，法律工作与党的总方针、总目标几乎不协调。尽管旧的司法制度并不适应当时的情况(它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它同人民的利益、要求相背离)以及因干部们缺乏经验而引起了混乱，但是，在军事任务的压力下，案件仍能迅速审理。

一份来自太行的有关法律问题的长篇报告表明，真正的变革已经有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在晋冀鲁豫，旧司法制度向新司法制度的真正过渡是在1941年9月(当时建立了高级法院)至1943年底期间完成的。在此期间，法律与法令得到了统一。人们不会忘记，这几年是以日本人的扫荡、国民党摩擦和自然灾害为特征的，这导致了土匪的增加和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恢复，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土匪猖獗的情况下，严格照法律办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因为这样一来将会判处数不清的死刑。为了与犯罪做斗争，也使用了其它方法，如思想斗争。同样，在许多人由于饥荒带来的艰难困苦而要求离婚时，如果依照法律轻易地批准他们的要求，许多妇女就会更加贫困。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设法通过采取救济和生产措施来解决这类问题。经过整风运动，干部加深了对领导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随着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在自1943年底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司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⑨。

2. 法律的目标是“保护赞成抗日和民主的每一个阶级的利益”^⑩，“保障(其成员的)人权、政治权力和财权、产权……以稳定社会秩序……”^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也适用于那些

不阻碍人们破坏旧的统治秩序并且赞成抗日的旧统治者，而民主政治恰好是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条件的。法律的任务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⑧。

由于意识到了变革的真实含义，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些变革^⑨。在推动法律工作时，如同贯彻别的基本政策一样，党一直提醒干部不得以恩赐的态度包办变革，“而要依靠人民，发挥他们的力量”。这里有个具体例子，说明了在一个村子中包办是如何使事情差点走向反面的：当干部来到村里时，人们正在“用争论的方法开展斗争，据理向一个封建统治者进行清算”；这些干部把案子接过来，通过命令“封建统治者”在3个月内彻底付清赔偿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民与干部都感到满意，相信事情已经解决；然而，由于干部完全在包办代替，是要把赔偿物恩赐给村民，故村民们并没有动员起来，“封建统治者”也没有感到任何压力，他们完全能拖延时间并且不按商定数目赔偿；直到两年后（即1945年），在检查变革的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中，这个问题才被发现。包办恩赐被断定为对群众没有好处^⑩。当村民们对所发生的事加深了认识，对于克服地主、富农这道障碍和消除做牛做马、向权势屈服的旧观念的信心和决心变得坚定时，就应该由他们自己将政策付诸实施。太行的一份报告批评了那些认为执行政策是边区政府的事，认为开展群众运动没有必要的人。该报告指出，粉碎“封建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不能局限于法律程序，“单靠政府司法部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该报告提请人们注意国民党在执行它的减租37.5%的法律时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党把完全相同的法律接手过来并取得了成功的情况。报告说，“这解释清了与社会、经济的变动有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如果群众不起来执行法律，那么法律将不能为人民所了解。”人民必须在“政治上觉悟起来”并且“确实与旧势力作斗争”，否则，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⑪。

3. 犯罪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政治犯罪”，即日本军

人及国民党士兵犯下的罪行。当战斗加剧时，这类犯罪活动就有增长的趋势。第二种，是“因贫苦而犯罪”，包括卖女卖妻、敲榨勒索、为日本人效劳等，这直接与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贫困有关。第三种，是“后果恶劣的封建犯罪”，如虐待妇女、强迫婚姻、强奸、贪污受贿等等^⑧。从战争初期晋察冀统计的材料来看，司法工作多半是处理通敌案件，通敌案件几乎占案件总数的80%。由于这类犯罪数量如此之多，变化如此之大——严重与不严重的，自愿与被迫的等等，那么，在敌后复杂的情况下，法律的执行就要有很大的灵活性与创造性^⑨。

与过去不同的是，司法机关强调要在犯罪调查中彻底了解人民的意见，也要向区和村的干部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对法律工作者来说，要了解“群众的困苦与感情”，“提高自己的觉悟”，经常参加与司法有关的各种活动是相当重要的。同时，通过公开审理案子，可以使群众了解犯罪的原因，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⑩。

对民事案件，主要采用调解手段解决，极少使用审讯的手段。调解工作通过法院进行，或者单独进行。法院调解的案子一般比较简单，容易判理。对那些比较复杂、甚至持续了几年的纠纷则要进行个别调解。对不严重的犯罪也是采取调解的方法处理。调解的好处在于节省人力与经费。在较老的解放区，民事案件自1942年以来逐渐增加，到了1944年，其数目已与犯罪案件相等。据1945年对4个县的检查，民事案件分别占其总案件数的99%，70%，63.8%和55%^⑪。

调解“对于改善阶级关系”来说是最好的方法，是感化农村旧统治者并使他们服从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来说，对于旧统治者不搞审判与严厉制裁从而把他们驱逐到敌人阵营中去，而是对案子进行努力的调解。调解的指导人最终还是群众自己——，法院的调解，是通过认真征求人民的意见，弄清他们的看法，使案件事实明确来作出正确结论的。对于那些不需经法院处理的案件，

动员人民就更为重要。群众性的调查委员会有两类。一类由村干部、公证人、劳动模范及群众积极分子等固定成员组成。另一类则由负责村民法律纠纷的负责人和依案件的性质而确定的其他成员组成，例如，租赁案总是由农会干部来调解。两种委员会各有利弊。前一类调查委员会，任何积极分子都可以成为其成员，但由于人员是固定的，工作范围就太窄了。而且，在那些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村行政机构还未从根本上变革的地方，这种委员会很容易被旧势力操纵。后一类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更具广泛性，但许多事情是由负责人决定^④。

审理犯罪案件的指导方针是“教育第一，惩罚第二”。这与以前单纯注重惩罚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说这个方针在降低犯罪率方面已起了“积极的作用”，至少在太行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太行地区的犯罪案件数(单位：件)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投 敌	7857	1779	2652
吸 鸦 片	1571	429	244
贪污受贿	606	232	238
盗 窃	2191	1421	516

(1945年投敌案件的增多与广大地区的收复有关)

太行犯罪率的下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达到了“过去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1942年开始实行的囚犯劳改，其目的主要在于改造囚犯的思想，因而带有教育的性质。然而，监狱的管理工作却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直到1941年仍在

使用一些旧方法；只是到了1944、1945年间，由于受到大生产及整风运动的影响，才着手进行诸如实施教育计划、搞自足性生产、禁止打骂等基本改革^⑧。

第十节 社会变革与人民战争

正是在农村发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才展现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充满活力的人民战争。军事机构整编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军队在1941—1942年的防御阶段中迅速得到恢复，完成了一个更新的过程，而中共在华北的影响急剧扩大，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决定性的社会变革。

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①1941年年中，日军拟订了在三年内打通通往抗日根据地的道路的计划(见第四章第一节)。日军曾对被敌对力量实际控制的两个地区作过估计，中共对自己在1941—1942年遭受损失的情况也有过计算(分别见第一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这些数字与住川吉光所统计的数字相比，虽不能说准确，但确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老八路军在战争初期就与人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为抗日动员了大量的农民。由于社会变革与军队整编，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更广泛，更顽强，更有战斗力，它使战士与村民形成了一个任何武装力量也不能攻破的整体。1944年底，美军医生M·A·卡斯伯格少校在对中共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历时7周、行程1000英里的考察后，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次考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事实之一，就是士兵与老百姓亲密

无间……在我所看到的士兵与农民接触的每一个场合，无论是单个人之间的接触还是一群人之间的接触，都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友谊……村民们慷慨地为士兵们提供必需品，给他们许多食物……我看到来自周围村庄的农民送来许多吃、穿物品，有羊、鸡、蛋、成篮成篮的粮食、水果、鞋子……当我回住处时，路上又遇到了这些农民。他们是躲过敌人碉堡的监视来给士兵送东西的……我还看到村民们向路过的士兵送玉米棒子、水果、馒头。”②

在晋西北访问的3个美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观感：

“部队与人民的士气空前高涨。只有亲眼见到过的人，才会相信人民的这种热情与精神面貌。士兵与人民之间有着一种经久不变的兄弟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他们之间的友好态度中自然显露出来的。”③

在1943年前后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社会、经济政策的强烈影响，已开始发生作用，中共势力也已深深地渗透到了农村。本书的其它章节（第一章第三节：军事阶段）所引用的日本人的材料对此已作了说明。1942年10月日本人的一篇文章说：当国民党战败并被逐出华北时，“尽管共产党遭到了不断的镇压，然而它的部队仍然散布在各个地区。他们在农村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许多村子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是事实，“除非他们的经济基础和赢得农民支持的农业政策遭到了破坏……再多的力量也不能阻止他们扩大影响……所以，在华北，与共产党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争夺农村的斗争。”④1943年以来的日方军事情报也表明中共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人认为：“因为群众已经武装起来，党的组织也渗入到了人民之中，所以，应该把一般民众都视为敌对分子，简单地用宣传工作把共匪同人民分离是困难的。”⑤另一份1942年日方的报告承认，共产党在华北的“长处”是“它与群众休戚相关”，这是“共匪的生命”⑥。

当然，根据地最初的组织工作是由外来的干部工作队进行的。“许多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写道，“只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到来之

后才建立起来，地方工作也只是在外地干部到来之后才有发展。”^①然而，在华北农村或其中的一部分地方动员群众进行改革，进行一场巨大的游击战争时，正是大量的地方干部，由于在自己所在的村子里领导着斗争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认识到要加紧工作、唤起民众为今后的事业而行动起来，仅有外来干部是不够的这一问题后，彭德怀对埃德加·斯诺说：“如果不能鼓舞、唤醒群众，同时不能从当地群众中不断培养出新领导者的话，就不能取得持久的胜利。”^②

宋任穷是这样解释地方干部在发展人民战争方面的重要性的：“他们知道当地情况，熟悉地形，他们受到当地人民的信任，他们决心保卫家园，同时他们在当地起着领导作用。”^③实践证实了宋的判断。他们的潜力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确实有来自群众的本地领导，那么就总会有一套坚持斗争的方法。”^④在中国，这种事情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本地干部的优势也在其它方面，诸如游击战中显示出来。事实上，上述宋的话与切·格瓦拉对土生土长的本地领导者的论述有异常相似之处：“（他）有他的朋友，他能够求他们帮忙；他了解当地的地形和可能在地发生的事情；他也有那些正在保卫家园的人所特有的热情。”^⑤

从刘少奇 1945 年 5 月在七大做的《论党》的报告中，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到在向农村渗透时本地干部的极端重要性^⑥。刘在谈到接管一个新地区后通常需要迅速地从外地调派干部来开展工作时强调：“必须谆谆告诫他们，只能作本地干部的引导者，要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并须准备以本地干部代替自己的工作，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人参与工作。”“外来干部必须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必须从本地人民中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干部，才能生根。脱离本地干部，就会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⑦

与此相反，在外来干部中存在着轻视与嘲笑本地干部的倾

向：“这些当地人懂得什么？乡下佬！”^⑭这种倾向一度越来越严重。直到1942年初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⑮。如果抗战初期培训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在村一级取得一点点进展的话^⑯，那么，这种情况在县以上的干部中就不会出现。刘在《论党》的报告中提供了1943年干部配置的一些数字：

(单位：名)

	本地干部	外地干部
太北 (8个地委)	9	28
太岳 (县委)	6	31
太行 (5个县委)	5	13

刘少奇随后引用的数据表明：1943—1945年期间，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太行的5000名各级干部中，本地干部占了80%^⑰。

第六章

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变化

与战时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紧密伴随着的是其它领域的变化。大量的各年龄层次的人不仅得到了基本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非常适合于他们的日常需要（生产方法等）以及长远利益（增加知识，使他们有能力管理乡村事务）。各种类型的报纸的出版，其内容也紧密地和农民的劳动条件相联系，使得农民能够了解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及前线的战况，这就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农家妇女通过更积极地参加生产、选举，在政府机构占有许多席位，接受教育以及积极地为抗战作贡献，开始从孤立中解脱出来，认识到她们集体的力量了。

第一节 教 育

为了群众

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学校系统崩溃了。教员逃往南方或者参加了抗日部队。学校建筑被毁。教育陷于混乱。在战争的第一年，河北保定13所学校高达80—90%的工作人员逃亡了^①。河北农村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正如下列统计所表明的，在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半，敌占区教育系统的规模仍然比1937年以前的规模小得多。

河北的教育受破坏的情况^②

		小 学	中 学	中学以上
学校的数量(个)	1937年前	29030	82	177
	1939年12月	7307	26	33
教师的数量(名)	1937年前	34213	1762	1750
	1939年12月	15253	583	518
学生的数量(名)	1937年前	1151536	18964	13591
	1939年12月	291744	6737	4430

山东的教育也受到同样的影响。到1940年4月为止，敌占区学校的数量相对于战前来说也呈上述下降趋势：中等教育层次以上的学校从69所下降到9所、中学从65所下降到26所，小学从35076所下降到7674所^③。

主要在1942年以后，教育系统开始重建，这时的学校和战前的学校大不相同了^④。除了给绝大多数的贫农家庭的儿童提供一个就学机会，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知识而外，重建的教育系统还体现着党要努力达到的基本目标，即：通过教育，用必要的知识来武装群众，以便他们保卫自己的经济政治权利和完成各项任务（如制定计划、组织劳动力、一般地执行法律和指示等）。教育的内容都和现实环境相关，它们在群众为改变环境而进行的斗争中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⑤。在评选农民当中的英雄人物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要把教育和农村的发展要求相联系，彻底破除从外地的城市学校沿袭来的陈规陋习的趋势^⑥。由于发展教育与农村

秩序的改变关系密切，意义重大，所以农民积极地响应。林枫 1944 年同 I·爱泼斯坦的谈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其要点却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好几万被选进生产组织、民兵组织和地方政府中努力工作的普通农民迫切感到他们需要受教育。缺乏教育妨碍了他们的工作。以前我们的老师和宣传家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人民接受教育，现在我们对各地来的农民对教师的需求应接不暇。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合格教师的数量有限……。”^⑦

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贫穷的农民现在来管理乡村事务，所以迫切地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彭德怀 1940 年写道：在普选产生的 852 名村长、副村长中，文盲不下于 400 人^⑧。党在考察晋西北某县的 18 个村长时发现，有 3 人曾上过 3 年学，其他 7 人上过两年，7 人是文盲，只有 1 人是“知识分子”^⑨。日本人对河北安次县的两个（经过选举的）行政村的调查表明，在 13 个村长中，只有 1 人受过中学教育，两人是文盲，其余的人只受过 2—3 年的小学教育^⑩。

基础教育对于贯彻党的政策关系极大。上面提到的对 18 个村长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都不很熟悉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方法。就减租减息来说，他们一般只知道“减租 25%”这么个概念，而不能领会地租最高只能达到 37.5% 这个限度的意义。对于逮捕人的程序问题，他们当中只有 3 人能正确回答。没有一人能清楚地理解村民集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不同作用。然而在和阶级更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回答就好得多。有 12 人能正确地理解“公民”的概念，有 10 人确切地（此外有 5 人部分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哪些人受到晋西北政府的照顾？它的领导机关是什么？”人们可以推断，这些村长对于较有技术性的问题的理解要差一些。不过，他们仍然意识到了他们工作的目的，即增强人民的权力。这样的事实，强烈地反映出村长们头脑的政治化，这就是只有 1 人不能正确回答谁将在苏德战争中取胜以及为什么会取胜的原

因①。

正象所預料的那樣，地主充

『象』

正如边区教育部长所指出的，必须保证使农民花费在课堂上的时间得到一些回报^⑳。

教育方面的变革和其它方面的变革一样，在执行一项政策之前总要先开一个群众讨论大会。因为最终的胜利取决于人民真正地理解和真诚的支持这种变革的程度，靠上面的官僚主义的强迫不能解决问题（“官僚主义的方法从来不可能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目标”）^㉑。党要求农民对旧的学校教育进行批评和检查，提出自己对新的学校教育的要求。随后，将群众的讨论意见汇总，进一步召集更多的讨论会。这样，相应的政策逐渐制定出来，也确定了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兴办教育方面的辩证的、符合群众路线的关系^㉒，即：实行民办，以更多地提倡必要的灵活性，但也不放弃必要的集中化“领导权不能削弱”^㉓。

具体地说，党主要在调查、提供援助、解决困难以及“纠正错误倾向”^㉔等方面实施了领导权，这是公助的一部分内容，此外还有提供教学材料、辅助经费和教员等^㉕。可以用毛泽东的话来对此做出总结。毛虽然未曾过多提及“民办和公助”的概念，但他在1938年写的《论新阶段》一文，概括了党的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主要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予恰当的指导与调整。”^㉖

1947年贝尔登在晋冀鲁豫旅行时注意到：“在我所去的任何地方都看到有小学，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有的在大村庄而有的在小村庄，也有的设在寺院里，或者设在以前地主居住的房屋里。”^㉗毫无疑问，这些学校中的许多设施是在抗战时期添置的。抗战时期，学校的正规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在建立得较早的晋察冀解放区，实际上已经实现了1个村办1所小学校的目标^㉘。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在中共控制的整个晋察冀边区，1939年还只有700所小学^㉙。当然，这方面的发展也有明显的不平衡。有个肯定罕见的情况是，发现在唐县（冀中）、冀西的中共控制区和晋东南的每个村庄早在1939年就建立

了初级小学^①。两年后，冀南几乎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②。在太行地区，1942年，22个县中只有1237所小学校，之后这个数目很快增加，到1945年，24个县的小学数目总计达3281所^③。晋西北在1940年还没有现代教育，后来，迈克尔·林赛看到了一份关于晋西北某县83%的村庄都建立了小学校的报道^④。班滋夫妇认为晋西北的基础教育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凡的”。^⑤看来，发展中学教育显得不甚重要，直到1940年晋察冀才有9所中学、晋冀鲁豫也只有12所中学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⑥。全部位于县城的老的中学，不是被毁掉，就是落入了日本人之手^⑦。

鉴于战前的学校教育系统几乎没有使较穷的村民群众受到教育，农村文盲成群，而现在又处于战争环境，所以中共宣布的在根据地招收60%的农村儿童入学受小学正规教育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⑧。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条件下，入学率必然会有显著的波动。下列数字表明了战争期间各根据地的入学率情况。

冀中(9个县): 90—95%^⑨;

冀中(全部): 62%，(一部分县)90%^⑩;

晋察冀(全部): 90%^⑪;

深县(晋冀鲁豫边区): 86.3%^⑫;

冀中(未加详细说明的地区): 75%^⑬;

鲁中: 63%^⑭;

冀中(28个县): 62%^⑮;

北岳: 57.19%^⑯;

五台及其它14个县: (平均)53.7%，(最低者)35%^⑰。

这些数字虽然五花八门，而且肯定也只能用于定性分析，但能够表明教育状况较之战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冀中的教育水平相对是比较高的，而抗战前夕当地也只有30%的儿童(在26个经过调查的县中)受过小学教育^⑱。小学教育的极大发展，是对农村绅士对教育的垄断的有力挑战——贫农和中农出身的儿童日益获得了接受起码的教育的权利，这使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变革农村

社会的必要性及变革的方法。下面的统计数字尽管不完备，但却明确显示了学生的社会背景(%)的极大变异。

小学生家庭成份的比例

(%)

	太 行 ^{④⑧}	冀 中 ^{④⑨}
地 主	5.2	20
富 农	18.8	14
中 农	57.0	58
贫 农	16.0	26
其 他	3.0	

(表内冀中一栏的累计数字超过了100%，系英文原版如此。——译注)

社会教育

从成年人教育大纲来看，社会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改造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④⑩}。

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无数的识字班、讲演班、学习班和读报组在农村组织起来了。冬学早在抗战前就小规模地存在^{④⑪}，它是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的教育活动。在冬学搞得较好的地方，组织了常年教育，建立了永久性的基地，后来就叫做“人民学校”。在晋察冀边区，这个目标1940年就达到了，山东根据地在此3年以后也达到了这个目标。冬学运动有时带有特殊的目的，如动员人民反“扫荡”。它不象正式的学校系统那样正规，教材也不标准，但是它适合群众的要求，安排“讲授他们希望学到的内容”。

或者说，冬学的特点正如概括的那样，是“一方面学习，另一方面解决问题以推动工作”^②。

彭德怀早在1940年就说，冬学运动不象小学正规教育那样在开始时发展缓慢，它已经在各基本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③。在鲁中的学习计划中，招收人员数在1942—1945年期间从64699人增加到458187人^④。1938—1939年首先发动冬学运动的北岳地区^⑤，在1939年春识字班的人数就达到了390495人^⑥。

冬学主要有3种形式：

首先是识字班。这是最基本和最广泛的形式^⑦。办这种班有双重目标：一方面是进行抗战训练，也就是进行如何与日本人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何使人民积极支持抗战的教育，并讲授一些关于减租减息、税收政策的知识 and 生产知识；另一方面是培养群众亟需具备的基本阅读能力：

“那时，许多区和村的干部不会写报告和读通知，他们在会议上不会记笔记或者传达（指示）。当民兵站岗检查过路人时，他们读不懂路条。在收税和进行劳动交换时，他们不会记帐。”^⑧

识字班的经历表明，只有把识字课本的内容和各种斗争联系起来，才有助于工作任务的协调和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同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对于识字班的活动来说，有必要从人民的日常需要出发^⑨。记住汉字有好多方法，例如贝尔登目睹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在地头的一块大木板上写上一个汉字，这样整天来回走着记着。通过这种办法，即使是头脑简单的人，也能掌握复杂的人类文明。”^⑩

其次是讲演班。与识字班相比，它集合学生在一起学习的次数要少一些，10天内集中学习1—3次。讲演班的特点是：在聚会时提出主要问题，围绕它进行宣传和教育。教材的种类有“反法西斯课本”，“减租减息课本”，“扩军优属课本”，“生产课本”等等。在一些战斗激烈的地区，课本的主题通常是：“断绝对敌供应”，“粮战”以及“肃清汉奸”等等。这种班的参加者不仅要通过

听讲演受教育，而且还要组织起来解决问题。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出现过这样的有趣情况：在阅读“减租减息课本”的课堂上，农民同被迫同意减租的地主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这类实际成效，使其他村民看到了讲演班的优点，也积极参加这种学习，讲演班的学员从一开始的6人突然增加到70人。由于教育水平较低，讲演班的教材在用短故事来叙述和表现人民自己的斗争时，不得不使用简单阐述的方法和采用农民的口语^⑩。

第三，技术训练班。它教农民如何制造地雷和其它武器^⑪。

干部教育

在建设边区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受过训练的干部。和朱德1937年6月关于中共“储备了大量干部”、他们能“在战时被用于迅速地扩大我们的部队”^⑫的说法相反，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干部奇缺，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如果说行政机关感到干部缺乏的话，那末军事部门就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⑬。这种短缺据说是一个普遍和严重的问题，“每个战场”^⑭，“在各个方面都要求更多的干部”^⑮。因为不可能从陕甘宁边区得到大量的干部补充（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干部短缺问题），而且训练需要时间，所以聂荣臻断言无其它办法可想，只有“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并且勇敢地前进”^⑯。虽然这些令人失望的话出自战争初期，但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问题绝没有得到解决。一份军事杂志说，这个问题在1941年是“最迫切和最困难的问题”^⑰。1944年，《解放日报》仍然强调缺乏基层干部^⑱。而战斗的伤亡又使问题更加严重；在1943年山东的60000名伤亡人员中，干部的比例不下于57%^⑲。

训练部队、政府和党的干部以及工作人员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付出的朝气蓬勃的努力在增加干部的数量方面确实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这是通过建立各种教育机构（干部学校、大学、师范学院、医学院、军事学院和职业学校等）以及在各方面安排管理训练课程来完成的^⑳。

由于对干部的需要很紧迫，在开始的几年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只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只要是识字的人，无论适合不适合，几乎都被选为干部。用这种方式来补充干部的不足，就在政府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上带来了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干部要求群众交纳的粮食和钱财过多，以致村民认为日本人来了可能会更好些。据说在1941年，损失了许多党的干部，他们不是被捕了，就是变节了，原因就在于没有对干部进行充分的政治训练^②。由于受过训练的干部的数量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只能对干部进行短期训练，而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抗战过程中都存在着干部的质量问题。1945年的一份报告谈到了在干部质量上存在着的问题，如：有统治阶级的思想，认为自己比群众高出一等，接近群众和向群众学习是降低自己的身分，以及对群众持专横的态度等^③。

各类学校

除上述三种主要的教育类型外，还有其他一些灵活的辅助教学形式。这些灵活的形式适宜于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学习。实际上，作为正规的学校系统的辅助成份，它们组织学习的方法取决于军事形势和地理形势^④。

在不稳定的游击区，由于易受日军进攻并遭到破坏，所以学校并没有固定的地点和机构，它们的设置，要便于随时转移、隐蔽和在任何地方开课^⑤。在晋西北访问的一小队西方新闻记者曾“看到在武装起来的教员的领导下，紧挨着敌人的一所小学正在为一旦得到通知就能马上全部撤离而做准备”^⑥。

在日军碉堡附近，以及在敌占区，学校不得不伪装成伪政府的学校，形式上采用日本人批准的课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为教材，实际上却讲授抗战的内容。从广义上讲，这些地区的抗日学校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两面的”学校和“隐蔽的”学校。前者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完全由中共管理的小学——这些小学带有“两面”性是

由于存在着日本人的压力(但它们基本上仍然由中共掌握,教育并没有中断)——和那些陷落在被占领区受伪政权管辖的学校(在这种条件下,党努力“争取控制”教师,把它们变成“两面的”学校)。为对付敌人频繁的审查,必须采取相当复杂的措施来掩蔽学校的有关活动。“两面的”学校既有合法的一面又有非法的一面,而“隐蔽的”学校则完全是非法的^⑧。

在偏僻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正规的教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地区试行了其它几种办法,它们包括:在邻近的几个村之间建立联合小学校;利用巡回教员成立活动小学校;建立由5个以上的学生组成小组,以文盲为组长,由老师轮班进行教学的巡回小学校;在最荒凉的地方建立各种文化小组^⑨。

教育与生产、战争相结合

无论在什么类型的学校,教育工作所一致面临的主题是要绝对地强调把教育与生产和战争相结合。这就不仅需要变更课程和教学方法,而且需要学生和教员直接参加生产(如春耕、收割等)和从事战争(如站岗、查路条等),此外,他们也从事其它一些旨在引起社会变革的活动,如宣传、选举、减租减息等等。所以全体教、学人员也了解了人民的具体情况^⑩。

毛泽东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回忆说,他自己当初也未曾认识到旧学校的教育目标对于农民的要求来说显得多么风马牛不相及: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⑪

“和生产相结合”^⑫是学校的主要原则,它从实质上纠正了城市的偏见。一方面,它注重于传授生产方法和技术,进行试验并且宣传农业科学的基础知识。这就不局限于课堂,而是把教育和

生产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了。另一方面，它要求有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并且使教学计划灵活地适应农业生产的周期，既适合于成年人（他们大多从事生产），又适用于儿童（他们大多从事学习）^②。实际上是要求教员把生产和学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把从事生产作为学校工作的一个部分。^③我们从选举模范教师的标准之一——“对生产有贡献”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教学和生产活动的紧密联系^④。

课本教学生如何自卫，如何帮助伤员，如何抓汉奸，还包括如何报道许多英雄的战斗事迹^⑤。日本人的报告说：“教材的共同特点是抗战反日，在儿童的作文、绘画甚至游戏中都渗透了抗日的意识”^⑥。

存在的问题

在贯彻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党遇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限制了党的独创精神的发扬。

教员缺乏。这种情况在战前也存在，但在战时，由于许多教员参加了抗日部队，或者任职于边区的不断膨胀的官僚政府——因为政府也急需受过教育的人员，教员缺乏的情况又急剧地恶化了。在有些地区，占战前总数80%的教员离开了他们的岗位^⑦。1943年在对29个县的调查中得到的教员缺乏的情况更令人惊愕：在这些县份，小学教员的总数是：高小教员只有121人，初小教员只有2278人^⑧。此外，许多教员的素质很差。在被调查的9个县中，只有42%的教员合格^⑨。

关于教材的短缺，贝尔登评论道：

“教地理时，由于没有图表和地图，教员时常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画图，故经常出现错误。因为缺乏书籍，教员不得不为学生也为自己准备上课用的纸。在山区，几乎什么东西都要靠油印或者石板印刷，……学院的教授不得不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上物理课，在无法进实验室做实验的情况下上化学课。”^⑩

学校仍然不足。到了1939年,那些战前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或者处于双方的激烈争夺中。由于这些地区直到抗战后期才收复,所以新的教育系统不得不在位于山区的较为稳定的地区奠基,而这些地区以前几乎完全没有学校^⑩。在抗日根据地内,便于办学的地方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鲁中某地,在1940年冬日军“扫荡”期间,所有的小学都被拆毁了,直到1942年也只剩一半的班级复课^⑪。在晋冀鲁豫,被焚或者被拆的小学,总计达47567所^⑫。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如极度贫困、迷信、军事形势的恶化等,在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还是大大推进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实质性变革。1938年5月,访问冀中的西方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一个使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农民都受到教育的群众运动正在开展起来”^⑬。不过,能和冀中的情况相提并论的地方很少,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第二节 报 纸

大量报纸的出版并非与教育无关,它使人民知悉现代的发展,有助于群众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加强团结和增强目的性,开阔他们的眼界,塑造他们的意识^⑭。

除了中共的主要喉舌——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之外,党在华北敌后的主要报纸是《新华日报》(也有重庆版)和《抗敌报》。《抗敌报》在1940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还有3天1版的《战友报》^⑮。《新华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比《抗敌报》大约晚1年,它在许多根据地发行,日销30000份。在1942年日军的军事进攻之后,它(指华北敌后的《新华日报》——译注)被迁到太行,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发行^⑯。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墙报、平板印刷或者油印的“小报”。这些报,一般说来每县有1种,张贴在中共控制的农村布告牌上^⑰。我们不可能知道报纸的出版总

量，但尽管如此，如果彭德怀的法说是准确的话，那么，到1940年，华北的报纸就有184种之多^⑤。1939年日本的调查人员还发现，随着中共向山西南部的渗透，在这些地区发行的报纸已有60种之多，而战前当地几乎没有报纸^⑥。

随着战局的波动，在主要的报社工作的工人们必须懂得如何排版，如何战斗，还要准备随时搬迁印刷厂。有人告诉斯诺，一个有600名印刷工人、日出30000份报纸的印刷厂（可能是《新华日报》的印刷厂），在日本人蚕食其所在地区时，一夜之间就全部转移了，而第2天人们仍然能看到同日的报纸^⑦。至于较小的地方报纸，七八个人便足以开展工作，他们通常是非武装的，其装备只有笔、墨水以及背在身上的印刷机器。冀中最大的一份地方报纸，其报社人员也只有30—40人^⑧。印刷手段相当原始。但一位西方访问者认为共产党的出版物还是“易读的，尽管有时偶尔需要辨认墨迹模糊的部分”^⑨。

由于撰稿人员奇缺、地域广大和受军事形势影响等原因，收集文章常常很困难^⑩。较大的报社有它自己的通讯记者，各战区的《抗敌报》有一些随军记者^⑪。记者的生活是要冒风险的，有不少记者死于他们的工作^⑫。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办报方针，叫做“通俗化”。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在“人人读报，人人管报”的口号下，报社人员努力报道有关人民群众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建立了包括后来积极在其中活动的村民在内的通讯网^⑬。根据看过许多反映1944—1945年的晋察冀情况的资料的周而复的观点，通俗化的工作进展得很有气势：

“虽然过去报纸和农民不相干，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情况已变成重要的新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在人民和报纸之间存在着血肉般的联系。通过报纸，他们学到了农业知识，并和整个边区的人民交流生产经验……读报正在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⑭

告诉农民农业上的问题（新的耕作方法等）和政府的指示，这

是报纸重要的教育功能。报纸还通过邀请人民群众向政府提意见，使政府有关方面、群众组织和军队对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引起注意^⑤。

第三节 妇 女

旧社会

妇女在 1949 年以前所遭受的痛苦是人所共知的，一位社会学家曾这样来概括：

“孤立、无知、缺乏就业机会、在参加工作方面完全受到歧视和强迫结婚的习惯，使妇女在传统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上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必然伴随着家庭中妇女财权的丧失，简单的饥饿威胁就会使她们屈服于夫权至上的家庭体制所给予她们的下等地位。”^①

根据另一位中国的社会学家的观点，妇女的作用主要局限于“照顾小孩、准备食物、洗全家人的衣服以及从事其它所有的家庭劳务”，她们很少从事户外的任何活动。即使在户外工作，她们的作用也是次要的：“例如，如果妇女要在田里干活，那末除草、锄地和拾稻穗就是她们的有代表性的工作。”^②实际上，只有在“家庭缺乏男劳力，家里太穷无法雇人帮忙的情况下，北方的妇女才到地里干活，而且认为这是羞耻的事”^③。30 年代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表明，所有的农活中，只有 5% 的活是由妇女干的^④。

总之，妇女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她们是无足轻重的。有个农妇在告诉克鲁克斯夫妇关于十里铺在中共的影响到来之前的情况时说：

“旧时，男人常常在街上谈论村子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不敢参加。如有人敲门问：‘有人在家吗？’我们总是回答：‘不，没人在家。’妇女是不算作人的。”^⑤

一般的变化

在抗战的岁月中，还可以见到成百万中国农妇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作用的巨大变化。当然，中共很早，特别是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经抓住了把妇女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此外，在中共建党以前很久的奉行激进主义的太平天国，和20世纪初西方倡导的争取女权运动以及反传统主义的五四运动，也都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⑥。尽管这方面的许多进步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取得的，但是由日本人的侵略引起的巨大的社会动荡——旧秩序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迁移等等——以及组织紧密并积极致力于有效的社会根本变革的中共力量爆炸性的扩张却是导致这种进步的主要因素。

王玉川——我们常常摘录他抗战初期在鲁南游击区的报道——可能有点夸张了这种变化的突然性，然而他却有深邃的眼光，他的评论是重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

“甚至在鲁南大多数孤零零的村庄，现在也召开了妇女群众大会，农妇们亲自参加并登台讲演。农民的女儿也和高级军官、县长及其他官员同台发表演说，妇女们都感到这是值得自豪的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就在几个月之前，鲁南的妇女还仍然相信那些旧的观念，如‘妇女不应该走出大门，甚至房门’，‘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今天，她们却在讲台上讲演，在学习班学习和朗读。日本人的侵略已经把山东的妇女从厨房里赶出来了，迫使她们为了女性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而参加战斗。”^⑦

日本的一个调查人员，注意到了1944年的一本关于边区妇女如何在大街上当众发表演说、如何上前线以及如何为抗战做危险工作的书，他断言，“她们不再是昨天的妇女了”^⑧。为数众多的中国农村妇女摆脱了家庭的羁绊，积极从事影响整个社会的事务。战时日本和中国双方的原始资料都同样注意到了妇女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参加与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有关活动：进入政府机构、

参加党的组织、组织自卫队，等等^⑧。

同时，在边区，还废除了许多不能使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结果妇女获得了财产继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继承权^⑨。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压迫妇女的传统习俗被废除或者受到了抑制。尽管妇女的权利有时也受到侵犯，但党强烈地告诫干部不要采用官僚主义的手段来处理与妇女的解放有关的问题，因为那样做将很难革除旧的习惯。的确，群众必须自己意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问题还要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杨秀峰举了一个例子：

“1942年我们废除了缠足，我们发布了一个命令并且提出了‘解放双足’的口号，凡是有缠足妇女的家庭都要被罚款。这种官僚主义的方法是不会有有效的，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命令，改而采用宣传的方法让人民自己去解放她们的双足。”^⑩

妇女协会

开始，由城市知识分子、八路军妇女干部、民选委员等进行的妇女动员工作是相当无计划的，直到后来，县、区和村各级妇女协会（这是最普通的名称）才逐渐建立起来。

在组织妇女协会的过程中，干部首先在军属中展开工作，“因为她们生活更困难，她们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意识到要进行抗战”^⑪。妇女协会发展得很快，马上就变成了第二大群众组织（继农民协会之后）。根据1942年的报告，其会员在华北敌后各边区分别达到了710535人（晋察冀），834673人（晋冀鲁豫），500000人（山东），87000人（晋绥）^⑫。妇女群众组织的大规模建立，使其领导干部的来源急剧地紧张起来。十里铺的5个妇女协会委员，和县里的其他妇女干部一样，都只受过15天的训练^⑬。不过，这些被选定的负责人还是有能力从事她们的工作的，因为她们遭受过作为一个妇女、一个穷人、一个中国人会遭受的痛苦。“例如：王翠娣受到继婆婆的虐待、灾荒的折磨、地主的剥削、侵略

者的压迫，这一切，使她成为十里铺最早、最热烈地支持共产党的农民之一。”^⑭但由于干部缺乏耐心，没有充分考虑自愿的原则和妇女觉悟程度就发布命令，有时引起了对立，使工作开展更困难。党对此进行了批评。这表明对干部的训练还远不够充分^⑮。

生 产

把妇女从受歧视、受残酷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然而，如何扫除家庭中压迫妇女的传统习惯，并不是党直接和主要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以后。蔡畅在一次谈话中认为，相对说来，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是不重要的：“我们的口号不再是结婚自由和‘男女平等’，而是‘救救孩子’、‘家庭美满’以及‘营养、健康和繁荣’。”^⑯

党的主要目标，可以从1947年2月中央委员会关于边区妇女工作的重要决定中清楚地看出^⑰。这个冗长的决定几乎是以以下两点而著称的：一是对把妇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保持完全的沉默，二是把坚持生产“作为与妇女关系最密切的工作”，作为“维护她们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决定说：“妇女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的好坏是衡量妇女工作的标准”，所以，“了解和组织妇女个体和集体的生产”是妇女协会的“主要工作”。参加生产和在前线作战，同样都是参与“光荣的斗争”。然而决定也指出，妇女参加生产不仅仅是一个增加产量的问题，它还有更广泛的含义：

“提高她们的教育水平和政治地位，改善她们的生活水平并使她们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这都依赖于经济的独立和繁荣。如果妇女努力生产和厉行节约，她们以及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不仅能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起很大的作用，而且还能使妇女逐步摆脱封建压迫创造物质条件。”

另一份文件从注意中国的家庭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的角度，为党在上述决定中提倡的政策提供了正当的理由，正如迪莉娅·戴维所概括的：

“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这种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小的(纯婚姻上的)家庭，而是乡村中的‘大家庭’，它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种大家庭是正在支持抗战的农村经济的基础。所以，作为行动的基点，应该重新构造和巩固这类家庭。”^⑨

十里铺妇女协会工作中的具体而极端的例子，表明了强调生产的后果^⑩：贫农妇女虽然构成了农村妇女的绝大多数，但是老中农妇女却在生产运动中占居着领导地位。这是由于后者有熟练的纺织技术，纺织是她们主要的生产活动，她们是“劳动群众中仅有的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纺车、织机和其它设备以及原材料的人”。地主和富农出身的妇女也成为妇女协会的成员。妇女工作“倾向于只从事生产”，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全部社会目标，如男女平等、从公公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等，总之，最早阶段的妇女运动所争取实现的一切社会解放，现在大部分被忽视了。”

在妇女协会的工作变得只注重于生产方面，十里铺所达到的程度可能是少有的。虽然老中农妇女对能挣得报酬的活动持积极的态度，但她们“对于社会解放可能意味着什么，则不存在任何幻想”。或者说，只要不象对待较穷的妇女那样对待她们，她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王翠娣和其他一些缺乏组织才能的人没有能够把较穷的妇女发动起来，结果为妇女的社会解放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归于失败，演变成几乎是单一地从事生产的结局。因此，妇女协会的工作“虽然在形成群众性的妇女生产运动方面是成功的”，但“在社会问题方面没能取得生产运动那样的成效”。

党对于把妇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采取谨慎步骤的关键原因，毫无疑问是担心经济混乱会达到党无法承受的地步，至少在敌后不稳定的形势下，情况是如此。妇女解放的问题是潜在的和具有爆发性的，它威胁着相当数量的党、政、军中的男同志的婚姻。并非巧合的是，当时有一批抗战初期汇集到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妇女却在大力提倡破除旧的婚姻制度，批评党对

妇女的政策。在 1942 年中共处于最困难时期的时候，这批妇女受到了攻击^①。她们被指责为没有从现实条件出发：“有不少人（处于领导岗位的妇女知识分子干部）仅仅知道背诵‘结婚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这样的口号。”^②

党之所以极力强调妇女要从事生产活动，原因在于劳动力不足和粮食缺乏^③。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充分利用所有能够加以利用的劳动力是十分必要的^④。

妇女在生产中的主要任务是纺纱织布。起初在一些地区试行过集体化的纺织生产，后来发现其效果并不太好，因为有战争环境影响，并且技术水平也太低。以后纺织生产主要改为以家庭为基础进行，有两种形式：或者由家庭一揽子完成，或者由政府供应原材料，然后向家庭购买成品并付给工钱。妇女也参加各种各样的合作生产。由于封锁和物价飞涨导致了布匹的严重短缺，而当时军队又正在急剧膨胀，对制服的需求剧增，所以不断增加纺织品的产量是很必要的^⑤。晋绥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那里大约有 125000 名妇女从事纺织生产，满足了当地 75% 的需求^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晋绥，日本人的破坏曾使纺织业的产量降至战前水平的 60%^⑦。促进生产的一个因素是开展劳动竞赛：“每天都规定定额，纺织工人对于纺不完指定数量的棉花而需在晚上加班感到羞耻。小组之间互相挑战，竞赛的结果用喇叭筒——通过‘高音喇叭’网向全村宣布。”^⑧

妇女还从事其它一些生产活动，包括为部队开办缝纫车间、发展养猪和养鸡业，参加榨植物油、皮革加工、造纸等行业的生产，提高它们的产量，等等^⑨。除了那些缺乏劳力的地区^⑩或者抢收时节，平时在地里劳动的妇女是很少的。

到抗战结束时，边区可能几乎没有哪一位妇女没有从事过这样或那样的生产活动。1941 年 2 月，即在妇女大规模参加生产之前，晋察冀的有关指示要求把 25—50% 的妇女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在取得了一些成效的地区，这个百分数被超过了。^⑪

党的原始资料多次宣称：妇女参加生产，大大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因为她们为自己创造了收入，亦即为她们的家庭创造了额外的收入，此外她们还成为使边区经济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②。就十里铺来说，“她们经济地位的这种改善是妇女解放的最有力的因素……”^③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妇女的工作变得更重要，买棉花和卖线、卖布等活动又使妇女更积极地活动在社会舞台上^④。

政 治

妇女通过被推选为候选人以及在行政机构中任职而参与政治，大大地提高了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虽然在选举的投票表决步骤上和在工作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对众多的妇女来说，她们所参加的这些活动，向她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帮助她们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总共有81—83%的妇女报名参加了村和区的投票表决^⑤。党提供的1939—1941年期间的一些数字表明，妇女确实开始被选进政府了。

根据党的一份文件，在晋察冀边区，总的说来，县、区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妇女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在县代会成员中，她们的人数占20%^⑥。作为平均数，这些数字看起来确实很高。而对冀中7个县的一次详细调查，得到的是相当低的百分比：被选进各种村级组织的妇女分别占21.3%（代表），7.1%（村主席、书记），7.2%（委员长）；在县级政府中，妇女分别占15.9%（代表），14.3%（议长、书记）^⑦。在山西，1940年，村、县两级政权机构中妇女代表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前者是21%，后者是16%^⑧。另一个对冀西和冀中行政机关中妇女人数的统计，也反映了妇女投身于政治的情况（关于村级机构中妇女的人数，还有别的一些统计材料）：唐县的代表有三分之一是妇女^⑨——男代表939人，妇女代表447人^⑩；定县的269个村长中，有30人是妇女^⑪；

平山县 5375 名代表中，妇女代表就有 344 人；完县有 23 个村庄的村长和副村长是妇女^④；涞源县则有 186 名妇女村长^⑤；灵寿县的 339 名区代表中，妇女占 27 名^⑥。

重要的是，在变革政治经济秩序和抗日保家的群众斗争事业中，妇女的人数已经占了很高的比例。在晋察冀 1941 年选出的县代表中，农村出身的妇女占不少于三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的比例，在清苑县，这个比例是十一分之四^⑦。

战 争

比走出家门从事生产以及参加乡村的政治活动更引人注目的是：妇女投入了战争，摆脱了传统的孤立地位和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妇女在支持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她们的参战，对于支持游击战，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是非常重要的。她们参与了站岗、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救护伤员、反奸、救济、优待军属以及掀起参军热潮等活动^⑧。到 1939 年年中，设法把 15—45 岁的妇女组织成自卫队的计划收到了成效，在晋察冀，自卫队的成员很快增加到 300000 人，其中成年妇女占 55%^⑨。只 1 年以后，晋察冀参加自卫队的妇女很快增加到 1679400 人，占边区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⑩。日本人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老年妇女也为抗战做了有益的工作，甚至参加了游击队的作战^⑪。

教 育

在为妇女解放创造新的条件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提高她们受教育的水平。大力提高受过基本教育的姑娘所占的比例，则具有更长远更重要的意义。按传统的农家观念，为女儿读书花钱不值得，因为她们一结婚就离开家，和家庭来往不多了（为儿子读书而在经济上支付的开销则被看作是对将来的一种投资）。1937 年对冀中、冀西的一次调查表明，上学的姑娘的比例远远低于 20%。其中饶阳是 4.2%，安国是 17.4%，深县是 8.8%，

唐县是 5.6%^⑤。

战时边区推行的教育政策实际上对每个姑娘都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在许多地方，女生的数量接近学生总数的一半：在冀中的 28 个县中，女生比例占 43.4%（有几个县占到 45—51%），在北岳的 3 个县中，女生比例占 43—50%^⑥；在灵寿、唐县等其它 6 个县中，女生比例占 35.5%（初小）和 29%（高小）^⑦。妇女也受益于各类成人教育，例如，大多数村庄举办了妇女训练班，教学人员努力传播基础知识，有希望的妇女被提升为干部^⑧。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对于反对愚昧起了很大作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冀中就有一篇自夸性的文章，说妇女已经学完了她们三册识字课本 70% 的内容^⑨。虽然有大量的妇女相应接受了几种形式的教育，但对女教师的训练和补充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女教师中，受过系统的良好教育的人微乎其微。在小学教师中，女教师的比例数略高于 10%^⑩。使姑娘和妇女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努力，面对着这样一个消极因素——农民当中存在着反对让女子受教育的强烈的保守主义情绪，按计划招收她们入学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反对和准备

妇女在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时，也遭到其它一些方面的强烈反对。“华北许多地方的封建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妇女运动常常面临封建势力的巨大障碍。”^⑪抗战本身就是向中国社会中妇女的传统地位挑战的指示器。虽然直到 1945 年之后这种反对大男子主义的斗争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人们并不能否认妇女在经济、政治和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此外，她们受到了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这提高了她们的觉悟，实质性地改变了她们的世界观，使她们能够理解自身的力量。正象在社会的其它领域中发生的情况那样，战争的岁月使革命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全面冲破旧的篱障，抗战时期不过是必要的准备阶段。

注 释

引 言

- ①C·P·非茨杰拉德：《毛泽东和中国》（汉门滋沃斯：企鹅丛书1977年版）第60页。
- ②詹姆斯·P·哈里森：《从长征到掌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纽约：泼莱格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
- ③查尔默斯·A·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 ④唐纳德·杰林的文章明确地向约翰逊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中的农民的民族主义》，见《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2月号第269—289页（不过，他的资料仅限于山西省和1935—1937年期间）。
- ⑤李·尼哥克：《1938—1943年华北中共的根据地：抗日活动及其发展史话——关于村一级的管理与动员》（伦敦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 ⑥卡尔·依·多列斯：《华北的人民战争：1938—1943年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 ⑦片岗哲也：《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 ⑧《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卷第137—139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
- ⑨迈克尔·林赛：《一场无人知晓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伦敦：伯格斯特

隆和波义译丛书1975年版）。该书没有页码。

- ⑩国民党一词的汉语拼音缩写是KMT，其余所有摘录的名字也是根据汉语拼音改写。
- ⑪我用Balujun这一汉语拼音代替八路军（华北地区的中共正规军）一词麻烦的英文翻译。
- ⑫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胜利的赞歌》（纽约：瑞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10页。

第一章 第一节

- ①T·A·比斯恩：《1937年6月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
- ②《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151页。
- ③徐特立：《五年抗战的历史意义》，见《抗战五周年纪念册》（1942年延安出版）第73—76页。
- ④凯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当前时局最大的危机》第67—68页。
- ⑤《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6卷第167页。这部著作汇集了毛泽东写的文稿共10卷，由竹内实编辑。“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占领满洲铺平了道路。
- ⑥丁守和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也可见第20页。
- ⑦哈尔道·汉森：《人道的努力·中国战

- 争的故事》(纽约:法拉和雷恩哈特出版社1939年版)第309页。
- ⑧例如,满铁调查部:《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东京:冈崎屋书院1970年版)第163页(以下简称《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译注)。该卷共600页,完成于1940年,包括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
- ⑨满洲国军事顾问部:《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略战术,尤其它的思想战》(1941年版)第159页。
- ⑩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98页。该书首版于1940年。
- ⑪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关于晋西北匪情的调查报告》(1940年)第159页。
- ⑫《游击战争》(汉口新华日报馆1938年版)第78页。
- ⑬伊恩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55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
- ⑭L·范·斯莱克编:《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7月关于美国战争部门的报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2页。
- ⑮《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认为,中日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这场战争包括双方的战斗和建设”。这在野泽丰的文章里及其它地方被赞许地引用。《中国近现代史》第6卷:《抗日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页。作者良泽南没有调查过边区工作。
- ⑯ 见1941年6月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自救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关于文化工作的声明。译载于《思想月报》(司法部,犯罪进攻部分)1941年9月号

第193—194页。最初发表于1941年6月27日《晋察冀日报》。

- ⑰《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第127页。
- ⑱I·爱泼斯坦:第284页。
- ⑲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农业政策》(1941年版)第283页。另外参见《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略战术》第126页。
- ⑳摘自恩斯特·菲切尔:《列宁自己的话》(伦敦:爱琳雷恩、朋九恩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 ㉑李普:《何谓无拘无束的选举》,载《群众》1945年9月15日版第606页。
- ㉒石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册第481页。

第一章 第二节

- ①吉恩·切斯尼克:《1840——1949年中国的农民起义》(伦敦:赛姆和赫德森出版社1973年版)第160—161页。
- ②约瑟夫W·埃赛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约翰·S·谢伟思的第二次大战电讯集》(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247页。(以下简称《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译注)备忘录系“根据两个美国官员,一些通讯记者及20多个外国旅游者的报告写成”。
- ③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72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④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上海:凯利和威尔思出版社1941年版)第293页。
- ⑤中共的原始资料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努力。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第 47 页。朱德 1945 年 4 月在七大的军事报告中说明,到 1938 年武汉失陷为止,部分国民党军队在“许多地方”抗日是“积极的”和“英勇的”。《解放日报》1945 年 9 月 5 日第 1 版。《解放日报》有关文章的题目列入了本书的文献目录。
- ⑥《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 138—140 页。
- ⑦埃德加·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纽约:伦敦·浩斯出版社 1944 年版)第 278 页。
- ⑧同上,第 279 页。后果是悲惨的;普遍的饥荒不是真正由各方面的短缺,而是由投机商的囤积居奇造成的。到 1944 年,在自由中国(国统区),因饥荒而死的人大概和印度的差不多。甚至军队也严重地存在着营养不足的问题,据报道,患营养性疾病的士兵大约占丧失战斗力的人数的 70%,而伤员只占 30%。——同上,第 280 页。
- ⑨国统区农村问题的分析,见古岛和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京大学 1956 年 11 月版)第 503—505 页。
- ⑩西奥多·H·怀特、安娜·雅各拜:《风暴遍中国》(伦敦:维克多·葛兰西出版社 1947 年版)第 128 页(以下简称 T·H·怀特、A·雅各拜——译注)。
- ⑪同上,第 128—129 页。
- ⑫同上,第 129 页。《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 6、33、39 页。詹姆斯·E·谢尔登:《崩溃中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时代,1912—1949 年》(纽约:自由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61 页(以下简称 J·谢尔登——译注)。
- ⑬ T·H·怀特、A·雅各拜,第 135 页。例子在第 135—136 页。
- ⑭同上,第 135 页。杰罗姆·切恩:《毛和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286 页(以下简称 J·切恩——译注)。
- ⑮ T·H·怀特、A·雅各拜:第 128—129 页。
- ⑯ J·谢尔登:第 260 页。J·切恩:第 238 页。
- ⑰ J·切恩:第 240 页。
- ⑱ L·范·斯莱克编:《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89—90 页(以下简称 L·范·斯莱克——译注)。《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 53、91—92、142—143、145、148 页。
- ⑲ L·范·斯莱克:第 97 页。也可见 88 页。
- ⑳同上,第 97 页。此外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 18 页。
- ㉑ L·范·斯莱克:第 95 页。
- ㉒《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9 日第 2 版。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47 页。
- ㉓中共宣布的军队数字发生了下列变化:
- 1940 年:重庆军队 166000,伪军 80000。
- 1941 年:重庆军队 120000,伪军 120000。
- 1942 年:重庆军队 80000,伪军 157000。
- 1943 年:重庆军队 30000,伪军 180000。
- 《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22 日第 4 版。
- ㉔《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L·范·斯莱克:第 88 页。
- ㉕《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东京:冈崎屋书店 1970 年版)第 136—137 页(以

下简称《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译注)。

⑳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361页。

㉑肖向荣：《山东八路军的创造》，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2号第26页。

㉒《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217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㉓L·范·斯莱克：第97页。

㉔谢伟恩：“我们全体人员都有同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不同的国家，遇到了不同的人民，不可否认的是在精神和风气上发生了变化……士气高昂。战争似乎真正把人们联系起来。这里没有失败主义情绪，而是对战争充满信心，人们并不厌烦战争。”《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179—180页。此外可见T·H·怀特、A·雅克拜的著作。哈里森·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冈特·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纽约：韦特利尔·豪思出版社1945年版)。

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71页。

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384页。

中共领导人早期的阐述对战争将发生伟大的变化这一点作了肯定的设想，然而也有很不肯定的因素。周恩来在1936年2月告诉埃德加·斯诺说：“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现在正走向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抗日运动中共将有可能掌握政权，将来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群众运动的发展程度以及动员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程度。”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日记：1936—1945》(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㉗J·贝尔登：第46页。

㉘詹姆斯·伯特伦：《华北前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年版)第422页。

“小鬼”一般指12—16岁的少年。

第一章 第三节

①《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136—137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②同上，第143页。

③同上，第139—140页。

④同上，第140、143页。

⑤《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以下简称《解放区概况》。此外见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9页，以下简称《人民解放军》。《解放日报》1945年5月9日第1—2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02、214页。除非另作说明，以下提及的“三阶段”理论都出自上述材料。

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4版。据说解放区人口到抗战最后一年已增加到1380万。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5页(以下简称李一叶——译注)。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政治部编：《冀中抗日战争简史》(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⑧共产党正规军的力量：

1937年：30000a, 40000b, 45000c,
80000d, 90000e;

1938年：120000f, 156700d;

1939年：270000d;

1940年：400000d；
1941年：303000g, 305000d,
1942年：300000h, 340000d；
1943年：339000d；
1944年：320800d, 470286i(至12月)；
1945年：600000j(春天)。
a)《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67页。
b)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18页(以下简称何干之——译注)。含115师、120师和129师。
c)《人民解放军》第219页。李一叶：第55页。这两个史料也包括115师、120师和129师。
d)有1937—1944年数字的——薛子正：《论战略反攻中的解放区战场》载《群众》1945年7月10日版第440—441页(以下简称薛子正——译注)。只有1940年数字的——李一叶：第55页；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48页；《解放区概况》第2页。
e)T·A·比斯恩：《1937年6月在延安》第39页。朱德告诉作者：“在我们用无线电通讯直接指挥的地区，红军数目达9万，各地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力量……他们分散存在，每批1000—3000人，所以很难估计他们的总数，这些分散的组织的通讯状况也不好。”
f)E·斯诺：《红色中国随记1936—1945》(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数字是博古向斯诺提供的。
g)何干之：第248页。
h)《解放区概况》第2页。
i)董必武：《中国解放区实录》(旧金山：合作出版社1946年版)第8页(以下简称董必武——译注)。该书特

别提到，当时陕甘宁宣布已有军队80549人。

j)《人民解放军》第219页。

- ⑩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一位美国妇女与八路军在一起》(伦敦：维克托·格兰西出版社1938年版)第143页。
- ⑪J·伯特伦：《华北前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年版)第228页。
- ⑫《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5卷第273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集》——译注)《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修订本第44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⑬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最近华北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概况》(北京：1939年版)第46页。
- ⑭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158页。
- ⑮外务省东亚局：《最近的中国共产运动》(1937年版)第9—11页。
- ⑯中华民国新民会：《河北省国共两党政治工作概况》(1938年版)第3—4页。
- 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东京：1968、1971年版)第1卷第215—216页(以下简称《北支治安战》——译注)。
- ⑱《中国共产党的概况、动向及对策》，载《情报》1942年1月1日第57号第4页。
- ⑲日本外交协会：《最近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42年版)第3页。
- ⑳日本人在铁路沿线的据点也受到攻击。何干之：第231页。
- ㉑《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383页。

- ⑳同上,第373页。
- ㉑《赤色晋察冀边区的真相》,载《东亚》1941年10月1日版第52页。
- ㉒《北支游击战区的经济情况》,载《东亚》1941年3月1日版第100页。
- ㉓《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第1版,9月4日第1版,9月9日第1—3版。
- ㉔《人民解放军》第123页。
- 到1940年12月,毛写道:“只要军队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这是必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449页。
- ㉕从1941年开始,更多地是依靠县以下的游击队和民兵,直到1942年底或1943年,分散的游击队和民兵的力量才集中起来。
- ㉖薛子正:第440—441页。《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219页。
- 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19页。
- ㉘《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第1版。
- ㉙董必武:第2页。
- ㉚《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第1版。
- ㉛《解放日报》1944年8月28日第1版(社论)。也可见1944年11月26日第1版(社论)。
- ㉜《解放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3版。
- ㉝《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

丛书1975年版)第245—246页。谢伟思断言:“在华北和华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共产党控制区,现在都有美国军方的观察家访问,美国空军的飞行员也受到保护。所有的证据都证实了关于共产党已经控制‘占领区’的乡村的说法”。第244页。

- ㉞井平己之助:《老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胎动中》(东京:1976年版)第147—150页。
- ㉟H·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第170页。
- ㊱齐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述。《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150页。

第一章 第四节

- ①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载《解放》1939年5月30日版第3页。
- ②《北京周报》(1965年9月3日版)第16页(以下简称《北京周报》——译注)。
- ③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④《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97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⑤同上。
- ⑥《北京周报》第16页。
-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1页。
- ⑧外务省调查局:《中国概论》(东京:1949年版)第21页。
- ⑨满铁调查部:《中国游击运动现状》(大连:1939年版)第156—160页(以下简称《中国游击运动现状》——译注)。
- I·爱泼斯坦:《在北方的旅行》,载斯图

- 尔特·杰尔特编：《中国共产党人》（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46年版）第71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该文是1944年春访问晋西北三星期后写成的。
- ⑩《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6卷第196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集》——译注）。
- ⑪《中国游击运动现状》第159页。朱德：《抗战与华北》，载《伟大的新中国》（重庆：中华编译馆出版部1939年版）第300页（以下简称朱德——译注）。
- ⑫A·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360页。
- ⑬I·爱泼斯坦，第71页。
- ⑭同上。
- ⑮《中国游击运动现状》第160页。
- 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5页。
- 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329页（以下简称《北支治安战》——译注）。
- ⑱吕正操：《从冀中区的经验谈平原游击战》，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号第37页。
- 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页。
- ⑳吕正操的文章，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译注）第9号第50页。周士第：《论平原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号第35页。刘志坚：《平原游击战争中的部队》，见《前线月刊》1940年9月版第31页。朱德：第300页。张冰之编：《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与经验》（上海：1938年版）第119—120页。
- ㉑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编：《河北民兵斗争故事》（天津：河北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页。
- ㉒《解放日报》1944年7月11日第4版。
- ㉓H·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第142页。
- ㉔J·切恩尼克斯：《1840—1949年中国的农民起义》第67页。
- ㉕同上，第68页。
- ㉖同上，第104—105、126页。
- ㉗《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356—357页。
- ㉘刘少奇在抗大作的《论华北工作区的工作经验》的讲演，载《抗大》（延安：1938年3月号），以下简称《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亨利·G·施沃兹译：《刘少奇和“人民战争”：1938年创建根据地的报告》（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57页。语录摘自第37页。
- ㉙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109页。
- ㉚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66页。
- ㉛北京发行的报纸。摘自野上厦：《华北抗日基本区的考察——它们的危机》，高士原璋、野泽丰编辑：《日本法西斯与东亚》（东京：1977年版）第185页。
- ㉜《解放日报》1941年7月14日第1版（社论）；1942年10月25日第2版（社论）；1944年7月10日第4版（社论）。吕正操：《从冀中区的经验谈平原游击战》，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8号第38页，在文中引用的是以上的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我们的对策》（1942年版）第208页。
- ㉝《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我们的对策》第212页。
- ㉞左权：《“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载

《解放》1939年2月11日版第19页。
⑤齐武，第152页。

第一章 第五节

- ①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36页。
- ②《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晋察冀支部》（1941年版）第31页。也可见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15页。（以下简称聂荣臻——译注）。
- ③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2—123、171页。
- ④为了简便，以下凡用“边区”一词时，都包括山东。
- ⑤《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38页。关于毛泽东对晋察冀边区所取得的成就的称赞，请看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序言。
- ⑥《游击战争》第164—165页。据刘少奇说，人口达到1200万，县数达到39个。《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38页。
- ⑦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1、3页（以下简称陈克寒——译注）。
- ⑧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24页。以下简称《解放区概况》。
- ⑨同上。
- ⑩《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第4版。
- ⑪《解放日报》1943年1月24日第2版。
- ⑫《解放日报》1941年8月11日第2版，1942年7月9日第3版。关向

应：《论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载《解放》1939年12月11日版第5页。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四周年》，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版第3页。

- ⑬一般指晋察冀的三个地区。保井三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晋察冀边区的形成和发展》，载《历史学研究》1971年10月（特刊）第153页。《解放区概况》第26—27页。C·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力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104、113—115页（以下简称C·约翰逊——译注）。
- ⑭这只是关于极端复杂的形势的一个概括性提纲，特别是在山西。详细报道请看：保井三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载《历史学研究》1971年10月（特刊）第154—157、161—162页；保井三吉：《抗战初期的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载《历史评论》1972年11月第269号第63、65—68、76—78页。内田知行：《牺牲救国同盟会历史介绍——山西抗战开始时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大众动员》，载《当代史》1975年8月第6期第55—97页。中共背景材料：《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11日第4版；陈克寒：第20—21页；聂荣臻：第12、14—16页。
- ⑮《解放区概况》第38—39页。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⑯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48页

(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①同上。

②《解放区概况》第39页。

③齐武：第47页。

④J·贝尔登：第52—53页。

⑤《解放日报》1941年7月25日第2版。丁玲：《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5—36页。此小册子系1944年写成。齐武：第48—50页。《解放区概况》第62—63页。

⑥《解放区概况》第38—39页。

⑦《解放日报》1944年7月16日第4版，贺龙：《晋察冀之今昔》，载《解放》1940年2月29日版第19页。

⑧《解放区概况》第94—95页。

⑨《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第4版。

⑩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19页。

⑪该报导见C·约翰逊：第105—109页。

⑫《解放区概况》第94、98、103页。
《解放日报》1942年4月12日第2版，1943年7月8日第4版，1944年7月16日。

⑬更准确的数字是2900万，《解放区概况》第79页。

⑭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13页。

⑮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组织》第90—91页。伊文思·F·卡尔逊的著作：《中国军队》（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0年版）的附录，第48—130页。这份有价值的材料，用该学院编辑的话说，“是由一位以前居住在华北的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写的，他和鲁南一支游击队在一起达几月之

久。这样，他就能够对游击队控制区的社会和军事组织进行直接研究”。第84页。

⑯中共指责国民党组织了包括地主在内的另外一些人进行“大规模叛乱”，反对范的部队。齐武：第305—306页。C·约翰逊认为日本人打败了游击队但并无证据能够加以说明。第11页。

⑰《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日第4版。肖向荣：《山东八路军的创造及其经验》，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2号第20—25页。《解放区概况》第84、86页。

⑱《解放日报》1944年7月18日第1版。

第一章 第六节

①L·范·斯莱克在《敌人和朋友——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中的统一战线》一书中考查了这一时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8—91页（以下简称L·范·斯莱克——译注）。

②参见康拉德·布拉特：《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纪实》（伦敦：乔治·艾伦与安温1959年版）第245—247页。

③陈端生：《1912—1949年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12—115页。

④《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216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⑤《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34页。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1937—1942》（延安：1942年版）第55页。以下简称《抗战以来》。也可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0页。

-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页。
- ⑧同上，第67页。
- ⑨同上，第68页。
- ⑩《抗战以来》第55页。
- 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66—167页。
- ⑫关于在国统区如何发展党的力量。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
- ⑬L·范·斯莱克：第95页。
- ⑭统一战线协定签订一周后，毛说到国民党的统治“还是十七年来的一套……过去的一套仅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相适应……”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页。
- ⑮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83页。
- 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42—143页。见《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9卷第65—66页。当英文译本与原文不同时，两者都列出。
- 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2页。
- ⑱同上，第433页。
- ⑲同上，第438页。
- ⑳同上，第441页。
- ㉑毛在1944年7月对新闻记者格仑瑟·斯坦的谈话。引自J·埃塞雷克编辑的访问记：《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255页。
- ㉒例如，《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28页。
- ㉓周恩来：《七七以来》（重庆：新时代出版社1941年版）第9页。一年后党的提法并没有变化：“中国共产党承认蒋总司令不仅仅是抗战的领袖，也是战后将要建设的新中国的领袖。”《抗战五周年纪念》第5页。
- ㉔《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 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页。
- ㉖同上，第41页。“所有阶级的”这个词在原文本中没有，但在毛的思想中看来确实有这个意思。见《毛泽东集》第5卷第270页，并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0页相对照。
- 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15页。
- ㉘同上，第456页。党经常重复这一点。
- ㉙《彭真同志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载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1946年版）第44页。以下简称《彭真同志》。
- ㉚同上，第49页。
- ㉛对此有许多论述，只举几个例子就足够了：《解放日报》1941年3月10日第1版（社论）；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载《解放》1939年5月30日版第5—6页；《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告边区同胞书》，载《解放》1939年10月30日版第4—5页；《游击战争》第30页。
- ㉜《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第4版。陈克寒：《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版第50—51页。
- ㉝《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日第4版。
- ㉞《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6页。
- ㉟丁玲：《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7页。
- ㊱邓小平认为，必须反复强调的主题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加强了各阶层的团结”。《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第4版。陈克寒对这一政策特点的论述是很好的。中共官方的概括是：“既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又结束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论，这对双方都

- 有利。”《模范抗日根据地》第26页。
- ⑳《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4版。关于这些权利的授予，见晋察冀边区宪政委员会编：《现行法令汇集》（1945年版）第2页。
- ㉑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政治工作论丛》（1941年版）第1卷第66页。
- ㉒《毛泽东集》第6卷第248页。彭德怀：《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载《解放》1939年10月30日版第12页。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载《解放》1938年10月31日版第10页。杨尚昆：《抗日根据地的强化及其各种基本政策》，载《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84—85页，日本人翻译的中文材料（以下简称杨尚昆——译注）。
- 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29页。
- ㉔杨尚昆：第84—85、89页。还可看T·A·比斯恩书中周恩来对此问题的阐述，《1937年6月在延安》第47页。
- ㉕《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3日第1版（社论）。
- ㉖《解放日报》1942年7月8日第4版。方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1945年6月1日版第346页。《彭真同志》第53—54页。关于中共为什么能得到地主的合作，聂荣臻回答：“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我们的同盟者。地主担心如果日本人打赢的话，他们就会失去昔日所有的东西”。伊文思·F·卡尔逊：《中国的两颗星》（纽约：多德，迈德1940年版）第224页。
- ㉗《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第4版。
- ㉘H·汉森：《人道的努力》第308—309页。
- ㉙《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8页。或者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资产阶级和所有一致要求保卫我们的祖国的人……”，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 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 ㉛《毛泽东集》第6卷第248页。
- 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0页。
- ㉝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01页。
- ㉞《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2页。
- ㉟同上，第422—423页。
- ㊱同上，第424页。
- ㊲同上。
- ㊳同上，第424—425页。
- ㊴同上，第425页。
- ㊵同上，第426页。
- ㊶同上，第427页。
- ㊷同上，第467页。
- ㊸同上。
- ㊹同上，第290页。
- ㊺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52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
- 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3页。
- ㊼同上，第425—426页。
- ㊽同上，第422页。当出现国民党准备投降或者抗日力量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时，团结抗战的呼声特别高。例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同上，第254页。
- ㊾克莱尔和威廉·班德：《龙的利齿——两年来的中国人民游击战争》（伦敦：艾伦和安温1947年版）第148页。
- ㊿杨尚昆：第85页。

- ⑧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关于冀中、冀西、冀南中共争取群众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40年版）第1页。
- ⑨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301页。
-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4页。
- ⑪杨尚昆：第90页。
- ⑫《抗战以来》第112页。
- ⑬《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6页。括号是译者所加。
- ⑭《抗战以来》第112页。
- ⑮I·爱泼斯坦：第285页。
- ⑯同上，第257页。
- ⑰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第11页。
- ⑱I·爱泼斯坦：第285页。
- ⑲同上，第254—256页。
- ⑳《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杨尚昆：第90页。
- ㉑宋劭文的报告的译本载于《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
- ㉒《彭真同志》第44页。
- ㉓杨尚昆：第90页。
- ㉔《彭真同志》第44页。
- ㉕同上。
- ㉖A·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355页。
- ㉗I·爱泼斯坦：第255页。
- ㉘彭德怀曾经于1940年宣称：“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工人反对资本家或者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这是不准确的。见《三年抗战与八路军》第2页。
- ㉙《彭真同志》第53页。
- 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6页。
- ㉛晋冀鲁豫边区调查研究室：《太行区1944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韬奋：1944年版）第30页。

第一章 第七节

- ①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4页。
- ②同上，第124—125页。
- ③《彭真同志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载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1946年版）第54页。
- ④同上。
- ⑤张冰之：《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及经验》（上海：1938年版）第152页（以下简称张冰之一——译注）。
- ⑥J·伯特伦：《华北前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年版）第363页。
- ⑦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30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⑧伊尚贝尔和戴维·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治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83—84页。这本包括了1937—1947年情况的最有用的书所使用的材料，是作者与其在中国农村的同事们在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期间搜集的。
- ⑨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73页。
- ⑩《星火燎原》（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册第79页（以下简称《星火燎原》——译注）。
- ⑪三崎良夫：《中共在华北的最近活动情况》（1941年版）第44页。
- ⑫张冰之：第152页。
- ⑬王五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95页。
- ⑭同上，第94页。
- ⑮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1日第5版。

- ⑮《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5页。
- ⑯约翰·H·博伊尔，《1937—1945年战争中的中日双方——合作的策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84—85页（以下简称J·博伊尔——译注）。
- ⑰《解放日报》1942年8月12日第3版。
- ⑱J·贝尔登：第165页。
- ⑲同上，第166页。另外，关于通敌的内容，见第30—31、164—169、175—176、223页。也可见《西线血战记》（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第30页；唐纳德·G·吉林：《1911—1949年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61—262页。
- ⑳乔治A·泰勒，《为华北而奋斗》（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社1940年版）第77、80、151页（以下简称G·泰勒——译注）。
- ㉑《解放日报》1942年2月13日第3版。
- ㉒林彪：《华北正规战与游击战》，载《伟大的新中国》第348—349页。
- ㉓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页。
- ㉔《解放日报》（1944年1月17日第1版（社论））。
- ㉕《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1版。
- ㉖J·博伊尔：第316页。
- ㉗林肯·里：《1937—1941年的华北日军》（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 ㉘《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第3版。
- ㉙《解放日报》1944年7月18日第1版。
- ㉚J·博伊尔：第316页。
- ㉛J·埃塞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54页。
- ㉜《解放日报》1941年9月21日第3版。
- ㉝《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 ㉞《星火燎原》第7册第247页。
- ㉟C·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势力》（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1—42页。
- ㊱同上，第43页。
- ㊲J·博伊尔，第83—84页。
- ㊳G·泰勒：第71页。
- ㊴摘自J·博伊尔：第95页。参见《新社会》第92—95页。
- ㊵同上，第89—90页。
- ㊶以北京为基地的《新民报》，这样评论了王克敏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信奉：“当我们想到这，我们就不寒而栗。”同上书，第105页。
- ㊷同上，第5页。博伊尔在188—191页上探讨了王克敏背叛的原因。
- ㊸摘自上书，第298页。
- ㊹博伊尔写道：“王的活动从未站稳脚跟，也从未得到承认……”第293页。对于日本人来说，宁愿要蒋介石，而不愿要王克敏。见第286、295、297页。
- ㊺《星火燎原》第7册第120、289—296页。
- ㊻《从河北省一农村看中共的农村政策》第38页。
- ㊼同上，第42页。
- ㊽《星火燎原》第7册第120、289—296页。
- ㊾《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8—49页（括号为译者所加——译注）。
- ㊿《星火燎原》第7册第120页。

- ②《星火燎原》第6册第113—115、232—233页。
- ③《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 ④《星火燎原》第6册第115页。
- ⑤李·尼哥克：《1938—1943年华北中共的根据地》（伦敦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73页。
- 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345页。
- ⑦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情调查——河北省保定道安国县第三区伍仁桥村的情况》（北京：1943年版）第90页。以下将省略该标题的后半部分。
- ⑧有关文件摘引自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第235页。该文系抗战初期郭洪涛在华北根据地参观一年后写成，已译成日文，大约100页。载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印刷所：《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东京：1942年版）第203—300页。

第一章 第八节

- 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656页。
- ②T·怀特和A·雅各拜：《风暴遍中国》（伦敦：维克多·葛兰西出版社1947年版）第69页。
- ③引自埃娜加·塞巴勒：《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31—1945年的日本人》（纽约：彭斯兰丛书1978年版）第170页（以下简称埃娜加·S——译注）。
- ④T·A·比斯恩：《日本人在中国》（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38年版）第293页。比斯恩谈到：“一个外国记者于保定陷落七天后到达那里，亲眼看到这个城市是如何被毁灭的。”

- ⑤L·范·斯莱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页。
- ⑥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⑦《星火燎原》（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173页（以下简称《星火燎原》——译注）。
- ⑧《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第4版。
- ⑨同上。
- ⑩齐武：第68—69页。
- ⑪同上，第69页。
- ⑫《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
- ⑬齐武：第70页。
- ⑭埃娜加·S：第168—169页。
- ⑮齐武：第64—65页。
- ⑯《星火燎原》第6卷第228页。
- ⑰《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
- ⑱《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⑲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河北民兵斗争故事》第45页。
- ⑳齐武：第64页。
- ㉑《抗战故事：开火》，见S·格尔德编辑的中共材料的译文：《中国共产党人》第251—252页。
- ㉒丸山正雄：《现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和行为》（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6—19页。还可见第64—65、113—115页。
- ㉓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2页（以下简称丁玲——译注）。
- ㉔《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第4版。
- ㉕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3—64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㉖齐武：第164—165页。

- ②《解放日报》1941年12月7日第1版(社论)。
- ③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明公司1947年版)第16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
- ④中共出版《抗战五年的损失》,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2卷第274页。
- ⑤齐武:第164页。
- ⑥同上。
- ⑦《华北水灾战祸调查报告〈3〉》,载《满铁调查日报》1938年7月第92,113页。报告第一部分于5月发表,第二部分6月发表。以下简称《华北水灾》。
- ⑧丁玲:第43页。
- ⑨J·贝尔登:第61页。
- ⑩齐武:第162页。
- ⑪《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第4版。
- ⑫《解放日报》1942年4月21日第3版,1943年7月8日第4版,1944年7月17日第4版。
- ⑬《解放日报》1942年4月12日第2版。
- ⑭《解放日报》1942年4月21日。
- ⑮《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
- ⑯《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⑰I·爱泼斯坦:第162页。
- ⑱齐武:第162页。
- ⑲《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第4版。
- ⑳《解放日报》1942年4月21日。
- ㉑李新:《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27页。
- ㉒《华北水灾〈2〉》第193页。
- ㉓同上,第206页。
- ㉔治安参谋司:《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我们的对策》第128页。
- ㉕《解放日报》1942年4月12日,1943年7月8日,1942年4月20日第3版。
- ㉖晋察冀边区生产委员会编:《解放区的农业生产》(1946年版)第2页。
- ㉗《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
- ㉘《新解放区的群众生产》第2页。
- ㉙《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 ㉚此为1945年的《华北年鉴》的估计。引自赵国春:《1921——1969年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新德里:亚洲出版社1960年版)(以下简称赵国春——译注)第16页。
- ㉛齐武:第163页。
- ㉜I·爱泼斯坦:第162页
- ㉝《华北水灾〈1〉》第158页。
- ㉞L·范·斯莱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72页。
- ㉟《华北水灾〈1〉》第160、163—164页;《华北水灾〈2〉》第193、199、203页;《华北水灾〈3〉》第92、99页。
- ㊱《华北水灾〈2〉》第205页。
- ㊲《华北水灾〈1〉》第167页。另外的统计见第165—166页。
- ㊳《晋察冀边区情况》,见《情报》1941年2月1日第35号第65页。
- ㊴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察南地区抗日情况的调查报告书》(1940年版)第100页。
- ㊵引自赵国春:第61页。
- ㊶这份政府报告被译成日文。这些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面文字材料,见狩屋太久郎编:《支那农村经济新动向》第240页。
- ㊷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译:《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111页。

- ⑳彭德怀：《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见《伟大的新中国》第309页。
- ㉑《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
- ㉒埃德加·斯诺：《中国的激流》，载《亚洲》1940年10月第511—512页。
- ㉓《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第4版。该文论及晋冀鲁豫边区。
- ㉔J·贝尔登：第62页。
- ㉕同上，第63页。
- ㉖同上。
- ㉗《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
- ㉘J·贝尔登：第62页。

第一章 第九节

- ①刘少奇：《论党》（北京：解放社1950年版）第98—99页。
- ②《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第3版。
- ③《解放日报》1945年4月4日第2版。
- ④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167页。
- ⑤陆定一：《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的几个重要经验》，见《解放》1939年3月20日版第29—30页。振农：《组织广大群众到抗日战线上来》，载《解放》1937年8月15日版第29页。
- ⑥《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
- ⑦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基本任务》（1945年版）第38页。以下简称《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
- ⑧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从1928年革命根据地创建后的农业税制度到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北京：财政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 ⑨《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

关于减租减息政策的重点是如何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的，参见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现行法令汇集》第189页。

- ⑩王冰编：《生产文献》（山东新书店）第41页。
- ⑪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180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也可见《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第4版。
- ⑫《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第1版（社论）。
- ⑬《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第1版。
- ⑭《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第1版（社论）。
- ⑮《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
- ⑯《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193页。此外可见《解放日报》1945年4月27日第1版（社论）。
- ⑰《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第4版。
- ⑱齐武：第85—86页。

第二章

- ①C·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力》第2、11、16—17、19页。作者在第49页最清楚不过地阐述了这个问题：“7年来，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恐怖和被蹂躏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用有效的政策以及使这些政策发生作用的组织能力来应付这种威胁的挑战。党赢得了近代任何政治党派所不曾得到的农民大众的支持”。约翰逊极力主张：农民动员起来的过程是“随着日本人的侵略和农村中由头面人物的撤离所导致的混乱状况的出现而开始的”，正是这种状

况，给中共提供了“使农民被动员起来”的有利条件；虽然“游击战确实引起了日本人的报复……但它反过来更有利于广泛地动员农民群众”。约翰逊否认了得到农民积极支持的经济政策，他并未考察这些政策及其影响，而是满足于毛泽东的一段简单语录所作的结论（“土地政策是一项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鼓励农民交租交息的两面政策”）。第16—17页。此外，约翰逊在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和阶级团结，阶级改良之间进行的“要么是，要么不是”的绝对分类，也是缺乏辩证观念和历史观念的。

- ②E·卡尔逊：《中国的两颗星》（纽约，多德，迈德1940年版）第168页。
- ③斯诺：《中国漫长的革命》（汉门，撒沃斯，朋九恩丛书1974年版）第168—169页。因为访问毛泽东时“没做记录”，这是斯诺的话。斯诺对同毛泽东的谈话所作的回忆，由中国官员作了“评论”和“修改”。也可见第147、184页。
- ④徐海东：《晋察冀抗战回忆》，载《解放》1938年5月15日版第8页。
- ⑤《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造的？》，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号第61页。
- ⑥郑光昭编：《抗战丛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页。
- ⑦《抗战故事：开火》。S·格尔德把中共材料编译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第251—252页。
- ⑧高克甫编辑：《八路军在山西》（上海：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43页。
- ⑨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18页。
- ⑩刘清扬、陈北鸥：《保卫华北的游击战》（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4页。《八路军在山西》第75页。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5页。林山：《怎样接近群众》，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号第48页。丘岗：《冀察热辽军区是怎样创造的？》，载《解放》1938年10月31日版第17页。柳林：《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载《解放》1938年9月8日版第20页。李公朴：《华北敌后》第22页。
- ⑪J·伯特伦：《华北前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年版）第361—362页（以下简称J·伯特伦——译注）。
- ⑫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110页。
- ⑬H·汉森：《人道的努力》第275页（以下简称H·汉森——译注）。
- ⑭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吉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40页（以下简称I·D·克鲁克——译注）。
- ⑮《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⑯哈罗德·J·汤普莱：《日本在中国的恐怖统治》（纽约：自由书社1969年版）第69—70页。用编者的话说，这是一个辑录，它“来自于一份题为《人们所看到的华北，1938年2月》的秘密报告，由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向他在上海的同僚提供”。此书原版于1938年。
- ⑰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8—69页。
- ⑱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第11页。

- ①《解放日报》1945年7月29日第3版。
- ②J·伯特伦：第362页。
- ③彭德怀：《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陆夫：《论阶级立场与民族力量的一致》（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64页。
- ④例如：《解放日报》1943年7月16日第2—3版，1944年8月21日第4版；陈克寒的《模范抗日根据地》第10页。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于1937年中共和国民党的斗争。一位陕西农民描述了1935年的情况：“当他们（也就是红军）来到这里时……他们总是说：‘打倒地主、土豪分田地’。他们谈了许多话，开了许多会。在会上我们老是站起来喊道：‘是啊！是啊！’但是我们并不真正相信他们有任何真正的力量。但是到了1935年4月，红军打败了一支反革命的地主武装民团，把他们赶出10里地……从那以后，红军常来，他们也镇压其他的反革命分子。这时，人民看到了红军还是有力量。因此我们不再向城里交税交粮，而是组织起我们自己的游击队。”简·迈德尔：《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汉门滋沃斯：朋九恩丛书1967年版）第107页。
- ⑤《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200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9卷第172页。
- ⑥《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
- ⑦《彭真同志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载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43页。以下简称《彭真同志》。
- ⑧《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5页。括号号为译者所加。
- ⑨彭德怀：《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载《伟大的新中国》第309页。《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指南》（解放社1939年版）第6卷第99页。
- ⑩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10页。
- ⑪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108页（以下简称王玉川——译注）。
- ⑫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势力调查报告》（东京：冈崎屋书院1970年版）第163页。
- ⑬黄远：《晋东南的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载《解放》1940年3月31日版第11页（以下简称黄远——译注）。
- ⑭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68年版）第274页。
- ⑮黄远：第11页。
- ⑯该文最初出现在1938年5月14日的《群众》上，出狩屋久太郎编译在《支那农村经济的新动向》中。见后者第163页。
- ⑰《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29页。
- ⑱《彭真同志》第43页。
- ⑲《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⑳例如可见张冰之编：《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及经验》第152—154页。
- ㉑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上的农村革命政纲》，载《解放》1937年7月15日版第35页。
- ㉒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1937—1942年》第112页。
- ㉓N·韦尔斯：《我的延安日记》（康涅狄格·麦迪生1961年版）第31页（以下简称N·韦尔斯——译注）。

- ⑫《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⑬引自满铁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301页。
- ⑭《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日第4版。
- ⑮秋江、陆冶编辑：《西线战绩》，（汉口：大时代书店1938年版）第50—51页。
- ⑯I·D·克鲁克：第34页。
- ⑰《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60—161页。
- ⑱《游击战争》第73页。
- ⑲摘自D·吉林：《军阀》第251页。
- ⑳I·D·克鲁克：第34页。
- ㉑王玉川：第91页。
- ㉒同上。
- ㉓同上，第91—92页。
- ㉔同上，第92—93页。
- ㉕J·埃塞雷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19页（以下简称《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译注》）。
- ㉖H·汉森：第257页。
- ㉗同上。
- ㉘任弼时：《山西抗战的回忆》，载《解放》1938年1月28日版第23—24页。
- ㉙《解放日报》1945年4月22日第3版。
- ㉚《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248—249页。
- 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0页。
- ㉜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卷第181页。
- ㉝《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第1版（社论）。
- ㉞E·斯诺：《为亚洲而战》第293页。
- ㉟T·A·比斯恩：《1937年6月在延安》第41页。

- ㊱N·韦尔斯：第31页。
- ㊲《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66—67页。
- ㊳李公朴：第15页。
- ㊴同上，第80—81页。也可见第68、89页。
- ㊵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131—132页。
- ㊶同上，第131页。
- ㊷参见本书第五章。
- ㊸J·贝尔登：第70页。
- ㊹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拂晓社1946年版）第25页。
- ㊺I·D·克鲁克：第74页。
- ㊻芳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34—335页。
- ㊼《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第4版。
- ㊽同上。
- ㊾I·D·克鲁克，第96页。晋冀鲁豫边区研究室：《太行区1944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第56页。
- ㊿A·L·斯特朗：《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载《美亚》1938年第6期第307页。

第三章 第一节

- ①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第1页，载《历史评论》1972年11月第269号第2页。
- ②C·约翰逊：《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力》（福斯坦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2页。
- ③关于这种演变的措施，参见J·博伊尔：《1937—1945年战争中的中日双方》第27—41页。
- ④埃娜加·S：《太平洋战争》（纽约，彭

- 斯兰丛书(1978年版)第70页。
- ⑤E·斯诺:《为亚洲而战》(上海:凯利和威尔逊出版社1941年版)第26页。
- ⑥彭雪峰:《论在敌人后方合作》,载《解放》1938年8月8日第14页。
- ⑦《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5日第1版(社论)。也可见《叶剑英抗战言论集》(重庆:1940年版)第93页。
- ⑧林彪:《华北正规战与游击战》,载《伟大的新中国》第353页。《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第6卷第174页。
- ⑨E·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伦敦:维克多·高兰茨公司1937年版)第109页。
- ⑩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120页。
- ⑪C·W·班德:《龙的利齿》(伦敦:艾伦和安温1947年版)第20页。
- ⑫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载《解放》1939年5月30日第3版。
- ⑬李梦龄:《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号第111页。
- ⑭G·泰勒:《为华北面斗争》(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社1940年版)第50—51页(以下简称G·泰勒——译注)。泰勒写道,据“军事专家”估计,在1938年春,有三分之一的日军来守卫他们的交通线。
- ⑮以上根据G·泰勒,第49—50页。李·尼哥克《1938—1943年华北中共的根据地》(伦敦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37—158页。
- ⑯《解放日报》1942年1月15日第3版。
- ⑰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59页。
- ⑱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

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丁玲《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第20页。

- ⑲G·泰勒:第51页。
- ⑳齐武:第47页。
- ㉑L·里:《1937—1941年的华北日军》(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6页。
- ㉒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452页。
- ㉓到1943年,日本计划把它在中国的军队减至50万。同上,第451页。
- ㉔《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1版,1944年12月31日第2版。
- ㉕井上久士:《华北》,载《日本法西斯和东亚》第192页。
- ㉖J·博伊尔:《1937—1945年战争中的中日双方——合作的策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以下简称J·博伊尔——译注)。
- ㉗同上,第103页。
- ㉘以上所述出自J·博伊尔:第102—108、110—111、116—117、130页。

第三章 第二节

- ①《叶剑英抗战言论集》第5页。
- ②D·A·比斯恩:《1937年6月在延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0页。
- ③J·伯特伦:《华北前线》第77—78页。
- ④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46页。也可见第51页。
- ⑤鲁杰编辑:《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汉口:大时代书店1938年版)第40页。
- ⑥例如可见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8、14页。周总米和王明编辑的《抗战的

- 形势与新策略》(汉口:1938年版)第49页。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第9页。《西线血战记》第30—35、40—41、44页。李公朴:《民众动员论》(上海:1938年版)第8—9、76、108页。《中国共产党工作会议报告》,载《情报》1940年1月1日第9号第80页。《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19、39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①邓小平:《艰苦奋斗中的冀南》,载《解放》1939年5月15日版第15页。
- ②刘伯承:《关于平原游击战争诸问题》,载《群众》1939年8月13日版第300页。
- ③《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载《群众》1939年7月16日版第241页。陈克寒1939年5月采访了彭德怀。
- ④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3、13页。
- ⑤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51页。
- ⑥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9页。
- ⑦柳林:《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载《解放》1938年9月8日版第20页。1939年8月毛写道:“汉奸仍然很活跃,几乎没有人被处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57页。
- ⑧罗贵波:《抗日两周年的晋西北与武装》,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号第56页。
- ⑨同上。柳林:第2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97页。
- ⑩C·泰勒:《为华北而斗争》(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出版社1940年版)第98页。
- 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战争初期,国

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治并不能遍及整个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是极不统一的。在有些地方,一些不听命令的维持旧秩序的军人掌了权,中央政府几乎不能在这些地方行使权力。新疆、华北、西南各省份都属于这个类型。”陈端生:《战时中国的地方政府》,载《太平洋事务》1943年12月第4号第445页。

- ⑫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页。
- ⑬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2页(以下简称聂荣臻——译注)。
- ⑭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90—91页。
- ⑮李梦龄:《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号第108页。此外见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14页。
- ⑯《现代史》1975年8月第6期第249页。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5页。《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第4版。甘泗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载《解放》1938年10月31日版第13页。
- ⑰H·汉森:《人道的努力》(纽约:法拉和雷恩哈特出版社1939年版)第309页。
- ⑱例如,当日本人在1938年初向晋南进攻时,几乎没有一个县长逃跑。清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势力调查报告》第138页。

第三章 第三节

- ①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

- 店1979年版)第15页。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14页。刘伯承:《关于平原游击战争诸问题》,载《群众》1939年8月13日版第300页。《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造起来的?》,载《群众》1939年3月11日版第697页。《晋察冀边区的情况》,载《情报》1941年2月1日,第35号第59页。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123—124页(以下简称王玉川——译注)。
- ②《晋察冀各级行政机构及其编制经费》,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12月1日,第6号第9页。
- ③高克甫编辑:《八路军在山西》(上海: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79页,载《情报》第35号第59页。社会问题西洋研究会:《北支中共及其军队最近的活动情况》(东京:东京东洋文化社1965年版)第42—43页,最初发表于1939年。
- ④安井山吉的文章,见《历史研究》1972年第269期第63页。
- ⑤秋江、陆治编辑的《西线战绩》第30页。
- ⑥A·史沫特莱:《中国胜利的赞歌》(纽约:瑞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189页。
- ⑦同上,第189—190页。
- ⑧王玉川:第124页。
- ⑨《解放日报》1941年7月26日第2版。
- ⑩《情报》第35号第59页。
- ⑪美国政府的一份研究情报也注意到:“当地方军队(也就是军阀)和中央军(也就是国民党)逃跑时,大多数上层官员和有钱人家也跟着逃跑。随着中共部队的推进,许多稍有钱的地主和商人家庭也逃跑了,因为他们害怕被共产党杀掉。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在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谋求安全。”L·范·斯莱克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6页。中共的一份原始资料也叙述了有钱人逃出中共地区的情况。中共常常为此痛惜,把它归因于干部中的“极左分子”的错误或者逃跑的有钱人的反共恐惧。可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常超:《晋西北的经济建设》,译载于S·格尔德编辑的《中国共产党人》第205页。
- ⑫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⑬王玉川:第114页。
- ⑭同上。
- ⑮《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第4版。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31页。
- ⑯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38页。
- ⑰见本节注⑬。
- ⑱《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39—40页。
- ⑲《西线战绩》第51页。
- ⑳罗贵波:《抗战两周年的晋西北与武装》,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号第58页。
- ㉑杉山部队:《民众抗日各团体的内容及干部培养,山西省和顺县地方共产党地区状况调查报告书》(1939年版)第42页(以下简称杉山部队:《民众抗日》——译注)。
- ㉒张冰之编辑的《抗日游击战略的理论

- 与经验》(上海: 1938年版)第152页。
- ②③满铁调查部:《上海抗战情绪调查报告》第138页。
- ④⑤齐武:第207—208页。
- ⑥⑦同上,第94页。
- ⑧⑨《解放日报》1942年2月24日第3版。
- ⑩⑪齐武:第94页。
- ⑫⑬同上。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以下简称丁玲——译注))。
- ⑭⑮《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7页。
- ⑯⑰摘自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第208页。也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冀中抗日战争见实》第71页。
- ⑱⑲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17—218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
- ⑳㉑董必武:《中国解放区实录》(旧金山:合作出版社1946年版)第22页。
- ㉒㉓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载《群众》1945年版第8页(以下简称李普——译注)。
- ㉔㉕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以下简称I·D·克鲁克——译注)。
- ㉖㉗生动的描述见李普,第4—5页。
- ㉘㉙《现行法令汇集》第68页。
- ㉚㉛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92页。
- ㉜㉝邓小平:《艰苦奋斗中的冀南》,载《解放》1939年5月15日版第15页。
- ㉞㉟《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慕伊:《晋察冀解放区的民主建设》,载《群众》1944年7月15日版第554页。
- ㊱㊲丁玲:第36页。《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概况》(延安:新华社1944年版)第23页。
- ㊳㊴《解放日报》1941年8月11日第2版。
- ㊵㊶彭德怀:《三年来的抗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第62页。
- ㊷㊸芳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6页。
- ㊹㊺陈克寒:《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载《群众》1941年7月7日版第46页。
- ㊻㊼《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4版。
- ㊽㊾《中国在敌后做了些什么?》(中马出版社1946年版)第28—29页。
- ㊿㊿王玉川,第114—115页。
- ㊿㊿彭德怀:第62页。
- ㊿㊿《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1页。
- ㊿㊿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2页。
- ㊿㊿《解放日报》1941年8月11日。
- ㊿㊿《支那抗战势力调查报告》(东京:冈崎屋书院1970年版)第179页。
- ㊿㊿《现行法令汇集》第68页。
- ㊿㊿同上,第77页。晋察冀的这份指示在1944年2月发出。
- ㊿㊿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302页。
- ㊿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汇编》第12页。
- ㊿㊿关于冀南的研究,参见今井俊:《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之考察——以冀南根据地为主》,载《史潮》1971年

6月第103期。

- ⑤安井三吉：《河北省的抗日民主政权》，载《中国社会主义史研究》第136页（以下简称安井三吉——译注）。
- ⑥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66页。（以下简称陈克寒——译注）。
- ⑦同上，第68页。安井三吉：第136页。《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2—55页。
- ⑧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66—67页。
- ⑨同上，第67页。
- ⑩《华北的救国会组织》，载《新共指针》1942年2月1日版第34页。
- ⑪《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1页。括号为译者所加。
- ⑫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关于冀中西南部中共争取群众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第31页。
- ⑬刘清扬、陈北鸥编辑：《保卫华北的游击战》第114页。
- ⑭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延安：解放社1940年版）第311页。以下简称《中国政治》。
- ⑮I·D·克鲁克：第54页。
- ⑯同上，第58页。
- ⑰杉山部队：《民众抗日》第42—43页。
- ⑱《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5页。括号为译者所加。此外，我把译者“群众团体”的译法改为“群众组织”。
- ⑲杉山部队：《民众抗日》第39—40页。
- ⑳《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55页。另外，见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69—71页。
- ㉑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19页。
- ㉒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编辑：《冀中》第32页。
- ㉓《中国政治》第312页。
- ㉔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19页。（以下简称聂荣臻——译注）
- ㉕《中国政治》第314—316页。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70页。
- ㉖郭洪涛：第233—234页。
- ㉗《中国政治》第309页。
- ㉘聂荣臻：第19页。
- ㉙《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 ㉚《中国政治》第309—310页。
- ㉛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编辑：《冀中》第61页。
- ㉜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67页。
- ㉝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37页。
- ㉞I·D·克鲁克：第52、58页。

第三章 第四节

- ①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610、656页。方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2页。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1页（以下简称李成瑞，《经济研究》——译注）。
- ②L·范·斯莱克编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07页。
- ③《北支游击区的经济情况》，载《东亚》1941年3月1日第99页。
- ④彭德怀：《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见洛甫编的《论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

- 统一致》第40—41页。
- ⑤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1页。
- ⑥高克甫编辑：《第八路军在山西》（上海：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75页（以下简称《第八路军在山西》——译注）。
- ⑦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7页（以下简称《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译注）。
- ⑧《第八路军在山西》第46页。
- ⑨《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7页。
- ⑩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1页。
- ⑪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29、30页。
- ⑫彭德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载《新闻电讯》1941年5月1日版第51—52页。
- ⑬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105页。
- ⑭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127页。
- ⑮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2页。
- ⑯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第41页。
- ⑰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92页（以下简称《北支治安战》——译注）。
- ⑲多国部队参谋部：《中国共产党运动解说》（1941年版）第98—99页。
- ⑳郑光昭编：《抗战丛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卷第87页。（以下简称《抗战丛刊》——译注）
- ㉑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页。
- ㉒齐武：第147页。
- ㉓《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524页。
- ㉔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第41页。
- ㉕齐武：第149—150页。
- ㉖《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92页。
- ㉗杉山部队：《民众抗日各团体的内容及干部培养》第33页。
- ㉘《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4页。
- ㉙《抗战丛刊》第5卷第96页。
- ㉚《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第4版。
- ㉛满洲国军事顾问部：《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略战术》第130页。
- ㉜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93页。
- ㉝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2页。
- ㉞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46页。
- ㉟同上，第47页。
- ㊱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2页。
- ㊲哈道·汉森：《中国游击队的后盾——人民》，载《太平洋事务》1938年9月第3期第293页，汉森说：“1938年3月，我用两周时间走遍了冀中游击队的区域，并带回了几乎所有的政府官方文件的副本以及我自己的观感。”（以下简称H·汉森——译注）。
- ㊳《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254页。
- ㊴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79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
- ㊵浣若的文章，见《情报》1941年5月15日第42号第58页。
- 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6页。由于30—40种不同类型的税收被取消，农民肩上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所以，这里涉及的战前的税

收，肯定只包括由政府当局所征收的土地税。

- ②《八路军在山西》第281页。
- ③《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524页。关于如何计算合理负担税收的详细叙述，见李公朴文章的第104—105页。
- ④H·汉森：第293—294页。
- ⑤1940年5月在阜平召开的干部大会提出：“公粮是边区财政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货币、饲料和粮食中，公粮是最重要的。”摘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26页。
- ⑥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页。
- ⑦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第92—93页。
- ⑧有关的文件，译载于满洲国军事顾问部编的《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略战术》第131—142页。
- ⑨郭洪涛：第279—280页。《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524页。
- ⑩《中共企图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载《剿共指针》1941年10月1日，第4号第34页。

第三章 第五节

- ①琳达·格罗夫：《创造北方苏维埃》，载《现代中国》1975年7月版。
- ②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 ③同上，第202页。
- ④同上，第19、198页。
- ⑤若不另作说明，即指齐武文章。第197、202、206页。
- ⑥《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199页。
- ⑦《冀中冀西敌占区实地见闻》，载《剿

共指针》1941年10月1日第4号第24页。

- ⑧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1937—1942》第111页。高克甫编：《八路军在山西》第279页。
- ⑨《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25日第2版。

第三章 第六节

- 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载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1937—1942》第22页（以下简称刘少奇：《抗战以来》——译注）。
- ②《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1页。
- ③满铁调查部：《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东京：冈崎屋书院1970年版）第113页。
- ④黎玉：《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载《解放》1938年8月20日版第8页。
- ⑤《游击战术与游击活动》（战时出版社）第121—122页。
- ⑥《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31页。
- ⑦摘自朱德所说：“自发地组成农民游击队来保卫自己的家乡……”秋江、陆治编：《西线战绩》第30页。此外见《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造起来的》，载《群众》1939年3月11日版第695页；柳林：《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载《解放》1938年9月8日版第20页；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版）第7页（以下简称聂荣臻——译注）；《现代史》第249页。
- ⑧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军事》（延安：抗战书店1940年

- 版)第244页。
- ⑨《现代史》第255页。
- ⑩聂荣臻：第8页。
- ⑪高克甫编：《第八路军在山西》(上海：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137—138页。
- ⑫聂荣臻：第8页。
- ⑬《群众》1939年3月11日第695页。
又见张冰之：《游击战争的理论及经验》(上海：1938年版)第105页。
- ⑭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⑮林彪：《华北正规战与游击战》，载《伟大的新中国》第350页(以下简称林彪——译注)。
- ⑯《游击战术与游击活动》第122页。
- ⑰李梦龄：《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期第109页。刘少奇：《抗战以来》第22页。
- ⑱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98—99页(以下简称王玉川——译注)。
- ⑲聂荣臻：第9页。
- ⑳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115页。
- ㉑《现代史》第249页。
- ㉒聂荣臻：第8页。
- ㉓今井骏已经考察了冀南土匪的不同的种类，社会出身和社会活动。见《史潮》第39—40页。
- ㉔在处理与秘密社团的关系时提出了下列方法：仔细地研究它们，用纪律约束它们的行为；如果它们受到进攻，就援助它们；通过政治工作来改变它们的迷信行为；如果它们继续支持日

- 本，就消灭它们，瓦解它们的组织。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99—101页。
- ㉕《群众》1939年2月11日版第695—696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113页(以下简称《政治工作论丛》——译注)。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13页。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第2号第101页。
- ㉖见吉恩·切斯尼斯克：《中国的秘密社团》(香港：海因诺曼教育丛书1971年版)第182—184页。
- ㉗王玉川：第106页。
- ㉘聂荣臻：第12页。
- ㉙《政治工作论丛》第214页。此外见聂荣臻，第9、11—12、47、113页；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13页。
- ㉚肖向荣：《山东八路军的创造及其经验》，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2期第27页。
- ㉛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㉜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的武装部队》，载《解放》1938年7月1日第49页。罗瑞卿：《动员时的政治工作》，载《解放》1938年4月5日版第12页。《政治工作论丛》第170页。《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第4版。
- ㉝刘少奇：《抗战以来》第22页。《政治工作论丛》第113页。
- ㉞刘少奇的文章，见《解放》第49页。
- ㉟同上。
- ㊱《政治工作论丛》第120页。
- ㊲《罗瑞卿同志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载《前线月刊》1940年12月第24页。

⑳《政治工作论丛》第 157 页。

㉑《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428、520 页。

㉒《政治工作论丛》第 158 页。

㉓同上，第 158—159 页。物质困难无疑是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始终的。关于特别困难的 1941—1943 年，贝尔登写道：“中国共产党坦率地对我承认，在这三年中，在政府里、军队里甚至党内存在着开小差的现象。”第 64—65 页。

㉔《政治工作论丛》第 159 页。

㉕刘少奇的文章，见《解放》第 50 页。

㉖《政治工作论丛》第 120—121 页。

㉗甚至在 1940 年在军事上遭受大的挫折之前，伤亡上升的趋势也很明显，

	死	伤
1937 年	8260	17726
1938 年	7351	20086
1939 年	20811	20026

据《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八路军军政杂志社 1940 年版）第 57—58 页。

㉘齐武：第 132—133 页。

㉙程子华的文章，见《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9 日。

㉚《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 1970—1972 年版）第 9 卷第 92 页。《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3 卷，第 159 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㉛《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社论）。也可见八路军联防军政治部编辑：《“发展生产”，“拥政爱民”文献集》（1944 年版）第 59 页。

㉜引自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华北八路军地区》，载《太平洋事务》1942 年 6 月版第 159 页。斯特朗补充道：“尽管这种言论是最极端不过的，但这位

传教士的评论在许多这类评论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㉝刚征募来的新兵必须在打仗中学习战争的基本知识。朱德：《一年以来的华北抗战》，载《解放》1938 年 9 月 30 日版第 14 页。

㉞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 1938 年版）第 138 页。1937 年 11 月写于山西。史沫特莱还写道：“山谷、小道、河床上到处都是战士……他们行军时大约以 1000 人为单位，他们匆匆赶来仿佛是大清早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然而他们大多在夜里行军……当我们停下来给他们让路时，1000 人的部队波涌似的过去了。然后，我们走几分钟又要站在路旁为另一支部队让路……下山时，他们突然跑起来。在其它时间，他们行军也是相当快的。他们渴望狂欢，但又不能放声大哭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虽说也还有笑声，以及不时地抓住片刻机会哼上几句。”见第 129 页。

㉟H·汉森：《人道的努力》（纽约：法拉和雷恩哈特出版社 1939 年版）第 266—267 页。

㊱E·卡尔逊：《中国军队》第 37 页。

㊲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 1938 年版）第 104 页。

㊳同上，第 159—160 页。在另一个地方，史沫特莱写道：“当我们到达春远镇的时候，上千的城镇居民站在街道两旁，手里举着小旗欢迎我们。时值中午，我们听到锣鼓声，并有人喊：‘开会了，开会了！’正如大多数城镇时常所做的那样，他们以开会来欢迎八路军……”——同上，第

- 178—179页。然而，在另一些地方，当八路军到达时，村民们却逃跑了。当一得知八路军的政策以及八路军就是以前的红军时，人们都回来了，并要求战士们留下来——同上，第159、190页。但是，人民对军队的恐惧心理非常强烈。以致对八路军也有一些怀疑——同上，第160页。关于人民一开始害怕八路军，后来这种害怕心理的情况，也可见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政治部：《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胶东：新华书店1945年版）第9页。
- ⑤近藤义晴：《北支共产军的活动》（1940年版）第4、23页。
- ⑥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38年版）第259页。（以下简称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并没有标志不同地位的徽章，薪水区别也不大；关于制服、食宿，对每人都平等对待。E·卡尔逊：《中国军队》第36—37页。T·A·比斯恩：《1937年6月在延安》第71页。
- ⑦埃娜加·S：《太平洋战争》（纽约：彭斯兰丛书1978年版）第94页（以下简称埃娜加·S——译注）。
- ⑧J·贝尔登：第342页。
- ⑨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载《群众》1945年9月15日版第54页（以下简称李普——译注）。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页（以下简称李公朴——译注）。《第八路军在山西》第244页。
- ⑩多国部队参谋部：《中国共产党运动解说》第16页。
- ⑪李普：第63页。
- ⑫H·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第204

- 页（以下简称H·福曼——译注）。
- ⑬朱德：《抗战与华北》，载《伟大的新中国》第291页。王稼祥：《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载《解放》1939年1月15日版第13页。
- ⑭聂荣臻：第107页。
- ⑮这一点经常被指出来，例如《解放日报》1943年7月14日第4版：《介绍抗日根据地中的晋察冀边区》，《解放》1933年9月18日版第2页。
- ⑯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第177页。
- ⑰T·A·比斯恩：《在中国的日本人》（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2页。也可见聂荣臻：第6页。
- ⑱《解放日报》1943年8月18日第4版。
- ⑲西方人士并未找到能说明中共军队运用了苏制武器的证据。J·埃塞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351页。J·伯特伦：《华北前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年版）第431页。
- ⑳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年》，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版第6页。
- ㉑李普：第63页。《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延安：新华社1944年版）第36页。《星火燎原》第6册第115页。美国政府1944年的一份报告说：“大约80%的步枪是从日军和伪军那里缴获来的”。L·范·斯莱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96页。
- ㉒E玉川：第97页。L·范·斯莱克：第45页。E·斯诺：《为亚洲而战》（上海：凯利和威尔恩出版社1941年版）第340页。
- ㉓据说有大量的武器散布在华北民间，

- 特别是河北。见刘清扬、陈北鸥编：《保卫华北的游击战》第66页。林朗、王韬：《在战斗中的冀中抗战堡垒》，载《群众》1939年11月30日版第523页。王玉川：第97页。林彪：第347—348页。关于各阶级中武器的分布情况，见戴车的《冀南通讯》，载《解放》1937年9月6日版第162页。
- ⑳G·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纽约，韦特尔塞·豪思出版社1945年版）第309页。
- ㉑《北支游击区的经济情况》，载《东亚》1941年3月1日版第94页，西方人士对中共如何制造武器作了报道——H·汉森：第221页；J·米勒：《中国人仍然控制着华北》，载《美亚》1938年9月版第342页。
- ㉒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第129页。
- ㉓同上，第159页，也可见第251页。还有同一作者的《中国胜利的赞歌》第190、194页。
- ㉔H·福曼：第233页。此外，见H·汉森：第219页。
- ㉕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载《解放》1938年1月28日版第16页。
- ㉖《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㉗《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传奇》（北京：外文出版社1939年版）第3页（以下简称《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传奇》——译注）。
- ㉘H·福曼：第133页。
- ㉙《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传奇》第27页。
- ㉚《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1版。
- ㉛《平西敌军工作所见》，载《剿共指针》1941年11月1日第5号第10页。

- ㉜《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356页。
- ㉝山崎小佐：《关于中共军队的动向及治安情况》（1944年版）第64页。
- ㉞《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76页。
- ㉟《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205页。
- ㊱《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传奇》第18页。
- ㊲J·博伊尔：《1937—1945年的战争中的中日双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349页（以下简称J·博伊尔——译注）。
- ㊳埃娜加·S：第23页。
- ㊴J·博伊尔：第341页。
- ㊵例如，朱德：《一年以来的华北抗战》，载《解放》1938年9月30日版第12页。
- ㊶林彪：第349页。
- ㊷李公朴：第46页。
- ㊸《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76页。
- ㊹《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205页。
- ㊺A·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361页（以下简称A·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译注）。
- ㊻J·伯特伦：第249页。
- ㊼朱德的文章，见《解放》第12页。《西线血战记》第84页。
- ㊽A·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61页。
- 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载《美亚》1938年第6期第308页。斯特朗的材料可能来自任弼时。

第四章 第一节

- ①井上久士：《河北》，载《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第185页（以下简称井上久士——译注）。《解放日报》1943年5月3日第4版。齐武：《一个革命根据

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 59 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②《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5 日第 3 版,1942 年 11 月 16 日第 4 版。井上久士:第 185—186 页。《北支的治安和新民会》,载《东亚》1943 年 1 月 1 日版第 35—37 页。
-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530—533、535 页。井上久士:第 184—185 页。
- ④《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533 页。
- ⑤《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
- ⑥J·博伊尔:《1937—1945 年的战争中的中日双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3 页(以下简称 J·博伊尔——译注)。
- ⑦埃娜加·S:《太平洋战争》(纽约:彭斯兰丛书 1978 年版)第 85 页(以下简称埃娜加·S——译注)。
- ⑧同上。
- ⑨《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1942 年 7 月 4 日第 2 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 19 页。《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533 页。J·博伊尔:第 314 页。
- ⑩《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533 页。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47 页。《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1941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1942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1942 年 10 月 25 日第 1 版,1942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1943 年 7 月 16 日第 2—3 版,1943 年 6 月 2 日第 4 版,1944 年 7 月 18 日第 1 版。
- ⑪《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534 页。《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1 日第 3 版,

1941 年 12 月 28 日第 3 版,1942 年 5 月 31 日第 2 版,1943 年 3 月 14 日第 3 版。

第四章 第二节

- ①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4 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②《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社论)。
- ③齐武:第 74 页。
- ④《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5 日第 3 版。
- ⑤《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第 122 页。
- ⑥《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25 日第 1 版(社论),1942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社论)。
- ⑦齐武:第 84—85 页。
- ⑧同上,第 75 页。
- 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第 92 页(以下简称《解放区概况》——译注)。
- ⑩《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5 日。
- ⑪齐武:第 98 页。
- ⑫《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2 日第 4 版。
- ⑬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载《经济研究》1956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 ⑭同上。
- ⑮同上,第 111 页。
- ⑯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北京:财政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2—53 页。
- 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 6 页。丁玲:《129 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 1950 年版)第 39 页(以下简称丁玲——译注)。

- 《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⑬《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
- ⑭《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第4版。
- ⑮《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2版。
- ⑯《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
- ⑰《解放日报》1944年5月7日第1—2版。晋冀鲁豫党的政策的总的贯彻情况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19日第2版。
- ⑱《解放日报》1943年5月31日第2版。
- 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它提供了关于机构调整的细节。也可见《解放日报》1944年5月31日。
- ⑳《解放日报》1944年5月7日。
- ㉑齐武：第98页。丁玲：第39页。《解放区概况》第32、65页。《解放日报》1942年8月19日，1942年10月16日，1944年7月10日第4版。
- ㉒《解放日报》1942年8月19日。
- ㉓《解放日报》1944年5月7日。
- ㉔《解放日报》1943年5月31日。

第四章 第三节

- ①根据一位作者的说法，这个师的三级配置，在军事组织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体制。山下龙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页。
- ②《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第3版。
- ③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第210页（以下简称《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译注）。由于日军的扫荡和领导不得力，1942年山东一些地方的人民武装部队分散化了。朱则民：《巩固民兵工作中的组织问题》，载《特殊情报》1941年9月第2号。

- ④《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215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⑤《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第4版。该游击队的作战区域包括七个县。《解放日报》1945年5月9日第4版。“地区的”或者“地方的”部队是指那些局限于某一特殊地区的部队。李斩：《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22页（以下简称李斩——译注）。
- ⑥雅克·格尤勒马茨：《战士》，见迪克·威尔逊编的《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页。
- ⑦李斩：第23页。
- ⑧《解放日报》1944年7月28日第3版。
- ⑨例如：《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第4版。
- ⑩李斩：第22页。今井骏：《史潮》1971年第108期第52页。《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106页。
- ⑪《解放日报》1941年12月6日第1版（社论）。
- ⑫《解放日报》1941年12月7日第1版（社论）。
- ⑬《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第1版。
- ⑭《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5日第1版（社论）。
- ⑮《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
- ⑯同上。
- 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第3版。关于不愿意减少部队的情况，也可见《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许多同志”由于只知道扩大部队而不知道缩小部队而受到批评。《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第1版。（社

论)。

- ⑬《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1页。
- ⑭《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1942年10月16日第2版。
- ⑮《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
- ⑯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6—47页（以下简称丁玲——译注）。
- ⑰《解放日报》1945年2月10日第3版。
- ⑱《星火燎原》（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册第82页。
- ⑲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3页。
- ⑳《解放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1—2版。
- ㉑《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3日第3版。
- ㉒李斩：第22页。
- ㉓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民兵在贯彻土地政策和变革乡村机构的群众斗争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李云峰：《如何掌握民兵组织、群众游击战》，见《特殊情报》1944年8月版第13页（以下简称李云峰——译注）。
- ㉔《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211页。
- ㉕《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第4版。
- ㉖《解放日报》1943年2月15日第4版，1944年12月16日第1版。
- ㉗丁玲：第50页。《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1944年7月28日，1944年8月10日第4版。
- ㉘《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96—97、102页；《解放日报》1944年7

月8日。

- ㉙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39页（以下简称《中共动向实态调查》——译注）。
- ㉚《解放日报》1942年2月3日第3版。
- ㉛《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
- ㉜《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97页。
- ㉝同上。
- ㉞《解放日报》1942年11月4日第3版。
- ㉟《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
- ㊱齐武：第133页。
- ㊲《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第4版。
- ㊳同上。
- ㊴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冀中西南部》第27—28页。《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37页。
- ㊵《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
- ㊶民兵骨干中有二分之一至十分之六七的人是党员。李云峰：第13页。冀中一个村庄，在23个民兵中就有21个党员。《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
- ㊷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冀中西南部》第39页。
- ㊸《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

第五章

- ① J.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出版社1947年版）第253—254页（以下简称 J. 爱泼斯坦——译注）。

第五章 第一节

- ①E·斯诺：《为亚洲而战》（上海：凯利和威利恩出版社1941年版）第294页。
- ②《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467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③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85页（以下简称杨尚昆——译注）。
- ④同上，第86页。
- ⑤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⑥《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4日第1版。
- ⑦同上。
-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 ⑨《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4日。
- ⑩该决定由博伊德·康普顿翻译。《毛的中国：1942—1944年的整党文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61—175页（以下简称B·康普顿——译注）。以上摘自第162—163页。
- ⑪齐武：第49页。满铁调查部：《支那抵抗势力调查报告》，第179页。
- ⑫B·康普顿：第167页。
- ⑬《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第2版。
- ⑭杨尚昆：第43—94页。
- ⑮B·康普顿：第168页。
- ⑯《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0日第1版（社论）。
- ⑰B·康普顿：第170—171页。
- ⑱《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第112页。以下简称《深入群众》。
- ⑲B·康普顿的表述，见其书第31页。
- ⑳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 实态调查》第23—24页，一份关于山西和顺县的报告，宣称要指派党员去任村长。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北支中共及军队最近活动情况》第43页。这可能是一个最初的措施。在十里铺，八路军在举行选举之前就任命了行政机构以防地主操纵。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37—38页（以下简称I·D·克鲁克——译注）。虽然李公朴没有说明其地位，但他报告说，在政府机构的全体人员中有十五分之一的人是党员，见《华北敌后》第167页。
- ㉑B·康普顿：第161—162页。也可见第166—167页。
- ㉒尤其要看《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日第1版，1943年12月31日第2版，1945年1月29日第1—2版。
- ㉓B·康普顿：第162页。
- ㉔《深入群众》第112页。
- ㉕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胡公司出版社1947年版）第231页。
- ㉖以上基于詹姆斯·P·哈里森：《从长征到掌权》第291—292页（以下简称J·哈里森——译注）。
- ㉗《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第2版。
- ㉘刘少奇：《论党》（北京：解放社1950年版）第131页（以下简称刘少奇——译注）。
- ㉙《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
- ㉚《深入群众》第112页。
- ㉛山崎少佐：《关于北支中共军队的动向及治安情况》第57页（以下简称山

- 崎少佐——译注)。
- ②《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如何争取共产党员〉》(原文如此——译注)，载《思想月报》1940年2月号第141页。
- ③山崎少佐：第58页。
- ④《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7、12—13页。
- ⑤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共产党内部武装人员及党员情况，冀西调查报告书之一》(1940年版)第11—12页。
- ⑥C·多列斯：《华北的人民战争》(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4页。
- ⑦I·D·克鲁克：第92—93页。
- ⑧关于自然村，其人口在20—30人到几千甚至上万人之间。刘少奇：第129—130页。
- ⑨山崎少佐：第57页。
-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98页。也可见该书第3卷第48页。
- ⑪《毛泽东集》第6卷第244—245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98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7—48页。
- ⑬《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
- ⑭《毛泽东集》第5卷第203页。
- 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8—49页。非党干部通常并没有实权，而这就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刘少奇：第129页。
- ⑯J·哈里森：第334—335、337页。
- ⑰赵福：《谈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 ⑱齐武：第210—211页。
- ⑲18份文件的目录出自B·康普顿：第6—7页。
- ⑳M·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

- (布坎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9页(以下简称M·塞尔登——译注)。
- ㉑齐武：第210页。
- ㉒《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66页。
- 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94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80—81页。
- ㉔B·康普顿：第117—118页。
- ㉕《罗瑞卿同志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载《前线月刊》1940年12月号第25页。
- ㉖B·康普顿：第157页。
- 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页。
- 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78页。
- ㉙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考察，见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88—93页。
- ㉚刘少奇：第113—115页。
- ㉛同上。第107页。
- ㉜B·康普顿：第157页。
- 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76页。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宗派的形成，在干部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3—44页。刘少奇已经分析了产生这种山头主义思想的原因。见其书第110—112页。
- ㉞《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页。
- ㉟M·塞尔登：第194、196页。
- 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0页。
- ㊲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7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㊳《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2页。
- 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322页。
- 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81页。另一位把重点放在自然属性方面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安东尼奥·葛兰西。

他认为：“事实上，任何民族的内部关系都是一种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是‘原始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唯一的。如果要想统治他们的话，这种关系就必须被理解和想象成具有原始性和唯一性。确实，其发展的方向虽然是国际主义，但是其出发点仍然是‘民族的’。人们必须从这一出发点出发。”1933年写于狱中。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日记选》（伦敦：劳伦斯·威夏特公司1971年版）第270页。

- ①J·贝尔登：第67页。
②B·康普顿：第21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修订本第43页。
③《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4日，第3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7—122页，《毛泽东集》第9卷第25—31页。
⑤此外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58页。

第五章 第二节

- 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475—476页（以下简称《现行法令汇集》——译注）。
- ②芳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2页。
- ③迈克尔·林赛：《1938—1945年晋察冀边区的税收制度》，载《中国季刊》1970年第42期第7页。
- ④同上，第4页。
- ⑤《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1日第2版。
- ⑥李成瑞：《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6—107页（以下简称李成瑞——译注）。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版）第154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⑦李成瑞：第109页。
⑧同上。
⑨齐武：第154页。
⑩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55—256页。
⑪《解放日报》1941年9月7日第2版。
⑫鲁中行政公署：《鲁中抗日民主政权》，第38页。
⑬李成瑞：第112页。
⑭同上。
⑮晋冀鲁豫边区调查研究室：《太行区1944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第29页。下面简称《经济调查》。
⑯同上，第44—45页。
⑰《现行法令汇集》第510页。
⑱曹阔村：《1921—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54页。
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1日，1941年9月7日。
⑳李成瑞：第103—104、106页。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20页。
㉑宋劭文的报告被译载于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60页。以下简称《农业政策》。
㉒文章译载于《农业政策》第77—78页。
㉓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96页（以下简称I·D·克鲁克——译注）。
㉔《经济调查》第29页。
㉕《现行法令汇集》第510页。

- ⑳《农业政策》第80—81页。
 ㉑译载于《农业政策》第58页。
 ㉒M·林赛：《华北前线》第18页。
 ㉓李成瑞：第102页。
 ㉔I·D·克鲁克：第48—49、114—115页。
 ㉕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525页。

第五章 第三节

- ①《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
 ②《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第3版。
 ③黄远：《晋东南迫切的减租减息问题》，载《解放》1940年3月31日版第12页（以下简称黄远——译注）。
 ④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187页（以下简称《现行法令汇集》——译注）。
 ⑤《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
 ⑥《现行法令汇集》第186页。《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以下简称《彻底实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84页。
 ⑦《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⑧《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社论）。
 ⑨王冰编：《生产文献》（山东新书店）第40页（以下简称王冰——译注）。
 ⑩《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
 ⑪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⑫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哈尔滨：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171页。
 ⑬由部队编辑，1945年春发行的一本书。宣称这个运动对于克服抗战中期的严重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见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第116—117页。
 ⑭《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3、412、418—419页。
 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减租减息疑问解答》（1940年版？第18页）（以下简称《减租减息疑问解答》——译注）。
 ⑯同上，第6页。
 ⑰同上，第6、17—18页。
 ⑱《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载《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65页。以下简称《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24—425页。
 ⑲《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18页。
 ⑳《租佃关系》，译载于S·格尔德的《中国共产党人》第215页。
 ㉑《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彭真同志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载《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47页。以下简称《彭真同志》。
 ㉒《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1页。
 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㉔《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13—14页。
 ㉕方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2页（以下简称方草——译注）。
 ㉖《彭真同志》第47页。
 ㉗《解放日报》1942年4月20日第3版。
 ㉘齐武：第129页。
 ㉙同上。
 ㉚《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㉛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100页（以下简称

- 称I·D·克鲁克——译注)。
- ②《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 ③J·米勒：《中国人仍然控制着华北》，载《美亚》(1938年版)第340页。
- ④《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13、417、421页。山村嘉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的土地政策》(以下简称山村嘉夫——译注)。山本秀夫、野间清编辑的《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第123页。
- ⑤《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⑥同上。古岛和雄：《抗日时期的中共的土地政策》，载《东京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第521页。(以下简称古岛和雄——译注)
- ⑦《彭真同志》第52页。
- ⑧《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⑨《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第64页。《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2页。《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13、420页。《现行法令汇集》第201页。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547页。
- ⑩古岛和雄：第512页。山村嘉夫：第123—124页。
- ⑪方草：第342页。
- ⑫《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15页。
- ⑬《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第65页。《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⑭《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25页。
- ⑮黄远。
- ⑯《现行法令汇集》第191页。
- ⑰齐武：第128页。山村嘉夫：第123页。
- ⑱《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第67页。《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⑲黄远。王冰：第41页。
- ⑳《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㉑同上。《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21页。
- ㉒《彭真同志》第47页。
- ㉓《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王冰：第41页。
- ㉔《现行法令汇集》第188页。
- ㉕王冰：第41页。
- ㉖齐武：第120页。
- ㉗同上。《彭真同志》第47页。
- ㉘齐武：第126页。
- ㉙同上，第130页。
- ㉚黄远。
- ㉛除非另有说明，下面指的是《彭真同志》第44—46页。
- ㉜I·D·克鲁克：第100页。
- ㉝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26页。
- ㉞《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 ㉟摘自齐武：第122—123页。
- ㊱《现行法令汇集》第186页。
- ㊲《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3版。
- ㊳《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许涤新：第171页。
- ㊴《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3版。
- ㊵《现行法令汇集》第187页。方草：第342页。
- ㊶《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 ㊷齐武：第122页。
- ㊸《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
- ㊹齐武：第123页。
- ㊺同上，第122页。《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现行法令汇集》第187页。方草：第342页。
- ㊻《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 ㊼齐武：第122页。
- ㊽史敬棠等人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第1卷第355页(以下简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译注)。

- ②③ I·D·克鲁克:第99页。
- ②④ 芳草:第346页。
- ②⑤ 《解放日报》1945年2月24日第3版。
- ②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92页。
- ②⑦ I·D·克鲁克:第100页。
- ②⑧ 《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
- ②⑨ 齐武:第121页。
- ②⑩ 《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
- ②⑪ 《彻底实行》第86—87页。
- ②⑫ 同上:第87页。
- ②⑬ 《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社论)。
- ②⑭ 《解放日报》1945年2月24日。关于干部不能把农民动员起来的情况,也可见《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3版,1945年4月4日第2版。
- ②⑮ 《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3版。
- ②⑯ 古岛和雄:第517页。
- ②⑰ 齐武:第121页。
- ②⑱ 《解放日报》1945年2月24日。
- ②⑲ 《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版。
- ②⑳ 《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彻底实行》第88页。
- ㉑ 柳林:《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载《解放》1938年9月8日第28页。齐武:第126页。
- ㉒ I·D·克鲁克:第97页。显而易见,农民们对于实行有利于较穷农民的兑换率立法,态度是犹豫的:“大多数农民,特别是老年人,倾向于对会使地主生气并会遭到他们反对的事情持谨慎态度。根据他们自己长期的经验及其父辈的经验,政府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地主却会依然存在。他们担心重蹈两个年青人的复辙。”见第

62页。

- ㉓ 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出版社1947年版第252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关于战前和战后农民因害怕地主实施报复而如何限制自己的激烈行动的例子,参见:简·默戴尔:《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第185—186页;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62页。
- ㉔ 《解放日报》1945年2月24日。
- ㉕ 同上,齐武:第121页。
- ㉖ I·D·克鲁克:第98页。
- ㉗ 《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 ㉘ 引自齐武:第117页。
- ㉙ 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拂晓社1946年版)第78页。
- ㉚ 齐武:第117页。
- ㉛ 《彭真同志》第49、53—54页。
- ㉜ 齐武:第118页。
- ㉝ 《现行法令汇集》第186页。
- ㉞ 同上,第187页。《彻底实行》第33页。
- ㉟ 齐武:第130页。
- ㊱ 该文件译载于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111页(以下简称《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译注)。
- ㊲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1页。
- ㊳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8日第3版。
- ㊴ 《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
- ㊵ 王冰:第39页。
- ㊶ 《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3版。
- ㊷ 齐武:第129—130页。
- ㊸ 《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
- ㊹ 晋绥边区生产委员会编:《新解放区的群众生产》第4页。

- ⑩齐武：第131页。
- ⑪《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第1卷第462页。
- ⑫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第37页。
- ⑬I·爱泼斯坦：第284页。
- ⑭丁玲：第37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第116页。
- ⑮J·贝尔登：第79页。
- ⑯《解放日报》1945年4月22日第3版，1945年7月29日第3版。
- ⑰《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日第4版。
- 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载《美亚》1938年8月版第307页。
- ⑲《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101—102页。
- ⑳今井骏：《史潮》1971年第108号第52页。
- ㉑同上。
- ㉒丁玲：第37页。《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第23页。
- ㉓齐武：第94页。
- ㉔《解放日报》1945年4月4日。

第五章 第四节

- 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问题》。以下简称《基本政策》。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1937—1942》第27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48页。湖北大学政治经济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页。
- ②《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11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毛泽东集》第7卷第289页。
-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4页。
- ④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上的农村革命政纲》，载《解放》1937年7月15日版第47页。
- ⑤《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第1版。
-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48—249页。
- ⑦摘自J·埃塞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0年版）第253—254页（以下简称《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译注）。也可见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纽约：韦特尔塞·豪思出版社1945年版）第111页。
- ⑧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79页。
- ⑨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40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刘澜涛：《北岳区当前的农民土地政策》见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56页（以下简称刘澜涛——译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 ⑩郭洪涛：第240页。
- ⑪刘澜涛：第56页。
- ⑫同上。
- ⑬尤其要看彭真对中共党内那些主张停止土地革命，出卖农民利益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指责的回答。彭真：《晋察冀边区汉奸托派的卖国罪状》（1938年版）第13页。
- 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5卷第199页。
- ⑮《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2、4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4页。

- ⑮刘澜涛：第57页。
- ⑯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56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
- ⑰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载《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第47页。
- ⑱刘澜涛：第59页。
- ⑳同上。
- ㉑同上，第56页。
- ㉒《新华日报》文章（1940年4月25日），译载于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21页。以下简称《农业政策》。
- ㉓同上。
- ㉔H·汉森：《中国游击队的后盾——人民》，载《太平洋事务》1938年9月号第294页。
- ㉕引自《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254页。
- ㉖G·泰勒：《为华北而斗争》（纽约：太平洋研究所出版社1940年版）第112页。
- ㉗I·爱泼斯坦：第256页。
- ㉘寺内部队参谋部：《北支共产党及共产军的各方面工作》（1938年版）第7页。
- ㉙大东亚省总务局：《中共概况》（1944年版）第92页。
- ㉚《彭真同志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载《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54页。以下引用时简称《彭真同志》。
- ㉛报告译载于《农业政策》第18页。
- ㉜关于典押和其他抵押形式，参见《彭真同志》第50—52页。
- ㉝刘澜涛：第57页。
- ㉞方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载《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3页。方草提供的关于中农购买土地量

- 的数字（292.18亩），明显是错误的。我已代之以李成瑞的数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第62页。这两份资料还有其它方面的一致，括号内的数据是李成瑞的。
- ㉟《解放日报》1942年4月21日第3版。
- ㊱《农业政策》第11—12页。
- ㊲同上，第102页。
- ㊳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
- ㊴晋冀鲁豫边区研究室：《太行区1944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第11页。
- ㊵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3页。
- ㊶同上。
- ㊷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0页。
- ㊸齐武：第132页。
- ㊹刘澜涛：第57页。
- ㊺刘少奇：《基本政策》第27页。
- ㊻杨尚昆：《情报》1943年7月1日第3号第67页。
- ㊼同上，第68页。
- 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减租减息疑问解答》第38页。
- ㊾《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第4版。
- ㊿彭真：《目前边区土地和耕畜分配状况》，载《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第98—99页。
- ①《解放日报》1942年4月20日第3版。
- ②齐武：第103—104页。
- ③同上，第102页。
- ④《解放日报》1942年4月20日。
- ⑤同上。

- ⑤《解放日报》1942年2月6日，刘少奇：《基本政策》第27页。根据哈道·汉森的说法，1938年3月冀中指挥部政治部公布的规定宣称“所有的公共土地都应该分配给穷人。”汉森的话见第291页。
- ⑥刘澜涛：第59页。

第五章 第五节

- ①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彭德怀：《通讯》1941年5月1日第5期第54—55页（以下简称彭德怀——译注）。
- ②齐武：第146页。
- ③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6月15日第2号第81页。
- ④《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第4版。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7月1日第3号第62页。
- ⑤《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6日第3版。
- ⑥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57页。
- ⑦齐武：第153页。
- ⑧同上，第187页。
- ⑨李成瑞：《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1页（以下简称李成瑞——译注）。
- ⑩《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第4版。
- ⑪齐武：第152—153页。
- ⑫《解放日报》文章（1941年3月13日），转载于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26页。以下简称《农业政策》。
- ⑬李成瑞：第104、108页。
- ⑭彭德怀：第55页。
- ⑮《农业政策》第109页。
- ⑯下面关于春耕运动的情况，大量地是依据《农业政策》第108—145页。《敌占区的春耕运动》，见《剿共指针》1942年2月1日第8号第48—57页。
- ⑰该文件转载于《农业政策》第111页。
- ⑱同上。
- ⑲《剿共指针》第8号第53页。
- ⑳林明、王韬：《在战斗中的冀中抗战堡垒》，载《群众》1939年11月30日版第523页。
- ㉑《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132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㉒同上，第153页。
- ㉓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卷第340页。以下引用时简称《中国农业》。
- ㉔常超：《晋西北的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常超——译注），转载于S·格尔德：《中国共产党人》第206页。
- ㉕《中国农业》第338页。
- 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32页。也可见同上第155页。
- ㉗《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社论）。《中国农业》第342页。
- ㉘《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
- ㉙《解放日报》1944年8月3日第2版。
- ㉚王冰编：《生产文献》（山东新书店）第52页。
- ㉛《中国农业》第500、503—504页。《解放日报》1944年4月17日第1版。
- ㉜《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
- ㉝同上。
- ㉞同上。《中国农业》第430—431页。
- ㉟《中国农业》第339页。
- ㊱《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8日第3版。

- ⑳藤田正典：《第一次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载《历史学研究》1958年第216期第21页。
- ㉑《中国农业》第471页。
- ㉒《解放日报》1944年4月17日。
- ㉓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72页。
- ㉔《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89页。
- ㉕摘自埃蒂奈·贝拉齐斯：《中国文明和官僚》（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4—155页。
- ㉖E·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37年版）第134页。
- ㉗八路军联防军政治部：《“发展生产”“拥政爱民”文献集》第23—24页。
- ㉘常超：第206页。
- ㉙《解放日报》1944年4月17日。
- 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89页。

第五章 第六节

- ①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184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中共晋绥分局编辑的《组织起来，陕甘宁晋绥边区关于生产运动的文献》（1944年版）第317页。下面再引用时简称《组织起来》。
- ②《解放日报》1944年7月11日第4版。《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第7页。史敬棠等人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70页。下面再引用时称《中国农业》。
- ③《中国农业》第357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晋察冀边区的典型例子与经验介绍》第19页。下面再引用时

称《典型例子》。

- ④方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见《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5页（以下简称方草——译注）。
- ⑤《中国农业》第313—314页
- ⑥同上，第467页。
- ⑦同上，第412、674页。
- ⑧同上，第314—315页。
- ⑨《典型例子》第18页。
- ⑩《中国农业》第572页。《组织起来》第317、319页。
- ⑪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67页（以下简称I·D·克鲁克——译注）。
- ⑫I·爱泼斯坦：《北方之行》，见S·格尔德：《中国共产党人》第68页。
- ⑬《中国农业》第573页。
- ⑭《组织起来》第319页。
- ⑮齐武：第180页。《中国农业》第304—305页。
- ⑯E·J·霍布斯鲍恩：《劳动者》（伦敦：威尔顿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公司1968年版）第371页。
- ⑰《中国农业》第311、348页。
- ⑱《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第1版。
- ⑲《中国农业》第467页。《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第4版。齐武：第180页。
- ⑳I·D·克鲁克：第66—67页。
- ㉑《中国农业》第524页。
- ㉒同上，第311页。《典型例子》第49—50页。《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
- ㉓《中国农业》第601页。
- ㉔同上，第311、376、602页。
- ㉕《解放日报》1943年1月23日第4版。
- ㉖如果不另作说明的话，下面均指《中国农业》第573—577页。

⑳同上,第315页,《解放日报》1941年5月10日第3版。
㉑《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1945年5月3日第3版。《中国农业》第601—602页。
㉒《解放日报》1945年3月13—14日。
㉓《解放日报》1945年5月3日第3版。
㉔《中国农业》第602页。
㉕《解放日报》1944年5月10日。
㉖周立波:《晋察冀行》第82页。
㉗《解放日报》1945年2月28日第3版。
㉘《解放日报》1945年5月3日第3版。
㉙《中国农业》第333、674页。
㉚齐武,第181页。
㉛《中国农业》第509页。
㉜同上,第524页。
㉝同上,第672页。
㉞如果不另作说明,下面指的是《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第4版。
㉟《解放日报》1945年5月3日第2版。
㊱《中国农业》第368页。
㊲同上,第386页。
㊳同上,第333页。
㊴《典型例子》第24—25页。
㊵《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第3版。
㊶《中国农业》第329页。
㊷I·D·克鲁克,第66页。
㊸《中国农业》第673页。
㊹《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
㊺《典型例子》第24页。
㊻《中国农业》第330、378页。
㊼同上,第386页。
㊽同上,第471页。
㊾同上,第675页。
㊿同上,第674页。
①《典型例子》第47页。
②《中国农业》第181页。

③《解放日报》1945年4月3日。王冰编:《生产文献》第44页。
④《中国农业》第341、385、412页。《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
⑤《中国农业》第187页。也可见385页。
⑥同上,第331—332页。
⑦同上,第367、465页。王冰:第52—53页。《典型例子》第9—11页。
⑧《中国农业》第465页。
⑨同上,第188、330、378—379页。
⑩同上,第310—311页。
⑪同上,第348页。
⑫同上,第411页。
⑬同上,第383页。
⑭同上,第383页、386页。
⑮齐武:第183页。
⑯《中国农业》第500页。
⑰《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8日第3版。
⑱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哈尔滨: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119页。
⑲《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3版,1945年4月7日。
⑳《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
㉑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48—49页。
㉒《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第1版(社论)。
㉓《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第1版(社论)。
㉔《中国农业》第345页。
㉕《解放日报》1944年7月11日。
㉖芳草:第345页。
㉗《中国农业》第385—386页。
㉘I·D·克鲁克,第65—66页。
㉙《中国农业》第465页。
㉚同上,第385页。

- ⑧同上，第517—518页。
- ⑨同上，第387页。
- ⑩同上，第377页。
- ⑪齐武：第181页。
- ⑫《中国农业》第467页。
- ⑬同上，第509页。
- ⑭同上，第503—504页。
- ⑮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212页。以下再引用时简称《农业政策》。
- ⑯《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第3版。
- ⑰在1938—1939年间，太岳区20个县有1280个合作社建立。见《晋察冀边区敌人政策一瞥》，载《剿共指针》1941年10月1日版第13页。进展是不平衡的，到1940年，在晋察冀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那些县，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建立了合作社。而其它地方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村建立了合作社。见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65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
- ⑱《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
- 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656页。
- ⑳《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
- ㉑《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368页。
- ㉒《解放日报》1944年8月3日第2版。据说冀中有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参加组建合作社。
- ㉓齐武：第192页。《解放日报》1945年7月30日第2版。
- ㉔《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54—56页。
- ㉕郭洪涛：第266—268页。
- ㉖《现行法令汇集》第651、658—659页。郭洪涛：第269页。
- ㉗I·D·克鲁克：第50页。

- ㉘郭洪涛：第268页。
- ㉙《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
- ㉚《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1945年7月30日。齐武：第192页。《农业政策》第250页。
- ㉛《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郭洪涛：第268页。《农业政策》第214页。I·D·克鲁克：第50页。宋劭文：《晋察冀边区的经济建设》，载S·格尔德：《中国共产党人》第197页。
- ㉜《解放日报》1945年3月26日第2版。郭洪涛：第268—269页。
- ㉝《农业政策》第215页。郭洪涛：第259、265页。

第五章 第七节

- ①桑野仁：《战时通货工作史论》（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协会1965年版）第148页。以下的“川野”，指的就是此书。
- ②川野：第148页。大岛宫下：《中国大陆的货币与财政体制》（东京：亚洲经济事务研究所1966年版）第48页（以下简称宫下——译注）。
- ③《解放日报》1944年12月6日第4版。也可见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④川野：第150页。宫下：第48—49页。齐武：第148页。
- ⑤川野：第150—151页。宫下：第49页。
- ⑥宫下：第52页。
- ⑦同上。川野编：《桑野：中国的金融制度》第105—106页。
- ⑧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606页。
- ⑨《刘少奇在抗大的讲演》第44页。
- ⑩日本人以法币为交换手段来掠夺根据

- 地的资源。宫下：第48—49页。《解放日报》1944年12月6日。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44—45页。
- ①①宫下：第54页。
- ①②川野：第154页。琳达·格罗夫指的是1940年日本方面的一份原始资料。该资料“建议把日本占领区的价格水平大约提高三分之一”。《农村社会的革命：1910—1947年的高阳区》（加里福尼亚大学，未出版的1975年哲学博士论文）第222页。迈克尔·林赛试图计算一下边区货币和伪币的兑换比率，见《华北前线》第18—19页。
- ①③《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360、363页。
- ①④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1页。
- ①⑤川野：译自中国资料，第151—153页。曾玲：《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制度的优越性》。
- ①⑥川野：第153页。
- ①⑦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第71页。
- ①⑧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73页。
- ①⑨同上。
- ②①《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250页。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42页（以下简称陈克寒——译注）。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第42页。
- ②②《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提供了一个禁止和允许进出口的商品的目录及其不同的税率，见第250—251页。《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599页。彭德怀的文章，载《通讯》1941年5月1日第5号。陈克寒：第29—30页。
- ②③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630页。
- ②④《解放日报》1943年1月18日第4版。
- ②⑤同上。
- ②⑥同上。S·格尔德翻译的中共材料：《企业战线上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第218页。
- ②⑦G·泰勒：《为华北而战》（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社1940年版）第122页。
- ②⑧《企业战线上的战士》第217页。
- ②⑨《赤色晋察冀边区的真相》，载《东亚》1942年10月1日版第52页。《晋察冀边区敌之政策之一瞥》，载《剿共指针》1941年10月1日版第13页。
- ②⑩《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第4版。班兹夫妇对他们在晋察冀看到的“游击工业”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见《龙的利齿》第134—136页。
- ②⑪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上顿：小勃朗公司1947年版）第294页。
- ②⑫C·多列斯：《华北的人民战争》（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陈克寒：第3页。
- ②⑬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第42页。
- ②⑭《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599页。
- ②⑮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3月15日第2号第82页（以下简称杨尚昆——译注）。
- ②⑯《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第4版。
- ②⑰《解放日报》1942年1月24日第3版。
- ②⑱J·米勒：《美亚》1938年版第339页。班兹夫妇写道，“在日本人控制最严密的河北中部，据报道，1942年事实

上只有十分之一的棉花产区种植了棉花”，见《龙的利齿》第141—142页，原因未说。

③齐武：第158页。

④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75—276、278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杨尚昆：第63页。

⑤《现行法令汇集》第647页。

⑥同上。郭洪涛：第276页。

⑦郭洪涛：第276页。

⑧《剿共指针》1941年10月1日版第13页。

⑨郭洪涛：第276页。杨尚昆：第63页。

⑩引自L·格罗夫：第213页。

⑪井上久士：《华北》，见《日本法西斯和东亚》第182、192页。

⑫杨尚昆：第63页。

⑬引自井上久士：第183页。

第五章 第八节

①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出版1947年版）第282—283页（以下简称I·爱泼斯坦译注）。

②李新：《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25—26页。

③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217页。

④中共晋绥分局编：《组织起来》第41页。

⑤《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第1版（社论）。

⑥除非另作说明，以下关于“变工”和“爆炸”联合体的资料来自《解放日报》1945年2月1日第3版，1945年8月8日第3版。

⑦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页。

⑧H·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第220页。

⑨《解放日报》1945年2月1日。

⑩《解放日报》1945年3月2日第1版（社论）。

⑪《解放日报》1945年2月1日。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34—636页。以下简称《中国农业》。晋冀鲁豫的一些变动，见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45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⑫《解放日报》1944年6月1日第3版，1944年8月3日第2版和1945年2月2日第3版提供了详细的情节。

⑬《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第4版。

⑭《解放日报》1945年4月27日（社论）。

毛写的这篇社论，后来载于《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第3卷第275—279页，并作了重大修改，这里引用的句子被删掉了。

⑮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53页。

⑯也可见齐武：第187页。

⑰同上，第187—188页。

⑱《解放日报》1942年2月24日第2版。

⑲《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9页。
《解放日报》1942年2月24日第2版。
齐武：第188页。

⑳《解放日报》1945年2月12日第2版。

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7—200页。

㉒2月28日

- ⑳《解放日报》1944年8月6日第4版。
- ㉑《解放日报》1944年7月30日第4版。
- ㉒《解放日报》1945年3月2日(社论)。
- ㉓《解放日报》1945年1月31日第1版(社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00页。
- ㉔《解放日报》1942年2月24日。
- ㉕常超:《晋西北的经济建设》,载S·格尔德:《中国共产党人》第207—208页。
- ㉖八路军联防军政治部:《“发展生产”、“拥政爱民”文献集》第64页。
- 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3页。
- ㉘同上,第154页。
- ㉙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11页(以下简称李成瑞:《经济研究》——译注)。
- ㉚八路军山东胶东军区政治部:《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第193页。
- ㉛王冰编:《生产文献》(山东新书店)第55页。
- ㉜《解放日报》1945年2月28日第3版。
- ㉝《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8日第3版,1945年3月1日,1945年1月18日第3版。
- ㉞《“发展生产”、“拥政爱民”文献集》第34页。
- ㉟A·史沫特莱:《中国向落后开战》(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38年版)第113—114页。
- ㊱L·范·斯克莱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73页。
- 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78页。
- ㊳《解放日报》1942年2月24日。
- ㊴人民出版社编:《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回忆贺龙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也可见中共汨罗县委员会编的《任弼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 ㊵齐武:第187页。
- ㊶J·埃塞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36、114—115页。
- ㊷《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76页。
- ㊸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1页。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9页。杨尚昆的文章,见《情报》1943年5月1日第2号第107页。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85页。彭德怀:《通讯》1941年5月1日版第51页。
- ㊹《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1945年3月1日。
- ㊺《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
- ㊻王玉川:《鲁南一个典型游击区的组织》第118页。
- ㊼A·L·斯特朗:《华北八路军地区》见《太平洋事务》1941年6月第2期第163页。
- ㊽同上,第161页。
- ㊾C·多列斯:《华北的人民战争》(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页。
- ㊿M·林赛:《无人知晓的战争,华北的1937—1945年》。
- ①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页。
- ②I·爱泼斯坦:第283页。
- ③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

安战》第1卷第92页。

⑤《解放日报》1944年5月9日第3版。1944年6月1日第3版。

⑥《解放日报》1945年2月12日第2—3版。

⑦《解放日报》1944年7月30日。

⑧《解放日报》1945年4月27日。《中国农业》第648—649页。

⑨《中共的麦收保卫工作》，载《剿共指针》1941年6月15日，第1号第6—7页。

⑩《解放日报》1944年7月16日第1—2版(社论)，1944年9月16日第3版(社论)。

⑪《剿共指针》1941年6月15日第1号第8页。

⑫《星火燎原》第7册第213—214页。

⑬《敌人的粮食获取和贮藏工作》，见《剿共指针》1941年8月1日第2号第11页。

⑭《剿共指针》1941年6月15日第1号第12页。

⑮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7页。

⑯H·汉森：《人道的努力》(纽约：法拉和雷恩哈特出版社1939年版)第276页。

⑰《解放日报》1944年6月29日第4版。

⑱J·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第58—60页，提供了具体例证。

⑲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军最近活动情况》第45页。

⑳《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356页。

㉑李成瑞：《经济研究》第107页。

㉒《解放日报》1944年9月16日第1版(社论)。

㉓《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124页。

㉔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170页。

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289页。

㉖《中国农业》第503—504页。

㉗《解放日报》1945年7月29日第3版。在参阅了一份中国材料(余火生：《人民的胜利》，1956年版)后，一位研究者注意到：在共产党的巩固地区，至少30%——一些地方达70%——的劳动力参加了军。见藤田正典：《第一次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见《历史学研究》第206期第15页。

㉘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治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76页。

㉙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645页。

㉚同上，第598页。

㉛《解放日报》1945年7月29日。

㉜同上。《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122—124页。

㉝《鲁中抗日民主政权》第29页。

㉞《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122、161页。

第五章 第九节

①齐武：《一个抗日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96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1948年版)第54页(以下简称周而复——译注)。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2—93页(以下简称李公朴——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政治部编：《冀中抗日战争见实》第71页(以下简称《冀中抗日战争见实》——译注)。《赤色苏区政权的

- 构成情况》，载《剿共指南》1942年2月1日，第8号第17—18页。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18—219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
- ②周而复：第54页。
- ③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载《群众》1945年9月15日版（以下简称李普——译注）。
- ④M·林赛：《华北前线》第14页（以下简称M·林赛——译注）。
- ⑤李普：第10—11页。
- ⑥周而复：第54页。
- ⑦《晋察冀边区内部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及编制经费》，载《剿共指针》1941年12月1日第6号第10—11页。
- ⑧《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4版。
- ⑨《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第1版（社论）。人民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86页（以下简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译注）。
- ⑩《解放日报》1941年7月26日第2版。丁玲：《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5页（以下简称丁玲——译注）。齐武：第49页。
- ⑪今井骏编：《史潮》1971年第108期第50页。
- ⑫《解放日报》1941年7月25日第2版，1944年7月14日第1版。丁玲：第35—36页。
- ⑬《解放日报》1942年11月4日第1版（社论）。
- ⑭《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 ⑮C·W·班德：《龙的利齿》（伦敦：艾伦和安温1947年）第146页。
- ⑯《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 ⑰周而复：第86页。
- ⑱福岛正夫、宫坂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解放区选举法令资料》（东京：1967年版）第13—14页。摘自编者的导言。
- ⑲M·林赛：第14页。
- ⑳《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第4版。
- ㉑陈克寒：《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版第51页。
- ㉒李普：《何谓无拘无束的选举》，载《群众》1945年9月15日版第610页（以下简称李普——译注）。调查涉及了7个县。
- ㉓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第213页。
- ㉔今堀诚二：《中国的民众和权力》第94页（以下简称今堀诚二——译注）数字大概指的是会议代表人数。资料来自彭真1942年的报告。
- ㉕《解放日报》1944年7月16日第4版。包括了55个行政村。
- ㉖齐武：第95页。包括太行的三个县。
- ㉗同上。包括太行的25个村。
- ㉘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24页。在1943年和1945年进行了三次调查。最广泛的一次调查。包括了8个县的8471个村庄。
- ㉙《冀中抗日战争见实》第71页。
- ㉚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20、23页（以下简称《中国动向实态调查》——译注）。
- ㉛《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第3版。
- ㉜《解放日报》1943年4月20日第3版。
- ㉝李普：《群众》第610页。
- ㉞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第213页。

- ②今堀诚二：第94页。
- ③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第15页。
- ④李普：《群众》第610页。
- ⑤引自C·多列斯：《华北的人民战争》（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8页。
- ⑥G·泰勒：《为华北而斗争》（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社1940年版）第106页。
- ⑦陈克寒：《解放》1941年7月7日版第49页。
- ⑧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303—305页。以下简称《农业政策》。
- ⑨今堀诚二：第94页。彭真的报告。
- ⑩《农业政策》第303页。
- ⑪《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
- ⑫《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20、23页。
- ⑬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版）第36页。
- ⑭今堀诚二：第94页。彭真的报告。
- ⑮J·埃塞雷克编：《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242页。
- ⑯《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卷第418页。
- ⑰同上，第417—418、427页。《中共在敌后做了些什么？》第22页。
- ⑱《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104页。
- ⑲例如——，同上第87页；芳草：《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政策》，见《群众》1945年6月1日版第346页。
- ⑳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第79—80页。
- ㉑引自L·范·斯莱克：《敌与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52页。

- ㉒《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
- ㉓《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 ㉔李普：《谈解放区的政治与军事》第19页。
- ㉕《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22页。
- ㉖《解放日报》1942年4月12日第2版。
- ㉗《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 ㉘同上。
- ㉙《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第3版。
- ㉚《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第2版，1944年7月17日第4版。
- ㉛《解放日报》1942年4月12日，1942年7月7日。
- ㉜《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第1版（社论）。
- 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419页。
- ㉞罗贵波：《抗日两周年的晋西北与我军》，《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9期第58页。
- ㉟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81页。
- ㊱同上。
- ㊲周而复：第57—58页。
- ㊳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浩与凯甘·保罗图书1959年版）第76—78页。
- ㊴E·卡尔逊：《中国的两颗星》（纽约：多德迈德1940年版）第222页。
- ㊵同上。
- ㊶齐武：第96页。
- ㊷郭洪涛：第233—234页。
- ㊸《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第2—3版。
- ㊹齐武：第96页。
- 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68—69页。
- ㊻同上，第76页。

- ⑩同上，第76—77页。
- ⑪《太行区司法工作概况》（1946年版）第1—3页。以下简称《太行区》。
- ⑫同上，第5页。
- ⑬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大使馆事务所：《中共盐阜区第一次司法会议通过的司法法令及关于司法工作的决议集》（上海：1944年版）第39页。也可见第34—39页。译自中共的小册子《司法专刊》。
- ⑭同上。
- ⑮据说“封建势力”反对群众的观点。见《太行区》第14页。
- ⑯同上，第17页。
- ⑰同上，第14—15页。
- ⑱同上，第19—20页。
- ⑲李公朴：第86页。日本人坚持说法律案件主要与勾结有关。《平西地区敌方活动之我见》，见《剿共指针》1941年11月1日版第14页。
- ⑳《太行区》第18、23—24、30页。
- ㉑同上，第3—5页。也可见李公朴：第87页。
- ㉒《太行区》第5、10—12页。
- ㉓同上，第32—34、36—38页。另外还可见《现行法令汇集》第698页。

第五章 第十节

- ①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2卷第536页。
- ②J·埃塞雷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版）第235—236页（以下简称《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译注）。此外可参看H·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45年版）第233页。
- ③《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240页。
- ④《作为对中共进行斗争的手段的北支农业政策的重要性》，载《东亚》1942年10月1日版第66—67页。
- ⑤《北支治安战》第2卷第151—154页。
- ⑥治安部参谋司：《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对策》第255—256页。
- ⑦《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45页（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译注）。
- ⑧E·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伦敦：维克多·葛兰茨公司1937年版）第274页。
- ⑨刘清扬、陈北鸥编：《保卫华北的游击战》第115页。
- ⑩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政治工作论丛》第1卷第114页。
- ⑪引自E·J·霍布斯鲍恩：《革命者》（伦敦：阔太特公司1977年版）第166页。
- ⑫刘少奇：《论党》（北京：解放社1950年版）第120—122页。
- ⑬毛同样坚决主张：“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5页。
- ⑭同上。
- ⑮同上。
- ⑯卡尔·E·多列斯：《华北农民的动员和延安共产主义的由来》，见《中国季刊》1976年12月第68期第710页。
- ⑰无论如何，刘是不满意的。他指出：“在许多领导机关中，大多数负责干部仍是来自外地。”刘注意到，事实上干部经常被派到他们不熟悉的地区去。

第六章 第一节

- ①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6页。
- ②L·里：《1937—1941年的华北日军》（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08页。
- ③同上，第109页。
- ④教育阵地社编：《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1册第74页。第1册与第2册的内容仅限于晋察冀边区。以下简称《教育建设》。
- ⑤同上，第3页。《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第1版（社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454页。
- ⑥关于对教育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作用的阐述，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第4版。
- ⑦I·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波士顿：小勃朗公司出版社1947年版）第283—284页。
- ⑧彭德怀：《三年来的抗战》第62页（以下简称彭德怀——译注）。
- 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第3版。
- ⑩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动向实态调查》第20、22—23页。
- ⑪《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
- ⑫《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第1—3版。
- ⑬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3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 ⑭同上，第223—224页。《教育建设》第1册第75页。
- ⑮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第47—48页（以下简称陈克寒——译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326页。
- ⑯《现行法令汇集》第399页。
- ⑰齐武：第223页。
- ⑱同上，第225页。
- ⑲同上，《现行法令汇集》第432页。
- ⑳《现行法令汇集》第456页。
- ㉑同上。
- ㉒同上，第432页。鲁中行政公署：《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5页。
- ㉓《教育建设》第1册第46页。
- ㉔《现行法令汇集》第432页。
- ㉕《教育建设》第1册第46页。
- ㉖《毛泽东集》（东京：宏文书屋1970—1972年版）第6卷第217页。
- ㉗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118页（以下简称J·贝尔登——译注）。
- ㉘《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第4、11页。《教育建设》第1册第10页。
- ㉙郭洪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第291页（以下简称郭洪涛——译注）。
- 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326页。陈克寒、陈毅：《坚持华北抗战枢纽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见《群众》1939年7月20日版第216页。
- ㉛齐武：第220页。
- ㉜同上。
- ㉝C·W·班德：《龙的利齿》（伦敦：艾伦和安温公司1947年版）第213页。
- ㉞M·林赛：《华北前线》第16页。
- ㉟《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第3版，1943年3月10日第4版。
- ㊱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43页。
- ㊲《抗日根据地改革条例汇集》第11页。在那些儿童入学率已超过60%的地区，目标是把这个比率提高到70%，

- 而那些提出入学率要达到 50% 的地区，是“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第 431 页。
- ⑳《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10 页。
- ㉑《冀中敌人的教育活动》，载《剿共指针》1942 年 1 月 1 日，第 7 号第 25 页。根据《晋察冀日报》的一篇文章。
- ㉒《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0 日。
- ㉓齐武：第 221 页。
- ㉔《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0 日。
- ㉕《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20 日第 3 版。
- ㉖《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10 页。
- ㉗《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0 日。
- ㉘《现行法令汇集》第 453 页。
- ㉙《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1 页。
- ㉚齐武：第 223 页。
- ㉛《剿共指针》1942 年 1 月 1 日第 7 号第 26 页。
- ㉜郭洪涛：第 294 页。齐武：第 227 页。《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 35—36 页。
- ㉝ 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第 114 页。以下简称《工作经验》。
- ㉞《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9、52 页。齐武：第 227—229 页（语录摘自第 228—229 页）。《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 36 页。
- ㉟彭德怀：第 76 页。
- ㊱《鲁中抗日民主政权》第 36—37 页。
- ㊲《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48 页。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北支治安战》第 1 卷第 206 页。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 1946 年版）第 96 页（以下简称周而复——译注）。《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 35 页。
- ㊳周而复：第 96 页。
- ㊴如果不另作说明，以下提到的识字班的情况都来自《工作经验》第 114—118 页。
- ㊵实际上，减少群众中的文盲，显然是一个长期事业。另外“众多的干部”不能读、写报告的事例，见 1943 年 1 月 16 日《解放日报》第 4 版。
- ㊶D·赞古丽亚注意到：“没有多少人能学懂全部指示，但识字看书使人变得更加开放和倾向于改变现状，以及易于接受新的信息，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想象力，并要求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通过读书看报来了解这些日常的生活经验，他们就能意识到事情可能会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发生变化。”赞古丽亚：《亚洲的租佃制度和共产党对农民的动员》，见约翰 W·莱韦斯编：《农民起义和亚洲的共产主义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3 页。赞古利亚引用的材料见本节注㉞，第 318 页。
- ㊷J·贝尔登：第 117 页。
- ㊸《工作经验》第 118—120 页。
- ㊹同上，第 120 页。
- ㊺T·A·比斯森：《1937 年 6 月在延安》第 41 页。
- ㊻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 50 页。
- ㊼同上。
- ㊽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 1939 年版）第 6 页。
- ㊾同上。聂荣臻补充道，干部是如此急需，以致以前的安全保卫人员、秘书、厨师等等，都不得不充当指导员或小的军事单位的指挥员。
- ㊿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政治工作论丛》第 1 册第 218 页。
- ①《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

①①《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第4版。

①②《教育建设》第1期第13—14、23、25页。

①③《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第2—3版。

①④胶东军区政治部编：《两种作风》（1945年版）第1页。

①⑤《现行法令汇集》第429页。

①⑥《工作经验》第9、64页。

①⑦J·埃塞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温塔基丛书 1975年版）第243页。

①⑧《教育建设》第1册第6、92—93页。第2册第7—8、10—12页。日本人的情报承认中共“巧妙地”渗透进了敌伪学校。《华北中共（军队）的活动和对将来之观察》，见《思想月报》1940年10月号第118页。

①⑨齐武：第220页。

①⑩《教育建设》第1册第5、75、93页。《工作经验》第9、17页。《解放日报》1944年7月27日第1—2版，1944年4月7日。《现行法令汇集》第456页。

①⑪《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7年版）第1卷第54页。《毛泽东集》第1卷第246—247页。

①⑫齐武：第224页。

①⑬《教育建设》第2册第34、37页。《工作经验》第68—69、72—74页。

①⑭《现行法令汇集》第403页。

①⑮同上，第462页。

①⑯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第45—46页。

①⑰《北支治安战》第1卷第205页。

①⑱《工作经验》第48页。

①⑲《现行法令汇集》第466页。

①⑳同上。

㉑J·贝尔登：第117页。作者补充道：“然而，考虑到他们能用来工作的人力物力，在我看来，边区教师简直正是在创造奇迹。”

㉒迈克尔·杯赛：《1941—1947共产党中国教育问题笔记》（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1950年版）第35页。

㉓《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第33页。

㉔《工作经验》第52页。

㉕J·米勒：《中国人仍然控制着华北》载《美亚》1938年第337页。

第六章 第二节

①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第122页。以下简称《工作经验》。

②秋吉久纪夫：《华北根据地的文学运动》（东京：1976年版）第170页（以下简称秋吉——译注）。

③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215页（以下简称齐武——译注）。

④秋吉：第170页。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9、98页。《工作经验》第122页。各种当地报纸的目录见秋吉：第170—171、178页；《工作经验》第122—123页；齐武：第214—215页；《解放日报》1941年7月3日第2版。

⑤彭德怀：《三年来的抗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 1940年版）第78页。

⑥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势力调查报告》第179页。

⑦E·斯诺：《为亚洲而战》（上海：凯利和威尔逊出版社 1941年版）第338

— 339 页。

- ⑥秋吉：第 171 页。
⑦D·威尔：《华北敌后战争》，见《东亚》1940 年第 163 页。
⑧《论敌人后方文化工作》，见《群众》1939 年 2 月 14 日版第 634 页。
⑨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 1939 年版）第 58 页（以下简称陈克寒——译注）。
⑩1942 年 5 月，在太行，有 27 名《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被杀害。齐武：第 213 页。
⑪《工作经验》第 123 页。
⑫周而复：《晋察冀行》（阳光出版社 1946 年版）第 19 页。
⑬陈克寒：第 58 页。

第六章 第三节

- ①C·K·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坎布里奇，麻省诸塞，M·I·T 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页。
②迪莉娅·戴维：《妇女工作——革命中国中的妇女和共产党》（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页。
③迪莉娅·戴维：《解放区的妇女》，载马丽恩·杨编：《中国的妇女》（安·阿波，密执安：中国研究中心 1973 年版）第 78 页。
④同上。原始资料见：J·L·布克：《中国土地的利用》（南京：1937 年版）第 293 页。《中国的农业经济》（南京：1930 年版）第 235 页。
⑤I·D·克鲁克：《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伦敦：劳特雷洁和凯甘·保罗图书 1959 年版）第 7 页（以下简称 I·D·克鲁克——译注）。
⑥D·戴维：《妇女工作》第 7—15

页。

- ⑦王玉川：《鲁中一个典型游击区组织》第 125 页。
⑧草野文夫：《支那边区研究》（东京：国民社 1944 年版）第 70 页。
⑨日本资料见《中国妇女工作实况》，载《剿共指南》1941 年 11 月 1 日版第 23 页。
⑩余为群：《华北解放区的新女性》（以下简称余为群——译注）。《群众》1945 年 4 月 5 日版第 179 页。
⑪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82 页。
⑫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 367 页。以下简称《中国政治》。
⑬《解放日报》1942 年 7 月 7 日第 4 版。
⑭I·D·克鲁克：第 44 页。
⑮同上。
⑯《解放日报》1945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社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上海：新华书店 1949 年版）第 23—24 页。
⑰引自 D·戴维：《妇女工作》第 37 页。
⑱同上，第 198—200 页。
⑲同上，第 37 页。戴维补充道：“这期间，发表了许多生产英雄的报告，但是，后来（也就是抗战以后）几乎没有有什么典型榜样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这些农家妇女向落后开战，反对丈夫和婆婆的虐待。”第 38 页。
⑳I·D·克鲁克：第 100—102 页。
㉑D·戴维：《妇女工作》第 36、38—39 页。
㉒《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第 5 页。
㉓《剿共指针》1941 年 11 月 10 日版第

24 页。

②④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 111 页。

以下简称《农业政策》。

②⑤《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10 日第 2 版。也可见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2—173 页。《抗战故事集：妇女》，载 S·格尔德根据中共的材料翻译编辑的《中国共产党人》第 248—249 页。

②⑥曹闾村：《1921—1959 年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第 60 页。

②⑦《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28 日第 3 版。

②⑧I·D·克鲁克：第 70 页。

②⑨D·戴维：《妇女工作》第 43 页。《剿共指针》1941 年 11 月 1 日版第 24 页。

③⑩D·戴维：《妇女工作》第 40 页。

③⑪指示译载于《农业政策》第 111 页。

③⑫余为群：第 179 页。《中国政治》第 373 页。《解放日报》1945 年 3 月 7 日，1944 年 8 月 29 日第 4 版。

③⑬I·D·克鲁克：第 45 页。

③⑭《解放日报》1944 年 7 月 10 日。

③⑮《解放日报》1942 年 7 月 7 日。

③⑯陈克寒：《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载《解放》1941 年 7 月 7 日版第 47、51 页。

③⑰李普：《何谓无拘无束的选举》，载《群众》1945 年 9 月 15 日版第 606 页。

③⑱今编诚二：《中国的民众和权力》第 94 页。资料来源，彭真 1942 年的报告。

③⑲李公朴：《华北敌后》（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96 页（以下简称李公朴——译注）。

③⑳《中国政治》第 327 页。

④①李公朴：第 96 页。

④②陈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重庆：新华日报馆 1939 年版）第 94 页。

④③彭德怀：《三年来的抗战》第 62 页。

④④《农业政策》第 303 页。

④⑤陈克寒的文章，载《解放》1941 年 7 月 7 日版第 47 页。

④⑥《中国政治》第 368 页。

④⑦林朗：《晋察冀边区妇女自卫军》，载《通讯》1941 年 4 月 5 日版第 37—42 页。译自 1941 年 2 月 22 日《新华日报》。

④⑧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第 33 页。

④⑨《中共工作会议报告》，见《情报》1940 年 1 月 1 日版第 56 页。

④⑩教育阵地社编：《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1 页。

④⑪同上，第 10 页。

④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第 453 页。

④⑬《中国政治》第 375 页。

④⑭余为群：第 179 页。

④⑮《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第 1 册第 14—15 页。《现行法令汇集》第 486 页。

④⑯《中国政治》第 372 页。

1941 年以来延安《解放日报》有关文章的目录

1941 年

- 3 月10日第 1 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成功》
- 5 月24日第 1 版:《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
- 7 月3日第 2 版:《晋察冀出版书刊多种》
- 7 月14日第 1 版:《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
- 7 月25日第 2 版:《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决定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 7 月26日第 2 版:《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向晋冀鲁豫临参会报告工作》
- 8 月11日第 2 版:《四年来的冀中》
- 9 月7日第 2 版:《襄生:《晋察冀边区财政建设中的创举》》
- 9 月21日第 3 版:《刘伯承:《晋冀鲁豫胜利辉煌》》
- 10 月11日第 3 版:《敌寇对晋察冀军区的扫荡》
- 12 月6日第 1 版:《精兵简政》
- 12 月7日第 1 版:《敌后游击战争的新任务》
- 12 月28日第 3 版:《邸华:《今年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

1942 年

- 1 月15日第 3 版:《邸华、雷辉:《敌寇

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

- 1 月24日第 3 版:《廖季立:《日寇对华北经济掠夺的三时期》》
- 2 月3日第 3 版:《华北青年运动》
- 2 月6日第 1 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 2 月11日第 3 版:《黄韦文:《关于根据地减租减息的一些材料》》
- 2 月24日第 3 版:《甘泗淇:《晋西北自力更生的经验》》
- 3 月13日第 1 版:《实行三三制,贯彻党的领导》
- 3 月23日第 3 版:《冷冰:《介绍晋冀鲁豫边区》》
- 4 月12日第 2 版:《若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 4 月20、21日第 3 版:《韦文:《晋西北的土地问题》》
- 5 月24、25日第 2 版:《罗瑞卿:《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结问题》》
- 5 月31日第 2 版:《大风:《晋西北人民在敌寇“扫荡”中》》
- 6 月2日第 3 版:《钟人方:《敌后部队的精兵简政》》
- 6 月7日第 1 版:《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
- 6 月13日第 3 版:《敌后武装斗争重要的一环,民兵》
- 6 月23日第 1 版:《再论敌后精兵简政》

6月25日第2版：陶铸：《再谈精兵简政》

6月29日第2版：赵继武：《敌伪矛盾和争取伪军工作的条件》

7月2日第2、3版：庸庸：《略论晋西北四区政权工作的缺点》

7月4日第2版：《敌占区政权工作几个问题的商榷》

7月7日第4版：王若飞：《我们怎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7月8日第4版：李凡夫：《沦陷区的土地问题》

7月9日第3版：丁甘如：《坚持五年抗战的冀中》

8月12日第2版：亚苏：《敌寇在晋西北争夺政权的活动》

8月19日第2版：毛铎：《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

9月4日第1版：《我们始终同老百姓在一起》

9月7日第1版：《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9月9日第1、2版：《敌后形势与我军政治工作》

9月11日第3版：姜凝光：《政权工作中的八股作风》

10月16日第1版：诞登：《山东怎样实行精兵简政》

10月25日第2版：《坚持华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条件》

10月31日第2版：《中共晋绥分局提出晋西北施政纲领》

11月2日第1版：《主力与民兵》

11月4日第3版：孙后礼：《晋察冀的民兵》

11月10日第1版：《提高领导改造作

风》

11月16日第4版：李凡夫：《评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1月17日第2版：《晋西北临参会闭幕宣言》

11月23日第1版：《敌寇“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2月13日第3版：薛奇：《晋西北发展民兵的经验》

12月15日第2版：《晋西北在反蚕食斗争的烈火中》

1943年

1月5日第2版：聂长林：《晋察冀的合作事业》

1月16日第4版：彭真：《工农干部要学文化》

1月18日第4版：孙后礼：《晋察冀对敌市场斗争》

1月23日第4版：石毅：《什么是“变工”和“扎工”》

1月24日第2版：《敌寇在华北的“集粮”》

1月25日第1版：《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2月15日第4版：《晋西北的民兵》

2月25日第3版：《晋察冀边区的春耕贷款》

3月10日第1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成功》

3月14日第3版：《敌人“扫荡”太岳的三个特点》

4月20日第3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缩影》

5月3日第4版：陶铸：《论目前敌后战争的特点》

5月31日第2版：《四次简政面貌一新》

6月2日第4版：钟人方：《敌后战争的新形势》

6月2日第4版：《如何反敌“总力战”》

7月2日第4版：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7月3日第4版：薄一波：《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怎样建设的》

7月3日第4版：彭德怀：《我们怎样坚持华北六年的抗战》

7月4日第4版：《爱山东保卫山东是山东人民无可推诿的责任》

7月7日第4版：刘伯承：《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

7月8日第4版：林枫：《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

7月16日第2、3版：吕正操：《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

8月18日第4版：《雷英夫》（“埋雷英雄”）

10月1日第1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10月24日第3版：《山东的整风学习》

10月26日第3版：《太行区生产会议速写》

12月31日第2版：《太行军区政治部展开拥政爱民运动》

1944年

1月17日第1版：《向沁源军民致敬》

4月7日第1版：《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

4月17日第1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

5月7日第1、2版：《太行区三次拥政总结》

5月9日第3版：《晋西北军区司令

部、政治部开荒经验》

5月10日第3版：《晋察冀三分局创立劳动互助合作社》

5月26日第1版：《敌后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发展》

6月1日第3版：《北岳区抢收抢种的经验》

6月2日第3版：《滨海区营南变工互助的分析》

6月29日第4版：华山：《窑洞阵地战》

7月4日第2版：《冀中平原部队生产》

7月7日第4版：朱德：《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7月8日第4版：《活跃于敌后战场的民兵》

7月9日第4版：程子华：《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

7月10日第1版：《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

7月10日第2版：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纺织手工业》

7月10日第4版：孙元范：《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

7月11日第4版：孙元范续作。

7月16日第4版：《战斗中成长的晋绥边区》

7月17日第4版：《战斗》续完。

7月18日第1版：肖华：《山东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7月21日第4版：李候森：《新山东的成长》

7月22日第4版：李候森：续完。

7月22日第3版：《晋绥抗战第八周年对敌斗争概述》

7月27日第1、2版：《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

7月28日第3版：朱则民：《山东民兵一年的斗争》
7月30日第4版：刘雪初：《敌后我军怎样帮助人民生产》
8月3日第2版：《晋察冀的大生产运动》
8月6日第4版 刘雪初：《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生产战斗》
8月10日第1版：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
8月21日第4版：李心靖：《民兵英雄运动》
8月28日第1版：《山东捷报》
8月29日第4版：吴宏毅：《从灾荒中站起来，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
9月16日第1、2版：《华北护麦胜利》
9月16日第3版：《晋察冀四分区护麦斗争的胜利》
10月9日第4版：吴宏毅：《如何解决灾荒中的社会问题》
11月26日第1版：《山东的新胜利》
12月6日第4版：焦崇一：《太行对敌货币斗争的一角》
12月16日第1版：《1945年的任务》
12月28日第3版：《晋绥边区的战斗生产与建设》
12月31日第2版：《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

1945年

1月18日第3版：《敌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
1月29日第1、2版：《迎接解放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第二年》
1月31日第1版：《游击区也能够生

产，也必须生产》

2月1日第3版：《晋绥边区劳武结合一年来的新发展》
2月9日第1版：《贯彻减租》
2月10日第3版：《李溪兰武工队》
2月12日第2版：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
2月24日第3版：《涉县更乐村减租运动中两种方法》
2月28日第3版：《中共晋绥分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
3月1日第1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
3月2日第1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经验》
3月7日第1版：《更进一步发动解放区妇女参加生产卫生运动》
3月12日第3版：李候森：《介绍晋察冀的劳动互助合作社》
3月26日第2版：《胶东农业合作社介绍》
4月1日第3版：《小官庄变工队的成长》
4月4日第3版：《太岳阳南检讨减租工作》
4月5日李候森：《敌后统治地区农村破产实况》
4月7日第1版：《敌后解放区一月动态》
4月22日第3版：《莒南的参军工作》
4月23日第1版：《庆祝陵川解放》
4月27日第1版：《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
5月3日第2版：《晋绥变工互助的几个问题》
5月3日第3版：《晋绥变工合作社》
5月9日第1—4版：朱德：《论解放

区战场》

5月15日第1版：《迎接新局面》

6月27日第2版：《太行六分区救灾经验介绍》

7月29日第3版：《山东人民参军运动》

7月30日第2版：《太行的合作社与救

灾工作》

7月30日第3版：《太行区减租减息的发展》

8月8日第3版：《晋绥解放区民兵建设》

8月10日第2版：《太行和左战役中民兵参战区的不少经验》